

# SGRA REPORT

SGRA报告 No. 106 中文版

## NO. 106

ISSN 1346-0382

第72届SGRA论坛

## 第八届 日本·中国·韩国 国史对话的可能性

20世纪的战争·殖民统治与和解的历史叙述  
—教育·媒介·研究

## 第八届 日本·中国·韩国 国史对话的可能性

### 20 世纪的战争·殖民统治与和解的历史叙述 —教育·媒介·研究

#### ■ 举办背景（详细内容请参考 p11）

本“国史对话”项目的目的是促进各国的国史研究者之间的对话与交流。自 2016 年发起至今已成功举办了 7 届。诸多参与者跨越国境齐聚一堂，围绕各国历史研究的现状与挑战、个案实证研究展开讨论，深化了交流。在新冠疫情背景下仍秉持着应继续对话的方针，自 2021 年起进行了 3 届线上举办的尝试，实现了深度讨论的持续进行。

本届论坛是第 8 届，睽违 3 年回归了线下方式举办。无法亲赴现场的各位则在线参加了本次会议。与疫情前相同，本届论坛由中日韩各 3 篇、共 9 篇论文报告及相关讨论构成。为促进对话顺利进行，本届论坛也安排了中日、日韩、中韩语言的同声传译。

#### ■ 举办主旨

“国史对话”于 2016 年开始举办，旨在加深中日韩“国史”研究者之间的交流，为搭建知识平台，克服横亘在三国之间的历史认识问题提供思考。

东亚历史问题的起因，通常被认为是源自对 20 世纪的战争与殖民统治的不同认知。但是，正如公开发表的日韩、中日历史共同研究报告书所示，尽管对于个别历史事实的解释存在差异，但在 20 世纪东亚历史的基本认识上并无重大不一致之处。尽管如此，东亚国际关系仍时常因为历史问题产生纷争，其中一个原因便是对对方“历史认识”的认识不足。

战后的东亚经历了冷战、和解、日本主导的经济合作、中国的崛起等众多局面与复杂变动。各国在各自的政治、社会环境中，基于本国史的脉络形成了各自的历史观，并普及到国民中去。战后各国的历史观是在半封闭的历史环境中形成的。对于各国的历史认识的形成过程、内在逻辑、与政治的关系、向国民普及的过程等的相关信息，尚未在东亚历史学家之间共享。有关历史认识的对立，与上述信息的缺失密切相关。

各国国民对于 20 世纪的战争与殖民统治的历史认识，是在国家历史观、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历史学家的研究与成果公布、媒介、文化与艺术等复杂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众所周知，历史学家的研究与国家历史观在保持紧张关系的同时，对学校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本届对话的主题之一便是历史学家在战后是如何从事历史研究的。战后东亚各国的政治发生巨变，使得历史学家的历史研究与历史认识也产生了激烈的动摇。而追踪历史学家的研究及其成果公布的轨迹，可以说是确认各国历史认识形成过程的有效手段。

电影与电视等媒介也在国民历史认识的形成上起到了重要作用。战后，各国从各自的历史观出发创作了众多与战争、殖民地相关的作品，而这些作品对国民的历史认识所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此外，在展开媒体交流的过程中，各国合作创作了众多电影与电视剧。各国国民通过观赏这些作品间接参与了历史对话。各国的文化、社会环境如何影响了历史认识？这是另一个想要确认的问题。

当围绕历史认识的国家之间的对立发生时，关注点多在如何指出对方的历史解释与历史认识中的问题点。但由本国国内发生的政治、社会变动所诱发的历史认识的对立其实更多。认识对方的历史认识的过程，可以说也是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认识的机会。从该观点出发，第 8 届国史对话做出了进一步深化一直以来对话的尝试。

## 关于 SGRA

关口全球研究会 (Sekiguchi Global Research Association/SGRA) 以推动实现良好的地球市民为目标于 2000 年成立，因渥美国际交流财团所在地东京都文京区“关口”而得名。SGRA 以在日本各大学的研究生院从事研究活动的渥美奖学生的外国学者以及日本的研究者为中心，为应对各种现代课题而进行研究及献策，并通过论坛以及报告书等形式公诸于社会。SGRA 以开展领域广阔的、国际化的、跨学科的研究活动为愿景，推动多国籍的研究人员广集智慧与人脉，从多方面的数据入手，展开分析和考察。

([www.aisf.or.jp/sgra/chinese](http://www.aisf.or.jp/sgra/chinese))

## 第八届

日本·中国·韩国  
国史对话的可能性20 世纪的战争·殖民统治与和解的历史叙述  
—教育·媒介·研究

|     |                          |
|-----|--------------------------|
| 日期  | 2023年8月8日(周二)至9日(周三)     |
| 会场  | 早稻田大学14号馆8楼+线上           |
| 主办方 | 日本·中国·韩国国史对话的可能性组织委员会    |
| 协办方 | 渥美国际交流财团关口全球研究会(SGRA)    |
| 协办方 | 早稻田大学先端社会科学研究所·东亚国际关系研究所 |
| 赞助  | 高桥产业经济研究财团               |



**第 1 场** [主持人：村 和明 (东京大学)]

**【开幕致辞】** 刘 杰 (早稻田大学) 5

**【主旨说明】** 三谷 博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7

**第 2 场** 副主题：**教育** [主持人：南 基正 (首尔大学)]

**【报告 1 (韩国)】** 解放后韩国知识界的去殖民话语及历史叙事架构的变化 13

金 泰雄 (首尔大学)

**【报告 2 (中国)】** 历史记忆的战争与历史书写的伦理  
——有关 20 世纪中期中国的“历史之战” 26

唐 小兵 (华东师范大学)

**【报告 3 (日本)】** 日本的历史教育如何讲述战争与殖民统治  
——基于教科书与教育现场的思考 33

盐出浩之 (京都大学)

**【讨论·提问答疑】** 报告人互评·回应与会者提问 43

**第 3 场** 副主题：**媒介** [主持人：李 恩民 (樱美林大学)]

**【报告 4 (中国)】** 自保、爱国与屈从：  
一个伪满“合作者”的心态探微 50

江 沛 (南开大学)

|             |  |     |
|-------------|--|-----|
| 【报告 5 (日本)】 | 战后日本的媒体文化与“战争叙事”之变迁<br>福间良明 (立命馆大学)  | 57  |
| 【报告 6 (韩国)】 | 现代韩国媒体的殖民地、战争经验形象化及其影响<br>——以电影、电视剧为中心<br>李基勋 (延世大学)   | 65  |
| 【讨论·提问答疑】   | 报告人互评·回应与会者提问  | 77  |
| 第 4 场       | 副主题：研究 [主持人：宋志勇 (南开大学)]  |     |
| 【报告 7 (日本)】 | “我”的历史，“我们”的历史<br>——以色川大吉的“本人史”论为线索<br>安冈健一 (大阪大学)   | 83  |
| 【报告 8 (韩国)】 | 在“发展”之外，书写新的历史的可能性：<br>韩国殖民地时期经济史研究的方向<br>梁知惠 (东北亚历史财团)  | 91  |
| 【报告 9 (中国)】 | 民国时期中国人对“日本军阀”的认知<br>陈红民 (浙江大学)  | 98  |
| 【讨论·提问答疑】   | 报告人互评·回应与会者提问<br>论点整理 刘杰 (早稻田大学)   | 108 |
| 第 5 场       | 指定讨论／全体讨论 [主持人：郑淳一 (高丽大学)]<br>讲在讨论开始之前：三谷博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br>指定讨论者 (按发言顺序排序)：<br>金宪柱 (国立韩巴大学)、袁庆丰 (中国传媒大学)、<br>吉井文美 (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史博公 (中国传媒大学) | 117 |
| 第 6 场       | 指定讨论／全体讨论 [主持人：彭浩 (大阪公立大学)]<br>指定讨论者 (按发言顺序排序)：<br>张晓刚 (长春师范大学)、金濤 (首尔大学)、平山升 (神奈川大学)  | 132 |
| 【闭幕致辞】      | 赵珖 (高丽大学名誉教授)  | 151 |
|             | 对 8 届国史对话的回顾与展望<br>今西淳子 (渥美国际交流财团)   | 153 |
|             | 讲师简介   | 155 |
|             | 代后记<br>金囿泰   | 157 |
|             | 参加者名单  | 162 |

※同声传译  
日语⇔中文：  
丁莉 (北京大学)、  
宋刚 (北京外国语大学)  
日语⇔韩语：  
李惠利 (韩国外国语大学)、  
安暎姬 (韩国外国语大学)  
中文⇔韩语：  
金丹实 (翻译工作者)、  
朴贤 (京都大学)

※所属·职称以本论坛举办时为准。

## 开幕致辞



## 刘杰

早稻田大学

作为本次会议的主办方的一员，在会议开始之前由我将国史对话的状况跟大家做一个简单介绍。

本次对话的题目是“20 世纪的战争·殖民统治与和解的历史叙述”，我们决定做这个题目，实际上是经过了比较长时间的犹豫和讨论之后才做出的决定。我们在决定以这个题目进行讨论的时候，考虑到我们是从 13 世纪的蒙古帝国的扩张开始第一次对话，那么我们经过 17 世纪，还有 19 世纪一些问题的讨论之后，似乎是我们应该进入 20 世纪，对 20 世纪的战争和殖民统治进行一次对话的时候了。但是我们之所以犹豫，是因为这个题目的对话，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对话。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很多个对话当中，大家都遇到了很多的挫折，没有取得所谓的比较圆满的一个结果。我们已经以“‘东亚’的诞生：19 世纪国际秩序的转换”为主题进行过一次对话，这次我们以“20 世纪的战争·殖民统治与和解的历史叙述”为主题进行对话，主要是基于我们认为现在可以进行一个比较冷静的对话了，是我们认为条件比较成熟了这样一个理解。

那么我认为有必要对“国史对话”的历程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为什么要对话？我们开始本对话的时候，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就是东亚三国的历史认识问题所造成的三个国家的国民感情之间的对立。

根据在中国和日本之间进行的对对方国家印象的舆论调查的结果，日本人对中国持有不良印象的人现在高达 90% 左右，中国人对日本有不好印象的比例也是相当高的。造成这个状况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中国的舆论，之所以中国人对日本有不良印象，它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左边的这条线，很多中国人认为日本对于过去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没有认真做好反省，这个依然是至今为止很多中国人对日本抱有不良印象的主要原因。但是在日本方面，对中国抱有不良印象的原因，很多日本人也会讲到历史认识问题，主要是因为中国反复用历史认识问题对日本进行批评，这个原因造成的日本人对中国的印象不好。当然，日本人对中国印象不好的主要原因，现在已经不是历史问题。但是中国人对日本印象不好的第一个原因依然是历史认识问题。这是我们之所以进行历史对话的一个比较远的一个原因。

我今天主要从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的关系来讲。中国和日本从邦交正常化到现在，已经走过了 50 多年的历程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两国的知识分子之间进行过很多共同研究，但是所谓的对话，还是比较新鲜的事情。共同研究的时候，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原则，叫做“求同存异”，所谓的“求同存异”就是尽量地把我们共同的认识凑到一起，然后达成一个比较圆满的共同研究的结果。那么认识不同的地方，就把它暂时搁置起来。最早的一次比较大规模的共同研究，就是在 1987 年抗日战

争爆发 50 周年的时候进行的，那么这个研究基本上就是一个求同存异的结果。

那么这个求同存异的结果，实际上我刚才讲过是一个共同研究的做法。那么到了对话，什么时候开始对话呢？我认为这是历史认识问题开始影响到政治和外交的问题，从而对两国的关系造成很大的影响的时候，人们开始觉得要进行历史对话了，而不是简单的“求同存异”了。但是我们发现，最初的对话主要是批评对方的历史认识，尽量地让对方接受自己这方的历史认识，这是历史对话最初的一个形态。但是这个对话，之所以说它艰难就是艰难在这里，大家很难接受对方的想法，也很难放弃自己的想法。后来我们就有一个提案，我们又举办了一次叫做“跨越国境的历史对话”的会议。这个“跨越国境”不是国家和国家，不同的国家的人进行对话的意思，是我们在我们的心里把国境放掉，在心里没有国境界限，这种对话的可能性有没有，我们是在思考这么一个新的对话方式。同时，也是把历史和政治之间尽量地拉开距离，在这样一个前提下，进行历史对话。经过很多年的对话的交流和各国的学术状况的变化，我们知道在东亚三国的历史学者之间，逐渐地形成了一个知识的网络和知识的平台，我们希望这个知识的网络的平台能够变得更加牢固，所以我们从十三世纪蒙古帝国的形成、扩张，从这个角度开始对话，然后我们对话的基础打得更牢固一些。

经过这些对话，我们现在可以思考我们历史对话的现状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我们认为，东亚的历史学者之间，经过对话，已经基本上构筑成了一个共有知识的平台，而且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开始思考一些过去没有思考过的问题。比如说，各个国家历史认识问题的不同和对立，并不是因为对方国家和自己国家的对立，认识不同所造成的对立，而更多的是源于自己国家内发生的政治、社会变动所诱发的历史认识的不同。同时，在倾听对方历史认识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同时思考自己的历史认识问题，自己国家内部的历史问题。就是说，我们不是简单地把历史认识问题归罪于对方和我的认识不同，而是要在和对方对话的过程当中也思考自己的历史认识问题，这可能是历史对话一个新的课题。所以我们这次在思考讨论这样一个课题的时候，也是基于这么一个想法。我们看了一下这次对话的几篇论文，我们都可以发现，每篇论文基本上都反映了刚才我谈到的这样一个基本观点。所以我们对从今天开始到明天为止的国史对话有非常大的期待。

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各位。



## 三谷 博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原文为日语。翻译：于宁（东京大学）]

大家早上好。在刘杰老师的发言之后，由我来对本次会议的主旨做一个补充。

本国史对话项目的启动要追溯至8、9年前，先是刘杰老师同今西女士进行讨论，然后邀请我参与协助，于是本项目就此启动。其实今天我们要进行对话的题目正是当时启动阶段我们最想探讨的主题，但我们担心一开始就从这个主题开始可能不利于项目的启动，于是便采取迂回作战的策略，先从蒙古来袭这一古代时期开始了对话。之后历经数年，今天终于可以讨论我们原本想要探讨的主题了。

不过在此期间，世事变迁，既有积极的变化，也有消极的变化，而我们今天可以在早稻田大学相聚，我们真的不胜欣喜。我今天在补充发言中想谈一谈我在本国史对话项目中的个人经验。到目前为止我应该还没有机会把我的全部经验讲出来。可能只能讲一个大概，我想先谈一下我在历年的国史对话项目中所做的一些工作，在这些工作背后，日本与邻国韩国、中国的国民之间存在过哪些对话，希望以此可以唤醒大家在这方面的相关历史记忆。这是我想谈的第一点。

此外，对于今天接下来要展开的对话，我有几点希望大家注意的要点，这是我之后想要谈的第二点。

先谈一下我的个人经验。我专攻19世纪日本史，特别是明治维新及其政治外交史。在此基础上我也对19世纪东亚整体的关系有所研究。最近我则同国内外的研究者一起，从17世纪的英国革命到本世纪初所谓“阿拉伯之春”之间选取了8个革命进行比较研究，试图通过该研究探究曾经作为世界最大规模革命之一的明治维新这一事件的究竟。所以，我的研究关注的重心其实是在19世纪后半期的日本。而本次国史对话关注的焦点是20世纪前半期的历史。这与我的专攻相距甚远。所以老实说，作为研究者而言，研究19世纪的人很少会越界去谈论20世纪前半期的问题。但是我因为各种缘由，会进入到这个领域，所以今天我也来到了这里。

我试图回想，我最早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大概是什么时候呢？我已忘了具体的时间，就所谓的历史教科书问题与外国的各位老师开始对话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最早的时候是邀请外国的老师们来东京，询问他们国家的历史教科书如何书写日本，然后向他们提出希望修改的地方的请求。最初就是做这样的工作，当时从泰国、美国等很多国家邀请了专家学者过来。其中，韩国的老师们来的时候，会议结束后我们在酒店的大厅喝茶。当时韩国方面的中心人物是郑在贞老师。他当时是首尔市立大学的老师，后来担任了东北亚历史财团的理事长。我们年龄相仿，当时都还年轻，我们喝着茶聊着天，郑在贞老师突然说到“我们国家历史的一部分是外国的历史”。“啊，什么意思？”我一开始被他这句话吓了一跳。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啊，原来如此”，过了一会儿之后我意识到原来他讲的是日本统治时期，即殖民地时期。当时，有一个瞬间，我想到如果日本也是相同的状态的话会怎样呢？于是我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

其实我大学本科毕业论文写的是“(伪)满洲国”成立的经过，所以我是知道殖民地与殖民统治这一事实的。知道这一事实的当然不只是我，日本的初中、高中教科书中明确记载了这一事实。但问题是，这一事实意味着什么，我们完全没有思考过。因此，我就日本人如何前往殖民地及其在殖民地的所作所为进行了多方面的考察并写成了书，但那时候，对于被殖民统治一方的人们的感受，在课堂上没有人教过我，我也没有读到过相关内容。对于这种无知透顶的状态必须做出改变。于是在那时我终于意识到，仅从日本人的视角出发从事一些细碎的研究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不去了解对方国家的人们所遭受的经历，是无法去思考殖民地统治与战争的。那时我大概40岁上下，已经从事历史研究工作20年左右。正是因为我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哪怕20世纪的历史不是我专攻的领域，我也必须要对这一时期的问题进行严肃的思考。这便是我关注这个问题的缘起。

之后，众所周知，在本世纪第一个年头的2001年，围绕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产生了激烈争论。右翼团体编写的教科书通过了文部科学省的审定并开始发售。对此在国内自然是引发了激烈的论战。战火也蔓延到了邻国，韩国和中国都对日本政府提出了抗议，从3月到7月左右期间，这场声势浩大的论战在日本开展得如火如荼，书店里的展示台上也铺满了相关书籍。

虽说这并非我专攻的历史时期，但我也曾前去同行们召开的国内外的会议进行讨论。但反倒得到了很好的结果。在那之前，对彼此并不感兴趣的各国历史学者们，比如，中国的日本史相关的研究者，以及研究国际关系的人可能会对日本有兴趣，但研究本国史的学者表现出的是日本历史跟自己的研究毫不相关的态度。但恰恰因为引发了这个非常大的政治问题，大家开始对彼此产生了兴趣。然后各大团体也开始提供资金支持，在各大城市召开了各种会议。其中有北京、首尔，当然也有东京，甚至还在美国的城市也召开过。

为什么民间团体在这个时候跟政府一样对该议题提供这样的支持呢？因为相关的三国政府都采取了将该历史问题与政治、外交隔离的方针。当时中国和韩国还在从日本获取各种各样的经济与技术方面的援助。所以，即便心里有想法，也无法直接向日本说出来。直至本世纪初其实存在着与现在完全不同的国际关系。所以，在当时如果认为当下的生存，以及面向未来的经济建设更重要的话，自然就无法向日本讲出真实想法。既然政府无法讲，那就请学者们代替政府讲吧，我觉得这是当时各国政府做出的一个判断。因此，学者之间的对话才在当时获得了巨大的支持。

在当时，当然也召开了由政府直接赞助的日韩对话、中日对话，但我因自身原因并未参与政府相关的工作。我并非反政府人士，只是作为学者不想这么做，所以就没有参与。与此相对，我积极推动了民间层面的工作。当时将我拉进这个领域的正是今天在场的刘杰老师。同刘老师一起做的是中日相关的工作，而与日韩相关的工作是跟同样来自早稻田大学的李成市老师一起推进的。李老师在今年春天退休了。正是他们将我带入这个领域，让我学到了很多。因为这个机缘，我在民间层面与中日、日韩之间建立起了很深的联系，并不断涌现出成果。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便是刘杰老师和我与美国华盛顿大学的杨大庆老师共同主编的《超越国境的历史认识》（东京大学出版会，2006年）。刘杰老师召集了年轻的研究者，提议大家对中日关系中的敏感部分和棘手的议题，基于一手史料进行确切的书写。我们不断邀请不同的人进行对话，最终将之集结成书。北京的出版社也出版了中文版，之后在杨大庆老

师的努力下英文版也面世了。

在当时，对于同中国和韩国学者之间的对话，起初我是很害怕的。当时的研究会虽然是刘杰老师主导的，但我参加的时候其实怕得要命。在那之前我也曾出席过历史对话的会议，通常都是日方会遭受指责。不客气地说，是真的会被痛骂。因为之前看到过这样的场面，所以我很害怕。但刘杰老师的研究会并非如此，其原则是以史料为依据进行确切的讨论。研究会请的都是能够遵守这个原则的研究者。即便如此，我还是会有害怕的时候，比如杨大庆老师参加的时候主题是南京大屠杀，但因为进行了确切的对话与讨论，我终于放下心来。原来严肃学者之间的对话是能够成立的，体会到这一点之后我的恐惧就消失不见了。自那之后，我就对这类会议脱敏了。在各种不同的会议上进行对话，确实会有不同的见解出现。虽然意见相左，但就对方为何会持不同见解进行思考，就能看清其背景。如此一来，自己便无需过分生气烦闷。此后这样的对话一直持续，2008年的时候，我恰巧在哈佛大学，然后邀请了刘杰老师、李成市老师，以及其他很多中国和韩国的老师前来召开了大型的公开报告会。会议最后，我说，“今后，只要政治家们不出什么幺蛾子，我们的历史对话肯定能顺利开展下去”，我到现在都还记得自己说的这句话。

这是我在2008年说的话。但现实却朝着反方向发展了。2010年在尖阁列岛(钓鱼岛)海域，发生了中国的渔船冲撞日本巡视船的事件。两年后的2012年又发生了韩国总统登陆竹岛的事件。此后日本的舆论一下子就变得强硬起来。到处都充斥着认为日本一直在被进犯的不满情绪。因此，日本政府修改了2014年以前的历史教科书审定标准，将此前顾及邻国历史认识的相关条款删除。在日本发生了这样的变化。自那之后，对于历史问题，无论是在邻国之间，还是在国内，开始觉得无论如何对话都是白费力气。我暂时退出了这样的对话，就是因为认为无论做什么都是白搭。

而就在那时渥美财团的今西女士与刘杰老师提议重新开启对话。起初我是消极参加的，但渐渐开始觉得这是可以持续下去的。特别是各位年轻学者，以前感觉年轻学者对此漠不关心，但他们也开始参加我们的对话，所以我真的非常高兴。此外，因为此前的历史对话都是探讨一些紧张危急的政治问题，所以我们也考虑举办真正具有学术研究意义的青年学者的交流会。于是在上海复旦大学的张翔老师和首尔大学的朴薰老师的协助下，在早稻田大学、复旦大学、首尔大学三校间轮流举办了年轻学者的大型学术会议。之后以日语出版了一本很厚的书(三谷、张翔、朴薰编《交响东亚史》东京大学出版会，2019年)。我相信这本书在今后会展现出它的价值。

刚才讲的这些只是我想讲的内容的一半，但只剩两分钟了，我抓紧讲。

“历史认识”这个词在日语中应该是普通名词，但在东亚却是专有名词。即“日本对邻国的侵略与加害”。邻国的人民一直在追问现在的日本人，对于20世纪前半期日本人对于他们先辈犯下的罪行作何感想，有没有真正做出反思。而日本要对此如何作答，是个问题。日方需要做的事是非常明确的，即正视20世纪前半期日本的前人们的所作所为，共享这份记忆。无论如何这都是必要的。但要讲给普通日本人是困难的。哪怕在现在依然很困难。我们说这是事实，但他们并不想听，会堵上耳朵。年轻人更是如此。但是事实就是，日本对韩国的合并、统治持续了36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持续了15年，想对此进行掩盖的任何努力都只能是徒劳。日本的右翼中有一部分人会挑出一些小的事件叫嚣“这其实是不存在的”。他们好

像以为，只要能够证明他们挑出来的这些小事件是不存在的，就可以等同于日本对于中国的侵略这整个事实是不存在的。这个逻辑根本就是不成立的。但要如何说服普通日本人还是很困难的。

而我对于邻国方面也有几个请求。从时间的间隔来看，自日本的侵略结束、帝国瓦解、殖民统治终结已经过去了78年了。在经历了三、四个世代之后现在生活着的人们，哪怕他们是前加害国与前受害国的国民，但毕竟都不是当事人。我认为必须要对这一点有充分的意识。

还有最后一个请求。这个名叫日本的国家只有一个吗？只要被叫作日本或日本人，就必定会采取相同的行动吗？政治文化确实有很强的持续性，比如日本人不喜欢辩论这一点是从很久以前一直持续至今的。但对外的态度却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丰臣秀吉曾两度入侵朝鲜半岛，他其实是想统治中国的，就像当时的满洲人那样，所以当时是非常具有攻击性的。但在丰臣秀吉之后承袭的德川家康，及之后的德川家掌权的274年间，维持了完全的和平。非但没有发动对外战争，就是在国内也没有引发内乱。我认为这在世界史上都是一个罕见的纪录。而在这个完全的和平时期之后，从日清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开始日本人又变得非常好战了。直至1945年被美国打到体无完肤为止的51年间，好战状态一直持续。而在战败后，日本决定不发动任何战争，到现在已经持续了78年。所以虽然都叫日本，但在对外行动方面并没有一贯性，甚至可以说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游走。

所以，我想问问大家，在今后各位想要日本再走向另一个极端吗？自不必言，这对于彼此来说都不是好事。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我想请大家做什么呢？我希望邻国的各位可以对在战后日本人没有发动战争这件事给出正当评价。我曾向我认识的中国人表达过这一希望，但他回答说这并非是日本人反省的结果，而是因为受美国控制而不得不这么做。现在在日本有7座大型美军基地，如果日本要反抗美国，就必定会被击垮，正是因为惧怕这一点，所以日本即便想也不敢发动战争，这便是他的解释。对此，各国是怎么认为的呢？当时我回应说“不是这样的”。我从小是在不断听着父母“绝对不可以再发动战争”的告诫中长大的。前几天，我回老家的时候跟高中同学聊天谈到了乌克兰战争，我便说“我父母一直这么告诫我”，而大家都应和道“是的，没错”。而这当中也有所谓带有偏右翼思想的人。就连他都认可我的说法。所以，战后的日本人是共享了这样的经验的。对于这一点我是希望能得到邻国的各位的认可，并希望各位可以跟我说请继续保持下去。这就是我今天最想请求大家的一点。

最后谈一下开展对话时的技术性问题，即为了今后可以共享更好的未来，我们应该如何去讲述过去的问题。首先，自己的报告当然非常重要。但希望在各自的报告之余，要尽可能去倾听其他人的报告内容。然后希望各位能注意到其他人的报告中出现的与自己意见不同的地方，并就产生不同意见的原因进行思考。明天会进行综合讨论，希望各位在今天听取其他老师报告的时候做好笔记，为明天就相关议题进行讨论发言做好准备。我有点超时了，就补充这一点请求。我的发言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 ■ “国史对话”项目历程

渥美国际交流财团于2015年7月举办了第49届SGRA(关口全球研究会)论坛,讨论了“东亚公共财产”和“东亚的市民社会”的可能性。通过讨论确认了,首先我们要在东亚建立“知识共享空间”或“知识平台”,之后向东亚提供和解型策略的意义。

2016年9月以第3届亚洲未来会议为契机我们举办了首届“国史对话”,“国史对话”平台就是这样诞生的。迄今为止三个国家的研究者之间虽然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对话,但能左右各国历史认识的“国史研究者”之间的交流还不够充分,从这一意识出发,我们首先探寻了可能让东亚历史形成对话的条件。具体是通过三谷博老师(东京大学名誉教授)、葛兆光老师(复旦大学教授)、赵珖老师(高丽大学名誉教授)的报告演讲,探讨中日韩三国各自的“国史”如何处理亚洲的问题。

为从结构上理解本国史与国际关系,第2届国史对话设定了“蒙古来袭和13世纪蒙古帝国的全球化”的主题。2017年8月在北九州,来自日本、中国、韩国、蒙古的11名国史研究者聚集在一起,从各国国史的角度进行研究报告后,从东亚历史的角度,对朝贡册封、蒙古史与中国史、资料的处理方法等问题进行了积极的讨论。此次会议的多个报告都表明,只要关注东亚整体的动向,不仅能看出国际关系,还会找到能更深入理解单个国家和社会的线索。

第3届国史对话进一步将考察时间往后推,设定了“17世纪东亚国际关系”的议题。2018年8月,来自日本、中国、韩国的9名国史研究者聚集在首尔,讨论了日本的丰臣秀吉和满洲的皇太极各两次入侵朝鲜,以及其背后以银贸易为主轴的紧密的经济关系,和战乱后的安定问题。另外,为回顾这3届国史对话,还进行了由早稻田大学主办的“面向和解的历史学家共同研究交流网的考察”的小组讨论。

第4届对话的主题是“‘东亚’的诞生:19世纪国际秩序的转换”。2020年1月来自日本、中国、韩国的国史研究者聚集在菲律宾马尼拉市,围绕各国的“西方认识”,“挑战传统和创造传统”,“跨国界人的移动”问题进行了报告和广泛的讨论。

第5届对话以“19世纪东亚传染病的流行和应对”为主题,由于新冠疫情2021年1月于线上举办。会议思考了各国在19世纪如何认识传染病问题,提出了怎样的应对对策,并探讨了各国的相互协作情况及其局限性。除了来自各国的论文报告外,还有非常多的前4届会议的与会者以小组成员的身份参加,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虽然因为新冠肺炎不得已在线上举办,但是我们因此而建立了Zoom网络研讨会这个平台,促成了一次有意义的对话。

第6届对话以亚洲近代的“人的移动与边界·权力·民族”为主题,于2021年9月与第5届相同继续以线上方式(三国语言同声传译)举办。盐出浩之老师(京都大学教授)在问题提出环节中以近代左右人移动的国境为焦点,指出人的移动与国家主权体制和国际政治结构(帝国主义和冷战)密切相关。在之后的环节中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本次论坛稍具实验性地以自由讨论为主

设置了1日的会议流程，实现了充分活跃的讨论，备受好评。

第7届对话以“‘历史大众化’与东亚历史学”为主题，2022年8月于线上举办。韩成敏老师（高丽大学研究教授）将当下韩国历史学家间日常讨论的“历史大众化”作为问题提出，分析了危机状况下的历史学的现状，作为解决方案之一提出了“公共历史”这一概念。之后基于各自国家不同的状况，学者们对“历史的大众化”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与热烈的讨论。

本项目除了推动在论坛、讨论环节中的对话以外，还为建立圆桌会议与会人员的交流网，开始配发使用三国语言编撰的报告书，并以邮件杂志形式推送与会者的文章等。历经6年的积累，已经成长为超过340人的中日韩各国国史研究者参与的交流网。



# 解放后韩国知识界的 去殖民话语及 历史叙事架构的变化

金 泰雄

首尔大学

[原文为韩语。翻译：金 丹实（翻译工作者）]

## 1. 序言

自从解放以来，韩日关系一直像过山车一样大起大落。韩国社会经历了去殖民化和冷战秩序，在此过程中由于国家分裂与战争、工业化、民主化以及南北关系起伏等原因，发生了有别于日本社会的急剧变化，因此这种过山车式的波动也可能是预料之中的事。因为国内政治和国际外交原本就是密不可分的。而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潜伏在韩日关系背后的历史阴影，随着韩日两国学者不断挖掘并整理出新史料，正式进入民众的视野。

两国关系的这种大起大落，反过来影响了本国历史叙述的架构及韩国史 / 东亚史历史教育。究其原因是因为每个时代对去殖民化的诠释和执政阶层的视角、知识界对韩日关系的认知等，与当时面临的国内外现实问题紧扣在一起，未能够保持其一贯性。尤其是韩国的政治圈和日本完全一个样，没有将这个问题交给学术界和教育界进行长期持续的探讨，而是选择了直接干预，导致教育现场时不时陷入混乱。

这篇发言聚焦于韩国政局的变动与去殖民问题环环相扣之下历史叙事所呈现的变化，梳理了叙事重构的轨迹及其涵义。尤其是将重点放在了历史教科书和支撑它的教育课程的变化上。因为这些历史教科书隐含着历史叙事的构架，从而影响着成长为市民的学生的历史意识的形成。

## 2. 去殖民话语和历史叙事的重构：1945年至1948年

1945年8月15日，朝鲜半岛从日帝统治获得解放，终于可以建设新国家、重建本国文化、重塑本国历史。换句话说，所谓的去殖民化成为了可能。大多数知识分子为建设新国家积极投身学术和教育运动。这时清算日本帝国建构的殖民地文化的残余，对历史经验进行评价显得尤为重要。这既是完成去殖民的历史叙事重

构，同时也是为走向未来奠定基石<sup>1</sup>。正因如此，历史叙事势必聚焦民族的苦难及清算被侵略历史的问题，构想单一民族国家，展望被压迫民族携手并肩的合乎伦理的亚洲<sup>2</sup>。然而历史叙事和基于虚构与想象的文学不同，终究还是把重点放在基于事实的叙述上。

历史叙事的这种建构和再生产，最先并非是从学界，而是在教育界付诸实行的。究其原因是因为新国家建构中文化的建构和集体记忆的重建必须是国民教育先行，学术方面的成果次之。因而将此前隶属于日语及日本史的韩语及韩国史从前者中剥离独立，成了迫在眉睫的任务。朝鲜语学会和震檀学会分别在1945年12月和1946年5月出版了《初等国语教本》和《中等国史教本》。正如后者的范例所示：“力求简明扼要地叙述我国的民族文化和国家社会变迁发展的概况”。并且将“学习国史的意义”规定为：“深入了解我们的民族和文化的传统及发展，理解民族性的本质，培养健全的国民精神、国民道德及情操”。换句话说，历史教科书的内在叙事，与民族国家构建这一时代命题是密切相关的。

与以往的日本史教科书的比较，如表1所示：

《国史教本》（1946）和《中等历史》（1944）对比

| 国史教本（1946）                          | 中等历史 2（1944）          |
|-------------------------------------|-----------------------|
| 第一部分 上古（太古、三国时代）                    | 第一部分 太古（从天照大神到大化改新）   |
| 第二部分 中古（新罗统一-高丽时期）                  | 第二部分 古代（从大化改新到平安时代）   |
| 第三部分 近世（李氏朝鲜）                       | 第三部分 中世（从镰仓幕府到江户幕府以前） |
| 第四部分 近现代（国纪4243-4278年，公元1910-1945年） | 第四部分 近世（从江户幕府到明治维新以前） |
|                                     | 第五部分 现代（从明治维新到退出国际联盟） |

表 1

虽说将叙述主体改为韩国人的历史，但是从时代划分和内容结构来看，《国史教本》与《中等历史》基本是大同小异。这是韩国史研究还没有走上正规的情况下套用日本史框架的结果。

与此相反，囊括东西洋史的1944年版《中等历史 1》的构成如表2所示：

1 历史叙事与文学及神话不同，第一手事件是实际事件而非虚构。只是历史叙事采用了文学发明出的情节结构类型，给某种文化进行过整合的过去事件赋予形态，将其转换成第二手意义类型。关于这一点请参考 Donald E. Polkinghorne, 康贤锡等翻译,《叙述,与人文科学相遇》,学林社,2009年,第137-138页;梁豪焕,《历史教育的立论与构想》,与书同行,2012年,第193-207页。

2 河申爱 Ha Shin-ae,《解放时期历史叙述中的脱/殖民性和新生亚洲的想象——以金东仁为中心》,《东亚文化研究》第81期,2020年。

《中等历史 1》(1944)

| 序言：皇国、东亚及世界 |             |
|-------------|-------------|
| 前篇          | 后篇          |
| 1. 古代的亚洲    | 1. 上古的欧洲    |
| 2. 亚洲各民族的互动 | 2. 欧洲社会的形成  |
| 3. 亚洲各文化的兴起 | 3. 欧洲的转变    |
| 4. 亚洲各民族的活跃 | 4. 近世各外国的发展 |
| 5. 近世的东亚    | 5. 欧洲的革新    |
|             | 6. 欧洲的世界政策  |

表 2

而在课堂教这类东 / 西洋史时，始终是以日本史作为参照系的。  
《中等历史 1》的序言“皇国、东亚和世界”就学习目标和方向阐述如下：

“东亚及世界”的历史划分为东西两部分，在前一部分，首先学习皇国以外的大东亚历史，在后一部分主要学习欧美的历史。当我们以这两者的密切关联作为核心展开学习时，能更加准确地把握世界历史中东亚的过去与现在，皇国进展的背景也自然会更加鲜明。皇国国民在学习东亚及世界的历史时，时刻不要忘记这一学习目的<sup>3</sup>。

由此可以看出：东 / 西洋史课程的教学目标在于让学生明白“皇国进展”，亦即“大东亚战争”的背景及其正当性。此处所说“皇国”也包括朝鲜。

历史教科书的这种三分论（译者注：将历史分为东洋史、西洋史和本国史这三部分的划分法），到解放后仍被继承了下来。金庠基、金一出和金圣七在教授要目时期（译者注：执行美军政制定的教育课程的时期）以前的紧急措施时期（译者注：根据新宪法由总统下达紧急措施进行管理的时期）编撰的《新东方史》（1948）很好地反映了东亚史的这种架构。关于叙事构成，该书前言记述如下：

国史中有关的事实，我们尽可能从相互关系着眼详加叙述，力求揭示国史与东洋史之间的关联<sup>4</sup>。

然而，这里所说的东洋史中，不包括日本史。对东洋史的定义和范围，编者规定如下：

3 文部省，《中等历史 1》，中等学校教科书株式会社，昭和 19 年(1944) 8 月 13 日，第 4-9 页。  
4 金庠基，金一出，金圣七，《新东方史》，同志社，1948 年，卷头语。

所谓东洋史，是指以我们的邻国中国为中心，揭示政治上、文化上密切相关的多个国家和民族之兴衰的学问。（国史的史实仅限与邻国有关联的部分将其收入）

另外，东洋史的地理范围随着时代演进有所扩大，很难一概而论。但大体上以印度至中亚东南部的轴线为基准，此线以东大陆地区和太平洋上的多个零散岛国包括在此范围内<sup>5</sup>。

从下面例子可以看出：名为东洋史教科书，内容却清一色都是中国史。之后在近代部分叙述了法国对越南的侵略、印度和越南的独立运动。而关于日本，仅在“美国与日本”、“清日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部分有简略的叙述。而且，提及明朝末期的北虏倭乱，在“东洋倭乱”为题目的单元，将倭寇和丰臣秀吉描述为让东亚三国不宁的祸患。可见此书与其说是涵盖日本前近代部分的通史，不如说是聚焦日本的侵略，以韩日关系史为中心进行叙述。解放后韩国面临去殖民挑战，时值大韩民国政府成立前夕，历史学界打破日本把自己塑为东洋和平守护者的架构，将日本描述为破坏东方和平的罪魁，显示了历史叙事的逆转。与此相反，1948年8月15日大韩民国政府成立后不久的同年10月，崔南善所著《中等国史》、《朝鲜本位中等东洋史》等书籍与李光洙的《文章读本》一起被教育部勒令禁止使用<sup>6</sup>。

当时对于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叙述当然不可能没有任何问题意识<sup>7</sup>。比如，1949年出版的《邻邦的生活：历史》一书中，中国明显被相对化了<sup>8</sup>。但相比之下，去殖民的问题迫在眉睫，因此无法增加日本史的比重。

以中学为例，一年级开设《邻邦（东洋史）》，二年级开设《远邦（西洋史）》，三年级开设《我们的国家（国史）》。而在这些课程中，日本史被彻底排除在外。崔南善著《邻国的历史》几乎就是以中国史为中心的。如果说解放前夕的东洋史以日本为中心，而现在则转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洋史。换句话说，从基于日本中心的位阶序列型连带论的东洋史，变成了基于中国中心的位阶序列型文化论的东洋史<sup>9</sup>。东洋史进而被列为高等公务员考试和大学预考笔试科目中的选修科目，与西洋史一道被选入考试科目<sup>10</sup>。

可见既继承了1945年8月以前日本殖民时期将历史划分为日本史、东洋史和西洋史三部分的课程体系<sup>11</sup>，同时又从日本占据主流的以往历史叙事中剔除掉日本，配置韩国史内容来替代它，并且从被侵略国的角度重构东洋和平话语。这样的叙事架构是无意识地继承了日本帝国主义一手炮制出的一国中心历史叙事为基轴的三分论的结果。

5 同上，第1页。

6 《文教部在全国中等学校校长会议下令禁止使用亲日派教科书等》，《朝鲜日报》，1948年10月12日；《教科书与风纪取缔等学制最后决定》，《朝鲜日报》，1948年10月12日。

7 孙晋泰·李海南，《邻邦的生活（历史部分）》，探求堂，1952年，序言。与此相关的是柳永泰，《韩国的东亚史认识与构成：通过东洋史研究60年看东亚史》，《历史教育》第107期，2008年，第140-143页。

8 柳永泰，同前引论文，第142-143页。

9 关于战时体制下知识分子的东洋叙事，请参考尹相铉的《1950年代知识分子的民族论述研究》，首尔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36-40页。

10 《考试委员会制定国家高等高考实施规定》，《东亚日报》，1948年10月11日。

11 大韩帝国时期，政府以本国史和万国史的二分主义构建历史叙述。关于这一点请参考金兴洙，《韩国历史教育史》，大韩教科书株式会社，1992年，第46-49页。

### 3. “中共”话语与二分论架构的出现：1949年至1964年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事件对东亚历史和世界历史产生的影响堪比日本帝国主义的覆亡。这为日后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韩国（朝鲜）战争”埋下了伏笔。毋庸置疑，冷战格局的出现和对立加深，对这场战争的生成起了作用。然而，朝鲜半岛的分裂和随之而来的左右翼之间的冲突、中国的国共内战和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对这场战争的影响，要比冷战秩序的固化大得多。李承晚政府公然称中国为阻碍韩国实现北进统一的“中共傀儡”。这就是基于反共主义和北进统一论的“中共”话语<sup>12</sup>。

从此，韩国政府的执政层有意识地对中共坚持两种态度：其一是对当下占领大陆的“中共”，立足于反共主义，将其与传统中国区分开；其二是视台湾为反共堡垒，与之携手将台湾与传统中国联系起来<sup>13</sup>。历史叙事的重构体现为对空间和时间的这种割裂。于是现实中的中国大陆，以被抽离历史的形态进入到由台湾代表中国的东洋史空间。

另一方面，1950年代开始强调应为“人类文化”做贡献、“克服后进性”，于是社会科学领域的自由主义派知识分子一跃占据主流。他们认为西方过去曾是文明史上的领头羊，现在是自由建设的中心，落后的东洋向西方学习便能克服后进性，并实现自由主义<sup>14</sup>。社会学家李相佰甚至主张：“西化即现代化”。在上述关于东洋的言说中，唯有日本还算勉强被视为摆脱了后进性的国家<sup>15</sup>。从这些主张推演出的就是亚洲的停滞性。经济学家裴成龙受到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的影响，甚至将“中共”和苏联定义为“东方式专制政体”。

历史学家金龙德认为，韩国也和中国一样，国家权力的这种特性导致公民阶层发育受阻，陷入停滞之中<sup>16</sup>。甚至连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经济学家也逐渐接纳亚洲式生产方式这种说法<sup>17</sup>。于是，关于东方停滞性的言说，并没有朝着去殖民话语的方向更新迭代，而是沦为力主南韩改造必要性（落后性）的某种修辞手段。当然，后来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也曾出现一股潮流，一些学者将传统中国和现实中的中国挂上钩，主张应重视其内在的力量<sup>18</sup>。他们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视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而不是现代化的失败。

在这一脉络上也重视起日本史的内在发展<sup>19</sup>。然而，由于东方专制论与东洋落后论的结合影响广泛，这股潜流根本不足以形成气候。尤其是在自由党政权内部，随着极权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团体——民青（朝鲜民族青年团）势力被清除，话语

12 金泰雄，《1950年代李承晚政府的错综的中国形象》，《东北亚历史财团东亚历史教科书比较分析国际学术会议发表资料集》，2022年。

13 同上。

14 尹相铉，同前引论文，第91页。

15 同上，第140-144页。

16 金龙德，《国史的基本性质——以我社会的身份为中心》，《思想界》，1953年9月号，第53页。

17 金容燮，《走在历史的小路上——解放一代学者的历史研究和历史讲义》，知识产业社，2011年，第98页。

18 郑文相，《中共，自由中国和中国——冷战时期韩国人对中国的认识》，惠安，2019年。

19 全海宗·闵斗基，《日本史》，知文阁，1964年。

权转移到持欧洲中心史观的自由主义政客的手中<sup>20</sup>。这种政局的变化导致西方中心的历史叙事占据主流，去殖民议题的重点也落在了经济增长和现代化之上，而不是民族问题的解决。

关于东洋的这些负面话语，包含历史叙事自身的矛盾，因而在1955年课改时，东洋史最终没能作为独立科目在初中课程中存续下来。我们也无可否认，合并的目的确实是为了让学生通过综合地学习世界史获得更广的历史视野，由此客观深入地了解本国历史<sup>21</sup>。

然而，对东洋史即中国史的偏见在此起了很大作用。尽管历史脉络有所不同，不妨看作这是回归到大韩帝国时期二分论（译者注：把历史分为本国史和世界史两大块的方法）的架构。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洋史就这样被纳入《世界史》。由于东洋史被编入世界史，西方中心的观点被进一步强化<sup>22</sup>。当然，在日本统治时期，西方中心的观念也一直是主流。但与之并存的还有以日本为中心的东洋史，这多少能牵制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教育。东洋史失去了独立性，势必会出现西方中心叙事构架垄断历史话语的局面。

这点清楚地体现在了教科书分量比例上：东洋史的篇幅仅占30%，而西方史则超过了70%。这种极端不平衡也违背了综合理解世界历史、坚持更广阔的历史视野这一教学宗旨。

中国史就这样作为下位组成部分，编入了西欧中心观的世界史中。当然，日本史也被配置在世界史叙事的次要位置。第一次教育课程的世界史框架中与日本史相关的内容如下：

### 3. 亚洲势力的扩张与欧洲社会的形成

- (1) 伊斯兰世界是怎样形成的？
- (2) 唐宋时代情形是怎样的？
- (3) 蒙古和日本是怎样发展的？

### 5. 近世东洋的情形是怎样的？

- (1) 明清时期的中国是怎样的？
- (2) 西南亚洲的变动是怎样的？
- (3) 西方力量是怎样侵入亚洲的？
- (4) 近世日本经历了怎样的变迁？
- (5) 东洋各国相互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高中阶段的情形也是大同小异。尽管日本史的篇幅相比初中阶段有所增加，但在以西方历史为中心的世界史中，也就是作为中国史的下位范畴简单交代了时代概况而已<sup>23</sup>。

20 藤井武司，《第一共和国的统治理念——反共产主义及其变形》，《历史批评》第83期，2008年，第140-142页。

21 教育课程·教科书研究会编，《韩国教育课程的变迁——中学》，大韩教科书股份公司，1990年，第96-97页。

22 南韩稿，《第一次教育课程世界史叙述体制与内容分析》，《历史与教育》第22期，2016年，第143-145页。

23 李海南，《高中社会科世界史》，1959年，探究堂；金成根，《高中世界史》，教育社，1961年。

尽管如此,这种自由主义为反抗李承晚总统的威权主义、进而引发“4·19革命”,提供了某种思想资源。但由于它植根于东洋落后性论,终究未能很好地回应韩日邦交正常化前夕再度成为焦点的去殖民问题。

与此同时,在韩国史学界内部,殖民史观问题正式被纳入议程。过去对韩国历史的解释多被日本学者的殖民史观所扭曲,基于这种认识,1958年底在李承晚总统的指示下,国史编纂委员会盘点了国史存在的诸多问题,编辑出版了第1至第6辑特刊《国史上的诸问题》<sup>24</sup>。执笔人分别是:古代(檀君朝鲜-新罗)李弘植,中世纪(高丽时代)金庠基,近世前期(朝鲜太祖-宣祖)申锡镐,近世后期(光海君-哲宗)李丙焘,近现代(高宗-8·15解放)李瑄根。这是首次涉及殖民史观问题的一系列特辑丛刊。

然而考虑到这一时期是,面临1960年总统选举的李承晚政府为了限制在野党言论而于1958年11月修订的国家保安法在国会审议期间,李承晚总统提出的殖民史观问题很可能是为吸引眼球摆脱危机故作姿态的政治修辞。为在野党发声的《京乡新闻》在1958年12月21日社论中呼吁抵制新国家保安法:“我们要像那些在倭政殖民政策下为了恢复民族的自由而舍身成仁的爱国之士那般斗争起来”<sup>25</sup>。此外,这与日本政府在1950年代末采取的在日朝鲜人归国方针也相关联。当时,对于进入与北朝鲜进行体制竞争的李承晚政权而言,日本政府的这一方针自然是令人不悦的<sup>26</sup>。在1950年代,李承晚总统的倡议终究没能产出相应的研究成果,止步于政治标语。而在1965年韩日邦交正常化前后,这个问题又重新浮出水面引起了关注。

## 4. 韩日关系的新探索和韩国史体系化的问题：1965年至1981年

1965年的韩日邦交正常化对韩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时的军事政府迫切希望获得美国支持,以便引进经济开发所需资金和技术。而美国这一时期制定了针对北方社会主义阵营打造亲美反共防波堤的东北亚区域统合战略,欲构建强有力的“美日韩三角安保体系”。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需要韩国有一个强力的反共政府,韩日邦交正常化无疑是首当其冲需要解决的问题。美国的这一东北亚政策,提升了日本在本地区的地位,日本也刚好能通过韩日邦交正常化消化掉通过朝鲜战争特需赚取的过剩资本。而韩国军事政府则如愿赢得美国的支持,抓住了引进经济发展资金和技术的绝好机会。而军事政权的对日政策显然对学界产生了影响。

正因如此,美国对第三世界外交政策背后的罗斯托(Rostow)的现代化理论对韩国史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sup>27</sup>。但是在韩日会谈前后,以历史学界为首,韩国的有识之士对日本的再崛起并没有放松警惕。1965年7月9日,韩国史学会代表干

24 国史编纂委员会编,《国史上的诸问题》1,1959年,第1-2页。

25 《社论:在这片土地上实现“心中的祖国”》,《京乡新闻》,1958年12月21日。

26 朴泰均,《通过反日实现另一种日本化:李承晚总统的对日认识》,《日本批评》第3期,首尔大学日本研究所,2010年,第106-110页;申在准,《1959年李承晚政府的对日通商中断措施与美国》,《历史批评》第115期,2016年,第373-377页。

27 朴泰均,《罗斯托第三世界现代化论与韩国》,《历史评论》第66期,2004年,第156-159页;Michael E. Latham,权赫恩等,《现代化作为意识形态》,Greenbee,2021年,第95-97页。

事带头发表了反对韩日会谈的声明。紧随其后，多个历史相关的学会发声明敦促政府废弃韩日协定。他们斩钉截铁抨击道：韩日协定不是基于平等互惠原则之上的条约<sup>28</sup>。结果让韩国人提高了对民族问题的认识，韩国文学和国史学的独立性也备受关注。当时，以西方史为主的世界文化史已经入主大学的公共必修课，与此相对的，培养韩国史研究人才成了迫在眉睫的课题<sup>29</sup>。

特别是在历史教育现场，根据第二次课程改革将韩国史和世界史合并授课的做法引起了不小的抵触和不满<sup>30</sup>。因为按统合社会的原则，不仅要为国史和世界史整合到社会课中，还要大幅削减世界史的内容。尤其在形式上，要将西方为主的世界史插进韩国史中，中国史自不必说，日本史也难免被忽视。例如，“近世世界的生活”总共60页，中国和日本只占了6页<sup>31</sup>。其中内容包括明朝的兴亡、明朝的文化、清朝的统一观的演进、清朝的文化、印度国内的对立、日本的幕府政治、日本的明治维新等。

另一方面，一些学者相继提出：韩国的主流史学依旧是受殖民史观支配的那套体系<sup>32</sup>。为此，1967年12月韩国史研究会宣告成立。其成立宣言开宗明义：“用科学的态度研究韩国史，进一步推动其发展，以便建构正确的韩国史体系，使韩国史作为世界史的一部分占据应有的位置”<sup>33</sup>。随后，于1969年12月，李基白、李佑成、韩祐勋、金容燮向文教部提交了关于初高中国史教育改革基本方向的研究报告，力主改进国史教育<sup>34</sup>。这表明韩国史不再是世界史的附属范畴，将作为独立领域自此展开自我探索。于是，以西方史为中心、中国史为副中心的世界史和自成一体的韩国史形成了历史教育的两大核心。

韩国史曾经是历史叙事的一个重要轴线，但到了1968年12月颁布的《国民教育宪章》和1972年10月维新体制启动前后，竟打出树立民族主体性的旗号，逐渐发生蜕变。韩国史从社会科目中独立出来，但世界史仍然编入到社会科目内；韩国史引起了当权者的“强制性重视”，韩国史与世界史的间隙拉开了<sup>35</sup>。两者衔接互动的余地越来越小了。

在这个过程中，以东洋史研究者为中心，学者们纷纷发声抨击。在韩日邦交即将正常化之际，全海宗指出人们对日本史的无知和认知的碎片化，1964年与闵斗基合著了《日本史》一书。这是首部由韩国人撰写的日本通史。全海宗表明出版动机如下：

自古以来，日本通过朝鲜半岛接受大陆文化。在与日本的关系中，对我们而言最重要的无疑是壬辰倭乱和日本在韩日合邦后推行的殖民政策。如今，我们不得不将痛苦的过去留在过去，把日本视为相邻的友邦，与之建立崭新关系。

28 《历史研究、历史学会反对批准韩国历史学会宣言》，《东亚日报》，1965年7月10日。

29 金容燮，同前引专书，第578-582页。

30 康宇哲等，《本刊座谈：修订的教育课程与历史教育存在的基本问题》，《历史教育》第9期，1966年，第167-169页。

31 朴成峰等，《新社会》，洪志社，1970年。

32 金哲俊，《国史教科书需要改变》，《新韩报》，1968年11月11日。

33 韩国史研究会网站<https://www.hanguksa.org/front/introduce/history/view?id=102&page=3>。

34 李基白·李佑成·韩祐勋·金容燮，《改进初·高中国史教育的基本方向》，1969年，文教部研究报告，第4页。

35 金泰雄，《国史教育的编制和韩国近代史探究》，先人，2014年，第23-25页。

当自问对如此重要的日本历史究竟了解多少时，我很难回答说自己有高出常识的认知。解放以后 20 年岁月流逝，至今却没有出版过一本日本史的书，我们史学界应当为此感到羞愧。撰写历史书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出于想了解日本史的意愿，我们编写了这本书。

最近，由于韩日邦交问题，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关注日本。我们希望读者从历史的角度把握日本方方面面的样貌，形成正确的日本观<sup>36</sup>。

正值韩日邦交正常化，克服殖民史观的呼声高涨，编者大力强调了解邻国日本的历史的必要性。关于时代划分，本书由“古代日本”、“中世日本”、“近世日本”、“近代日本”和“现代日本”（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算起）组成。这是基于日本内在发展过程进行划分的。

全海宗进而批评过度强调“主体性”和“民族性”的做法，主张不应拘泥于东洋史与韩国史的关联，强调东洋史也应自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sup>37</sup>。另外，闵斗基提出的主张是：东洋社会（比如中国）的近代化，并非是受西欧冲击被动裹挟而致使传统断裂的西化，而是士人阶层对抗西方的冲击、立足传统自主革新的自生发展<sup>38</sup>。黄元九则强调：响应国家政策，反映民族情绪的东洋史学不可取，作为历史学家能不带偏见地看待日本和中国的主体性才是可贵的。然而，许多学者对西化并非传统的断裂而是某种自生发展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sup>39</sup>。

于是，维新体制下的历史叙事主要由国史和世界史构成，世界史则都是以西方史为中心、中国史为副中心的固定模式。尤其是韩国史，与总体目标要求“了解韩国民族自身发展史”、“通过建立全球维度的认知，把握民族史的特征”不同，年级目标和单元目标唯一强调的是一种能克服国难的民族精神。于是与中国史、日本史仅仅是通过战争这一主题得以关联起来<sup>40</sup>。

## 5. 韩日历史纠纷与民主化运动的联动：1982年至2001年

历史叙事的二元结构，到了 1982 年韩日间发生历史纠纷时迎来了新局面。1986 年 6 月，日本政府发布了高中历史教科书的审议结果，其中与朝鲜半岛和中国有关的“侵略”词条被改成“进入”（日文为“进出”）、“3·1 运动”被改为“暴动”等，除了这些用词有所修改之外，“3·1 运动”造成 7000 名韩国人死亡这一细节也被删除。日本媒体报道了以上内容<sup>41</sup>。

但是，通过镇压“5·18”民主化运动掌权的韩国新军部为了在经济低迷的情

36 全海宗·闵斗基，同前引专书，第1页。

37 全海宗，《东洋史教育的问题与方向》，《历史教育》第14期，1971年。

38 闵斗基，《两个中国论——历史背景和问题的焦点》，《世代》第4-7期，1966年7月；金衡钟，《故闵斗基先生的学术业绩》，《东洋史学研究》第74期，2001年；郑文相，《在‘中共’和‘中国’之间——通过1950-1970年代大众媒体上的对华关系论述看韩国人对中国的认识》，《东北亚历史论丛》第33期，2011年，第70页。

39 《没有底边的东洋史研究“反省与课题”座谈会上的发言》，《京乡新闻》，1970年3月31日。

40 车美姬，《韩国初中高中国史教育——以国史科目独立时期（1974年至1994年）为中心》，教育科学社，2011年，第50-52页。

41 郑载正，《韩日历史冲突与历史对话》，大韩民国历史博物馆，2014年，第48页。

况下从日本吸引大规模投资，不许媒体报道日本教科书篡改历史的消息。最大目的就是为引进日本政府贷款。然而事与愿违，日本政府通报新军部政权：日本不能为其提供“安保经济合作贷款”，于是事态便急转直下。新军部政权利用民众的反日情绪作为导火索，全面点爆了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7月下旬起，韩国和中国媒体不约而同炮轰日本篡改历史的行为。而日本政府则不以为然，认为历史教科书审议过程是客观公正的，审议结果不会损害同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国土厅长官甚至称这些批评是“干涉内政”，事态进一步恶化了<sup>42</sup>。

还好，适逢新冷战打响，美国判断韩日之间这种冲突对其东亚政策势必带来负面影响，在里根政府撮合下，日本政府与韩国新军部政权秘密达成共识，承诺向韩国提供40亿美元贷款，这个问题在次年1月中曾根首相访问韩国期间画上了圆满的句号<sup>43</sup>。中曾根首相在正式访韩期间举行的青瓦台晚宴致辞（1983年1月11日）中表示：在韩日两国之间确实存在过不幸的历史，我们必须严肃地接受这个事实。进而1984年9月全斗焕总统访问日本时，中曾根首相在午宴致辞中谈到：20世纪，有一段时期，日本给韩国和韩国人民带来巨大的苦难，我对此深感遗憾，在此坚决表明将来不会再发生同样的事情。就此，新军部政权算是取得了预期的成果。

与中国不同，新军部政权就这样将“反日”的旗帜换成了“克日”的大旗，独立纪念馆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建成的。新军部利用歪曲事实的日本历史教科书和韩国民众的反日情绪，强化了政权的根基。而日本政府在1982年11月出台的教科书审议标准中追加了一项条款：“内容涉及与亚洲近邻各国之间的近现代历史时，必须从国际理解和国际合作的角度加以必要的考量”<sup>44</sup>。

新军部政权达到自身目的后，立即以组织反国家团伙罪构陷了带头举办日本历史教科书批判讨论会的学生们<sup>45</sup>。新军部政权是想借机一举消除质疑政权合法性的学运势力。然而，上面达成的共识不过是权宜之计，韩日之间历史冲突随时都有重燃的可能。当时韩国社会处于新军部政权高压统治下，程序民主化还远没实现，民众的诉求无法得到充分的表达和宣泄。不过这倒成了日后在韩日之间出现试图克服历史认知差异的尝试的契机。

特别是1988年诞生的卢泰愚政权与此前的全斗焕政府情况多少有些不同。尽管卢泰愚政权的根基也是新军部势力，但毕竟是在1987年6月的民主化运动后通过修宪进行直接选举掌权的，因此卢政府不得不向程序民主转轨。再加上冷战终结也对韩日关系的重建起了助推作用。

由此，1980年代持续被提起的日军“慰安妇”问题逐渐进入韩国公共领域的讨论，而就在1990年6月，日本政府宣布“日军并没有参与军队慰安妇问题”；1991年8月，金学顺（1924-1997）通过报纸和媒体而非女性杂志揭露了日军“慰安妇”真相，将此议题从私人话题提升至公共记忆的高度。这样的控诉，只有在韩国社会的民主化程度达到相当高水准并且人权意识也大幅提高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

对此，日本政府通过1993年河野洋平外长的声明，承认了日军在“慰安妇”

42 《日本教科书争议是内政干涉》，《东亚日报》，1982年7月24日。

43 曹世亨，《韩日关系50年，冲突与合作踪迹》，大韩民国历史博物馆，2014年，第107-108页。

44 郑载正，同前引专书，第49页。

45 徐京锡，《回顾1982年日本教科书四科目公开讨论会》，《历史系60年史》（首尔大学师范大学历史系编），2007年。

的征集、配置、移送和管理等环节直接或间接参与的事实。随后，金泳三政府明确表示：日本应将日军“慰安妇”的悲惨遭遇写进教科书中，以史为鉴汲取教训。在这种氛围下，日本所有中学的历史教科从1997年起对日军“慰安妇”相关内容进行了记录，哪怕只有一两句也均有所涉及<sup>46</sup>。

不用说，日本的保守右派势力猛烈攻击日军“慰安妇”相关记述。《新历史教科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成了可能重新点燃韩日历史冲突的火种。尽管如此，2001年10月15日韩国政府和日本政府终究还是达成了共识：作为应对历史冲突的一种方案成立“韩日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并开始运作<sup>47</sup>。这时正值2002年韩日联手举办足球世界杯前夕。

## 6. 韩国的政治民主化路程和“东亚史”的诞生：2002年至今

1998年金泳三政府谢幕，金大中总统上台。此后，南北关系改善了，韩日关系也迎来了新局面。1998年，金大中总统和小渊惠三首相联合发表“金大中-小渊宣言”即“21世纪新型韩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宣言”，该宣言被誉为推动1965年韩日邦交正常化之后的两国关系更上层楼的重要文件。小渊首相承认了日本殖民统治曾给韩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对此表示“痛切反省，发自内心的道歉”。这是韩日外交史上首次将日本对过往历史的反省和道歉明文写入达成共识的正式文件中。根据这一宣言，韩国政府向日本大众文化敞开国门。进口日本电影也是从这时开始的。

为了配合这种和解气氛，韩日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广泛收集能够认识双方的差异、达成相互理解的议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讨论不再停留在如何客观把握本国史的层面，而是上升到了将韩国、中国和日本所在的东亚的历史作为中间媒介，把本国史与世界史连接起来审思的水准<sup>48</sup>。因此甚至有学者展望：如果中国和日本也能朝着这个方向迈进的话，三国可分享的内容范围将变得更广阔。如何重构历史叙事的问题全面推到议程上。

这种努力的成果就是2005年诞生的韩中日共同编纂的东亚近现代史<sup>49</sup>。这是韩中日三国共同策划、执笔撰写，并且在各国同时出版的首部东亚共同历史教材。反对日本教科书篡改历史的韩国、中国和日本学者、教师、社会活动家等，花费了4年的时间，面对面细致推敲每一个用词和句子写就的这本东亚近现代史，深刻反思被侵略和战争血泪浸染的19世纪中叶以来的历史，表达了对东亚享有和平、人权、民主的美好未来的追求。

该书的特点是：力图摆脱偏狭的国粹主义，围绕20世纪侵略与反侵略史，谋求东亚共同认知的形成。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涉及到1930年代日本在东亚所发动战争的有关章节，将题目定为“日本民众的加害与受害”、“日本的侵略战争失败”等，

46 郑载正，同前引专书，第100-111页。

47 同上，第193-198页。

48 赵珖，《韩国史学史的认识与课题》，景仁文化社，2010年，第281-283页；郑载正，同前引专书，第132-133页。

49 韩中日三国共同历史编纂委员会，《开启未来的历史：韩中日共同编写的东亚三国近现代史》，韩民族日报，2005年。

并且一以贯之从这个立场叙述历史。该书最后一章“为了东亚的和平未来”也值得瞩目。这一章直面历史,开诚布公地探讨了各国清算过往历史的问题、日军“慰安妇”问题、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以及历史教科书歪曲事实的问题等。

另一方面,2003年中国展开的“东北工程”(译者注:把曾经存在于东北地区 and 朝鲜半岛北部的古代国家的历史纳入中国史进行考察的大型学术项目,于2002年2月正式启动,为期5年)在韩国引起广泛争议。2004年,韩国政府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中国并没有停止该学术项目,反而快马加鞭地向大众推广其研究成果<sup>50</sup>。鉴于此,韩国政府于2004年3月成立了高句丽研究财团。

这一系列的冲突纠纷超出韩日、韩中关系的范围,最终影响到了整个东亚。韩国和日本的非政府团体等立足于本国中心的民族主义观点,强调起和平与共存这一普世价值,讨论的外延随之扩大了。其结果就是,以歪曲历史著称的日本扶桑社版历史教科书采用率显著下降,在韩国方面则是新设的东亚史课成为教育课程改革的热门议题<sup>51</sup>。

进而到了卢武铉政府时期,“东北亚均衡者”新构想出笼。该构想提出:要以东北亚为中心,建设“和平繁荣共同体”,韩国成为引领者,在这个动荡和不透明的地区,化冲突为和解、化对立为合作,强调在此过程韩国应积极发挥能动性。这个新思路与超国家主义的东亚话语结合起来,开创了新局面<sup>52</sup>。

此外,学术界在东亚史叙述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层面也取得了长足进步。1990年代的后冷战和后现代主义登场之际,区域史作为一种既能够超越国家和民族,又能客观地看待并反思欧洲中心的世界史的方法论和范畴引起了关注。人们开始形成东亚史是介于本国史和世界史之间中间态的历史思考体系的判断,认为应能将二者紧密相连起来并实现互动<sup>53</sup>。

学术界的这些进步,是因韩国社会正式进入程序民主化阶段,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达到相当水平才得以实现的。尤其与1965年韩日邦交正常化时期不同的是,现已完成足以克服殖民史观的研究人才储备,因而可以回应中日扭曲历史的做法了。换句话说,民主化、经济实力和研究成果是催生东亚史教科书的主要因素。于是在2007年的课程改革中,高中首次引入了《东亚史》这门课。这表明经过第一次课程改革时期,将历史课分为韩国史和世界史的二分论被解构,现在重新回归三分论。

然而,这种三分论有别于解放政局下坚持的三分论。亦即后者分为未能摆脱既往殖民史观的韩国史、欧洲中心的西洋史、中国中心的东洋史;而前者则是由已经摆脱殖民史观的韩国史、以交流与贸易为中心的世界史、强化东亚三国间关联的东亚史构成。因此《东亚史》课的教育目标定为:“了解历史上在东亚地区展开的人类活动及其留存的文化遗产,加深对东亚地区的理解,培养追求地区和平与共同发展的视野及态度”<sup>54</sup>。尤其是把重点放在了从史前时代到现代东亚人所建立的文化共通性与关联性探索上,以便培养学生积极能动地参与维护东亚地区发展与和平稳定活动的素质。当然,上述架构的世界历史课和东亚史课所追求的目标,与教学实践

50 东北亚历史基金会,《超越冲突走向和解》,2006年,第34-39页。

51 智模善,《〈东亚史〉科目的设立和教育课程发展》,《历史教育》第128期,2013年,第72-73页。

52 韩国东北亚知识人连带编,《朝着东北亚共同体》,东亚日报社,2004年。

53 白永瑞,《本国史与区域史的互通:东亚人的历史叙述倾向》,《历史学报》第196期,2007年,第105-106页;柳永泰,《以东亚史为视角》,首尔大学出版文化院,2017年,第68-76页。

54 《2007年修订时期课程,高中东亚史》,NCIC国家课程信息中心网站,2023年10月12日检索。

之间仍存在较大反差，因此招致了不少严厉批评<sup>55</sup>。

即便如此，韩国的《东亚史》教科书出版前后，韩国国内自不用说，中国和日本学术界和历史教育一线也相继出现按照这种区域史方法论撰写的东亚史·韩日关系史的概论书和教材<sup>56</sup>。我们可以预想，这种努力必将成为韩中日三国在历史叙事构架上持续而有意义的推陈出新的坚实基础。

## 7. 结语

目前，在新自由主义大潮的冲击下，韩国的基础教育课程随市场需求呈非常不稳定的摇摆状，科目设置也随之变化不定，《东亚史》教科书的命运可说是前途未卜。最要命的是，《东亚史》与《世界史》一道被公认为韩国的高考科目中投入产出不成比例的得分最低的科目，因而没多少学生选修这门课。这显然给韩中日三国的未来投下了阴影。如果不能确保并且维持能持久推动相互理解的制度机制，那么，跨越矛盾走向和解的希望就会十分渺茫。

尤其是在无法指望通过国家之间对话解决问题的情况下，政治不但没能扩展相互理解的范围，反而使空间变得更狭小，当今的这种局面令人担忧。因此，为了做到不被政治热潮裹挟而带着主体意识阐释现代世界和已然全球化的世界、并去理解对方国家的历史，有必要通过学术界与学术界、教育现场与教育现场、民间团体与民间团体之间的接触与交流、分享，将重构历史叙事的事业持续坚持和发展下去。因为唯有这种努力才能为新一轮对话奠定基石<sup>57</sup>。

55 梁豪焕，《世界史教育：变革话语与教科书叙述的现实》，《历史教育》第140期，2016年；柳永泰，《东亚史与世界史，为了什么教什么？——探询“农业缺席”的交流史》，《历史教育》第164期，2022年。

56 最近的代表性成果包括吴炳守编，《韩中历史教科书对话：近代的叙事与意识形态》，东北亚历史财团，2021年；全国历史教师协会·韩国、历史教育者协会·日本，《面对面的历史课：韩日教师的联合与交流记录》，现代主义者，2023年。

57 近藤孝弘，朴京熙译，《历史教科书的对话》，历史批评社，2006年，第7-11页。

第 2 场  
教育

报告 2 (中国)



# 历史记忆的战争与历史书写的伦理

## ——有关 20 世纪中期中国的“历史之战”

唐小兵

华东师范大学

### 1. 记忆的疆场：以《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为例

战争与革命是 20 世纪中国前半期最重要的主题，而对战争与革命的历史书写和历史记忆，从来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性的命题，而同时是中国社会如何面对过去的历史、进而很可能刺激记忆领域的纷争与冲突的导火线。任何对历史的表达，都隐含着一种对现实政治和社会文化的理解方式，而那些试图突破历史记忆固有框架的书写，往往会引发公众和政府层面强烈的反响或反弹。军旅作家张正隆《雪白血红》在 1980 年代的末期出版，几乎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却因为龙应台的作品《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等重新浮现在世人的眼前。龙应台以一个作家的敏锐和文化名人的号召力，将半个多世纪之前的东北悲情往事，再度拉回当代华人世界的感觉世界之中。然后，龙应台发出了一连串的疑问：“亲爱的，我百思不解的是，这么大规模的战争暴力，为什么长春围城不像南京大屠杀一样有无数发表的学术报告、广为流传的口述历史、一年一度的媒体报道、大大小小纪念碑的竖立、庞大宏伟的纪念馆的落成，以及各方政治领袖的不断献花、小学生列队的敬礼、镁光灯下的市民默哀或纪念钟声的年年敲响？为什么长春这个城市不像列宁格勒一样，成为国际知名的历史城市，不断地被写成小说、不断地被改编为剧本、被好莱坞拍成电影、被独立导演拍成纪录片，在各国的公共频道上播映，以至于纽约、莫斯科、墨尔本的小学生都知道长春的地名和历史？三十万人以战争之名被活活饿死，为什么长春在外，不像列宁格勒那么有名，在内，不像南京一样受到重视？”<sup>1</sup>这只是《大江大海》的一个小插曲，而这本轰动一时的作品主要是通过文献梳理、历史遗迹寻访和口述访谈等多种形式，还原或重构了国军将士（包括远征军）在乱世中的命运，尤其此后被历史刻意遗忘的一面。

作为“战败者”的后代（其父龙槐生系国军将士），龙应台试图为被历史叙述

1 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200页。

遮蔽的这群人争回一个应有的纪念位置：“如果，有人说，他们是战争的‘失败者’，那么，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都是。正是他们，以‘失败’教导了我们，什么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价值。请凝视我的眼睛，诚实地告诉我：战争，有‘胜利者’吗？我，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sup>2</sup> 龙应台试图站在一个人道主义的立场和非战的立场，对一切战争的失败者和受害者提出一个控诉，但“真正值得追求的价值”是什么，它是一个基于现代文明（比如自由、民主、平等诸人权）的普世价值，还是个人因参与追求民族国家的独立和富强而具有尊严的特殊性内涵，龙应台语焉不详；再者，龙应台将内战时刻的国共纷争造成的牺牲与苦难（这种内争很难在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之间划出一道明确界线）与抗日战争过程的南京大屠杀、反法西斯战争的列宁格勒保卫战并置在一起进行讨论，以后者在公共领域和国家层面大规模的历史记忆来映照前者的被“遗忘”，就等于抹杀了不同类型的战争之间的差别性。这种“以失败者为荣”表面上是以对“弱者”和“卑贱者”的人道主义同情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但其实更多的是以家族、血缘、团体的身份认同为核心而构建了承认的谱系，其中隐含了一个未必能够不证自明的预设：失败者天然就代表正义。

历史记忆更深刻地指向为父辈讨还一个历史的公道，形成的是代际之间的记忆传递和一个民族的心智结构。对 20 世纪中期中国的历史记忆，国共双方也同样致力于各自记忆宫殿的建造。长春围城，在国共两方的记忆里呈现的是几乎完全不同的面相，对国民党而言是屈辱体验，对中共而言是“兵不血刃”的凯旋。这凯旋中间又夹杂着“晦暗的血污”，因此不太可能去开掘这段历史的真实面相。与记忆相对应的是遗忘，但正如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新所言，遗忘并非纯粹“消极性”的心灵生活，而“遗忘研究给历史学带来的重要启示之一，就是用新的眼光看历史：原来我们所能了解的历史史实，不过是被种种力量筛选过的、幸存下来的碎片，另外那巨量的史实，都已被屏蔽和排斥在我们的记忆库之外了。我们无法了解的那些，有相当一部分是前人认为不应该或不值得为后人所了解的。我们不知道过去，固然可以称为失忆（amnesia），或曰历史记录的空白，但这种失忆和空白，一定程度上是遗忘（forgetting）造成的，是前人积极行为的结果，是符合前人预期的。”<sup>3</sup> 对长春围城，或者更广泛的 20 世纪中期中国的内战史，我们都可以从“记忆”与“遗忘”的双重视角去探测。有时候“记忆”与“遗忘”是相克的，一方要强迫遗忘而另一方就要强化记忆，有时候记忆与遗忘是相生的，在遗忘“非正义的战争暴力”的前提下发扬胜利者的记忆，有时候胜败双方都是刻意要从公共生活中抹掉一些历史的痕迹，让民众“积极地遗忘”甚至不去观看某部分历史区域的真相。自然，民众和知识人并非木偶，他们有时候会从这重重历史记忆和遗忘构建的“存在之网”中挣脱出来，去复原对历史的真实感知。

## （1）来自高华的高度评价

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在大陆两个历史学者那里引发了完全不一样的回应。已故历史学家高华为此书撰写的长篇评论《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

2 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9年版，扉页。

3 罗新：《遗忘的竞争》，《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5年3月8日。

诉——读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札记》，纵横捭阖，文采斐然，将台海两岸在1949年前后的大变动，从政经大脉络和历史人物小视角展开分析，结合龙应台的记述将“悲情一九四九”的历史内涵及其后续影响淋漓尽致地呈现了出来。高华对此书评价极高，认为该书的基本特点是：“《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意象复杂，场面宏大：从1949年200万大陆人渡海迁台到台湾，再到二战时期的德、俄战场和南太平洋战场；从‘白色恐怖’对‘外省人’的残酷迫害；到‘本省人’对‘祖国军’的期盼和失望，再到‘亚细亚孤儿’的悲情。全书有家有国，以个人和家族的变迁，来折射时代和国家的大势走向对个人命运的影响。以人文的、人道的史观，穿透被宏大话语总结、归纳的历史，从中还原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寻求其中的意义和价值。”<sup>4</sup>高华进而指出，《大江大海》的旨趣是：“以普世价值观，来反思1949年由国民党政府的大失败而引发的国内一部分人群的大迁徙、大逃亡，‘向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致敬’。龙应台在书中着力描述了被意识形态宏大话语长期遮蔽的一个个历史场景，讨论了一系列与1949年相联系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问题，但是她不直接评判那场内战的是非功过，而是重点叙述那些内战的牺牲者及1949年来到台湾的人群，对他们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尊敬。”<sup>5</sup>高华抽绎出龙书的价值核心是“普世价值”，而其历史观是“人文的、人道的史观”，并充分肯定这种聚焦在小人物生命故事的历史叙述是拆解被政治主导的意识形态叙述的有效方式。

在高华看来，龙应台将“内战的是非功过”的价值评判悬置了起来，因而是在一种人道主义心情之下的历史写作，将所有战争的受难者与幸存者都放置在历史记忆的天平上同等地书写。但龙应台自身又特别标举其以“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那么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是龙应台认同失败者的价值、思想与行为，还是仅仅因为他们是战争中的败者因而容易被赋予同情的视角？如果如龙应台所言，战争无所谓胜负，那么何以她又旗帜鲜明地以“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一方面，《大江大海》似乎在一种人道主义的悲悯情怀和聚焦小人物的历史叙事中试图实现历史的大和解，另一方面，《大江大海》又如此强烈地在剪不断理还乱的家国之哀与国共两方中选择站队。这岂非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高华对这个症结有精彩的诠释（未知龙应台本人是否同意）：“国府失去了民众的支持，使自己犹如空中楼阁般的脆弱，最终难逃覆亡的命运。1949年初陈诚奉蒋介石命接掌台省主席一职后，痛定思痛，宣称以‘人民至上，民生第一’为治台之理念，从‘三七五减租’着手，将社会基础夯实，开始新的出发。显然，台湾以后取得的成就和进步是与其失败相联系的，龙应台不会为国民政府1949的大流亡而骄傲，她是为台湾人从失败后站起来，又开出新价值而自豪。”<sup>6</sup>

4 高华：《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读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札记》，《领导者》总第34期，2010年6月。

5 高华：《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读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札记》，《领导者》总第34期，2010年6月。

6 高华：《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读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札记》，《领导者》总第34期，2010年6月。

## (2) 来自杨念群的严厉批评

相对于高华对《大江大海》的极度推崇，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的杨念群教授在一篇短文中，很尖锐地抨击龙应台在该书中的历史观为“炮灰史观”：“所有战争，包括一九四九年中国内战，并不是靠单纯的人道主义告诫就能理解的。我相信，龙应台这位年近花甲、见多识广的‘小红帽’在踏入历史丛林之后，肯定遇到不少与她观点相左的狼外婆，但结果是‘小红帽’太强悍了，每一次都能用汹涌的修辞顺利击昏狼外婆。于是，南洋岛山打根集中营里虐杀国民党军战俘的台湾监督员，与血战淮海食不果腹的前线国民党军队，密集冲锋不顾死活的解放军士兵，统统变成了飘散到战争尘埃中的悲情线偶，由历史的偶然所操控，这些跨民族、跨疆界、跨海峡的恢弘叙事，揭开的是一整代人‘隐忍不言的伤口’，让他们血迹斑斑地尽情喷洒，然后任由记忆的血水灌流进当代人麻木的心里。为被践踏、被侮辱伤害的失败人群立传，结论当然是战争根本没有什么胜利者。当交战搏杀的暴力被不论轻重、不分界线地指责，任何战争的意义都会从此彻底消解，‘炮灰论’刹那间炸出人们的眼泪，‘正义论’对胜负的书写当然就会在泪水中变得模糊不清。”<sup>7</sup> 换言之，在杨念群看来，这种诉诸小人物的悲欢离合的历史叙述，所构建的其实是在本质上无差别的悲情故事，等于是完全消解了战争的意义，也就是消解了投身或者说献身战争的将士的生命主体性，每场战争的卷入者都成为被忽悠和被利用的“炮灰”，在战场上死过一次的当事人，还得在历史记忆的领域以“复活”的方式在“生命意义和价值”上再死一次。并且，杨念群质疑龙应台在搜寻史料并构建历史叙述的时候，自动剔除掉了那些与其“人道主义的立场”相悖的证据，从而也就失去了真正进入历史的可能性。

这触及的其实就是面对 20 世纪中国的中期历史的一个核心问题：各执己见的个体经验的书写与记述究竟是会推动历史和解还是其实在阻碍历史的和解？历史的大和解何以可能？战争创伤如何抚平？我们是否能在具体地理解投身战争的个人的心情与境遇的基础上来讨论个人与时代的相遇？同情的理解是否就意味着批判性和反省力度的弱化？历史记忆和历史书写在人际、代际、党际之间的对话与和解中应该和能够扮演怎样的角色？

## (3) 历史记忆的真实性与模糊性之间的关系

吴乃德在一篇讨论二二八事件的文章曾如此谈及历史记忆的真实性与模糊性之间的关系：“为了和民族当前的想象和渴望产生共鸣，历史记忆必须加以剪裁。‘记忆’和‘历史’因此经常不完全重叠。‘集体记忆是非历史的（ahistorical），甚至是反历史的（anti-historical），对某一个事件作历史性的理解，是了解其复杂性，是从疏离的立场、以不同的角度加以观看，是接受其道德的模糊性。集体记忆则将历史中的模糊加以简单化，甚至加以消除。’可是简化的、甚至错误的历史记忆，不论它负载多么巨大的道德教训和启发，显然违反理性社会对真实的追求，而且也将不断受到历史学者、后代，特别是不同立场者的挑战。同时，模糊的历史记忆或

7 杨念群：《龙应台炮灰史观的煽情与阙失》，共识网，2013年12月15日。

能点燃某些人的热情，却必然失去对其他人的号召。由于不同族群、不同立场的团体具有不同的历史经验，模糊的历史必然无法成功地营造共同的历史记忆。而共同的历史记忆却是民族形成的重要条件之一。或许——只是或许——如某些历史家强调的，‘除非历史记忆以学术标准为基础，否则我们对记忆的责任只是一个空壳。’<sup>8</sup>

龙应台似乎也意识到了历史写作的局限性，她在书中坦承：“我没办法给你任何事情的全貌……没有人知道全貌。而且，那么大的国土，那么复杂的历史，那么分化的诠释，那么扑朔迷离的真相和快速流失无法复原的记忆，我很怀疑什么叫‘全貌’。何况，即使知道‘全貌’，语言和文字又怎么可能表达呢？……所以我只能给你一个‘以偏概全’的历史印象。我所知道的，记得的，发现的，感受的，都只能是非常个人的承受，也是绝对个人的传输。”<sup>9</sup> 吴乃德聚焦的是“模糊的历史记忆”和“道德的模糊性”，前者是指历史被裁剪、压制、刻意引导、遗忘等之后形成的“笼统印象”，而后者是指在具体的历史变动之中其实很难给其行动一个道德上的裁断，这隐含的一个预设是历史书写者并非“全知全能”，所以他对自身在道德、价值和趣味上可能的偏向，以及这种偏向可能导致的对历史认知和历史阐释的误导，应该存有一份冷静的反省。<sup>10</sup> 史华慈曾说，历史研究永恒的困境就是得面对“人的不能全部破解的存在意义上的复杂性。”龙应台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回看历史，并且意识到了自己只能相当个人化地传输“以偏概全的历史印象”，但其为“失败者”写痛史的心志过于强劲，为父辈做传的心情过于激越，以至于她忘记了其回溯历史的初衷而抹掉了历史与人性的复杂性。越是充满对复杂性的理解的写作和记忆，就越不可能让读者在情感上迅即卷入，而大多数的读者试图从历史中捕捞的记忆往往是他自我投射的认同与情感，人在历史长河试图打捞的往往是他翻转的身影。这就是历史与记忆之间永恒的张力。

正如吴乃德所言：“简化的、甚至错误的历史记忆，不论它负载多么巨大的道德教训和启发，显然违反理性社会对真实的追求，而且也将不断受到历史学者、后代，特别是不同立场者的挑战。”作为战败者的国军，对于台湾岛的本土居民而言，却又是强势的介入者，在弱者之下更有层层弱者，这就导致正义与伦理的界定变得异常艰难。在前引许倬云等人认同的大陆上层精英引入台湾的积极后果，在另一些本土精英看来，却是强烈地压抑了地方性的政治和经济精英的政治参与。

笔者曾经在讨论中国大陆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历史和解”问题时提出：“对于社会共同体的自我更新和文化遗产来说，让记忆呈现出来是一件既必要又特别艰难的事情。记忆自然不是为了煽动仇恨，而历史写作更非如此。记忆更多的像一个民族的自我疗救，而讲述本身也成为一种不断修复一个社会集体创伤的独特形式。”<sup>11</sup> 我想，这个议题对于两岸知识人、政治人物和民众而言，具有相近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所以应该在一个更为宽广和纵深的视野里来开掘其价值、探寻其方法、反思其效果。

8 吴乃德：《历史记忆中的模糊与未知》，台北：《思想》，第21期，2012年5月。

9 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9年版，174页。

10 Timothy Brook 教授也曾指出过：“历史研究者不能塑造道德准则，也不能制造道德知识。历史研究者的任务不是提出错误的观点来抨击过去的历史参与者或现在的读者，而是调查在某时某地产生道德准则的标准和条件以便进行研究。”详见氏著：《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潘敏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81页。

11 唐小兵：《让历史记忆照亮未来》，《读书》，2014年第2期。

## 2. 记忆的伦理：以《关山夺路》为例

2009 年台湾出版（2013 年由北京三联出版简体字版）的另外一套在知识界和公众社会引起持久反响的是旅美华人作家王鼎钧先生的回忆录四部曲，尤其是以一名国民党宪兵和解放军战俘的视角讲述 1945-1949 年内战历史的《关山夺路》更是获得了包括高华、王奇生等历史学家的高度认可。王奇生指出王鼎钧：“强调自己写的是一位‘小人物’的回忆录。他更多地写世事的沧桑，而不是个人的名利得失。他试图呈现一个小人物在动荡剧变的历史年代难以自主的命运。他以其职业性的敏锐观察，将乱世的各种人情世态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写，并以具体的情境事例，将自己数十年累积的阅历感悟，一一述出，平心静气，边叙边议，不见煽情，不见呐喊，却触及灵魂。”<sup>12</sup> 作为回忆录的《关山夺路》在历史叙述上展现出了几重张力，而这些张力或者说叙述困境的存在，恰恰丰富了作者的叙述层次，同时在某种意义上对读者固有的认知历史框架构成了挑战。从对国共两党成败之因果的探寻来说，王鼎钧对作为失败者的国民党及其军队似乎并没有同情，他费了最多的笔墨试图寻找强弱转化之道。就战败的日本与国民党、苏联军队三方而言，他对于作为胜利者的后者缺乏任何意义上的认同，反而有意选择对战败者的“尊严”做更多的记忆与书写。因此，王鼎钧的历史记忆的价值基点就不再是简单的人道主义逻辑（当然，纵览全书，他始终对弱者、失败者有同情感），也不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霸道逻辑，这就提出了一个饶有意义的挑战：面对 20 世纪中期的战争记忆，我们的立足点究竟应该归置在何处？这场战争能够用正义与非正义来严格区分敌我双方吗？道德的模糊性与情感的强烈性，居然如此奇特地搅拌在一起，冲击着我们理性的堤坝。比如书中第一部描述的抗战胜利后“日俘日侨”这一节文字，作为战败者的日军勉力维持其体面和尊严，保持着整洁和秩序，没有悲情呐喊，更没有摇尾乞怜，以至于作者说“无论如何，日本军人的品质是优秀的，日本政府浪费了他们。”<sup>13</sup> 而与之相对照，王鼎钧对国民党军队持负面的评价：“战地军官，军权至高，当地司令官以通敌和作战不力之类的罪名杀了多少人！结果高级将领以千万士兵做投降的资本，换一个新官位，他的部下经过改编整训，枪口换个方向，不是死在这个战场上，就是死在那个战场上，无论如何我不能承认这样的军人‘优于’那样的军人。”<sup>14</sup> 而作为战败者的家属，日本女性通过出售物品、叫卖食物来维持生活，换回回归日本的旅费，顺从中介人的摆布为中国军官提供性服务从而为日本男人维持尊严。

王鼎钧的历史记忆充分地展现了面对历史时人的情感伦理的复杂性。从侵略与反侵略战争来说，中国的抗战自然是正义的，但这种正义并不能保证在此之下中国军民的举止行动就是合乎正义或者伦理的，而作为战败者的日军及其家属，在这场战争记忆之中，似乎并不是被同情的弱者，却成就了“弱者的尊严”，仿佛成了应该被战胜者一方来尊重的对象。胜利并不天然象征正义，而失败也并不必然代表屈辱。王鼎钧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对人的理解、态度和情感，可以超

12 王奇生：《真实的历史比小说精彩——读王鼎钧回忆录》，新京报书评周刊，2013年3月29日。

13 王鼎钧：《关山夺路》，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78页。

14 王鼎钧：《关山夺路》，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78页。

越民族国家的框架吗？我们可以在一种消泯了个人的国家身份的前提之下，认真地对待历史中每一个具体的个人吗？对战争的历史记忆能够构造我们与那个时代之间内在的连带感吗？如果超越了控诉史学或者成王败寇史学，那么史学又有怎样的意义？当我们顺应这种对失败者进行充分理解甚至尊重的逻辑之后，反思和批判是否会成为摇摇欲坠的空中楼阁？换句话说，对战争各方的记忆，其能够抵达的历史目标和道德目标究竟应该是什么？

## 结语

人类学家王明珂曾经指出：“历史不只有一种声音；许多不同时代、不同的社会人群，都在争着述说自己的过去，争着将自己的过去一般化、普遍化，以成为当代的社会记忆，以抹煞他人的记忆。在自传、传记与口述历史中，我们可以看见，有些人可以向社会宣扬自己的过去，有些人的过去被社会刻意发掘、重建。这是对过去的诠释权之争，也是认同之争，权力之争。”<sup>15</sup> 对于 20 世纪中期中国的历史记忆，无论是官方主导的历史记忆，还是民间自发的回忆录、口述史，或者作家、学者的历史写作，都试图将自身对于 20 世纪中期中国的历史理解和认知框架“一般化、普遍化”，而这种写作和记忆的情感动能往往是基于人道主义的价值立场，或者基于对历史成败的理性反思，前者往往容易被批评悲悯遮蔽了理性，而后者又容易被指责理性化的反思，将淹没在历史结构和行动中付出生命的个体。尤有进者，有些学者甚至会认为关于这个时段的更多私人化历史记忆（比如这些年大量出版的回忆录、口述史等）的出现，非但不能推动人际、党际、代际之间的和解，反而会进一步撕裂中国社会，导致历史记忆的价值共识难以构建。<sup>16</sup> 而就对 20 世纪中期中国的历史苦难的认知与记忆而言，我们自然不能停留在对于政治和战争悲剧的控诉层面，而应该深入历史的肌理，将在波澜壮阔的历史洪流背后的潜在的结构因素挖掘出来，这才是历史记忆和历史写作的更高境界。历史记忆或者历史写作，就如同盲人摸象，摸到的虽然只是一个“片面的局部”，却不乏深刻的具体性，而当每个历史回忆者和写作者意识到自己可能是“盲人”（会有个人的偏见、知识和信息的限制、表达能力和记忆能力的欠缺等），而大象却是一个难以被一次性完全触摸的整体的时候，他就会相对谨慎、谦卑地面对自己的历史写作。对 20 世纪中期中国的历史记忆，无论是龙应台的历史写作，还是王鼎钧的历史记忆，都不乏在当代中国的公共生活中通过引入历史资源来进行启蒙的动力，这里特别值得深思的一个有价值的主题就是：价值启蒙是否必须以尊重历史真实为前提？揆诸历史与现实，我们会发现启蒙与历史之间存在永恒的张力，而这种张力和困境引发的争执甚至冲突也经常在当代中国的公共生活中掀起惊天巨浪，搅动人心。或许，这才是我们追溯、检讨和写作这一页历史的时候不得不小心对待和处置的深层原因。

15 王明珂：《自传、传记与口述历史的社会记忆本质》，台北：《思与言》，34 卷第 3 期，1996 年。

16 这部分的思考，得益于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李志毓博士的一次深入讨论，谨致谢意。



# 日本的历史教育如何讲述 战争与殖民统治

## ——基于教科书与教育现场的思考

盐出浩之

京都大学

[原文为日语。翻译：蒋建伟（浙江师范大学）]

### 前言

20世纪前半期日本对周边国家的战争与殖民统治，后来在日本是如何被认识的？每当涉及此问题，历史教科书往往成为议论焦点。1982年，中韩两国对日本政府审定的高中历史教科书提出抗议，引发了第一次“历史教科书问题”<sup>1</sup>。而1997年成立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通称“编纂会”）则批判以往历史教科书教导“自虐”史观，从而独自编纂历史教科书，引起了很大关注<sup>2</sup>。

然而，若真要问日本的历史教育是如何表述战争与殖民统治的，只分析历史教科书是不够的。因为学校教育不仅有教科书，教师在教学现场教什么、如何教，学生们学什么，这些更为重要。虽然历史教科书需要符合政府的标准（学习指导要领）并通过其审定，尽管教科书主要由历史学家撰写，但是，在教育现场，教育工作者、学生家长等社会各方的意向发挥着重要影响。

通过区分教科书与教育现场这两个不同维度，可以使更清楚地看到日本历史教育的重要特征。实际上，直到近几年，在教育现场回避近现代史尤其战争及殖民统治的倾向都很强烈。自2022年开始，高中新设教授世界与日本近现代史的“历史综合”科目为必修课，就是为改变这种状况而进行的尝试，但仍面临各种问题。

本报告首先确认日本历史教科书的审定等相关制度，在此基础上，对近现代史中关于战争和殖民统治的记述进行概观。其次，通过现有资料，对日本历史教育现场教师如何教授近现代史、学生们又是如何理解与接受的展开分析。最后，简要讨论高中新设“历史综合”这一科目的意义及今后课题。

1 波多野澄雄：《国家と历史》，中央公论新社，2011年。

2 三谷博：《日本の历史教科書の制度と论争构图》，（刘杰等编：《国境を越える历史认识》，东京大学出版会，2006年）。

# 1. 历史教科书是如何表述战争与殖民统治的

## (1) 教科书审定制度是如何演变而来的

自1903年开始，日本和学校教科书一直采用国定制。而到1947年，战败不久的日本在GHQ的占领下，制定了学校教育法，其中规定对学校教科书改为采用审定制。其做法是，①由民间企业制作教科书，②文部科学省（2001年以前称文部省）对这些教科书进行审定，③从审定合格的教科书中，选择学校教科书。①具体指，一些民间出版社，各自委托大学的历史学者及初高中教员负责撰写，并制作教科书。③具体指，公立初中的教科书，是由每几个自治体成立一个采择地区协议会，经过教师等人员的调查与研究，最终选定的<sup>3</sup>。高中不实行义务教育，因此教科书由学校各自选择。②所提到的审定制，就历史教科书而言，从战后到现在，其运行方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首先，最初的变化是由“家永审判”引起的。历史学者家永三郎撰写的高中日本史教科书，自从1952年初次接受审定以来一直不通过，直到1964年才以大量修改为前提有条件通过。其中一个争议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家永在教科书中，批判了日本发动的“鲁莽的战争”及“战争中的残虐行为”。对此，文部省给出的审定意见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国的立场与行为进行单方面的批判”不符合“科学、实证地理解史实”这一目标<sup>4</sup>。然而，当时的审定不仅仅限于是否符合“史实”，还涉及了历史观、学说及解释<sup>5</sup>。1965年以后，家永以教科书审定属于日本宪法所禁止的“检阅”行为为由，在法庭上进行了长期抗争。法院在承认文部省审查权的基础上，指出具体审定过程中存在肆意性。文部省也在1977年，承认被审方有对审定提出异议的权利<sup>6</sup>。

审定制度的运行发生第二次大变化，是由于1982年的“历史教科书问题”。文部省在审定高中日本史教科书时，建议将日军对中国的“侵略”这一表述改为“进出”。从日本媒体上得知这一消息后，中国和韩国对日本提出了抗议。自民党政权为避免与中韩两国关系恶化，在教科书审定基准中，追加了“近邻诸国条款”。把“在涉及近现代史中与近邻亚洲诸国相关部分的表述时，要从国与国相互理解与协调的角度进行必要的考量”作为基准之一<sup>7</sup>。

家永审判与历史教科书问题，使教科书审定制度变得透明。近年的审定，基本上都是调查所记述内容相关支撑文献等关于历史记述正确性的确认，而不介入历史观，也就是说审定范围被有意识地限定了<sup>8</sup>。

然而，在近年，审定制度发生了第三次变化。这一次，教科书的审定基准中追

3 三谷：《日本の历史教科書の制度と论争构图》。

4 家永三郎：《一历史学者の歩み》，岩波书店，2003年。支援教科书审定诉讼全国联络会编：《家永·教科书裁判 第1部 准备书面编》，综合图书，1967年，465～466页。

5 大槻健、尾山宏、德武敏夫编：《教科书黑书》，劳动旬报社，1969年。丰田武：《历史教育のあり方》，《读卖新闻》，1960年5月16日（夕刊）。

6 三谷：《日本の历史教科書の制度と论争构图》。波多野：《国家と历史》，132～136页。

7 文部省实际上并未强制把“侵略”改为“进出”，但确实曾劝告回避“侵略”一词。三谷：《日本の历史教科書の制度と论争构图》。波多野：《国家と历史》，136～147页。

8 三谷：《日本の历史教科書の制度と论争构图》。三谷芳幸：《历史教科书と検定の论理》，《历史学研究》第1032号，2023年2月。

加了与“近邻诸国条款”不同旨趣的内容。首先,2014年,关于“近现代历史事件中,没有定论的数字等事项”,规定明确指出“没有定论的数字”,并且规定不使用导致“误解”的表述<sup>9</sup>。接着,在2021年,又指出“从军慰安妇”这一表述,会让人误解为朝鲜慰安妇是被日军“强行带走”的,基于“客观事实”,“慰安妇”才是“恰当”表述。另外,对于征用朝鲜劳工,不使用“强行带走”“强制劳动”,而仅使用“征用”这一表述<sup>10</sup>。

近年这种审定基准的变化也发生在自民党执政期间,它反映了日本社会一部分人根深蒂固的愿望:肯定地记述自己国家的过去。但是,也只有通过对审定标准的明文修订,并借助“客观性”这种修辞,才能介入教科书的记述。这是经过家永审判及历史教科书问题,教科书审定制度变透明的结果。

## (2) 历史教科书是如何书写的

历史教科书是如何表述日本的战争及殖民统治的?本报告主要对战后至近年初中教科书的论调进行概观。下面列举的都是经文部省(文部科学省)审定合格的教科书。

之所以选择初中,最主要是因为从战后到现在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接受了初中义务教育。高等学校不仅战后初期升学率低<sup>11</sup>,而且如下文所述,在1994年其历史教育的构成发生了很大改变,因此难以连贯起来分析。而初中的“历史”,则主要学习从原始时代、古代至现当代的历史,以日本史为主夹杂着一些世界史,从战后到现在形式基本没变。

### ① 1955年前后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历史教科书审定制度颁布之初1955年前后的教科书<sup>12</sup>。早在这一时期,就已经确立了一个论调,即从满洲事变到中日战争再到太平洋战争的过程以及日本战败这一结果,整体上都看作是日本犯的错误。

相当多的教科书,明确指出满洲事变和中日战争是侵略。另外,包括未明确指出满洲事变和中日战争为侵略的教科书在内,许多教科书都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中日战争导致日美对立,进而引起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经过<sup>13</sup>。这有可能是为了让学生们

9 文部科学省,关于教科书审定的改善等、教科书审定基准的修正(2014年1月)<[https://www.mext.go.jp/a\\_menu/shotou/kyoukasho/gaiyou/04060901/1338839.htm](https://www.mext.go.jp/a_menu/shotou/kyoukasho/gaiyou/04060901/1338839.htm)>

10 “基于内阁会议,文科省在教科书审定中决定把从军慰安妇改为慰安妇,出版社做出修正,教育现场对‘淡化负的部分’表示担忧”,《东京新闻》,2022年3月30日。<https://www.tokyo-np.co.jp/article/168575>>这一变更基于以下两个内阁会议的决定。一个是2021年4月27日“众议院议员马场伸幸针对‘从军慰安妇’等表述问题提交的答辩书”;另一个是2021年4月27日“众议院议员马场伸幸针对‘强行带走’‘强制劳动’等表述问题提交的答辩书”。

<[https://www.shugiin.go.jp/internet/itdb\\_shitsumon.nsf/html/shitsumon/b204097.htm](https://www.shugiin.go.jp/internet/itdb_shitsumon.nsf/html/shitsumon/b204097.htm)>

<[https://www.shugiin.go.jp/internet/itdb\\_shitsumon.nsf/html/shitsumon/b204098.htm](https://www.shugiin.go.jp/internet/itdb_shitsumon.nsf/html/shitsumon/b204098.htm)>

所谓征用,是指基于国民征用令(1939年)的强制劳动。

11 学校基本调查,按年度统计升学率(1948年~)J(e-Stat)<<https://www.e-stat.go.jp/dbview?sid=0003147040>>

12 在初中社会科课程的历史课上开始使用审定教科书是在1952年。小山常实:《历史教科书的历史》,草思社,2001年,40~41页。

13 森克己、竹内理三、藤木邦彦编:《中学社会 日本と世界 历史的内容を主とするもの》下,帝国书院,1955年。历史教育研究会编:《世界の動きと日本の歩み》,日本书院,1955年。坂本太郎等编:《中学校社会(历史的内容を主とするもの)》下,学校图书,1955年。有泽广己等监修:《新编新しい社会④》,东京书籍,1955年。丰田武等监修:《中学校の社会科 近代の世界と日本(改订版)》,中教出版,1956年。

理解日本战败的原因。有一本教科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日本”这一章的开篇如下写道：

1945年8月6日，我们日本人遭遇了人类未曾经历的可怕灾难。广岛被投原子弹，许多无辜的人瞬间坠入地狱。（中略）为避免愚蠢的行为重演，让我们探究战争发生的原因，认真思考战争所带来的后果<sup>14</sup>。

对于当时战争结束才10年左右的日本社会而言，包括儿童在内，战争所带来的灾难仍是记忆犹新的共同体验。教科书的编撰者，以这个共同体验为前提指出，日本错误地发动侵略战争，导致战败受害<sup>15</sup>。不过，当时的教科书所提及的战争受害，仅指日本人的受害。而另一方面，教科书把对中国的侵略和发动太平洋战争的责任几乎全算到了军部头上<sup>16</sup>。

而且，1955年前后的教科书，虽然承认侵略中国和发动太平洋战争的错误，却对日本的殖民统治几乎绝口不提。虽然偶尔有教科书会提一句“殖民地（台湾、朝鲜）人们的自由经常受到限制”<sup>17</sup>，但是把吞并韩国说成“向大陆发展”等对此进行肯定性评价的教科书是当时的主流<sup>18</sup>。甚至，有教科书说道：

我国失去了以往领土的百分之四十六以及在海外的各种权益，八千万以上的人口被困在这剩下的狭小领土上，我们要一边对战争中曾加害过的各国履行赔偿责任，一边把自己的生活经营下去。因此，未来还有很多困难等着我们。<sup>19</sup>

也就是说，当时的日本社会，把放弃殖民地视为战败受害的一部分。就连历史学者也缺乏对殖民统治的批判性视角。

## ② 1970年前后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日本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1970年前后的教科书。关于侵略中国及太平洋战争的记述没有太大变化，强调日本人在战争中的苦难及受害这一点也跟以前一样<sup>20</sup>。但是，这一时期的教科书，也开始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世界各国的受害<sup>21</sup>。并且，也有教科书指出，满洲事变以后“支持军部做法的人变多了”，

14 丰田等监修：《中学校の社会科 近代の世界と日本（改订版）》，114页。

15 1960年代，这些记述以学生是战后出生为由，在文部省教科书调查官的指示下被删除了。大久保佑香里：《1946～55年におけるアジア・太平洋战争の认识と记述》，《三田学会杂志》第108卷第1号，2015年4月，162～163页。

16 吉田裕指出了战后日本人战争观中“受害者意识”与“领导人责任观”之间的关联。吉田裕：《日本人の战争观》，岩波书店，2005年，56～66页。

17 小西四郎、家永三郎：《社会科 中等历史》下，三省堂，1954年，150页。

18 历史教育研究会编：《世界の動きと日本の歩み》，284～285页。坂本等编：《中学校社会（历史的内容）》下，79页。

19 森、竹内、藤木编：《中学社会 日本と世界》下，256～257页。“日本变小了”的观点还见于坂本等编：《中学校社会（历史的内容）》下，139～140页，有泽等监修：《新编新しい社会④》，158页。

20 川崎庸之等：《新版 标准中学社会II 历史》，教育出版，1969年。笠原一男等：《中学校社会 历史的分野》，学校图书，1972年。井上智勇等：《中学社会（历史的分野）》，大阪书籍，1972年。以及下面这条注所列教科书。

21 小叶田淳等：《日本的历史と世界》，清水书院，1971年，281～283页。竹内理三等：《中学校社会 历史 最新版》，帝国书院，1972年，280～281页。儿玉幸多等：《中学社会 历史的分野》，日本书籍，1972年，316页。鹤饲信成等：《新しい社会 历史的分野》，东京书籍，1972年，276页。

这反映了不再将战争责任全部推给军部<sup>22</sup>。

这一时期的教科书与以前不同的是，对日本统治朝鲜的表述。大多数的教科书，开始提及日本吞并韩国时所激起的激烈反抗<sup>23</sup>以及三一运动<sup>24</sup>。另外，有个别教科书指出，日本统治朝鲜时存在经济上的压榨<sup>25</sup>，也有教科书涉及战时对朝鲜人的征用<sup>26</sup>。这些变化发生的背景是，1965年日韩邦交正常化。

### ③ 1987年

我们再看一下1983年教科书审定基准增设“近邻诸国条项”后的1987年的教科书。几乎所有的教科书，关于中日战争、太平洋战争，都不再仅强调日本人受害，而是明确指出对亚洲各国造成的伤害<sup>27</sup>。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都提到了南京事件（南京大屠杀）及强虏朝鲜人和中国人<sup>28</sup>，也有很多教科书提及日本占领东南亚时当地人的受害与反抗<sup>29</sup>以及对台湾人和朝鲜人征兵<sup>30</sup>。像这样，教科书在表述战争期间日本对亚洲各国造成的伤害时，包括了对殖民地人们的战争动员，而且对殖民统治本身的记述也增多了。尤其是许多教科书提到了殖民统治下日本对朝鲜实施的同化政策及民族歧视，还有战时实行的创氏改名、神社参拜等所谓的皇民化政策<sup>31</sup>。

以上变化，并非仅来自“近邻诸国条项”的影响。在日本与近邻诸国不断深入交流的过程中，也随着历史研究的发展，只关注日本人在战争中受害的教科书记述得到修正，变成一种更为公允的记述。

### ④ 2000年代以降

关于近年的教科书记述，主要列举市场占有率高的两册。第一、简明易懂地记述了满洲事变后对中国的侵略以及中日战争与太平洋战争的关系；第二、不仅看到日本人在战争中所受的伤害，也关注日本对亚洲各国造成的伤害；第三、涉及对殖民地的同化、歧视及皇民化政策等。这两册教科书，继承了1987年以来许多教科

22 鹤饲等：《新しい社会 历史的分野》，269页。

23 鹤饲等：《新しい社会 历史的分野》，234页。川崎等：《新版 标准中学社会Ⅱ 历史》，248页。小叶田等：《日本の历史と世界》，237页。笠原等：《中学社会 历史的分野》，213页。儿玉等：《中学社会 历史的分野》，260页。

24 川崎等：《新版 标准中学社会Ⅱ 历史》，278～279页。小叶田等：《日本の历史と世界》，261页。竹内等：《中学校社会 历史 最新版》，262页。笠原等：《中学社会 历史的分野》，234页。井上等：《中学社会（历史的分野）》，274页。儿玉等：《中学社会 历史的分野》，289页（脚注）。

25 笠原等：《中学社会 历史的分野》，213页。

26 儿玉等：《中学社会 历史的分野》，315页。

27 虽视点不同，小山《历史教科书的历史》通过对初中历史教科书按时序分析，得出了与本报告相同的见解。

28 川田侃等：《新编 新しい社会（历史）》，东京书籍，1987年。时野谷胜等：《中学社会〈历史的分野〉》，大阪书籍，1987年。石川忠雄等：《中学校社会 历史的分野》，学校图书，1987年。护雅夫等：《日本の历史と世界》，清水书院，1987年。儿玉幸多等：《中学社会 历史的分野》，日本书籍，1987年。野村正七等：《新订 中学社会 历史的分野》，教育出版，1987年。

29 川田等编：《新编 新しい社会（历史）》。时野谷等：《中学社会〈历史的分野〉》。护等：《日本の历史と世界》。儿玉等：《中学社会 历史的分野》。野村等：《新订 中学社会 历史的分野》。

30 时野谷等：《中学社会〈历史的分野〉》。石川等《中学校社会 历史的分野》。儿玉等《中学社会 历史的分野》。野村等《新订 中学社会 历史的分野》。

31 川田等编：《新编 新しい社会（历史）》。时野谷等：《中学社会〈历史的分野〉》。护等：《日本の历史と世界》。野村等：《新订 中学社会 历史的分野》。

书的论调<sup>32</sup>。

## 2. 教育现场是如何表述战争与殖民统治的

### (1) 战后~1990年前后

若把焦点对准教育现场，我们会发现日本的历史教育与教科书的记述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样貌。1962年，有一位高中生向报纸投稿十分不满地指出，无论是初中还是高中的历史课都是“只把古代和中世讲述得特别详尽”，却不学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应该把教科书的内容全部学完”。对此，一位初中教师回应说：因为课时不足，所以无法教现代史。而且，“日本的教师，在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各个阶段，也几乎都没有接受过现代史教育”<sup>33</sup>。令人吃惊的是，即使到了1990年左右，这种倾向也几乎没有改变<sup>34</sup>。

也就是说，历史课从原始、古代开始讲起，近现代往往由于没时间就不讲了，这种倾向在战后持续了很长时间。无论历史教科书如何表述战争及殖民统治，在教育现场一般不讲述这部分内容。

缩减前近代史所用时间，或者先教授近现代史也并非不可能，但是，课时不足只是一个方面。毋宁说，正因为有教科书的顺序及课时不足等正当理由，近现代史尤其关于战争及殖民统治的历史才自觉不自觉地被回避了。其主要原因应该是日本社会尤其学生家长那一代的历史认识。

1971年，初中教师本多公荣在历史课上讲授了太平洋战争。最后，本多让学生读了介绍“在亚洲各国的教科书中太平洋战争是如何被书写的”相关资料，并让学生写了“致亚洲初中生朋友们的信”。学生们对于“日本在战争中对亚洲诸国所犯下的残虐行为”受到很大冲击，并对“跟我们使用的教科书完全不一样”而感到震惊。但是，学生家长们在读了由学生们的“信”汇总成的文集后，却给出了不

32 五味文彦等：《新编新しい社会 历史》，东京书籍，2006年。坂上康俊等编：《新编新しい社会 历史》，东京书籍，2017年。矢ヶ崎典隆等：《新しい社会 历史》，东京书籍，2021年。黒田日出男等：《社会科 中学生の历史》，帝国书院，2004年，同2017年，同2021年。2021年，东京书籍市场占有率是52.5%，帝国书院为25.2%，排第三位的教育出版占11.4%（“2021年度初中教科书采用状况”，《内外教育》，2021年2月2日）。

另外，在此之所以未列举“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及采取同样立场的教科书，是因为他们的市场占有率极低。由“编纂会”撰写、扶桑社出版的历史教科书，自2001年通过审定至2010年最终版刊行，采用率不到1%。之后，由“编纂会”退会人员撰写、育鹏社出版的历史教科书，虽在2010年代有3%-6%的采用率，但2021年以后却骤减至1%-1.1%。由现在的“编纂会”撰写、自由社出版的历史教科书，每年的需求量是几百部，采用率是0.0%。三谷：《日本の历史教科書の制度と论争构图》。“扶桑社历史教科书采用率0.4%”，《朝日新闻》，2005年10月6日（朝刊）。“育鹏社的教科书，采用率上升”，《朝日新闻》，2011年11月2日（朝刊）。“历史教科书，育鹏社增加”，《朝日新闻》，2015年10月31日（朝刊）。“2019年度初中教科书采用状况”，《内外教育》，2019年1月29日。“2021年度初中教科书采用状况”，《内外教育》，2021年2月2日。“2022年度初中教科书需求量”，《内外教育》，2022年2月1日。“2023年度初中教科书需求量”，《内外教育》，2023年1月24日。

33 近藤克荣：“半途而废的历史课”，《读卖新闻》，1962年4月6日（朝刊）。青木幸寿：“充实现代史教育”，《读卖新闻》，1962年4月16日（朝刊）。小野ワキ：“现代历史也请详细讲解”，《读卖新闻》，1967年4月3日（朝刊）。三谷博：《历史教科书问题 序论》，（同编《readings 日本的教育与社会6 历史教科书问题》，日本图书センター，2007年）第10页关于1960年代后半期的回顾中也提到了这一点。

34 那须隆志：“历史课，先从现代开始（声）”，《朝日新闻》，1988年12月11日（朝刊）。“不幸的时期如何表述？备受瞩目的日韩历史教育”，《朝日新闻》，1990年6月2日（朝刊）。森田定治：“教师自身也不擅长‘近现代史’ 如何学习历史（声）”，《朝日新闻》，1990年6月9日（朝刊）。古宫纪子：“增加近现代史课程”，《读卖新闻》，1990年12月13日（朝刊）。“高中日本史教育，现在没把重点放在近现代”，《朝日新闻》，1991年2月10日（朝刊）。荒川理英：“高中历史，何不从近代开始（声）”，《朝日新闻》，1994年7月15日（朝刊）。“‘战争结束50年的八月’知道才能……教战争的课还不够/爱知”，《朝日新闻》，1995年8月29日。

同的反应。

(母亲 A) 如果只写我们攻打了过去, 做了过分的事情, 那不是只看到了一方面(不公平)吗? 在这本书(文集)里, 并没有写我们。

(母亲 B) 战争中, 有很多人牺牲了。我们家也有战死的人。从那本书来看, 好像真是白死了, 让人感到遗憾。

(母亲 C) 这让我战栗着想起同时代的我们, 那时, 我们一切都被蒙在鼓里, 只被告知好的事情。

(父亲 A) 在军队, 命令一下, 就拼了命努力去做的事情, 却被“荒唐愚蠢”、“残忍”这样一个词就否定了, 实在令人遗憾。

(父亲 B) 我辩解一句, 罪恶的是军阀、财阀, 并不是所有日本兵都是坏人。一个被召集起来的普通市民, 不会对当地人做坏事。

(父亲 C) 战争本身就是罪恶的, 因此, 可以理解现在的年轻人指责当时的人。但是, 也希望体会一下当时被迫卷入战争年轻人的心情, 同时, 也希望能再考虑一下被迫卷入战争的时代经过。<sup>35</sup>

当时的学生家长, 主要是曾在亚太各地作战的士兵及其家属, 或者在战争末期遭受美军空袭等灾难的人们。他们并不想把侵略中国和太平洋战争正当化, 也一致认为战争是罪恶的。

但是, 他们所抱有的战争观是, 在战争中日本受害了, 并且战争是被国家权力强迫的。曾参加过战争的士兵们, 也通过对军队上层及军队组织的反抗, 表达了他们的受害者意识。日本是侵略者、加害者, 并且普通士兵也在战场上和占领地区助纣为虐、伤害和虐待过许多人, 对当时的学生家长而言, 这些都是不愿面对的过往<sup>36</sup>。

当然, 教师们与学生家长是同一代人, 所以像本多那样的教师是个例外。学习过本多的授课方式的教师们表示, 在自己的学校有“不涉及(战争)的风潮”, 即使想这么教也很难实现。据本多所言, 战争受害, 由于是“父母的亲身体验”, 所以很容易教。但是, 作为战争中加害者的一面, 由于“记忆犹新”而很难去教, 而最难的莫过于教战争的原因。许多学校, 即使讲述战争, 也是基于学生家长或教师的受害体验, 告诫学生不能发动战争而已<sup>37</sup>。

因此, 孩子们通过与家人对话、学校教育、媒体等, 继承了作为受害者的战争观。1980年代末, 某高中教师, 在日本史的课上, 让学生关于日本的战争及殖民统治作报告。结果, “此前我一直以为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受害国”, “我曾以为日本遭受原子弹轰炸, 是一个非常可怜的国家”等类似反应层出不穷<sup>38</sup>。

35 本多公荣:《ぼくらの太平洋戦争》, 1973年(岩本努等编:《本多公荣著作集》第1卷, ルック, 1994年)。本多生于1933年。

36 桥本明子著, 山冈由美译:《日本の長い战后》, みすず书房, 2017年, 第2章。吉田裕:《兵士たちの战后史》, 岩波书店, 2020年。并且, 根据1972年的舆论调查, 46.6%的人认为中日战争是“不得已而为之”, 只有26.4%的人认为“做了过分的事情”(吉田:《兵士たちの战后史》, 210~211页)。

37 《败战三十年座谈会・戦争と社会科教育》, 1975年(岩本等编:《本多公荣著作集》第1卷) 321~327、342~343页。

38 波多野淑子:《生徒の戦争观をめぐって》, 《日本史教育研究》第109号, 1989年5月。

殖民统治的历史，在教育现场也基本不教。1990年电视台有一个新闻节目，采访初高中生时问道：“你知道过去日本曾对朝鲜做过什么吗？”。对此，一部分人说不知道，多数人回答“在战争中，日本对朝鲜做了很过分的事情”。不过，对于具体做了什么，大家就“不知道”了。如前所述，1980年代后半期，历史教科书中加入了关于殖民统治的内容，然而，学生们的理解却仅限于战争中日本好像对殖民地造成了某些伤害，仅此而已。看了这个新闻的教师坦白道：因为在初高中几乎没学过近现代史，所以，在进入大学学习之前，我跟他们一模一样<sup>39</sup>。

但是，我们不能把学校教师回避近现代史的主因，全部归结在学生家长那一辈人的历史认识上。1984年某高中教师指出，历史教育中存在着“权威主义构造”。历史教科书每一行记述的背后，都有“庞大的史料和研究史”，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之外把握这些很困难。所以，“我们无法像数学老师理解数学教材那样去理解历史教科书的内容，只能依存于学界权威把他们的研究成果传达给学生”。因此，历史就不得不成为一门背诵记忆的科目。这位老师指出了历史学与历史教育之间存在的断裂。该教师还吐露，其自身经历了战时到战后教育价值观的巨大转变，很难对（历史教育的）价值观负责<sup>40</sup>。

由此可见，社会上关于近现代史尤其战争及殖民统治存在相对立的认识，为了实施让教师、学生（或家长）都信服的教育，只说历史教科书上写着是不够的。

## (2) 1990年前后～2020年前后

1990年前后，在学校教近现代史的风气高涨。其背景是，包括与中韩两国交流加深在内全球化的发展及冷战终结。另外，这一时期的日本人大多没经历过战争，若不通过学校教育及媒体，根本无法了解战争及殖民统治的历史<sup>41</sup>。

第一，在1987年制定原案、1994年开始实施的高中教育课程中，历史教育的定位发生了改变。从前，在高中，日本史和世界史都是选修课，鉴于全球化的趋势，世界史成了必修课。还有，无论日本史还是世界史，都设置了以近现代为中心的A科目和涵盖所有时代的B科目<sup>42</sup>。不过，学习A科目的，一般是不考大学（约半数）或者大学入学考试不考日本史及世界史的学生。

第二，然而，1990年左右开始，大学入学考试也开始增加近现代史方面的题目。以前，大学入学考试中近现代史的题目少，曾是高中不教近现代史的借口，这已经行不通了<sup>43</sup>。

第三，新闻报道等关于应重视近现代史的舆论高涨。1990年5月，韩国卢泰愚总统访日，天皇（现在的上皇）在宫中举行晚宴，提及“我国曾带给（朝鲜半岛）

39 井上岳史：《近·现代史を学ぶには》，《日本史教育研究》第113号，1990年7月。

40 该教师以课时不足为由在课上没教近现代史，只给学生发了类似年表的资料。村濑克己：《问题提起 納得して学ぶこと》（日本史教育研究会编：《入门·日本史教育》，山川出版社，1989年）66～70页。涩泽新二：《村濑氏发表·讨议报告》，同71～75页。

41 成田龙一：《增补“战争经验”の战后史》岩波书店，2020年，275页。

42 《教育课程の基准の改善について 昭和62年12月29日教育课程审议会最终答申》，《教育情报研究》第3卷第4号，1987年。<[https://doi.org/10.20694/jjsei.3.4\\_64](https://doi.org/10.20694/jjsei.3.4_64)>

43 “大学入学考试增加近现代史的题目，历史变动的反映？”，《朝日新闻》，1993年2月26日（朝刊）。

……一段不幸的时期”，是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sup>44</sup>。

就这样，到1990年代中期，教育现场终于开始教包含战争及殖民统治在内的近现代史，而教育工作者面临如何“讲述”近现代史的难题。对这一时期的教师和家长而言，他们自身并未经历过战争及殖民统治，如前所述，他们自身所受的历史教育中也几乎没学过20世纪的历史。当然，也有教师“是自然而然地听着战争中的事情、战后的饥荒、父辈的战争体验等长大的”<sup>45</sup>，然而，这种传承下来的记忆很有可能形成作为受害者的战争观，与历史教科书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在此，报告人将基于2005年和2022年在大学生协助下完成的问卷调查，考察近年高中的日本近现代史教育<sup>46</sup>。

首先，询问在高中近现代史学到哪里。2005年，16%的学生称基本上没学过近现代史，学到1920年代的占9%，学到1930年代的占13%，学到1945年的占16%，学到战后（1950年）的占22%，学到1990年代的占22%。2022年，完全没学过近现代史的学生仅占2%，学到1945年的占9%，学到战后（1969年）的占16%，学到1990年代及之后的占73%。从这些数字看好像学生在高中逐步学习近现代史了。

但当问及对日本史这门课感想时，就会发现学近现代史主要是为了大学入学考试。“只是记住而已”，也就是为了考试而进行的背诵记忆科目，2005年这样回答的人占33%，2022年占23%。背诵记忆是指“知识的填鸭”，换言之，就是缺乏“故事性”（2022年）。此外，还有人认为“为学完考试指定范围，上课进度很快”（2022年），也有人觉得“虽然学习了基本知识，但是，很少有课能把历史上发生的事有逻辑地讲述出来”（2022年）。还是从原始、古代讲起，并未给近现代分配足够的时间，在课时构成不变的情况下，为了考试始终只列举需要背诵记忆的事项，就往往回避“讲述”。

当然，也有教师积极地“讲述”近现代史，但是，他们的课有时让人觉得缺乏客观性。下面这条感想就很能反映这一点，“一讲到近现代史，要么尽量不深入讲，要么就是老师个人思想色彩浓重，呈现出两个极端”（2022年）。不难推测，这背后涉及到对战争及殖民统治的历史认识问题，“我当时希望老师既讲日本好的地方也讲不好的地方，能让我喜欢自己的国家”（2005年）<sup>47</sup>。

不过，在教育现场，“讲述”战争及殖民统治的历史仍存在困难的原因之一，应该是前述历史教育的“权威主义构造”。“对于阿伊努族、冲绳、战争等，大家也在课上一起调查……让我思考了很多”，发表这条感想的学生，回忆高中日本史的课程认为自己“很幸运”（2005年）。战争、殖民统治等有关历史认识的问题，尤其需要有理有据让学生信服的教学方式。

44 “如何表述‘不幸的时期’？备受关注的日韩历史教育”，《朝日新闻》，1990年6月2日（朝刊）。关于当时天皇的发言，请参考宫内厅网页“在重要仪式上的讲话（平成2年）”  
<<https://www.kunaicho.go.jp/okotoba/01/okotoba/okotoba-h02e.html>>

45 松本馨：《<story 日本的历史 近现代史编> 编集中间报告》，《日本史教育研究》第146号，1999年7月。

46 问卷调查的对象分别是2005年在法政大学文学部学习“日本现代史”课程的45名学生，2022年在关西大学法学部学习“日本政治史”课程的64名学生。从调查结果可以推测，这些学生在高中是选修的“日本史B”。

47 世界史教师小川幸司指出，“对于慰安妇问题、战争责任问题、领土问题等需要对话的历史认识问题，教师在课堂上往往会避而不谈”。其主要原因是，若在课堂上就这些问题展开对话，会担心学生们毫不避讳地把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表达出来，从而引起情感冲突。井野濑久美惠·小川幸司·成田龙一：《（讨论）转换期的历史教育/历史教育の转换》，《思想》第1188号，2023年4月，18页。

### 3. “历史综合”的尝试

依照 2016 年制定原案、2018 年颁布的《学习指导要领》规定，2022 年高中新开设“历史综合”科目，将日本史与世界史合并，以近现代史为中心，要求全体高中生必修<sup>48</sup>。根据该原案的基础，即日本学术会议的建议（2014 年），设立“历史综合”的目的是，“为年轻一代活跃在世界舞台上提供必要的基础素养”，尤其是改善日本人对“近代日本与周边国家之间发生的问题”，“几乎一无所知”的现状<sup>49</sup>。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大家认识到改正回避近现代史教育的倾向是紧要课题。

“历史综合”的另一个特征是，从资料中获取信息，并重视设定问题，根据资料考察、讨论。其目的是，从“讲授”与“记忆”构成的历史教育，转变为引导学生针对“为什么”等问题，通过自身调查，促成深入理解的历史教育<sup>50</sup>。我们可以把这视为对历史教育“权威主义构造”的修正。

目前出版的许多“历史综合”的教科书，涉及包含日本在内的世界近现代史，对于战争及殖民统治也从不同国家、民族的视角展开论述。有的教科书忠实奉行不同于以往的历史教育这一理念，积极促进活用问题和资料的课堂教学<sup>51</sup>。

不过，在教育现场“历史综合”是如何被接受的，仍是很大的未知数。以前，在高中，日本史与世界史由不同教师担任，把这两个合并在一起教，教师方面的努力必不可少<sup>52</sup>。向活用问题及资料的历史教育转变，也是同样如此。再加上，“历史综合”是在一年时间里，每周两次课，讲述从 18 世纪到现代的历史，让人担心时间不够。也听说教育现场希望充实 18 世纪及 19 世纪的历史记述。也就是说，回避近现代史的倾向，至今仍未结束。

虽然前途多难，至少对于近现代史，尤其战争及殖民统治的过往，要让日本人共同拥有最基本的认识，日本的历史教育在向这个方向转变。从长远来看，希望这也会给历史研究带来变化。

48 文部科学省：《高等学校学习指导要领（平成30年告示）解说 地理历史编》，2018年。<[https://www.mext.go.jp/component/a\\_menu/education/micro\\_detail/\\_icsFiles/fieldfile/2019/11/22/1407073\\_03\\_2\\_2.pdf](https://www.mext.go.jp/component/a_menu/education/micro_detail/_icsFiles/fieldfile/2019/11/22/1407073_03_2_2.pdf)>

49 日本学术会议史学委员会高校历史教育相关分科会：《提言 再び高校历史教育のあり方について》，2014年。<<https://www.scj.go.jp/ja/info/kohyo/pdf/kohyo-22-t193-4.pdf>>

50 文部科学省：《高等学校学习指导要领（平成30年告示）解说 地理历史编》。日本学术会议史学委员会高校历史教育相关分科会：《提言 再び高校历史教育のあり方について》。

51 报告人参与撰写的久保文明等：《现代的历史综合》（山川出版社）就是一个例子。盐出浩之：《<现代的历史综合 みる・读みとく・考える>三つのねらい》，《山川历史 PRESS》第3号，2021年8月。<<https://ywl.jp/view/JVwwE>>

并且，“历史综合”科目也有“编纂会”相关人员撰写、明成社出版的教科书，但采用率仅0.5~0.6%。“2022年度高中教科书采用状况”，《内外教育》，2022年2月15日。“2023年度高中教科书采用状况”，《内外教育》，2023年2月7日。

52 “摸索前进的日本史、世界史教师”，《朝日新闻》，2022年6月5日（朝刊）。矢野慎一：“独家视角 新科目‘历史综合’教师意识改革所面临的课题”，《朝日新闻》，2022年9月2日（朝刊）。

# 【讨论·提问答疑】第2场

## 报告人互评·回应与会者提问

主持人：南基正 首尔大学

发言：川岛启一 同志社中学·高中  
 (按发言顺序排序) 田卷庆 芝浦工业大学柏中学高等学校  
 金滢 首尔大学  
 盐出浩之 京都大学  
 唐小兵 华东师范大学  
 金泰雄 首尔大学

[以母语发言。翻译：洪龙日(韩语)、于宁(日语)]



南基正

第2场，在教育方面，我们已经探讨了韩中日三国目前的情况、至今的发展历程及当前面临的问题等。

现在我们将进入问答环节。虽然时间有限，但希望能简要地提出今天讨论中未解决的问题或比较简单的问题。这里除了解决问题以外，共享我们需要共同关注并思考的问题也很重要。请提出今天内容中未涉及但我们必须仔细考虑的问题，这将对我们大有帮助。同时，请尽可能简洁地发言，因为这是通过翻译进行的对话。

如何准确地阐述要点，也是通过这种会议需要培养的素质之一，希望大家能够思考这一点。请首先使用您的母语发言，并先报告您的姓名和所使用的语言，务必使用麦克风。如果涉及到特定的人名、地名或您特别使用的概念等，请通过聊天窗口以汉字形式输入。每人提问限时1分钟，评论限时2分钟。请举手后开始发言。

如果您在教育现场有所体会，或者对目前的感受，以及听了今天的演讲后有任何想法或希望进一步讨论的问题，请分享您的看法。刚才跟我打过招呼的两位，我希望首先将麦克风交给川岛先生，请发言。

川岛启一

我是同志社高中的川岛启一。我负责教“世界史B”与新开设的“历史综合”

两门课。我想发表一下评论。

正如三谷老师指出的那样，教科书中记载了很多历史事实。但学生们在知道了这些事实之后，要让他们认识到这些事实“具有何种意义”，从我自身经验来看，确实在实际操作中存在难度，我也一直在苦恼应该如何进行教学。

之前的历史科目全部被废止，自2022年度起，改为全新的“历史综合”、“世界史探究”和“日本史探究”的科目，目前教学现场相当混乱。

就在两三天前，我与三谷老师共同参与的高大连携历史教育研究会召开了大会，我们刚好在会上分享了关于应该如何推进历史综合教学的苦恼。我确实感受到，从现状来看，要多层次呈现加害的历史与受害的历史，一边听取各方声音一边进行学习，还是非常困难的。此外，我非常希望能够有机会开展这样的讨论。以上就是我简短的评论。

田卷庆

我是芝浦工业大学柏中学高等学校的田卷庆。感谢今天各位的报告。我指导学生“历史综合”这个新科目也已经满一年了。我想就此稍作评论。

以前，我们都是按照从古代到现代的时代划分进行通史教学，但现在变成了按主题划分的“历史综合”，我认为这是非常具有突破性的。具体来说，比如有近代化、大众化，以及全球化等主题。从时期上看，是从17、18世纪左右开始到现代的这一区间，或多或少也对时间顺序有一定的意识，但通过以主题进行划分这一做法，我认为让对话变得更加容易。

但是也因为是以主题划分，所以同一时代的事件在不同的主题中会重复出现，要在同一时代的来来回回中学习，所以对学生而言，我们现在学习的是哪个时代哪个地区，他们会产生混乱。在这方面，我认为作为指导者，我们需要对此进行进一步学习。

此外，“历史综合”非常注重史料，重视的不是老师讲什么，而是学生通过史料读取到什么，并基于读取到的内容与老师或同学进行对话交流。本次论坛为我们提供了各种史料，包括从外语翻译过来的史料，我从中获得了很多编辑教材的视角。这样的新视角在今后也会不断积累，我希望能将其编纂成教材，以这样的形式将这类知识回馈给更多的人。

南基正

我想对报告者们说的是，您提到了目前的教学是以历史材料为中心进行的。如果您了解韩国或中国在这方面的做法，请分享给我们。另外，我在想，韩国对“东亚史”的探索是否与所谓的“历史综合”有着类似的思想。进入2000年代后，1990年代以来韩国流行的“东亚史”概念，也可以看作是韩国人适应后冷战时期全球化、全球化浪潮中的一个过程。

这些观点虽然具有其积极的意义，但在韩国的情况中，似乎也暴露出一些负面的含义，希望大家能够对此予以考虑。对于中国，我想知道是否存在类似的尝试或思想。如果在座的各位中有人了解中国的情况，不限于今天的报告者，也请分享一下您的见解。

如果有疑问、评论或想提出新的问题，请现在发言，我们还可以接受一位。目前有两位想发言，我们将接受这两位。之后，我们将在最后给予三位报告者发言机会，以此结束本环节。请最先在后面举手的朋友发言。

听众 1

您好，我目前没有正式职位，毕业于韩南大学历史教育系。虽然不是正式教师，但我已经以合同制教师身份在多所中高等学校以及特性化高中（译注：以职业教育为中心的高中）教授历史课程。后来，因为对现行历史教育体系感到疑问，我开始考虑如何能够突破这种局限，因此决定进入日本的研究生院深造，于去年来到日本。

在此背景下，我想分享我的一些看法，因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与今天的讨论内容相符。在教学过程中，我感受到韩国社会存在一种趋势，那就是更倾向于向学生灌输知识，而不是促进他们的理解。由于学习是为了应对考试，学生们往往不去思考为什么要这样学，而是不假思索地接受知识，只是死记硬背。例如，关于《江华岛条约》的第一条：“朝鲜是独立国家”，学生们通常不理解为什么要强调“独立”，而只是机械地接受这一事实。因此，从那之后发生的壬午军乱、甲申政变、甲午中日战争等历史事件，他们往往缺乏完整的理解，只是认为“既然这在条约中提到，那么它一定很重要”。这种情况在教育实践中非常常见。

因此，我想强调的是，直到大学阶段我才真正深入地学习历史，接触到了爱德华·霍列特·卡尔（E.H. Carr）的理论，并开始思考历史的多种视角和方法。但在韩国教育体系中，直到高中阶段，让学生理解这些观点是极其困难的，教育过程本身也非常艰难。教师们经常提到，从实际教学角度来看，教授这些内容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了解了日本的教育现状后，我意识到各国教育模式大同小异，基本上都是按照固定模式进行的。这使我开始思考，有没有可能突破这种模式，教师们需要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并努力将其实际应用到教育实践中。这是我从对话中得到的一些启示。

南基正

是的，教育方式往往是灌输式的，这或许是东亚共有的问题。也许我们应该说，这是源于教学方法本身的问题。这需要我们共同探讨和解决。关于如何克服这一问题，我认为您已经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接下来有请金滹老师发言。

金滹

我是首尔大学的金滹。我将用韩语提问。虽然明天我还有机会提问，但由于心情急迫，所以先提问。特别是向唐小兵老师提问，听了今天的报告后，我实在无法不提问。这个问题与教育尤其相关。

我对历史教育也有很大的兴趣，在韩国期间对日本的综合历史方法论投入了很多关注。实际上，我认为日本在这一领域进行了一些非常新的尝试，我很想为此鼓掌。但如何使这些尝试成功，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重要课题。今天听了在场各位老师的发言，我有很多感想。唐小兵老师在文章的最后提到，“价值启蒙是否必须以尊重历史真实为前提？”对此我想提出一个相反的问题，“历史真实性是否一定要以价值启蒙为前提？”如此一来，正如您所说，历史与现实之间存在一种不变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和困境一直在中国、日本、韩国的公共生活中引发各种问题。

因此，您提到在重新审视、重新评价和记录特定历史时需要非常谨慎，这种谨慎也应体现在历史教育中。我想请问老师，您在与学生对话时，如何探寻并应用这种谨慎的方法？这是为了明天能进一步讨论而需要明确的前提性问题。

南基正

好的，谢谢。这或许也与我们刚才简短提到的教育现场如何解读史料的问题有

关。这似乎是关于我们如何谨慎地为学生留下独立判断空间的问题。现在我们来听听场内的发言,然后请三位报告者每人再做两分钟左右的总结。虽然时间稍有延长,但我们会为各位预留足够的时间。由于金泰雄老师明天不能与会,所以我们会给他三到四分钟的发言时间。最后,请每位报告者做总结发言。首先,请盐出老师用两分钟进行总结。

■ 盐出浩之 谢谢。从教育第一线的老师们那里,我了解到了“历史综合”现场教学的难度,对我来说非常有参考价值。我想向其他两位报告人发表一下感想和评论。

首先是关于金泰雄老师的报告,我发现我们的关注点非常接近,特别是金老师也关注教育现场,而且对政治、社会与教育的关系颇有理解,让我学到了很多。我特别想了解的是,您在最后提到的有关考试的话题,希望您能再补充解释一下韩国社会对于历史的需求对历史教育以及教科书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接下来是对唐小兵老师的提问。您的报告让我感触良多。报告论文中有很多地方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报告论文中提到的“作为自我疗救的记忆”这句话。在日本,也有类似的情况,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记忆被用来治愈伤口,这对教育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我想请教唐老师,它对中国的历史教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 南基正 好的,谢谢。那么请唐老师做出回应并分享您的见解。

■ 唐小兵 非常感谢与会的老师和听众朋友的一些意见。我首先回应一下金浩老师的问题,关于价值启蒙和历史真相的一个关系:究竟历史真实是价值启蒙的前提,还是后者是前者的前提。对于这个问题其实我一直想写一篇文章,关于启蒙和历史的关系,但因为各种原因一直没有写出来。因为在中国大陆这 20 多年来,其实有一种重写历史尤其是民间写史的潮流。这个潮流包括对晚清史和民国史的一个重构。而这个重构过程中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是体制外的一些历史学家,他们是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对于比如说民主化和普世价值的自觉认同。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历史写作它并不是完全基于历史真相、多元化的史料所呈现出来的整体的写作,而更多的是一个价值的肯定,然后在面对历史事件的时候这样的选择可能会有所偏向。这个偏向当它被呈现出来以后,其实就会损害到它在公共领域所试图去传播的那些价值。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理由,我会认为,对于历史写作来说,它是一个不断地对于历史真实和真相的抵达,虽然不可能完全地呈现,但是你要通过各种方式努力地呈现出来,在这个基础上面,可能会因为不同的复杂面向呈现出来之后,自然就会对你既有的价值体系、知识结构和认知框架构成某种挑战,形成一种理解和阐释上的作用力,你就会调整和思考,然后这才会形成一个不断的开放的过程。

那么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我认为其实也是非常有价值和意义的,刚才日本的学者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就是历史教育和历史的研究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因为这也是我 2018 年初在美国拜访王鼎钧先生的时候,他当时问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历史的研究会有很多前沿的研究,那么这种很前沿的,最新的研究成果是否要在第一时间就转化为历史教科书,成为历史教育的一部分,还是说在历史研究成果和教科书的历史叙述之间是应该有一个缓冲的地带,因为不然的话,历史的研究它可能不断地会突破一些固有的历史认知框架,它可能

会导致一代人的历史和另外一代人大相径庭，这就导致教科书上的历史要不断地重写，那可能会对这个民族的文化 and 作为延续性的文化共同体的内部稳定性构成某种挑战。

这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么对我个人来说，就是因为有些老师，在日本中学教书的老师问的一些关于如何教书的问题激发了我的思考。我在中国的历史教学中是通过呈现多元史料，比如说回忆录、口述史、日记、书信和档案，包括带学生去读民国时期的各种报刊，我试图先不预设观点，引领学生直接面对历史世界的基本事实。这点我非常认同日本一个学者沟口雄三教授的看法，他生前做过关于历史的客观性和意图问题的演讲。他说当一个历史学者或者学生在面对历史世界的时候，他首先是要把偏见和偏向这样的“拐杖”先放下来，进入历史的海洋，让不同的东西都涌过来，具体地产生感受和理解，慢慢地所形成的历史理解才是真正属于他自己的东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对于学生来说，老师更多的应该教他一些方法，让他自己去学会认知、理解，并形成自己的历史知识地图，这个可能非常重要。

所以这里也引起我思考一个问题，今天听会也颠覆了我之前的一个关于历史认识的刻板印象，当一个国家和社会实现了民主化以后，它的历史教育可能有更大的弹性和多元的空间，可能不会像我们在中国大陆会面临来自一些主流话语的限制，可能有很多东西不能够完整地呈现，只能部分地呈现。那你会看到，其实即使在一个民主化的韩国和日本的社会，同样历史教育在面对过去的历史记忆、战争记忆，还是仍然会存在问题。它不是一个单一维度可以解决的问题。因为这样一个原因，我觉得像中日韩国史对话这样的对话形式，其实它就会有一个永恒在场的必要。它不是说这个社会实现了民主化以后就一劳永逸，这些问题都可以终极解决了，我们就不再需要这样一个对话。所以我觉得这些方面对我来说都是非常的有启发，有价值。

最后一点就是说，刚才来自日本中学的历史老师谈到，日本历史综合的改革。因为我不是很了解，但是我很感兴趣，关于历史综合，按照不同的主题来区分，比如关于大众化，东西方文化交流和文明的演进，等等。我就想起20年前，我刚到上海读研究生的时候，当时上海的历史教科书也曾经试图进行改革。比如按照比较文明和文化交流的历史认知框架来书写历史，包括当时比较新潮的日常生活史和新文化史等都被纳入书写体系，当时是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的老师在编写教材。但是这个教材用了没几年，后来就被否定掉了。因为当时一些西方媒体报道在这个教材里面比尔·盖茨出现的次数比毛泽东出现的次数还更多，所以这个就不符合20世纪中国历史的总体真实，也暗示着中国将告别革命。整个中国的20世纪是革命的世纪，不是比尔·盖茨的世纪。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你会看到，学术表达和政治话语之间有一个永恒的张力，这也显示出了历史学者存在的意义，他有一个永恒的存在意义。即使民主化的国家，仍然会有一个主流政治话语跟历史研究写作之间的张力。

我就做这样一个回应，谢谢。

南基正

好的，谢谢。最后请金泰雄老师发言。

金 泰 雄

首先关于以史料为中心的探究式学习 (Inquiry-based Learning) 的问题。虽然我不是正统的历史教育研究者或教师,但由于我毕业于师范大学并在师范大学任职,所以对这个问题非常关注。实际上,关于探究式学习教学法的讨论由来已久,早在 1950 年代和 60 年代就已经提出,其目的是培养历史思维 (historical thinking)。然而,在实际教育中,史料为中心的探究式学习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落实,主要原因在于入学考试的命题方式。因为目前的考试采用五选一的选择题形式,只要求一个正确答案。

与法国不同的是,法国的文凭系统 (Baccalauréat) 考试更注重学生的思维过程和多样化的答案,而我们的考试仍然坚持一个正确答案的多选一选择题形式,这使得史料探究学习在实际教育中失去了意义。因此,尽管许多历史教师开展了探究性教学,但其效果在现实中仍然有限。虽然大多数大学教授认为当前的历史教科书与 1970 年代的国家编撰教科书类似,但事实并非如此。由于史料探究学习的深入研究以及一线教师的努力,自 2000 年代初第七次教育课程实施以来,教科书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进。然而,只要入学考试的命题方式不改变,这些努力仍将是徒劳的。

尽管如此,作为师范大学的教师,我不能只责怪入学考试。即使学生在教科书中没有学到相关内容,我们仍在不断提供教师可以利用的探究资料。例如,如何利用文学作品进行探究活动,如何利用海报,如何将绘画作品和统计资料应用于历史教育等等。因此,我与学生们一起编写了《国史探究学习指南》这样的书。然而,这样的书籍并没有被普通学生和教师广泛使用,而是被首尔江南区大峙洞的补习班用作解答所谓“杀手题”(超高难度试题)的指南。因此,入学考试依然是阻碍正常历史教育的因素。

但是,除了需要从根本上改善入学考试制度外,我们还需要不断为教师和学生提供有意义的学习材料和激发动机的阅读材料,以便他们能够自主学习。我们应该专注于培养学生理解历史的模糊性和复杂性,而不是在历史中寻找煽动性口号或政治手段,应该重点培养学生慎重且复杂地去思考问题的能力,来让学生学习如何与世界上的人类共存。这样的努力不应止步于此,而应延伸至终身教育。

另一个我要提到的是东亚史的问题。我认为日本历史教育现场使用的“历史综合”的诞生是一个非常令人鼓舞的现象。日本的思考在于,在全球化时代,日本不能独自生存,如果想与邻国共存,就必须与学生们一起面对这些问题。我认为这与韩国“东亚史”教科书的诞生背景相似。

然而,对此的批评也不少。虽然批评并不直白,但在韩国,“东亚史”教科书的叙述基调似乎回归到了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而在这个过程中,忽视了弱势群体、少数民族、移民和多文化共存等问题。因为在韩国走向现代主权国家的过程中,以及中国形成民族国家的过程中,许多不符合这一进程的要素被排除在外。我认为这种批评同样适用于日本。因此,基于这些思考,我撰写了一本关于居住在日占时期朝鲜的华侨劳工的书。这一问题不仅限于日占时期的朝鲜,还与今年是关东大地震 100 周年相关。在这次灾难的处理过程中,发生了对朝鲜人和中国人的屠杀。这不仅是一个民族问题,也是一个阶级问题和移民问题。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仍在持续。

最近,我对灾害问题很感兴趣,并正在撰写相关书籍。由于我的兴趣和专业领

域非常广泛，有些人会问我究竟专业是什么，我对此深表同意。然而，历史学家应当沉浸在自己的专业世界中，但也应始终努力与现实世界保持联系。这就是我对移民问题和灾害史问题感兴趣的原因。尤其是我认为灾害史研究过于陷入了人类与气候、自然与人类的二元对立结构，而忽视了历史和社会背景。虽然尤瓦尔·诺亚·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的《人类简史》那种方法很重要，但从历史和社会背景出发的方法也同样重要。我认为历史学和历史教育应该发挥这样的作用。

从此观点出发，日本很早就开始关注灾害史和灾害史教育，参照这一研究轨迹，我在研究生院也以此为主题进行了讲授。我认为未来灾害史教育应成为中国、韩国、日本三国共同探讨的课题。目前，北京因洪水而受灾，东京也面临地震和核电问题的困扰，从这一点来看，通过东亚灾害史教育来解决这些问题是非常必要的。

接下来，第三个问题，我想讨论一下唐小兵老师刚才提到的问题，即“多重视角”或“多视角问题”。我认为，这对于克服民族国家的局限性至关重要。我曾尝试在自己的研究中应用这种方法。以韩国为例，在撰写《大韩帝国评说》时，我不是依赖历来的研究者的全知视角来解释当时的情况，而是利用包括开化派（译注：朝鲜王朝末期赞成开港一派）尹致昊、保守派黄玄、外国人、商人在内的各种资料，从不同视角讲述当时的故事。

这样一来，读者就能够摆脱历史学家过度介入或国家主导的解释，通过多重视角和资料，主体性地看待当时的情况。这将帮助他们不被政治煽动或被简单逻辑所左右，而是基于事实，谨慎细致地把握历史背景，并批判性地反思当前的问题。我认为，多重视角将成为未来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此外，这种方法也应体现在历史教科书中。如果教科书中收录了包含各种性格和视角的资料，学生们在学习时将能够从A到Z的多视角进行思考，探讨资料之间冲突的原因和历史背景。这不仅有助于解决当前的历史教育问题，还将扩展到更广泛的教育和社会关注领域。这是我的观点，谢谢大家。

## 南基正

各位，非常感谢。你们的耐心和风度令人感动，现在已经接近午餐时间，已经快到下午1点了。很抱歉，我因为讨论太有趣而忘了控制时间。入学考试对历史教育的阻碍这一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不仅在韩国如此，其他地方也是如此。

今天的讨论不仅仅是为了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更是为了展示彼此的观点，确认我们的差异和重叠之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找到那些可能的交集点。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些内容，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此刻，更在于未来我们在这个场合之外的交流。

在午餐时间或者晚餐时间，希望大家能继续交流，进一步确认和讨论这些交集和分歧。请大家享用午餐，我们将在下午2点再次见面。非常感谢大家的辛勤付出。

第3场  
媒介

报告 4 (中国)



# 自保、爱国与屈从： 一个伪满“合作者”的心态探微

江沛

南开大学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三省沦陷，此后伪满洲国成立。伪军下级军官施明儒留下了1937-1945年间的个人日记《辙印深深——一个伪满军官的日记》<sup>1</sup>，呈现出了他在伪满洲国明为伪军、暗有抗日行为但无力改变大局，心态经历了从忧患、焦虑到接受、顺从，其中又夹杂着愤怒、屈辱与悔恨的嬗变过程，具有东北沦陷区民众心态的代表性。通过历史心理学的方法，在充分考虑日军强权之下伪满“合作者”生存状态的基础上，本文试图诠释战争压力对人性的扭曲，强调人性的脆弱与复杂，力争突破以往从民族国家立场出发诠释沦陷区历史的单一认知模式。

对于中国人而言，中日战争无疑是一段深重灾难。日军占领东北地区14年，建立了伪满洲国。面对外来入侵者和新政权，以“闯关东”移民为主体的东北民众，陷入民族情感与现实生存间的扭曲困境，心理矛盾，迷茫犹疑，复杂心态难以言表。

在中日战争若干史实仍具争议的当今，“合作者”也即汉奸的话题十分敏感，有关伪满洲国的汉奸和伪军群体的专题性研究，是一个目前中日战争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本文的主要史料依据《辙印深深——一个伪满军官的日记》，是稀见的伪满低级军官日记。通过对其分类梳理，从历史心理学和日常生活史的角度出发，努力理解那个年代的民族主义情感、求生欲望、迷茫心理、顺从意识的交织中，沦陷区“合作者”和民众的日常生活实态和复杂变化的情感波动，由此审视日本侵华战争对沦陷区民众带来的心灵创伤和复杂影响。

## 一、“伪军”士官面相：施明儒简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长驱直入占领东北全境，摧毁了国民政府在东北

1 施明儒：《辙印深深——一个伪满军官的日记》（1-4卷），吉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吉林市档案局2011年版，日记时间起自1938年1月1日，直至1945年12月31日止（其中1944年散佚）。

各省的行政管理机制。1932年3月，日本关东军策划伪满洲国成立，直到1945年8月抗战结束。在13年的日伪统治期间，为使东北全境成为战略支撑地，日军起用当地人士也即“合作者”帮助迅速恢复社会秩序和经济生产，不仅可以有效减轻民众的反抗情绪，增加认同感，也可保障对占领军的军需供给，降低占领必需的政治与经济成本。

本人不去争论“合作者”、“通敌者”、“汉奸”等指代名词的具体内涵与外延，在抗战爆发初期、抗战中期和战后处理汉奸问题的不同时期，这些指代名词的意义均有所不同。其中夹杂着民族与道德情感与政治立场的判断在内，十分复杂。英国学者安德鲁·瑞格比根据为占领者服务的动机、目的和心态，将通敌者分为四类：“为了私人利益无条件通敌的叛国者、因占领者缘故通敌的爱国的叛国者、为了生存而通敌的适应者、为广泛社区服务的有条件通敌者。”<sup>2</sup> 据此，如果要界定“合作者”这一术语的话，他们只是“在占领当局监督和施压下继续行使权力”的人。从政治层面来讲，不应被夸大为“叛国”的典型代表。东北沦陷时期，只有极少数伪满官员成为彻底的叛国者，有一些人属于另外三类，但多数民众则介于通敌者与抵抗者之间，更多关注于自己的生活状态。

日记主人施明儒，可能说是后三类人的代表之一。他是吉林省梨树人，既为伪满下级军官，又同时参与自发的秘密抗日活动：“1935年，22岁的施明儒由吉林省故乡梨树县到敦化县参加伪满军通信兵，这期间联络了三四位好友，开始建立抗日工作的初步组织，定名为‘国民党东北流亡抗日救国社’，但作者并非国民党党员，该救国社与国民党亦无组织联系。1937年组织中两名同志遇难殉国，救国社名存实亡。后来施明儒为求经济保障，于1938年考入奉天（沈阳）伪满军官学校，结识了一些爱国青年。1941年军校毕业后返回吉林市，任伪满军吉林市独立通信队副队长。同年5月，与4名青年秘密恢复救国社，订立组织纲领，发展至百余人。1942年他转入伪满江上军。以吉林市为据点，在德惠、九台、桦甸、磐石、敦化、蛟河及奉天、鞍山、哈尔滨等地分设联络处。作者及组织成员曾策划破坏伪满江上军第一、第二两战队舰船和爆破鞍山昭和制钢所，但均因败露而未能成功。”<sup>3</sup> 他的抗日行动多处于策划阶段，几无实施，只在日记中宣泄着对日伪统治的不满；在日常生活中形同百姓，热衷于拜访亲友、购书观影、约会出游，压抑、迷茫、顺从心态明显，是一名典型的沦陷区青年。

解剖施明儒的言行，有助于我们理解枪刺下的生存压力，是如何导致沦陷区民众的心态及言行异于常态的，生活的真相远比想象要复杂得多。

## 二、生存窘况：何以当伪军？

研究二战期间丹麦史的亨瑞克·德斯莱夫森（Henrik Dethlefsen）曾说：占领状态下，整个社会必须适应现存政治环境，迁就当权者是“习以为常的、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有的社会行为”<sup>4</sup>。在枪刺威逼下，多数民众无力反抗，生产资料的单

2 [英]安德鲁·瑞格比：《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刘成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3 施明儒：《辙印深深——一个伪满军官的日记》第1卷，第1页。

4 Henrik Dethlefsen, Denmark and the German Occupation: Cooperation, Negotiation, or Collaoration?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History,15:3(1990),pp.198-199.

一导致迁移困难，生存威胁导致了沉默、造成了合作。只有基于战争情境的压力，去研究东北沦陷时期的对日“合作者”，或许才可能理解当事者特有的挣扎、犹豫、迷茫与顺从心理。

具有民族主义情感的施明儒，被迫选择了对日合作。日本人是他们家乡的统治者，战争使得普通民众在经历政治不适同时也要承受经济萧条。怀有明确反日侵略及爱国情怀的施明儒，记录了他1938年到新京（即长春）见学、去南岭参观战绩时的见闻，途中忆起九一八事变时驻扎在此的士兵，空怀一腔热血，终因“国贼之误”白白牺牲，大好河山沦陷，顿时悲从中来。看到开采25年、蕴藏丰富的抚顺煤矿，已“操持于倭鬼掌中”，感到刺痛。在到达内蒙古林西县官地镇时，他感叹今不如昔，半数商店倒闭，十分萧条，熟识的铺子依旧但“景物全非”<sup>5</sup>。旧日的北边重镇佳木斯，发展“突飞猛进”，然而为“倭贼压榨所苦，致市民生活陷于呻吟状态”<sup>6</sup>。九·一八事变前的黑河市，“市政初兴，井井有序，与对岸之苏联自由交易，互交流着风俗文化，物产丰饶，民乐其业”，如今“到处死寂寂的暮气沉沉，倒闭的商店闲放着空洞洞的房舍”，凄凉萧索，满目疮痍<sup>7</sup>。

安德鲁·瑞格比指出，在人们的共同认识中：“叛国者至少应该为他们的罪恶付出某种程度的代价，而遭受痛苦的受害者理应获得一定的补偿”<sup>8</sup>。战争使得民不聊生，即使是被民族大义所谴责的“合作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战争的“受害者”。

面对经济萧条，施明儒需要谋职求生。东北沦陷多年后，经济有恢复，但民众生活依旧潦倒。如因贸易隔绝，瑞士手表的零件无法更换。物质缺乏，仅次于秋林的哈市第二大商店“同记商场”，货物稀缺<sup>9</sup>。结婚摄影时，吉林所有的像馆里“尺二的底板和闪光粉”，都已中断供应一年有余<sup>10</sup>。除此之外，物价飞涨令人堪忧，同友商店一小包不到二斤重的冬衣70多元。正阳街满洲书店一部冯友兰著的《中国哲学史》高达10元。交通一度中断，职员出差要领到部队长签发的旅行证才能放行<sup>11</sup>……

施明儒选择成为伪军官，看重的是便利、优渥的生活。在一次受到日军欺辱后，他坦言，忍受“这无谓的鸟气”，是为了谋求“父亲和母亲的养膳”<sup>12</sup>。《日记》展现了其结婚时的筹备过程，仅婚礼的基本预算就高达一千元，囊括了“彩迎汽车、音乐、礼堂筵席、礼服、摄影”等项<sup>13</sup>。在物质匮乏状态下，声称“家无恒产，绝非富第”的施明儒<sup>14</sup>，能够准备一场奢侈婚礼，得益于其伪军任职收入。此外，人脉资源同样提供了不少便利，如他向部队长顺利请下婚礼的“白酒特别配给请求证明书”；在汽车缺乏的吉林，仍能托友人定妥两台<sup>15</sup>。

5 施明儒：《辙印深深——一个伪满军官的日记》第1卷，第70、89、188页。

6 同上书，第2卷，第347页。

7 同上书，第3卷，第11页。

8 [英]安德鲁·瑞格比：《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刘成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中文版序第6页。

9 施明儒：《辙印深深——一个伪满军官的日记》第2卷，第73、290页。

10 同上书，第3卷，第218页。

11 同上书，第2卷，第159、336、67页。

12 同上书，第1卷，第56页。

13 同上书，第3卷，第259页。

14 同上书，第2卷，第75页。

15 同上书，第3卷，第223、259页。

施明儒声称，他对日合作的另一原因是为“抗日社”活动做掩护。施明儒“考军官候补生”前强调，他投奔伪政府并非是求取“伪国假功名”，而是另有“他意”，旨在“实现我之理想，补完大地疮痍”，借参加伪军工作掩护和支持秘密抗日，如获得东北抗日联军与伪军战斗的消息以便伺机而动<sup>16</sup>；得知伪军对付反满抗日思想对策后能够谨慎行事<sup>17</sup>；对谍报手段有简略了解<sup>18</sup>；从伪军官学校中联系新同志加入抗日社等等<sup>19</sup>。

在施明儒日记中，沦陷区“合作者”的生存状态慢慢浮现。多数民众有民族情感，但无力改变强权占领的现状，惟有自保，忍辱偷生最为实际。他们的喜怒哀乐，难以单一的道德标尺衡量。

### 三、“白皮”多面：“叛国”还是“爱国”？

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的宣传模式，常常脸谱化汉奸、合作者：无论何种原因，服务或听命于占领军及伪政权，总是贪生怕死，难以原谅的。在民族大义面前，个人生命的权利微不足道。然而虑及日占区1亿多民众无奈做“亡国奴”的事实，让人深感这一解释体系的无力。施明儒仇恨日军占领，也有反抗行为，但纵观其表现，清醒与困惑并存，情感与实利交织，表面是服务伪满政府的“白皮”，内藏的爱国“红心”则时隐时现，很难用“叛国”或“卖国”简单界定。

整体而言，施明儒明里服务伪满，暗中对日伪有所抵制。10余年间，他负责的抗日救国社的秘密行动与伪职工作并行，伪职是掩护其暗中抵抗的最好外衣。行军途中，作为伪满军官的他尽己所能保护同胞，遇到女教员遭受士兵轻薄侮辱，他查知真相并通报上官，严加惩处。当关东军以“剔抉八路家眷”为借口、将30余名逃难女性拉去组织临时慰安所时，他“偷偷的命令情报班长，把用车拉来的女人全部放跑”<sup>20</sup>。他的身份和行动的明暗组合方式，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敌后工作者，也与以往对于日伪“合作者”的记述方式不尽相同。

素质较低的伪军群体，时常表现出无奈求生、炫耀乡里、利权交换甚至以暴力展示地位等矛盾心境。在看到伪军严刑拷打被俘民兵时，施明儒直觉“痛心酸鼻”，坦言“彼此都是中国人，国难陷危的今日，为什么要丧心病狂得如此？”；在听闻“近日士兵在街内行同强盗，拐骗敲诈、欺辱凌虐，极尽其恶”时，咒骂他们“直类兽禽、令人发指”；在“驻军受攻，上级却惶然无计不往加援，反与两位军需官挟妓饮酒，一室宣淫，士兵也效法横行”时，深感“伤心之至，并反难道东北人真是天生的牛马心肝吗？”<sup>21</sup>

“合作者”的多面性并不一定导向政治性的反抗。1940年代初东北“抗联”渐被压制后，武装抵抗者很少有能与日军直接作战，不得不转入地下抵抗。施明儒的伪军官身份，使其可以及时掌握情报，拥有相关技术、资金与人力支持，便利

16 同上书，第1卷，第6、61、181页。

17 同上书，第2卷，第129页。

18 同上书，第1卷，第48页。

19 同上书，第4卷，第247页。

20 同上书，第4卷，第187-188、189页。

21 同上书，第4卷，第17、220、228页。

其秘密行动。即使如此，施明儒领导的小组织，十年间大小行动多次，多是晚上贴一些传单标语，效果有限，还招致三名成员牺牲。

在日伪统治无法动摇的环境中，施明儒为代表的部分人，在日伪统治下左右为难、有爱国之心又不愿毁家纾难、压抑迷茫又希冀乱世逐利，这种心理的背后是人性自保、逐利的驱动。在以往的意识形态判断及知识结构中，我们习惯性地忽视沦陷区缺少支持和组织的民众并不具有群起反抗条件这一前提，想当然地认为占领区民众客观上不会支持日伪统治；其实，所有“白皮”的内心，也不是都甘于出卖民族利益。欺侮同胞、强取豪夺，也许只是原始劣根性和逐利行为的结果。

## 四、人性嬗变：屈辱与投机？

在沦陷时期，面对民族大义、民众苦难，生活宽裕并寻求自保的施明儒，决不在心理压抑中，他的性情在形势和利益驱使中时有变化。

1938年3月，收到军官录取通知的施明儒，逃不过内心自责，觉得自己“猎取伪国的功名真是一时的孟浪”，是在“铸大错”；虽然只是“游戏官场”，但又担心同胞误解自己中途易节；同时对这份工作是否真正有益于秘密反抗行动心存疑虑，认为“塞翁失马，难分祸福，何苦为之。”1940年8月，施明儒在行军时发现，沿途中一些地方，“树皮剥去一大片，在上面写着些宣传式标语和劝告书”的遗迹，他认为“这些是留给些苟延偷生的满洲人看的”，同时他敬告东北抗日联军的诸友，“对伪军的同情和谅解，固然是不可少的，但是决不可轻易的信任他们。因为他们决对不可信任的”<sup>22</sup>。

身为伪军，他心系民族与国家命运。在伪满洲国建国六周年纪念日到来时，初春正月，寒冷的吉林大蒲柴河突然落雨，作者直觉是上天为中国“洒同情之泪”<sup>23</sup>。在“东北事变十周年中国国恨血祭纪念日”时，作者慨叹“在这历史血斑渲染成的中国之国恨日”而缄默不语，认为只有卧薪尝胆，才能“填补哀恨的空虚”。在“双十节”之夜，他低声高呼“革命精神不死”。在观看古装影片《红石山》时，触动了作者敏感的神经，认为每个角色都能影射出一位当代伟人。认为影片“纯为一种爱国运动呼声中的‘秘密结社’之写照”，剧中对白流露出一种“革命烈士的精神”，让其联想起“现在祸党卖国汉奸之辈，认贼作父、为莽奔走而视享莽之利禄荣贵者”，意识到“汪逆政府和伪满洲的当局诸人”，警醒于“豺狼当道，英雄在野”的现实<sup>24</sup>，却独独没有关联他参加伪职的苟且行动该如何定性？

随着时间推移，施氏心态更加复杂。1942年9月，他因琐事蒙受侮辱，慨叹“被征服的民族永远是受着征服者的压迫”，声称自己并非“真正承认了征服者的权利”，只是十年来的奋斗经验及所处环境，使他明白了“某种场合下处理个性应有的态度”。作者自称，为了“青年的事业”才“曲全做人的责任”，能够以最大忍耐“接受不合理的侮辱”，选择缄默只是在顾惜自己在人生战场中获得的“惟一斗争地盘”。但是，“流贯在全身血管里的依旧是倔强的热血”<sup>25</sup>。

22 施明儒：《辙印深深——一个伪满军官的日记》第1卷，第28、184页。

23 同上书，第1卷，第20页。

24 同上书，第2卷，第70、129、50、52页。

25 同上书，第3卷，第71-72页。

这样的事情在施氏身上多次发生。1943年8月，施明儒到日侨经营的木厂购柴，被告知木柴不卖给满洲人，理由是担心他们低买高卖，他只能在日记中愤怒质问：“难道堂堂的军官也会办这样卑劣的事么？”1945年8月，他双脚化脓行动困难，无法执行作战命令。在请假被日军拒绝后，心中愤恨至极，只得忍痛参战，自觉真是“流着无价值的血汗，担负着汉奸的臭名”。日本战败后的1945年底，作者回望抗战胜利，心情冷落而孤寂，觉得又平庸虚度一年，悔恨当初没逃入后方参加抗战，但后悔的是因为“没有抗战的功绩，也没有大员的亲友”，至今“不能露头角”，仍旧是“伪人”，戴着一顶“奴化”的帽子在晃<sup>26</sup>。

对于伪军工作，施明儒从忧患焦虑到逐渐接受，顺从与无奈中夹杂着不满、愤恨和屈辱，矛盾感强烈。自1938年加入伪军到1941年底，施氏对中国抗战抱持信心。然而因对太平洋战争的错误认知，施氏自1942年起陷入了悲观，民族大义未忘，醉生梦死、追随日伪、求生自保的心态渐重。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似乎心有抵抗、甘受屈辱的战士，正在蜕变为追求安逸、渐失大义的懦夫。民族大义与求生本性的交织原本并非是矛盾的，一人多面或许才是枪刺下众生相的本质。

施氏的复杂心态在沦陷区具有相当的代表性。面对强权，有人奋起反抗，有人卖国求荣，更多的人如施氏一般被迫顺从、压抑而渐渐麻木。抗日学校毕业的新青年，在游击战线上奋勇杀敌；伪满洲国对英美宣战时，昔日同窗竟上书请出征为日本人而战，令其不齿<sup>27</sup>；哈尔滨的市民面对满街尸体已是司空见惯<sup>28</sup>；“昌黎男多游闲，女则华丽一身”，粉香十里，“商女不知亡国恨”，犹在晏乐自如<sup>29</sup>。在施氏所勾画的一幅沦陷区的生活图中，民众意识从被占领之初的忧患，到1940年代中期渐渐分化，有“为‘大义’所屈，为‘人责’所缚”而积极抗日者，也有“以老母在堂，不欲冒危险”而“重身家惜生命”者<sup>30</sup>，他也认为“迫于势而屈于敌者尚可藉权宜而宽恕”<sup>31</sup>。回到强权占主导的殖民场景中，民众表现虽有爱国层次之差，但也是一种社会性表达，折射出的是战乱下的复杂人性。

不见尽头的中日战争所形成的社会压力是，“没有人知道入侵在空间上将会延伸多广、在时间上将会持续多久，而且也没有人知道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利益的交织会变得那么复杂。”<sup>32</sup>民众多求顺从，“自保和私利才是根本原因”<sup>33</sup>。他们多认为，占领是暂时的，国家主权终会回归，活下去才是王道。中国人固有的公私观念，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为各扫门前雪，在国家层面上则常常表现为等待英雄。面对强权下的复杂人性，民族主义思潮常会呈现流于清谈而缺乏践行的窘境。

26 同上书，第4卷，第57、225、298页。

27 同上书，第1卷，第111-112、124页。

28 同上书，第2卷，第334页。

29 同上书，第4卷，第205页。

30 同上书，第2卷，第47、11页。

31 同上书，第1卷，第124页。

32 [加]卜正民：《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潘敏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38页。

33 刘熙明：《伪军——强权角逐下的卒子》，台北稻香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页。

## 余论

战时中国沦陷区遍及东部省份，沦陷区人口1亿余。日占时期最长达50年（台湾）和14年（东北），短的有七八年，也有数年。在长短不一的日据时代，日伪统治究竟给民众带来了什么？日伪政权抓捕劳工、强征慰安妇、对战区烧杀抢掠、压榨民众经济生活，都是无可辩驳的真实存在。问题在于，这只是沦陷区的某一场景，潜流下的日常生活才是主体。以往的研究，“使我们对沦陷时期的历史只有较为笼统的印象：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竭泽而渔、敲诈勒索、滥杀无辜、无恶不作，但这些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辞藻，丝毫也帮不了我们了解认识日伪政权的实际统治状况和沦陷区基层社会的情形”<sup>34</sup>。沦陷区的下层民众，被打上了民族主义的“原罪”印记，显然是不公平的。理解政治高压下多数民众的生存状态及心境演变，才能深入理解野蛮侵略、政治高压戕害人性的苦痛程度。

面对入侵，沦陷区部分人选择离开或抵抗，多数人无力外逃，沉默以对，这只是一种惯常生存方式突遭变故后的延续而已。随着最初暴力频施时期的过去，民众时有错觉，零星侵扰会变为日常控制，时间不动声色地让人们逐步适应并屈服于新政权的统治。当活着的渴望压倒固有意识形态和道德准则的禁锢，民众的民族国家立场渐生变化，“合作者”应运而生。多数情况下，直接服务于日伪政权与谋职以求生存是不一样的，前者要鹦鹉学舌地附和日伪政权的宣传，希冀以公开言行的“政治合理性”，避免利益损失或进行生存利益的交换；后者是生存常态，如政府服务、经济服务、交通邮政、报刊出版、摆摊设点、赚取营生等，这是必备的社会运转领域，否则百姓无以为生。不能根据道德标准来推断特定场景中民众的选择，不仅是基于人性立场，更在于缺少对历史场景理解的思考毫无意义甚至有害。

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有一个逐步延展的传播过程，为提振抵御外侵的民气，就必须展开基于民族-国家立场的主流叙事，也会情绪化地忽略民众的生存权。问题是，这种立场判断常常难敌日常生活的逻辑力量。毛泽东曾慨叹：“辽海燕冀，汉奸何多！以地事敌，敌欲岂足？人执笞绳，我为奴辱”<sup>35</sup>。在一贯高扬民族气节和殊死抵抗、视“合作”为亡国奴的同时，我们该如何思考每当民族危机都会出现汉奸蜂起的奇异现象？

中日战争史既是一部侵略与抵抗史，某种意义上也是一部“合作史”。以往的研究中，“强权下的生存”常与汉奸、“合作者”相关联，所包含的立场判断及道德判断，常会引导并束缚我们的思维。从强权下生存的角度考察东北沦陷区对日“合作者”心态时，我们看到了比已知的更加灰暗的故事和更加曲折复杂的艰难抉择，这是努力勾勒出中日战争史全景的前提条件。

34 潘敏：《江苏日伪基层政权研究1937—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35 毛泽东：《祭黄帝文》（1937年4月5日），《新中华报》1937年4月6日，第1版。



# 战后日本的媒体文化与 “战争叙事”之变迁

福间良明

立命馆大学

[原文为日语。翻译：苗凤科（中央大学）]

## 1. 《海神》的大热

1949年，战死学生的遗稿集《听海神的声音》（东京大学协同组合出版部）出版了。该书收录了来自大学和旧制专门学校的75名战死学生的日记和信件的抄录，并没有像小说那样的故事情节。尽管如此，这本书成为1950年年度畅销书的第四名，出版大热。

“对战争的反感”，是这本遗稿集的基调。尽管学生们被哲学和自由主义等思想吸引，对学问有着深厚的热情，却不得不被迫参加违背自己意愿的战争。这本遗稿集的热销，正是来自对这种“反战”意识的共鸣。旧日本军在组织上的病理性，和在战地的暴行，已经通过东京审判等方式被广为人知。最重要的是，军队一边宣扬“圣战”的美名一边压迫国民的生活和言行，最终导致彻底失败，对此人们怨念深重。遗稿集的这种“批判战争”、“反战”的情绪，让无数读者为之感动落泪。

1950年，据遗稿集制作的电影《日本战死学生的笔记 听，海神的声音》上映。这部电影的基调是“暴虐残忍的职业军人”与“理性反战的学徒兵”的对立，电影与原作一样，大获成功，使陷入经营困境的电影公司（东横电影）得以重振旗鼓。

然而，这部电影和遗稿集能得到全国性的共鸣，细想下实属奇妙。昭和初期高等教育机关（大学、旧制高中、旧制专科学校等）的升学率，只占总人口的3%左右。在这本书中牺牲的学生们是社会上极少数的精英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明显不同。而为什么日本民众普遍会为《海神》流下热泪呢？

可以指出，这一定程度来自对“教养”的向往。从大正时代（1912～1926年）到昭和的1960年代，大学和旧制高中都推行着教养主义。要成为精英，必须熟悉哲学、思想、文学、历史的经典著作，陶冶塑造自己的人格，这是一种文化上的规范。然而，这并不完全是精英知识分子的专属。特别是战后初期，那些没能接受义务教育以上教育的奋进青年为了填补内心的遗憾广涉书籍，旨在探讨读书、生存方式、社会批判等课题的“人生杂志”类刊物被广泛阅读，青年团、青年课堂也

经常举办读书会<sup>1</sup>。对过去战争的疑问，让青年们开始用自己的方式来思考生活和社会。这其中也包含对“教养”（这类文化）的社会性的憧憬。

讲述战死的精英学生们的《海神》（遗稿集·电影），也是这类“教养”的象征。在遗稿集和电影中对哲学思想的提及，重新调起了观众们对“教养”的向往，激起了被剥夺了获取“教养”权利的学生乃至全国民的悲哀，以及对导致这种状况的军队·政治领导人的愤怒。

## （1）战前知识分子的违和感

然而，《海神》的大热，也带来了一些否定的声音。尤其是年长的知识分子们，多指出战死学生的叙述中体现出的教养的“浅薄”性。放眼今天，《听，海神的声音》中的描述并非“没有教养”，反而可以感受到主人公们对田边元、康德等哲学家的深入关注。然而，当时的年长知识分子们并不这么看。

从时代上看，他们属于在战争之前就意识形态定型了的战前派，在大正流行民主主义的时期，广泛涉猎了西方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相比之下，那些在二十出头的时候战争结束的战死学生们（战中派），在他们开始记事的时候九一八事变就已经爆发，他们接受初高中教育的时候中日战争已经开始了。他们在战争时代里度过了青春期，几乎没有过接触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机会，和年长的一代相比，接触西方古典的机会也相当有限。战前派的知识分子们正是在《海神》中感受到了这种教养体验的差异。恰逢彼时朝鲜战争爆发，日本也在讨论重新武装、修改宪法和恢复征兵制的课题。年长知识分子们的言论中体现了诸如“不应该止步于感伤和浅薄的教养，而是要思考如何从反思中引导出反战思想”、“或许我们缺乏构造此思想的社会科学素养”等思考<sup>2</sup>。

但说到底，在战后谈论“反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试图掩盖战时自己的言行。不仅是学生们，即使是知识分子、文化人士，在战时也有很多人写了赞美战争的文章，或者参与了日本主义的运动。一般的民众，也通过邻居会、妇女会、青年团等方式积极参与了战争的推行。尽管如此，战后他们往往会像那些事情不曾发生过一样，高声疾呼“反战”。吉田满，一名从被击沉的大和号战舰上奇迹生还的前学徒军官，对这种情况是这样批判的：

战后很长一段时间，这样一种风潮主导着我们：并不是吐露在战争中自己真实的言行，而是否定与战争有关的一切，把自己塑造成战争的受害者，或者是秘密的反战者，试图与战争彻底绝缘。<sup>3</sup>

这是针对战后日本的“反战正义”问题的尖锐质疑。有时候，“反战”也会令人们回避曾经高呼“圣战正义”的过去，远离责任意识。

1 福间良明『「勤劳青年」的教养文化史』岩波新书，2020年。

2 福间良明『「战争体验」的战后史——世代、教养、意识形态』中公新书，2009年。

3 吉田满『「战舰大和」与战后 吉田满文集』筑摩学艺文库，2005年，第195页。

## (2) 对“反战正义”的怀疑

这种对“反战”言论的违和感，也反映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的媒体文化中。1952年6月，白鸥遗族会编辑出版了《云的尽头 战歿飞行预备学生的笔记》，次年，还上映了根据此书改编的同名电影。虽然并不像《海神》那样出名，但这部引起了关注的遗稿集与它的电影版，通篇表露着学生兵的“纯真”。他们被迫放弃学业，与恋人分离，对自己的生命即将被剥夺而苦恼，却勇敢地接受和战友一同赴死的命运。这种人物形象在这些作品中显现出来，与强调对战争表达愤怒的《海神》形成了对比。

能够实现此类的战争叙事，很大程度上源于GHQ占领的结束。旧金山和约于1952年4月生效，占领统治就此结束。此前被压抑的对旧军的怀旧、反美情绪和对东京审判的批判声如潮水般涌现。学生兵和特攻队员的“纯真”性得以被叙述，也是源于这样一种言论环境。

不过，这一现象，也促使人们思考“为什么当时大家没有反对战争”这一问题。在《海神》里，虽然描绘了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们的“反战”心情，但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在旧制高等学校或是帝国大学的顶级精英学生中，日本主义的学生运动也曾经十分活跃<sup>4</sup>。在攻陷汉口（1939年）和袭击珍珠港（1941年）后，人们为“战果”欢庆，之后也鲜少看到人们积极拒绝支持战争的态度。

电影《云的尽头》的导演家城已代治说：“我也曾是一个在特攻队远远的身后，为他们鼓掌的人。”、“至少我曾经不是反战者，反而更趋向于支持者。”然后他写道，他对“我们被欺骗了”这种观点感到抵触。“被欺骗了，这是多么令人羞耻的词啊。如果我真的被欺骗了，我对欺骗我的人不会有任何恨意，只会对自己被欺骗感到厌恶而已。”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他在质疑曾经支持战争的自己，乃至整体国民<sup>5</sup>。对“纯真”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战时国民的“责任”提出的质疑。这个问题在一味强调“反战正义”的行为中往往被忽视。

## (3) 世代间的隔阂

然而，这种视角在后来的媒体文化中并没有得到深入的发展。反而在进入1960年代后，表面上看到更多的是关于战争经历的世代间的隔阂。

被送上战场最多的是战中派的那一代人，他们倾向于重视“战争叙事的困难性”。这不仅仅是来源于受到军队内部暴力的憎恨和耻辱，还有他们作为在战场上野蛮行凶的日本军队一员，或是抛弃战友逃跑所带来的自责、懊悔和抑郁。正因为这些难以整理、难以言说的情绪，他们往往对简单明了或是相对愉快地讲述战争经历有着强烈的抵触感。

1960年代的社会环境使这种情绪更为强烈。1960年，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修订的反对运动盛行，在6月22日即条约批准前夕，全国有620万人参加了抗

4 井上义和『日本主义与东京大学——昭和时代学生思想运动的系谱』柏书房，2008年。

5 家城已代治「弱者的勇气」『教育』第186号，1965年，第64页。同「关于电影艺术家的反思与自我革新」『映画制作』第1号，1946年（南博编『战后资料·文化』日本评论社，1973年，第123页收录）。

议活动，成为战后最大的公民运动。对岸信介政府强硬的国会运营方式的反感，加上对日本可能再次被卷入战争的担忧，催生了这场运动的热潮。自然而然地，过去的战争经历也相应的被重提起来。然而，战中派一代对于将战争经历与当前政治状况相挂钩的讨论方式表示不满。他们认为，这不过是“方便”把战争经历的一部分情绪加以利用，而忽视了其他部分。此后的越南反战运动、冲绳归还问题和70年安保斗争兴起时，战中派一代的文化人也表现出了类似的反应。

然而，年轻一代对此往往持反感态度。对于致力于学生政治运动的他们来说，战中一代的言行似乎在否定年轻一代运动的意义。此外，战中一代强调“战争叙事的困难性”的态度，让人觉得他们是在炫耀战场经历。没有战争经历的年轻一代在对有战争经历的战中派一代时，只能处于劣势。这让年轻一代感到不满。

这种现象，也与教养主义的逻辑有相似之处。教养主义旨在通过阅读古典名著进行人格熏陶，因此，在这一观念下，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经典的老知识分子相较于年轻人而言具有压倒性优势。前文战前派知识分子之所以指出战歿学生“教养不足”，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同样，当“战争”成为话题时，有丰富经历的战中派一代在没有战争经历的年轻人面前，处于优势位置。

年轻一代对战中派一代的态度感到不满，是自然的。在与战中派世代的会议交流中，他们时常批评战中派一代过于停滞于过往的经历，认为这种态度是没有结果的。1969年，“海神像破坏事件”（立命馆大学为纪念《听海神的声音》的出版而设立的雕像，被学生们拉倒了），就是对这种不满的象征。

当然，战争大片依旧经常大热，年轻的观众也不少。然而其中也不乏一些作品，与描绘士兵们壮烈而悲壮美的传统方式保持着距离。例如，1968年的年度票房（日本电影）第7名的特攻队电影《啊！同期之樱》，虽然在制作·发行公司东映的意向下，不得不大量使用豪侠电影或黑帮电影中的明星，但最后一幕却以特攻机被美军炮火击落的场景收尾。电影导演中岛贞夫作为战中派的下一代，也指出他出于对“人们已经习惯了拿战中派人的体验空谈一气”这一现象的反感，在作品中强调了“死亡”的“无意义”（及对导致这种情况的社会的批判），而不是修饰美化死亡<sup>6</sup>。

## 2. “对被害者意识的批判”

作为对战中派一代的不满的延伸，出现了“对被害者意识的批判”。年轻一代经常批评战中派一代的“被害者意识”，质疑他们不去正视战争期间“加害行为”的态度。在日本战亡学生纪念会（以《听海神的声音》的出版为契机在1950年成立的反战运动团体）的研讨会上，对战中派一代文化人的谴责也不少。

战中派一代在战场上的经历意味着，无论他们是否直接参与，他们都是曾经进行各种“加害”行为的日本军队的一部分。相反，没有战场经历年轻一代自然就没有在战场上的“加害”体验。这个“对被害者意识的批判”的论点，反转了战中派和年轻一代在关于战争体验论争中的地位，为他们对战中派的批判提供了优势。

不过，对于此事我们不能忽视越南战争这个当时的社会背景。美军对北越的空

6 中岛贞夫『啊！同期之樱』『映画艺术』1967年5月号。关于特攻队内容的战后叙述史，如描述特攻队的电影、遗稿集等，参见福间良明『殉国与反叛——「特攻」的叙述的战后史』（青弓社，2007年）。

袭在报纸和电视上被大量报道，而参与这些空袭的美军大部分是从冲绳和佐世保出击的。这意味着日本在越南战争中的“加害”行为。同时，在越南的空袭也让人联想到太平洋战争末期日本人民的空袭经历，同时也唤起了旧日本军对东亚各国的侵略记忆。在这个意义上，越南战争迫使人们正视了日本在战时及战后的“加害”行为。对战中派一代的“受害者意识”和“加害行为”的批判，一定程度上源于这样的背景。

补充一句，战后的日本电影并非从未关注“加害”行为。例如，市川崑导演的《野火》（1959年）描绘了在菲律宾战场上，寻找食物的日本士兵射杀当地居民的场景，同时也展现了当地女兵对日本士兵的强烈憎恨。然而，除此之外，电影中对“加害”行为的直接描绘并不多，反而大量描绘了日本海军的海战和特攻队的作战行动，仿佛是在回避这个问题。与陆战不同，海战或空战的话不必直接描绘对“人”（敌军士兵和当地居民）的暴力，可以只重点描绘军舰和战斗机等“机械”。《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1968年）等在1960年代大热的为数不多的战争电影大多是讲述日本海军的海战和空战。这些主题（似乎可以）避免直接涉及“加害”和“暴力”<sup>7</sup>。然而，同时期，人们开始质疑那种回避“加害”话题的言论。这与刚才提到的，不同世代对战争体验产生的隔阂，以及越南战争的影响有关。

## （1）自我反省和拒绝彰显

关于“加害”和“责任”的问题，不仅在年轻一代，在战中派一代的讨论中也时常被提到。曾在莱特湾海战中沉没的战舰“武藏”上服役过的渡边清，战后在报纸上看到天皇和麦克阿瑟的合影时产生了强烈的憎恨情绪，感到天皇的行为就像是背叛了他死去的战友。这种情绪在1960年代后成为了渡边声讨天皇战争责任的契机。然而，渡边不仅仅是对天皇问责，他也开始质疑自己，因为他曾出于对天皇的崇敬而自愿参加海军，积极参与战争<sup>8</sup>。他不是借斥责以天皇为首的国家领导人来给自己这方免责，而是也质疑了那些信任领导人、积极参战的普通国民，他们的责任。

进一步说，渡边的论述也是对“自身可能犯下的罪行”的质询。在他的自传体随笔《崩塌的神——一名复员兵的笔记》（1983年）<sup>9</sup>中，他批判了大言不惭地炫耀在占领区的暴行的复员回乡农民，并同时自问：“如果我也在那个场合，我能肯定自己不会施暴吗？”渡边的讨论，不仅涉及到自己直接的行为责任，也触及到了自己在特定情况下也会犯下的暴力行为的可能性。

这也引发了对制造暴力的结构其本身的质疑。首先，对于士兵们来说，他们施行暴力不一定是因为他们首先意识到这是“残虐”的，反而是因为暴力在某些情况下看起来不像是“残虐”的，甚至可以被认为是“正义性”的行为。无视后勤支援的作战行动，上司们急于取得战果的晋升欲望，军队高层比起理性判断更推崇攻击性的态度——这种军队的组织氛围，常常强迫底层的士兵进行鲁莽的行军，把他们逼得自暴自弃。曾被征召为坦克兵的作家司马辽太郎，在描写战国时代、江户幕

7 吉田裕『日本人的战争观：在战后史中的变迁』岩波现代文库，2005年。虽然在战后日本的战争电影中多次描述了海军，但日本海军对重庆的轰炸等事件几乎未被关注。参见福间良明『殉国与反叛』（前文）。

8 渡边清『崩塌的神——一名复员兵的笔记』岩波现代文库，2004年。参见上文福间良明『「战争体验」的战后史』。

9 本书作为朝日选书（朝日新闻社）的其中一本出版后，于2004年以岩波现代文库版再次出版。

府统治末期、明治时代等的历史小说中，多次把昭和陆军的扭曲与故事情节交织在一起<sup>10</sup>。渡边清自我质疑“自己可能曾犯下的罪”的讨论，如果深入探究，也会涉及由军队和政治的组织病理引发的暴力和失败问题。

这种问题意识，也导致了对彰显死者的拒绝行为。

从196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初，以日本遗族会和自民党保守派为中心开展活动，旨在将靖国神社国有化，让国家纪念彰显战亡者。对此，媒体、宗教界、教育界表示强烈反对，认为无法保证政教分离，且可能导致国家神道的复兴，结果国会未通过该法案（靖国国家护持问题）。

大多数战中派文化人士也反对这个动向，但他们的论据略有不同。安田武和桥川文三等人更担心的是，夸赞和表彰死者可能会掩盖死者对军队和国家的愤怒，最终导致死者的声音无法被听到。安田在他的《战争体验：给1970年的遗书》（1963年）中就已经说过，“对他人的死亡深感震撼”是活着的人的傲慢和颓废<sup>11</sup>。他是在质疑，战后“活着的人们”其实是在通过彰显死者，来逃避来自死者的怨念。

## （2）“彰显”和“加害”的二元对立

然而，这种复杂的讨论在1980年代以后变得较为少见，反而，“加害（责任）”和“彰显”之间的二元对立开始凸显出来。

在靖国国家护持问题平息后，日本遗族会和自民党保守派开始更重视首相、内阁对靖国神社的官方参拜。1979年，A级战犯被合祀在神社的事实已经为人所知，因此在“战后40年”即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康弘作为战后首相首次官方参拜靖国神社时，遭到了国内外的激烈谴责。1982年，关于日本入侵中国大陆的历史教科书叙述问题引发激烈争论，甚至演变成了外交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对过去战争的评价，开始二分为重视“彰显死者”的讨论和直面“加害责任”的讨论。这里看不到“被害”和“加害”的二元对立，而是“加害”和“彰显”的二元对立。

曾经，“加害”的问题与“自我反省”相联系，也可以看到一些（尽管微小）尝试去分析萌生暴力结构的机会，而不仅仅是特定个人的责任的思考契机。对于彰显死者的讨论，也曾有对死者的愤怒被掩盖了的担忧。甚至还有，对“反战”、“和平”的政治主张可能会使人们避开死者和体验者复杂的情感，功利性地滥用战争体验的质疑。然而，这些论点在1980年代以后变得模糊，总的来说，只有“彰显”和“加害”的二元对立不断被再生产。

同时，“战争体验的隔阂”也不再突出。比战中派年轻的一代开始具有社会话语权，而且，或许是因为战中派文化人厌烦了来自年轻一代的冲击，关于战争体验的发言有所减少。实际上，像安田武和渡边清这样的战中派在1980年代过世的人也不少。必然地，关于战争体验的世代间的冲突几乎看不到了。

1990年代初冷战结束后，在东亚各地区，此前被亲美独裁政权压制的个人赔偿问题变得尖锐，同时，处于“战后50年”这个节点上的日本，战争责任和殖民

10 福间良明『司马辽太郎的时代』中公新书，2022年。

11 安田武『战争体验：给1970年的遗书』未来社，1963年，第142页。

地责任备受关注<sup>12</sup>。在日本国内，尽管有许多媒体言论和市民运动试图认真对待这个问题，但同时也有广泛的“历史修正主义”的人反对这些行动，不仅否认战争责任，甚至试图以积极的态度看待日本的战争行为。这种观点通过小林善范的漫画《新·傲慢主义宣言 SPECIAL 战争论》（1998年）等方式，渗透到了流行文化中<sup>13</sup>。

媒体关于历史认识问题的讨论比以前更多了，也出版了很多相关书籍。但是，这并没有解决“彰显”和“加害（责任）”的二元对立，反而使这种对立更加深化了。那些试图思考“加害”问题的人往往不会接触到赞美的言论，反之亦然。因此，越是有多数的讨论，就越不会加速不同立场之间的交流，反而只会扩大二者之间的冲突。这种情况在冷战结束后的日本社会中尤其突出。

### 3. 关于“传承”的断绝

在今天的日本，“战争记忆的传承”也在被广泛讨论。尤其是在“战争结束纪念日”的8月的新闻报道中，这种倾向尤其明显。随着大量的战争亲历者去世，采访变得越来越困难，背后的焦虑感越来越强烈。但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我们试图“传承”的到底是什么？我们也可以退一步来思考这个问题。

在1990年代看到的围绕历史认知的二元对立，并未在之后消失。在与东亚各国的紧张关系中，时常可见类似的激烈讨论。特别是在网络媒体上，这种趋势尤为显著。虽然涉及历史认识的网络言论数量庞大，但这并没有促进不同立场之间的交流，人们反而只是接触到自己喜欢的言论，并再次重复着不接受异议的状态。这在一方面是由于网络媒体的特性，即根据“检索”和“检索履历”来推动信息推送，但另一方面，我们不应忽视其与1990年代以来的言论环境的连续性。

当然，历史认识问题并不总是受到关注。相反，在主流媒体中也经常出现一些冲突不大的话题，这些话题似乎是为了避免“引火烧身”。比如往往不深入探讨“彰显”或“加害”的问题，而是赞美所有人都不会否认的“记忆传承的重要性”。

然而，这些文章或言论中试图在“传承”的东西，变成了历经各种断绝和遗忘之后的清汤寡水。现今，很少有媒体关注对“死者的感慨”的抵抗，对“加害”意识的自我反省，对催生暴力的社会结构的关注，相反，“易懂性”正在成为主流<sup>14</sup>。

但是，如果我们回顾过去的言论，我们会注意到不同观点的存在。曾经有一段时间，“断绝”比“继承”的话题更为突出，而在那时，围绕战争体验和记忆的各种论题争相浮现。“反战正义”有时遮蔽了什么？围绕“加害”话题的讨论是否是和自己不相干的事？这是由什么欲望支撑的？更进一步说，我们该如何面对产生“加害者”的机制？这些论题在过去的媒体言论和媒体文化中经常可以看到。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它会直接关系到日本与东亚关于历史认知的“和解”。但是，最近的讨论是经历了怎样的过程而产生的？其中涉及了怎样的社会背景？有什么论

12 关于这方面的社会背景，参见浅野丰美编《和解学的尝试——记忆·感情·价值（和解学丛书1）》（明石书店，2021年）。

13 在这样的背景下，以遗稿集《听海神的声音》为原作的电影《听，海神的声音》（新版）在1995年上映了。电影中涉及了日本士兵对菲律宾居民的屠杀以及“慰安妇”等问题等，反映了“加害”的问题。然而，在对暴力采取批判视角的同时，渡边清提出的“自己可能也曾是犯下暴力的当事人”这种危惧并未得到描绘。这表明，对于把暴力正当化（视为其理自明）的社会结构的质疑已经淡化。参见福间良明《「战争体验」的战后史》。

14 关于“继承”话题的政治无害性所蕴含的问题，参见福间良明《战后日本、记忆的力学——“继承含义下的断裂”及政治无害性的政治学》（作品社，2020年）。

题被遗忘了？探讨这些问题，是重新分析当今被视为一切已明晰的历史认知时，所需的基础工作。也许，不是面对“继承的历史”，而是面对“断绝的历史”、“遗忘的历史”，我们才能看清一些东西吧。



# 现代韩国媒体的殖民地、 战争经验形象化及其影响 ——以电影、电视剧为中心

李基勋

延世大学

[原文为韩语。翻译：洪 龙日（东京大学）]

## 1. 前言

本研究旨在探讨从解放之后直到 2000 年代，韩国电影和电视剧如何塑造殖民地和战争经验的形象，并进一步探索其对公众历史认知的影响。我将按不同的时期进行分析，研究各时期采用了哪些素材来描绘过去，如何以不同的视角处理同一素材，以及通过该历史变迁来追踪对媒体起到主导作用的历史认识及其影响。首先，我会观察电影和电视剧是如何利用过去来表征“民族”的。在塑造国民和民族形象的过程中，有哪些被否定和排除，或者重新定义的？这是一项极具戏剧性的探索。北朝鲜军队或左翼如何从被描绘为人类的敌人和无法共存的邪恶势力，到五十年后以牺牲的兄弟的面孔重新回归，这中间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我将考察在各个时代的媒体中，“历史”是如何被赋予意义的。

## 2. 20 世纪 50-60 年代，冷战民族主义的殖民地和战争记忆

### (1) 打造一个“民族”作为“纯洁”和“意志”的体现

在朝鲜半岛，解放后立即席卷而来的独立政治热潮，使殖民时期迅速演变为民族解放斗争的时期。电影制作人们制作了大量的启蒙电影，用以鼓舞建设新民族国家的使命感，其中以描述独立斗士抗日运动的电影为主，在后来的韩国被称为“光复电影”。1946 年由崔寅奎导演，全昌根编剧并主演的《自由万岁》便是这类电影的代表作<sup>1</sup>。

主人公汉钟是不畏死亡，执行民族独立课题的男性革命家。电影以主人公汉钟

1 韩国影像资料院，《韩国电影风景1945-1959》，文学思想史，2003，23页。

遭到日本警察枪击后逃脱的场面开始。这是在此后以独立运动为题材的电影中经常出现开场剧情<sup>2</sup>。加入抗日组织的汉钟在准备武装起义的过程中被警察追捕，然而他意外地躲进了日本警察的恋人美香的家中<sup>3</sup>。尽管美香受到汉钟的教导并帮助他隐藏和逃脱，但这却为日本警察提供了追踪的线索。在抵抗组织的秘密基地，美香被击毙，而受伤的汉钟也被捕，但在深爱他的护士惠子的帮助下，他最终成功逃脱。

汉钟是一个准备进行民族起义、策划处罚反动行为和武装斗争并直接参与斗争的革命家，是以坚韧不屈的意志战斗到最后的英雄。尽管斗士们互相称呼为同志，但同志们中并没有女性。电影中的女性称他们为“老师”，尊敬或爱慕他们，并为他们的斗争做出牺牲。

美香对自己作为叛徒恋人的困境绝望地哭了起来，她问道：“人难道没有重新生活的权利和努力吗？”汉钟坚定地回答：“人当然有重新生活的权利，我们是为了国家的重生而来，将炸弹运送到倭寇的巢穴。但我们需要的是钢铁般的意志和火山般的激情，而不是个人的感情。”<sup>4</sup>

惠子是一名护士，也是汉钟藏身之处的家庭的女儿。她成功地将被捕的汉钟救出，这与只会呼救和哭泣的堕落的美香形成鲜明对比。纯洁的少女惠子从危险中救出了汉钟，在电影中被描绘成新的英雄。

在这部电影中，民族被描绘成无条件的、绝对的献身对象。被日本警察追捕的汉钟闯入陌生人美香的家中，并向她提出了要求：“如果你是韩国人，就应该救我<sup>5</sup>。”当惠子向她的母亲宣告她将救出汉钟时，她的母亲说：“即使我阻止，你也一定会去救老师。”她并没有劝止女儿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人<sup>6</sup>。

1959年是讲述民族独立运动的电影突然增多的一年。这一年恰逢“3.1运动”40周年。而在前一年的1958年，朝鲜总联正式启动了归国运动，“北送”成为了韩日之间最大的争议焦点。另外，在接下来的选举即将到来之际，李承晚政权的危机感达到了高潮。当时上映的一系列电影致力于塑造（包括李承晚在内的）救国英雄的典范<sup>7</sup>。

其中，由尹逢春导演，都琴峰主演的《柳宽顺》值得关注。柳宽顺作为抗日运动的象征，曾在1948年、1959年、1966年、1974年、2019年共5次被拍成电影，其中1948年、1959年、1966年的作品都是尹逢春执导的。1959年的《柳宽顺》在内容上比1948年的作品更丰富，而且比1966年或1974年版本的《柳宽顺》展现出了更为主动的女性英雄形象<sup>8</sup>。

2 原剧本设定为夜晚的场面，但是因为胶卷和装备不足的缘故，改成了白天拍摄。金丽实，《“自由万岁”脱正典化试论-以现有剧本和电影的差异为中心》，《韩国文艺评论研究》28，2009，294页。

3 由于饰演该角色的演员独银麒越北，1975年复原的影像中删除了亲日警察南部的登场场面，因此很难理解电影的展开。另外，日本警察的台词在影片中是用日语录音，但后来重新配音，全部换成了韩语。

4 目前的复原版以逃脱的场景结束，但在实际电影中，汉钟在山中与日本警察的枪战中失去了生命。金丽实，前文，289-290页。

5 原台词是“朝鲜”，但后来重新配音，全部换成了“韩国”。金丽实，前文。

6 然而，如此强调积极抗日斗争的《自由万岁》的制作团队同时也是制作亲日电影的代表性主角。导演崔寅奎执导了强迫男人作为志愿者入伍为题材的《太阳的孩子》（1944年）和《爱的誓言》（1945年），摄影导演韩濤模也参与了《太阳的孩子》的制作。韩国电影100周年纪念项目委员会编撰，《韩国电影100年前后》，Dolbegae，2019，51页。

7 主要代表作品有《独立协会与青年李承晚》（申相玉）、《三一独立运动》（全昌根）、《高宗皇帝与安重根义士》（全昌根）、《韩末风云与闵忠正公》（尹逢春）等。郑尚雨，《解放后1950年代独立运动的电影表现》，《韩国史研究》183，2018。

8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柳宽顺电影更加强在专制制度下呈现的理想化女性形象。金秋天，《柳宽顺电影研究：抵抗的再现与女性》，延世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2，37页。

在 3.1 运动之后，回到家乡的柳宽顺发现自己父亲的学校被关闭，领导万岁示威的哥哥被捕。她和朋友们积极组织并领导示威活动，祈求上帝赋予她领导斗争的力量。这是圣女贞德式的奉献精神象征。

在万岁示威运动期间，尽管失去了父母并在狱中遭受折磨，柳宽顺仍然继续进行斗争。在狱中，她回忆起在梨花学堂时期去庆州修学旅行时关于佛国寺、石窟庵等地方的见闻，这种对民族文化和历史的热爱，对民族意识的热情，是她成为民族英雄的原动力。

此外，这部电影也展示了在后来的韩国电影中呈现日本人形象时的陈词滥调。小胡子、粗暴的言语、玩世不恭和不屑一顾，都是日本警察和官僚的共同特点。

还有一个典型的日本人角色登场，他既不是官僚、警察，也不是军人。由喜剧演员金喜甲饰演的日本高利贷者是掠夺朝鲜人的反面角色，但他却是一个卑躬屈膝、有些愚蠢的人物。在听到朝鲜人害怕的是“光着身子跳舞的日本人”的玩笑后，他到柳重权的家里讨债时便光着身子跳舞，结果被赶了出来。他那糟糕的韩语发音、矮小的体格、粗鲁和低俗的行为，都是之后在韩国媒体上出现的殖民地日本人的刻板形象。

此外，虽然需要描绘日本人的角色，但韩国电影和电视剧却不能使用日语，这是韩国媒体的一个难题。在确立韩国语为“国语”的过程中，韩国媒体将“清除倭色”视为时代课题。以前进口的带有日语字幕的欧洲电影甚至在 1949 年 7 月 1 日开始被禁止放映<sup>9</sup>。在确立使用国语的民族共同体之后，曾经的“国家语言”即帝国的语言被完全禁止，日本人被描绘成一个使用扭曲语言的民族。

反之，“民族”的语言只能用准确的标准语来表达。参加抗日运动的民族成员必须统一使用“标准语言”。即使在他们的家乡忠清道竝川，宽顺和爱德也不说任何方言。无论是宽顺家人间的对话，还是宽顺说服亲戚爷爷时的对话，没有人会说方言<sup>10</sup>。因为方言不可能成为民族斗争的语言。

《无名之星》(金刚润导演, 1959) 戏剧性地展现了无法用方言表达的民族观念。该片以 1929 年发生的光州学生运动为题材，在光州和罗州当地大规模动员光州地区的学生完成拍摄。但是电影中的角色都用标准语进行对话。甚至那些无法忍受朝鲜生活，前往满洲的农民也没有使用方言。民族的纯洁性和统一性是不能被方言所侵犯的。

相反，神圣的抗日运动的大义被与血统联系在一起。主角相勋兄妹的父亲是 3.1 运动的主导者，同时也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独立志士。他交给妻子保管的太极旗，在十年后的 1929 年光州学生运动中再次焕发出光芒。相对而言，亲日派高等警察的妹妹英爱虽然参加了抗日学生组织联盟会，但最终因为哥哥而牺牲。在最后的万岁场面中，相勋的家人站在最前面。就像《自由万岁》中的美香一样，英爱并没有位置。

9 《京乡新闻》1948.10.26 (3) ; 《东亚日报》1949.3.10 ; 《朝鲜日报》1949.3.12 (1) 社论。

10 甚至有人说，饰演柳宽顺的都琴峰是当时最好的方言演员，她曾一度只得到使用方言的角色。《东亚日报》1962.12.21 (5) ; 《朝鲜日报》1962.12.9。

## （2）在朝鲜半岛之外制造殖民记忆

### ① “学兵”的经验与记忆

以程式化的英雄故事来记忆殖民地的这一方式是有其局限的。为了吸引公众的关注，必须以不同的方式来讲述殖民地的故事。1961 年上映的电影《玄海滩知道了》（金绮泳导演）就选择了一个与过去不同的叙事脉络来回顾殖民地时期。电影通过“学兵”这一叙述者，开始在朝鲜半岛之外讲述殖民地末期的故事。

被抓去当学兵的朝鲜青年阿鲁云在日本名古屋的兵营中生活，遭受了日军上司和老兵的各种折磨。在此期间，阿鲁云的学校前辈中村介绍了自己的表妹秀子（由旅日朝鲜人孔美都里饰演），此后阿鲁云和秀子开始相爱。通过与阿鲁云的恋情，秀子摆脱了民族偏见，并认识到“可耻的不是人种，而是人格”。在美军大规模空袭前逃跑的阿鲁云，在轰炸不断的街道上彷徨。轰炸结束后，日军阻止失去亲人的家庭寻找尸体，并试图架起铁丝网进行大规模集体火化。阿鲁云从火海中走出，看到这一情景的群众推倒铁丝网蜂拥而至，阿鲁云与秀子得以重逢。

在这部影片中，折磨阿鲁云的不是所有的日本人，而是日本的军部。在最后的场面中，日本的民众通过他们的抵抗，拯救了阿鲁云。相比于对日本人的单方面的憎恨，权力和军部成为了问题的根源，有良心的日本人成为了团结的对象。

阿鲁云能有这样的经历，是因为他是“学兵”。那时的朝鲜学兵是接受当时最高教育的知识分子精英。在中国、太平洋、东南亚等地区经历过战争的学兵中，有些人在逃生后参加了光复军或朝鲜义勇军等抗日军事组织，经历了多种政治经验<sup>11</sup>。因此，以学兵为主角的作品，虽然反映了解放前夕的殖民地经验，但并没有直接处理当时朝鲜半岛内发生的事情，不过这并没有问题。如果将视线转向朝鲜半岛内部，在战时体制下，如果不讨论朝鲜人的合作问题，就无法真实地讲述故事。讲述学兵们及其恋人故事的金来成的人气小说《青春剧场》在 1959 年、1967 年、1975 年三次被改编为电影，也是出于这个原因。但是，《青春剧场》主要关注主角的复杂的爱恨关系和逃亡与追逐的故事，殖民地历史本身除了作为背景之外并没有被赋予更多的意义。为了将“学兵”的历史经验与强制动员、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解放后的历史课题等问题联系起来进行形象化，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 ② 动作、空间、满洲和无意义的时空间

20 世纪 60 年代，以满洲为背景的动作电影在韩国大受欢迎，这些影片以 20 世纪 20 至 30 年代的满洲为背景，受到了西部片，尤其是 1960 年代中期以后的意大利式西部片的深刻影响，因此被统称为“满洲西部片”<sup>12</sup>。代表性作品有林权泽的《再见了，豆满江》（1962）、申相玉的《关外双雄》（1967）、《无宿者》（1968）、林权泽的《独眼朴》（1970）和李晚熙的《挣脱枷锁》（1971）等。《无宿者》更

11 解放以后，学兵们建立了学兵同盟等独立的组织进行活动，在维持着“学兵一代”这一身份认同的同时回应现实问题。孙惠淑，《研究学兵写作时的内心意识——以韩云史、李佳炯、李炳注的小说为中心》，《语文论集》75，2018。作家韩云史也是在日本大学读预科期间被抓的学兵出身。

12 这是以 2008 年在韩国影像资料院“满洲西部片特别展”上放映 14 部电影为契机而开始广为人知的用语。金大根，《满洲西部电影评论分析》，《人文社会 21》12-6，2021，240-241 页。

是使用了“东方西部片”的标语来进行宣传<sup>13</sup>。

然而，即使被归为满洲西部片，电影《再见了，豆满江》讲述的实际上是逃亡至满洲独立军基地的独立团成员们在国内的抗争历程。影片中，一个独立运动家的儿子，英友，炸毁了西大门监狱，企图与日军交战并前往满洲。在此过程中，影片描绘了英友与恋人之间的爱，以及与日本军警的追击战，还有他的同志们的牺牲和援助等情节。影片中，独立团成员们拥有大量的弹药、枪支和爆炸物，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枪战。虽然电影的舞台并非满洲，但在报纸广告中却出现了“震撼豆满江和满洲平原的独立团与日本宪兵队波澜壮阔的战斗”的字眼。电影被描绘成“令人屏息的追逃，在持续的紧迫情况下痛快复仇”的“刺激和悬念并存”的“巨大全景”<sup>14</sup>。制作此片需要的是日军这一不会让人产生罪恶感的敌人，以及一个能让“枪击连发的巨大全景”出现的地点。无论怎么包装，将内战中的朝鲜战争制作成“痛快淋漓”的动作片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件不舒服的事情。“满洲”可以摆脱这种负罪感，从而成为制作动作片和暴力片的理想背景<sup>15</sup>。满洲在这里并非是一个真实的地方，而是一个空洞的能指，一个富有想象的空间<sup>16</sup>。至于地点和时间的历史性，并不是制作这些电影时需要考虑的因素。

然而，后来的满洲西部片中，满洲就像西部一样，只是作为动作片的背景才具有意义。例如，在《再见了，豆满江》中，虽然动用了许多临时演员和弹药来演出独立军壮观的战斗场面，但是，此后抗日斗争的苦难和凄惨几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小英雄们的连续动作场面。许多满洲西部片对西部电影的经典场景进行了创新性的使用，甚至还出现了一些直接模仿故事情节的作品。

在这些电影中，独立军只以一种陈腔滥调的形式出现，虽然他们强调了独立的伟大理想，呼唤韩国人的民族意识，但这与电影的主线并无太大关系<sup>17</sup>。人物变得越来越滑稽，大量的B级电影被快速制作出来。尽管电影中插入了强调国家和民族的场景，但对电影制作者和观众来说，这种做法并无太大意义。

同样，注重艺术性的电影也无法避免这个问题。在这个时期，许多由韩国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被统称为“文学电影”，其中许多是讲述殖民时期的故事。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金东仁原著（1925）的《土豆》。在金承钰导演的1968年版的《土豆》中，主要讲述的是主人公福女受苦的故事，她被无能的丈夫强迫卖淫<sup>18</sup>。然而，原作中所表现出的底层人民道德堕落的冷静视线在电影中消失了。原著中，福女与中国人王书房有固定的卖淫关系，丈夫对此予以默许。王书房结婚后，被嫉妒冲昏头脑的福女袭击了王书房，并在此过程中殒命。对于福女的死亡，她的丈夫与王书房达成协议，掩盖了事情真相。然而，在1968年的电影《土豆》中，福女被描绘成一个受害者，而不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人。她不断地忍受着贫穷和她丈夫的无能，

13 李英栽，《亚洲式身体：冷战韩国·香港·日本的跨国主义动作电影》，somyong出版社，2020，60-61页。

14 《京乡新闻》1961.12.13（4）下端广告。

15 李英栽，2020，前书，80页。

16 崔洙雄，《在韩国电影中出现的“满洲”表象的价值和活用方法研究》，《顺天乡人文科学研究》34-4，顺天乡大学人文科学研究，177页；曹惠贞，《“满洲西部”的题材接受情况及改编研究》，《韩民族文化研究》60，2017，251页。

17 金大根，《满洲西部电影论》，《人文社会21》12-6，2021。

18 《土豆》不仅改编为电影（1968年金承钰导演，1988年裴昶浩导演），还经常被制作成电视剧（电视文学馆，1984年）。

但没有出现地主、资本家、总督府的权力，只是一种抽象的贫困。电影虽然揭露了父权制和暴力的问题，但即使如此，她的丈夫在最后也归于悔过，回到她的坟前哭泣。原作中明确的阶级、性别以及殖民地掠夺结构的问题在电影中几乎消失了。在只剩下无能的家长和不幸的女性牺牲者的悲剧情节中，对时代历史性的敏感感觉几乎无法察觉。

### 3. 敌人，但却是同族——上世纪50-60年代冷战民族主义战争叙事的矛盾

#### 冷战时期阵营逻辑与制造“敌人”

在朝鲜战争期间制作的宣传电影中，战争被描绘成一个单纯的善恶对立。在这个构图中，正义象征着联合国军，通常意味着美军，战争变成了“自由阵营”与“共产阵营”的冲突。追求和平的自主国家和得到联合国承认的“大韩民国”被视为自由阵营的一部分，他们将这场战争定义为“维护人类自由和地球和平的战争”<sup>19</sup>。在20世纪50年代的反共电影中，左翼被描绘为人类的敌人，即罪恶的象征。他们似乎是在提倡人民和民主，但实际上他们只专注于满足自己的私欲。典型的左翼人士（比如人民军、游击队）被描绘成没有道德观念，甚至连基本的伙伴意识都缺乏的恶魔。因此，即使后续有人登场表达悔改，电影仍然需要首先在善恶、自由与共产主义之间建立明确的对立关系。《自由战线》（金鸿导演，1955），《我要告发》（金默导演，1959）等电影就是这样的代表作品。

然而，也有人主张，比起强调这种不切实际的阵营逻辑，还不如更加强调人文主义和爱情。这些电影导演关注的是如何在敌人内部揭示“人性对非人性”的斗争。例如，1955年的电影《稗牙谷》（李康天导演）就是这类电影的代表。电影中，一位名叫“大嘴”的队长带领的游击队犯下了各种残忍和卑劣的行为，包括屠杀、抢劫和性侵犯，这让曾经的知识分子哲洙感到深深的怀疑和失望。最后，哲洙和爱上他的游击队员爱兰决定投降，但在被发现后，只有爱兰幸存下来并成功逃离。在影片中，大部分的游击队员都是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冷酷、自私、卑鄙的人。甚至会以是反动派的亲戚为由处决他们的同志，并对受伤的同志进行性侵犯致死。甚至连爱着哲洙的爱兰也在毫不犹豫地强迫平民屠杀反共人士的无情行为中显露出冷酷的一面。

但“自由对共产主义”的阵营逻辑要求将所有敌人都描绘成非人性的存在。当时的国防部政训局长金宗文指责说，《稗牙谷》中只出现了游击队，导致“故意排除了自由与反自由两个对立世界之间的对抗”，将“游击队员英雄化”。最终，《稗牙谷》只能在爱兰下山的场景中插入太极旗，才得以重新上映<sup>20</sup>。影片只不过是试图展现游击队内部具有“人性”的人所经历的冲突与矛盾，但即便如此也是不被允许的。

这部电影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它对一名被游击队招募的少年的命运进行了深入

19 李明子，《通过战争经验的重组打造国家》，《统一问题研究》56，2011，22页。

20 李英裁，2020，前书，73-74页。

的描绘。在游击队袭击少年所在村庄的过程中，一名游击队员明知那是少年的母亲，却仍然毫不犹豫地开枪射杀了她。当男孩找到垂死的母亲时，哭着进行了最后的对话，而垂死的母亲对儿子进行了责骂。“是你射杀了妈妈。”“不是的，妈妈。”即使儿子否认，她还是骂着“你这个混蛋”，并试图去揪住儿子的前襟，然后便咽了气。很难想象这是一位垂死的母亲和她儿子之间最后的对话。左翼的恶魔性是连母性都无法原谅的，而少年最终因为隐瞒舅舅是反动派而被处决。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这两人的最后一次对话是用标准语进行的。尽管电影反复强调少年的故乡设定，但少年、他的母亲和舅舅以及其他村民都使用标准语进行对话。这意味着，在电影中，使用智异山村庄的方言本身并不符合严肃的反共民族叙事。在日常的电视剧和电影中，方言通常被用作描绘角色性格的手段，但在描述战争和民族主题的作品中，方言却常常被视为禁忌。在一部关于军事或战争的电影中，选择使用方言需要有足够的勇气。比如1961年上映的电影《五人海兵》中，首次出现了使用全罗道方言的角色<sup>21</sup>。

为了赢得观众的共鸣，朝鲜战争的电影必须以壮观的动作片为主。在政府和军方的积极支持下，大型的战争片得以制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1963年由李晚熙导演的《一去不回的海兵》。为了拍摄这部电影的最后一幕，当天有3000名海军陆战队员、10辆坦克、12架战斗机进行了支援，并消耗了大量的弹药。广告也宣称这部电影是“以电影史上空前规模再现人类最大的战斗”<sup>22</sup>。电影的重点并不在于意识形态的对决，而是在于描绘军人在炮火中的真实面貌。这些来自不同阶层和地区的军人被编入同一个海军陆战队分队，一同经历残酷的战斗和考验，从而巩固了他们之间的团结。最后，他们在面对中国军队的大规模进攻时，展现了无畏的勇气和坚定的决心，迎来了影片的高潮。

如今，如果从韩国士兵的视角来看待这场战争，国家军队的战争，“大韩民国”人民的战争，无法回避的事实是这是一场“内战”。我们必须认识到被驱逐为人类敌人的敌人其实也是“民族”的一部分。这个问题在电影中必然会反复出现。例如，当海军陆战队员得知杀死他同伴妹妹的人实际上是自己的亲哥哥时，他深感苦恼。他质问自己，如果面对哥哥，他能否开枪。这个问题在后来的朝鲜战争电影中反复出现，构成了一个根本性的危机。另外，这个令观众感到不安的问题也可能会破坏动作片的壮观感。为了避免这个危机，电影制作人创造了“中共军”的敌人形象，而不是人民军。在最激烈的战斗场面中，充满山脊的“中国军队”不再是人类，而是“人海”这一物化的象征<sup>23</sup>。通过这种方式，电影避开了兄弟间的互相残杀，选择与被象征为蛮夷的敌人进行战斗<sup>24</sup>。随后，“共产蛮夷”的表达逐渐得到巩固，将共产党排除在民族之外<sup>25</sup>。

然而，“中共军”的形象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相反，区分中共军和朝鲜军的

21 扮演“乡巴佬”角色的全罗南道顺天出身的朴鲁植提议使用全罗道方言，金基勋导演鼓起勇气接受了这个提议。李英栽，《20世纪60年代朝鲜战争电影的三个局面：国民、反复强迫、空中的观点》，《尚虚学报》62, 216-217页，在1988年制作的《南部军》中，才首次出现了使用方言的游击队。

22 《东亚日报》1963.3.20 (5) 下端广告。

23 电影中出现一群僵尸是在1968年(乔治·罗梅罗，《尸体之夜》)，在朝鲜战争电影中，以“人海战术”为代表的中国军队的形象与最近的僵尸没有太大不同。李英栽，前书，224-225页。

24 中国人民志愿军介入朝鲜战争后，韩国媒体开始将“中国军队”称为蛮夷。《朝鲜日报》1950.12.16 (2)。

25 以“消灭吧，蛮夷这是几百万……”开头的军歌《胜利之歌》如实反映了当时“共产蛮夷”的形象。

企图为加强反共标准的政权提供了借口。《一去不回的海兵》的导演李晚熙紧接着执导了一部名为《7 名女俘虏》的电影。尽管在 1964 年 12 月通过了电影审查并获得了上映许可，但随后南韩的中央情报部直接介入，禁止该电影上映，并在第二年将导演拘留。电影的剧情其实很简单。正在迁移的女护士和平民被北朝鲜军队俘虏。北朝鲜军队的搜索队在护送她们的过程中，看到中国军队试图强奸这些女性，愤怒的北朝鲜军队与中国军队交火后，成功解救了这些女性，并且投降了韩国。问题出在哪里呢？检察机关以违反《反共法》为由起诉了导演，并主张说：“提倡感性的民族主义，描写无力的国军，赞扬北朝鲜傀儡军，夸张描写受到美军虐待的慰安妇惨状等，助长了排斥外国势力的气氛”<sup>26</sup>。

## 4. 20 世纪 70-80 年代“历史”的崩溃与重组

### (1) 反共主义的极端化

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描述朝鲜战争的反共电影主要由文化宣传部下属机构电影振兴公社制作。即使是当时的著名导演也难以拒绝政策性要求，因此创作了像《野菊花开放》（李晚熙导演，1974）和《证言》（林权泽导演，1973）这样的电影。据林权泽回忆，当他试图拒绝电影振兴公社要求的国策电影制作时，他们提到了他在北朝鲜的亲戚，以此对他施压。《证言》是一部完全按照政权要求制作的电影。1950 年 6 月 25 日，张少尉和他的爱人朴顺雅本来在约会，然而，他很快就被召回前线，而朴顺雅则被迫逃亡。电影试图展现从避难到洛东江战线，再到联合国军区，她遇到的屠杀平民、拷问和杀害等各种人民军的暴行。电影被命名为《证言》，是因为它由无数的惨烈画面和朴顺雅对它们的解说构成<sup>27</sup>。电影甚至剔除了故事情节，变成了揭露共产主义“野蛮行径”的证词录。

反共电影的程式化在动画片《一将军》中达到了高峰。尽管 1978 年的这部电影并非以朝鲜战争为背景，但主角“小一”与北朝鲜人民军的斗争场景创造了一种与真实朝鲜战争电影相类似的影像。《一将军》的主题借鉴了通过电影和电视剧而广受欢迎的人猿泰山的故事。在森林中与动物自由生活的小一在共产党的强迫下搜寻山参，在此过程中他救了受伤的小淑。一起逃脱的小一击败了强迫人民挖隧道以便进行侵略的共产党，找回了自由。在这个过程中，与小一战斗的人民军被描绘为狼和狐狸，而在最后时刻揭下面具的“红色领导”被描绘为一头巨大的猪。这部动画片创造出了一个靠真人出演的电影无法实现的“敌人”形象。

### (2) 消失的历史——毫无意义的殖民地

在一个由强制性反共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主导的社会中，电影和戏剧在很大程度上无法真实地反映那个时期的历史背景。这样的例子在描述殖民地的电视剧中尤其明显，其中的时代背景仅仅被视作简单的场景设置。20 世纪 70 年代，这种现

26 朴有禧，《韩国电影表象地图》，与书相伴，2019，198-199页。

27 郑圣一，《证言 Testimony 林权泽 1973》<https://www.kmdb.or.kr/story/5/1344>

象主要出现在被广泛称为“侠客片”的B级动作电影中，而进入80年代以后，情色电影开始占据主导地位。李斗镛导演的电影《桑叶》(1985)就是此类电影的代表。《桑叶》改编自罗稻香1925年的同名小说。在原著中，作品的现实性主要来自主角安峽和森甫夫妇的堕落和不道德行为。丈夫森甫是一个赌徒、鸦片中毒者和家暴者，而他的妻子安峽则利用她的美貌维持生存。然而在电影版本中，森甫的形象被塑造成了独立运动家，一个理解并接受妻子为了生存所做出挣扎的宽容志士<sup>28</sup>。安峽在电影中虽然对所有人都宽容，但坚决拒绝与对日本警察奴颜婢膝的长工三石有性接触。森甫也对揭露其妻子不忠行为的三石进行了惩罚。电影中的村庄被设定为民族共同体的象征<sup>29</sup>，而森甫的缺席则是守护这个共同体的必要过程。然而这些民族主义的设定并非出于对当时历史背景的深入理解，它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设定，其作用只是为了呈现出殖民地时代这一过去历史时期而已。电影中充满了原始的情色主义和轻松的喜剧元素，而其中的民族主义和父权制设定只是用来给观众带来稳定感。无论是殖民地还是朝鲜时代，电影中对历史的描绘都没有显著差异，而过多的民族主义元素反而抹掉了时间和空间的差异。在《桑叶》的时空中，当只有朝鲜人存在时，便形成了一种乌托邦式的共同体。侵犯这一共同体的存在，例如亲日派及其手下三石，都被设定为反派，而必须离开这个乌托邦的森甫却被塑造成了英雄式的人物。因此，《桑叶》的时空成为了一个脱离历史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民族内部的冲突、歧视和父权压迫都消失了。

### (3) 牺牲与绝望的战争故事

电影中的历史观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确实经历了显著的转变。最重要的是，人们对待朝鲜战争的视角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早期的反共电影中，历史被视为一种证明共产主义罪恶的工具，而在新的电影中，战争则被描绘成一种延续至今的创伤和痛苦的源头。历史开始被赋予现实的含义，善与恶不再完全由意识形态决定。权力的本质变成了邪恶，观众开始从受害者的角度来审视战后的历史。

1980年上映的电影《歪鼻子》(林权泽导演)和《最后的证人》(李斗镛导演)都是这种新趋势的代表作<sup>30</sup>。《最后的证人》中，虽然游击队依然被描绘为罪犯，但右翼的形象更为邪恶。在电影中，少女智慧被游击队员强暴并因此怀孕，黄巴宇这个善良的长工救了她并娶了她。然而，对她父亲遗产觊觎已久的青年团长和检察官、叛变的游击队员联手陷害黄巴宇，他被诬陷为杀人犯，而智慧则沦为别人的情人，被迫在酒场讨生活。得知这一事实后，智慧的儿子在精神崩溃的状态下展开了复仇。尽管刑警揭示了这起谋杀案背后的阴谋、背叛和长期犯罪，但黄巴宇为了儿子，选择认罪并自杀，智慧也在葬礼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连调查此案的刑警也选择了自杀。黄巴宇和智慧象征着战争和冷战秩序下，以及由此产生的权力压迫下的牺牲者。左翼和右翼的界限已经模糊，牺牲和受害仍在继续，但权力仍然牢不可破。刑警的自杀象征着当代知识分子的无力和挫败。

28 金芝美,《文学与电影的再媒介-叙事的合作与变异的理论与实际》,《韩国现代文学研究》45,2015。

29 在电影中,村庄是狂欢节的场所,通过反复的庆典鼓舞和礼赞共同体意识。孟秀珍,《替罪羊,以及作为民族过敏原的女性形象分析——以李斗镛导演的《桑叶》为中心》,《电影研究》24,2004,112页。

30 朴有禧,前书,208页。

## 5. 民众与现实——“历史”的再现：20世纪90年代以后

### (1) “历史”与“民众”的再发现

1987年6月的民主化抗议活动之后，对朝鲜战争的意识形态屏障开始瓦解。尤其是直接记录游击队经历的手记和小说，如《南部军》、《太白山脉》和《智异山》，这些作品不仅成为畅销书，还被改编为电影。最先被改编为电影的是《南部军》（郑智泳导演，1990）。虽然这部电影像《稗牙谷》一样，以人道主义和人间之爱为基础来批判战争，但其对游击队的具体描绘却达到了新的高度。无论是《想去那座岛》（朴光洙导演，1993）还是《太白山脉》（林权泽导演，1994），这些作品都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对立，揭示了受苦的民族和公众的痛苦，并试图寻求和解。相比《歪鼻子》或《最后的证人》中个人罪恶和受害的主题，20世纪90年代的一系列作品更加关注在全球历史和结构性冲突背景下，人民在超越个人意愿的情况下所做出的牺牲。

能够清晰体现对“历史”观点变化的是由MBC为庆祝创社30周年而制作的迷你连续剧《黎明的眼睛》（金钟学导演，金圣钟原作，宋智娜编剧）。从1991年到1992年，这部36集的电视剧以其精彩的制作、深度的主题以及超过50%的高收视率成为了电视剧的里程碑。电视剧讲述了大治和河琳，两位被动员参加战争的“学兵”的故事。尽管两人都在战争的磨难中逃离了学兵的生涯，也都走上了抗争之路，但他们却分别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他们的命运与被日军强行带走成为“慰安妇”的女性丽玉紧密相连。他们经历的帝国主义军队的暴力压迫和战争的痛苦，以及在祖国被解放后的希望和失望，左右对立和战争，爱情和死亡，都构成了电视剧的主要主题。尽管该剧的原著小说在20世纪70年代的体育报纸上连载时，主要强调了具有刺激性的性和暴力描写的反共主题<sup>31</sup>，但在改编成电视剧的过程中，《黎明的眼睛》却努力再现了人的历史，而非冷战对立。剧中的人物，他们的动机和行为的改变都被赋予了合理的解释，而且剧中开始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讨论了南韓过去未曾触及的问题，如清算亲日派的失败和济州4.3抗争。从帝国主义强制动员的角度，剧中描绘了“学兵”和“慰安妇”的经历，提供了对韩国国家建立的批判性理解。超越冷战国家主义，尝试在电视剧中具体表现“历史”的实际情况，在这一点上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sup>32</sup>。

这种变化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民主化运动，特别是“民众”概念的普及有着紧密的联系。起初，“民众”被视为一种含糊的感性主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逐渐成为解决历史问题的主体，并开始强调这是底层人民的阶级团结。2000年之后，左翼或人民军的叙事也开始浮出水面。

此外，日军“慰安妇”作为帝国主义战争的受害者，以及他们所经历的鲜活历史，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个问题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

31 张秀喜，《作为断绝与孤立的冷战叙事的日军“慰安妇”叙事研究——以20世纪70至80年代日军“慰安妇”叙事为中心》，《感性研究》22，114页。

32 白头山，《民主化过渡时期电视连续剧的分裂再现方式：以“黎明的眼睛”为中心》，《故事与形象》15，2018。

为人所知，并且在小说和电影中出现，但其真实的本质却一直没有被广泛理解。自从边永姝在1995年、1997年和1999年制作了关于日军“慰安妇”的纪录片《微弱的声音》后，许多纪录片和剧情片开始出现，如《鬼乡》（赵正莱导演，2017）、《雪路》（李娜静导演，2017）、《我能说》（金铉锡导演，2017）和《她的声音》（闵奎东导演，2018）等。尤其是在2000年代之后，这些电影不再仅仅讲述受害少女的故事，而是开始讲述那些要求对战争罪行负责并赔偿的女性的故事。这一转变，从某种程度上，突破了“民族”这一框架，展示了“殖民地”经验的现实状况。

## （2）冷战后的“民族”

2004年制作的电影《太极旗飘扬》（姜帝圭导演）从侧面反映了韩国媒体对朝鲜战争观点的变化。当战争爆发后，主人公镇泰选择避难，他了解救被一同征兵的弟弟镇锡，不惜一切代价。镇泰深信只要立下战功就能将弟弟送回家，于是他冒着生命危险投身于战斗中。然而，弟弟镇锡因为国军指挥官的命令而牺牲（实际上他九死一生地保住了生命），此时成为人民军一员的镇泰化为复仇者，而镇锡则在激烈的战斗现场寻找哥哥。

虽然主人公镇泰在国军和北朝鲜军队之间往返，成为了战争的英雄，但其动机并非出于意识形态，而是为了救出弟弟。同样，弟弟也为了寻找哥哥，再次冒着生命危险返回战场。这部影片从家庭的角度出发，将战争描绘成同一民族的悲剧。镇泰在阵营中的反复跳跃并非机会主义的表现，而是为了家庭而不惜一切。然而，痛苦的伤口是无法避免的，成为人民军的镇泰脸上也留下了深深的疤痕<sup>33</sup>。电影构建了以“牺牲者”和家庭为中心的叙事。镇泰奋不顾身拯救弟弟，努力履行作为家长的职责，除了不惜生命的兄弟之情之外，他也是电影中冲突的根源。尽管这部电影强调的是人性之爱和家庭，但人民军和中共军作为非人的存在，仍然不具有“敌人”之外的任何意义。

戏剧性的变化出现在2005年的电影《欢迎来到东莫村》（朴光贤导演）中。由于地处极度深邃的山谷，东莫村成功避开了战争，人民军的残兵和国军的逃兵在此相遇。本应相互对立的他们被和平的东莫村居民同化，不知不觉间达成了共存。东莫村象征着民族共同体，而“敌人”则来自民族之外。当东莫村成为美国空军的轰炸目标后，人民军和国军士兵为保护东莫村而使用对空武器抵抗轰炸，他们在成功守住村庄后牺牲。由普通民众组成的民族共同体因外部势力的威胁而形成了年轻一代奋起保护共同体的格局。

然而，讲述朝鲜战争的电影和电视剧仍然难以摆脱人道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叙事模式。尽管在讲述殖民地经验的电影中有许多试图脱离民族主义的尝试，但多数并未获得成功。如《广播岁月》、《摩登公子》、《奇谈》、《青燕》（尹钟灿导演，2005）、《YMCA棒球队》、《天地男儿之激进党员》等电影试图跳出旧有的抗日叙事模式，以重新描绘殖民地时期的生活，但这些尝试并未得到观众的热烈反响。反而，以抗日斗争为主题的电影如《暗杀》、《密探》、《反抗》等获得了成功。这表

33 之后在讲述朝鲜战争或韩朝关系的电影《朝鲜军队》中，脸上的伤疤就像一种陈词滥调一样固定下来（朴有禧，2019，前书，221-223），象征民族的历史痛苦，同时也是标志着仍然是“敌人”。

明，对于“国史”的关注仍然强烈。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以抗日为主题的叙事已经开始摆脱以往以男性为主的严肃故事，比如《暗杀》和《反抗》等电影都是讲述女性主角的故事，这一变化为历史的再现展现出新的可能性。

## 【讨论·提问答疑】第3场

## 报告人互评·回应与会者提问

主持人：李恩民 樱美林大学

|               |          |
|---------------|----------|
| 发言：袁庆丰        | 中国传媒大学   |
| (按发言顺序排序) 唐小兵 | 华东师范大学   |
| 张晓刚           | 长春师范大学   |
| 三谷博           |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
| 福间良明          | 立命馆大学    |
| 李基勋           | 延世大学     |
| 江沛            | 南开大学     |

[以母语发言。翻译：于宁（日语）、洪龙日（韩语）]



李恩民

下面我们开始第三场关于媒体的报告。在过去的一个小时里，日中韩三国的三位学者给我们做了一个极其精彩的报告。具体分析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到现在各个国家的社会变动及其人民对 20 世纪历史的认识或描述，媒体是如何来解读的，这些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大的启发。同时我们也意识到，比如说关于那个时期的描述，中国叫做抗日战争，日本叫做日中战争，韩国叫做殖民地时期，在影视剧中，对于日本人的描述，我觉得中韩有好多相似的地方，但也有完全不同的地方。下面我们就进入讨论环节。根据我们国史对话的一贯的做法，希望评论或提问的时候，首先对其他国家的报告人做提问。比如说，对日本学者的报告，首先希望中韩两国学者来加以评论或者提问。对中国的学者，希望日韩学者来加以点评。然后对于韩国的学者，希望中日学者加以点评或者提问。如果前面有名牌的各位想要提问的话，请举一下我就知道了。在会场后面的请举手，在网上的各位希望您能够在聊天栏写上您的问题，有时间的话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或选择性地予以提问。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开始。好了，首先我们有请中国传媒大学袁庆丰先生来做提问或者点评。

袁庆丰

我还是想先说中国学者，因为我忍不住要说，因为它很重要。刚才我听南开大学江沛教授的讲演，深受启发和触动。实际上，江教授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我认为大部分学者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有多么严重。他讲的那个研究对象，他讲的那个历史时期，我们作为研究者，其实往往忘了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是处在当下，所以当我们谈抗日战争的时候，那意味着我们是处在当下来回望历史。可事实上呢，很多人就忘了，在历史发展当中的人和事，他们是不知道后面的结果的。比如说，很简单，在抗战爆发以后，包括最高领袖，蒋介石、毛泽东、罗斯福，他也不知道这战争什么时候结束，谁获胜。他们都不知道，那些普通人怎么可能知道？你让他们做怎么样的选择？今天我们说他是坏人，他是伪军，他为占领者服务，那是我们站在今天的角度。可是在当时，谁是占领军，谁是胜利者？谁在我这儿，谁就是胜利者，我就是服从，服从是常态。对不起，我说两句更尖锐的，刚刚我们过去了三年，三年我们刚刚过去，我们都健在，我们都活下来了，告诉我，谁知道会延续三年？对不起，仅限中国大陆。谁知道得三年？不知道。你今天可以说那时候你为什么这样？可在当时，我们都这样。所以，作为研究者，往往就是忽略了这个问题。你要求当年的人怎么样，太可笑了。你要是在当年，也许你比他还积极。

对不起，因为我做电影研究，二十年来，主要致力于 1949 年之前的中国电影历史。而这段历史又和两个国家紧密相关，日本，今天的韩国，当然还有今天的北朝鲜，紧密相关。我补充一个事实来支撑江教授的观点——因为他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我都同意。比方说，我做中国电影历史研究，我告诉大家一个常识，因为很多学者，很多研究历史的人其实没有这个常识。所以诸位要是不知道，诸位无罪，我们有罪。我告诉你个常识，就在全面抗战八年间，中国电影无比繁荣。谁想到？一个简单的例子，抗战八年，前四年，从 1937 年 11 月 12 日上海沦陷开始，到 1941 年年底珍珠港事件爆发，“孤岛时期”电影产量不完全统计，就有 250 多部。沦陷期间四年，又是 250 多部。八年期间，电影产量居然有 500 多部，你们知道从 1905 年中国电影诞生到 1937 年 7 月抗战爆发之前，中国电影产量才有多少吗？1086 部。结论是，就是在抗战最激烈的时候，就是在中国大部分沦陷的时候，中国电影市场一片繁荣。对不起。

我想谈一下韩国学者的报告。上个月，我们学校的一个韩国留学生，他在做博士论文开题，题目就是“韩国电影人在中国”，他总在使用一个词，今天这个词我听见了，他在讲 1949 年之前中国电影和韩国电影。我就问他，因为我是委员，问他，大韩民国是什么时候有的？你怎么可以把 1948 年之前的叫“大韩民国”呢？今天我们都知道，大韩民国、北朝鲜，没问题，都没问题。我们对韩国很好，我们对日本也很好，但是，涉及到 1948 年之前的朝鲜，恐怕不能叫韩国？我跟那个学生说，你这样是不可以的，因为它这是个常识性的问题。

我的发言结束了，感谢组委，敬请批判。

李恩民

谢谢。第二个评论是对李基勋教授报告的一个评论或是补充，请教。那么还有哪一位？好的，唐小兵老师。

唐小兵

我先问一下日本福间教授的报告。因为这里面谈到的一些问题是很有意思的，关于教养的问题，谈到当时这些日本战殁学生当时在日本是非常少数的和小众的一

个群体,是受过良好的教育的。但是,日本民众观看讲述他们人生经历的电影《海神》,普遍地会流下热泪,所以我想请教,在日本这样一个时代,比如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是否存在一个民众对于知识精英的复杂态度。我这些年研究左翼文化在上海,其实涉及到日本左翼文化对中国,比如尤其上海的左翼文化的影响,所以我不知道在日本是否有明显的对精英知识分子的认同,或者说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其实对精英也是非常地认同的,这里面他用的是关于教养的词语,我是很好奇的,就是说,在日本,因为在同时期的中国,可能会有一个伴随中国革命的兴起,其实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反精英主义的社会情绪。那么,在日本其实是不是基本不存在一个所谓伴随左翼的兴起而带来的比如说民粹主义,或者说反精英主义?这是针对福间教授的一个问题。

另外我想针对江沛老师的报告也问一个问题。因为江老师谈到的这套书,我也买过,但没完全读完,但我也很感兴趣。因为江老师这篇论文谈到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在这样一个日本控制的时期,一些中国的普通人,或中国的地方精英,他们跟日本人的合作问题,我们该怎样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理解他们人生的选择。这里面可能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在历史的写作和历史研究中间,要不要一个道德的维度。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中国传统的史学,知人论世,道德史学是非常重要的,对一个人道德的评判和道德的裁断是历史写作最核心的内容。另外一方面,现代的专业主义史学兴起以后,我们更多的追求是一个历史真实或真相的呈现,包括江教授讲到的卜正民(Timothy Brook)教授的那本书《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里面我记得有句话,印象特别深,他说“历史研究并不生产道德知识”,但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研究,对于没有明显的宗教传统的中国儒家文化来说,历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道德感培养的来源。我不知道江老师怎么看待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我们完全要把这样一个中国传统文化,道德判断和历史书写之间的关联切断,走向一种完全专业主义的史学,还是在中间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或者某种中间的道路吗?

我就提这两个问题,谢谢。

李 恩民 谢谢唐老师的问题,一个是对福间教授,一个是对江教授。对于李基勋教授的报告,有人提问吗?对于李基勋教授的报告,希望中方或日方的学者进行提问。

张 晓刚 我是长春师范大学的张晓刚。刚才听了李基勋教授的发言,我想发表一下意见可以吗?我主要研究日本史,虽然一直关注韩国近现代史问题,但不是很深入。李基勋教授是通过电影素材进行学术研究,令人耳目一新。韩国电影我看的不是很多,我的少年时代(1970年代)曾经看过朝鲜电影,其中有一些反映朝鲜人民抗日斗争的影片。为此,我想请教一下李教授的看法。从东亚近代史暨中日韩近代史来看,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发动了甲午战争,逐渐取代清朝的地位,在朝鲜半岛设立了统监府对韩国加以控制。那么大家知道,后来韩国为了取得与中国、日本同等的地位而改朝鲜王朝国号为大韩帝国;但是大韩帝国成立以后日本也始终没有放弃对朝鲜的控制,反而加快了殖民侵略的步伐。从这段历史来看,朝鲜半岛人民一直在坚持反日独立的斗争,比如说,出现了朝鲜的反日义兵运动,后来还发生了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的事件。到1910年,日本就把朝鲜兼并了,史称“日韩合邦”。我在此

说的朝鲜是指整个朝鲜半岛，整个朝鲜半岛都有很激烈的反日斗争活动，它跟上午讲到的中国东北当时的情况还不一样。比方说在我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大连市，当时被称为“关东州”，在日本取代沙皇俄国实施殖民统治时期，大连和旅顺的市区内有组织地进行反抗斗争的事例并不多见，“放火团”也许可以看作是反日斗争的代表性组织。另外，在地处偏远的庄河县，当地人民组建了“大刀队”开展了一些反日斗争活动。反观在朝鲜半岛，据我所知当时反日斗争十分活跃，甚至坚持到 1919 年还发生了“三一运动”。后来日本殖民当局以非常残忍的手段把朝鲜半岛的反日起义镇压下去，反抗斗争活动逐渐减少了。除了镇压，这是不是也与日本在朝鲜半岛实施了殖民教育有较大的关系？就这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韩国学者的看法。因为当时朝鲜和日本合并成一个国家了，后来朝鲜人还参加了日本的太平洋战争。那么，韩国有没有反映这一时期相关历史的电影作品？韩国学者怎么看待这段历史？谢谢。

李 恩民 谢谢在网上参加的长春师范大学的张晓刚教授的提问。有请下一位提问者。

听众 2 首先是对福间老师的提问。您在今天的演讲中主要谈论的是太平洋战争。但对韩国和中国而言，可以说与日本的战争从日清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时期就已经开始了。所以我想向您请教，关于日清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是如何被讲述的。

然后还想向李基勋老师请教关于在韩国独立运动中上海的定位问题。

李 恩民 最后有请三谷先生。

三谷 博 我想向江老师提问。本场探讨的是各国历史中媒体的比较问题，但江老师的报告并未直接涉及媒体。不过作为历史学者，我想知道是在什么契机之下出版了这本包含了重大问题的日记。出版是媒体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本日记是由吉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这一组织进行出版的，这个组织里都有哪些人呢？组织里有日记作者的亲属吗？另外，日记作者是汉族，满族还是朝鲜族？以上是我想要了解的事项。为什么会出版这本日记，是谁出于何种理由出版了这本日记，我认为这些问题关涉到对媒体功能的核心论述。

李 恩民 谢谢。因为时间的关系，提问到此为止。下面请三位报告人回答一下问题。不用一一回答，可以综合起来回答。每人大概 3 分钟，首先请福间先生。

福间良明 首先，我谈一谈关于知识分子与教养的问题。在日本战后初期的讨论中，多是认为在战时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自由主义与左翼思想受到了压制。媒体以及普通民众普遍认为正是因为这样的思想压制才导致了战争的发生。

教养受到压制，与自由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教养受到压制，与战争的爆发不一定有直接的联系，但这两者被关联起来进行解释。知识分子以及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学生们便被定位为可怜的存在，成为被同情的对象。所以，对《听，海神的声音》中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的憧憬也因此变得更加强烈。

有一点，是关于对日清战争（甲午中日战争）的讲述。我认为在电影等流行文

化中 1894 年开始的日清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并未得到太多关注。不过，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以后，尤其是中日战争之后的中国战争，并非没有相关作品，但确实是比较少。我认为日本战争电影的一个特点是很少会出现敌方或当地居民。比如《听，海神的声音》中关于缅甸战役的故事中，几乎没有出现过当地居民。这部电影关注的主要是士兵们的悲情，而其他电影则关注男性之间的羁绊，反而很少突出敌方的存在。日本的战争电影总体上以描绘海战和空战的作品居多，从某个层面来讲这样的作品无需刻画敌方。当然也有各种例外情况，但整体而言，这似乎是一个普遍的倾向。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

李 恩民 谢谢。下面我们请李基勋教授进行回答。因为对江教授的问题是最后一个提出来的，所以给他留点时间。

李 基勋 其实，我没有太多需要解释的内容，但为了回应袁庆丰老师的发言，我想解释一下为什么那个学生会那样写。韩国的官方教育中，“韩国”或“大韩民国”这个称谓是从 1919 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开始使用的。从这种教科书的立场来看，1919 年之后，可以称之为韩中或中韩。尤其是对于没有在大学攻读历史专业的学生来说，这种表达方式可能是他们习惯性的使用。因此，我想这就是他使用这种表达的原因。

虽然关于日本统治时期的反抗题材电影有一些，但由于这是一个难以处理的题材，所以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多。如果要讲述对帝国主义的反抗，就必须涉及亲日合作的问题，这样故事才显得完整。但要将亲日合作形象化是非常困难的。此外，如果涉及反抗，就必须涉及社会主义，但在韩国，社会主义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所以要将其拍成电影并不容易。因此，需要找到一些可以避免这些敏感问题的方法，然后拍成电影。有几部这样的电影作品，其中代表作就是《东柱》。

在我的报告中，由于时间关系，我没有提到的最后一部电影是《东柱》。这是一部讲述韩国抗日诗人尹东柱如何创作抗日作品并投身运动，最终牺牲的电影。整部电影为黑白电影，我个人非常喜欢这部电影。

李 恩民 不是提问，是评论。最后请江教授进行回应。

江 沛 感谢各位老师对我的报告的批评和回应。我首先回答三谷老师的提问。严格来说，我报告的主题不属于媒体类的，把我的报告归在这儿，是会议的安排。这个日记是吉林省档案馆馆藏的，大概在 1950 年代的时候作为资料被移交给档案馆，如果不在档案馆可能就被毁掉了。2011 年左右，吉林省档案馆和吉林政协文史委合作把它出版，但是内部出版，不是正式出版社的，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因为给一个伪军正式出版日记，在中国有些不太适宜。是内部出版印刷，大家可以用。这个主人公是汉族。

唐老师提出的问题是很大的问题，我们怎么去理解沦陷区民众的道德评判。因为我的问题其实更多的是基于中国的历史认识的一个情况。其实中国的历史学从古开始，它实际上就是承载着一个宗教、哲学和政治的责任。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所以历史的评判变成一个政治合法性的非常重要的根基。同时也是社

会道德建设的重要依据。因此在中国的历史学里面,这种道德评判往往是很丰富的,但是它基本上是符合上层或政治精英的理念来进行评判的。过去中国的历史学,我们不是说是要进行价值判断,它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资政。所以梁启超说,中国的二十五史,基本上就是帝王的家谱,就是为帝王服务的。20 世纪以后,大众文化的兴起,民众价值的提升,如何定位历史中民众的价值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梁启超提倡新史学,也是顺应时代的潮流。但是新史学提倡以后,我们后来发现,在中国一直没有得到一个很充分的贯彻。我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今天我们的历史判断,没办法避免民族国家立场,大概任何一个国家你都很难避免这个立场,也很难避免资政这样一个要求。但是与此同时,我想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我们同时在坚持民族国家立场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有一个人性的立场,或者叫民众的立场,这样的话,我们才有可能对历史进行更加深入地分析,能够真正地去把历史关注到广大的民众,这样的话,我们的历史才能更加丰富。

这是我的一点想法,谢谢。

李恩民 谢谢三位教授的回应。虽然没有按我们原定计划准时结束,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房间里越来越热起来了,我们的讨论其实也越来越热起来了。如果再给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也绝对不会冷场的。但是我们还有下一个预定,所以我们的小组讨论就此结束。

第4场  
研究

报告 7 (日本)



# “我”的历史，“我们”的历史

## ——以色川大吉的“本人史”论为线索

### 安冈健一

大阪大学

[原文为日语。翻译：丁乙（京都大学）]

## 序言

20 世纪的战争、殖民统治与和解是以何种方式被阐述的？对于已有大量研究积累的这个问题的，我将有意识地承接前次论坛中的“历史大众化”问题作进一步探讨。

在本次大会的宗旨中也已阐述，从专家的角度来看，对于 20 世纪东亚历史发展的主要路线并无认识层面的较大争议。但尽管如此，在东亚，对于历史的认识依旧是一个课题。对此，国家的存在发挥了巨大影响力，对于国家而言，何种历史认识能成为可能是个有探讨余地的问题，而这不仅仅关乎各个国家的历史学的形态，也与其中生存着的每一位市民所养育出的历史意识相关联。

这也是为什么历史学家非常关注市民的历史认知，特别是对社会的历史认识有很大影响的学校历史教育。然而，是否有一些问题被忽略了？虽然我对于“对对方‘历史认识’的认识”还不够充分这一宗旨的问题提起非常赞同，但是对于在自己的社会中共存的市民的“‘历史认识’的认识”，我认为还有极大的探索的余地。

本文中，我也会参考自身经验，从重视市民书写自身历史的意义的立场，选取现代日本市民的历史意识的一部分进行论述。这里所谓的“历史”这一词汇会从其广义范围进行解释，将关注传统含义中的历史研究的“外部”。在展开论述前，我想先通过将 1990 年代以后对“经验”这一领域关注度上升的过程视作关联现今的历史研究的转折点，来限定我的探讨范围。

## 1. 关于 20 世纪战争、殖民统治与和解

20 世纪末，冷战的终结所带来的变动波及各方各面。在日本，自民党的长期政权落下了帷幕，首相对于殖民统治的道歉声明等，预告了对战争与殖民统治的历史的态度的改变。在战后 50 年，此前许多无法得以阐述的个人的战争经验也被重

新讲述。

在1990年代的日本，关于战争责任问题，哲学家、文学家等参加并进行了积极的讨论<sup>1</sup>。从韩国社会得到的作为日本军慰安妇制度的牺牲者的当事人的证言具有极为强大的冲击力，由此为契机开展了对于证言和资料的发掘活动，有良知的历史学家与活动家们阐明了战时系统性的性暴力的存在。这样的情况也与大众媒体共振，我们可以确认当时的电视与前后的时代相比，给予了战时的加害问题更多的关注<sup>2</sup>。

时代的变化是与历史研究的状态整体联动的。在当时，对战后历史学的转换期研究产生巨大影响力的研究之一是由西川长夫提出的国民国家(批判)论<sup>3</sup>。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对于西川的论述都存有批判，而在更为具体的、细致的研究得以进展后，进一步带来了与此前不同形态的批判研究，并树立了新论点，可谓是研究的重要成果。

此外，对于国民国家批判的高涨也带来了另一契机，即对于此前处于国民外侧的人们的关心也得以高涨，对其历史的探求取得进展。实际上，在日本的朝鲜人、琉球·冲绳史、阿伊努族史的研究的进展，或与其并行的“帝国的历史”、“殖民地的历史”的讨论的盛行，都给相关研究领域的样貌带来剧变<sup>4</sup>。

关于殖民地研究的进展，也给历史教科书中的记叙方式带来变化。日本军慰安妇制度的处理方式等诸多典型问题向来是受人关注的论点，但此外的各方面也经历着变化，却往往被忽视了。研究者、学生们跨越国界相互往来，通过学习、交流使得先前在国民国家的框架下被探讨的情况产生巨大变化。专家之间的意见不合的情况也显著减少，这也是这一期间的的重大成果。

但是，社会本身的变化，也会导致历史学此前重视的学问与社会的关系的质的变化问题。毫无疑问，从个别问题来说，通过自身的历史研究，对于战争牺牲的和解问题作出研究贡献的例子也存在。比如，就战时中的强制劳动问题，西松建设(旧西松组)与中国人劳动者以及遗族之间的和解问题<sup>5</sup>。与处于劳动现场、作为当今的管理者的中国电力也有交流，由和解问题孕育出的历史的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然而，从整体看来，在愈发繁忙、体制化的大学中进行的学问与不断流动变化的社会之间的良好关系究竟是什么，依旧是现今不断在摸索中的课题。

作为对这种情况的反应，与其说催生出了新的统合性的研究方法，不如认为是回到了作为实实在在可以共享的，诸如东日本大地震和新冠病毒的流行这样的“事件”和“经验”。“经验”在历史研究中逐渐占据了主要地位，其背景是日本战败后经历了很长时间，有直接经验的一代人也经历代际交替，导致人们重新审视“我们为什么要继承战争的经验”这个以前不言自明的问题<sup>6</sup>。关于战争与殖民统治的研究也无法再像以前那样进行。

尽管对“经验”的关注日益高涨，但对于非专家而是个人自身的“经验”的记录行为，尤其是对于自身的历史进行书写的行为，目前所得到的学术关注，在历

1 小森阳一、高桥哲哉：《超越国家史》，东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2 米仓律《八月新闻与战后日本》，花传社，2021年。

3 西川有诸多著作，如《国民国家论的射程》，柏书房，1998年。

4 关于殖民地研究的成果，可参见日本殖民地研究会：《日本殖民地研究的现状与课题》，雅典社，2008年；同研究会：《日本殖民地研究的论点》，岩波书店，2018年。

5 内田雅敏：《元徴用工 通往和解的道路》，筑摩书房，2020年。

6 兰信三、小仓康嗣、今野日出晴：《为何要继承战争经验》，Mizuki书林，2021年。

史学的文脉中绝非处于突出地位。

从国际范围来看，与对于记忆问题的学术关注度的高涨相辅相成，人们对自传的关注也水涨船高。口述历史（oral history）的代表研究者，保罗·汤普森从叙述（Narrative）这一点与口述历史的相通性对自传研究的经过发展进行了简要总结<sup>7</sup>。

汤普森指出，1990年代以后，对于自传、信件或日记等个人的书写记录（Life-writing）的学术关注度不断增强。1999年，在中国北京大学的文学研究者赵白生（Zhao Baisheng）的倡议下，成立了International Autobiography Association。Life Writing是一个包含自传的极其广泛的类别，近来，牛津大学出版社也出版了由七卷组成的通史性质的研究成果。其最近的一卷涵盖了1945-2020年期间<sup>8</sup>。

当然，在日本也存在很多关于在过去书写的自传或笔记的历史研究。近年来，对于个人存留的记录，出现了以“自传体文献（ego document）”的称呼进行把握的研究趋势<sup>9</sup>。尽管如此，我还是要重申，目前在进行中的不断产生的个人层面的历史叙事与历史学之间的关系是极其薄弱的。然而，我认为这为包括战争和殖民统治的历史的相互理解留下了重要的参考线索，在下文中，我将讨论市民表达其“经验”的事例。

## 2. 历史的现场

我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其与“历史大众化”相关联。谨慎起见，首先需要确认的是，无论历史学本身在世间的关注度是如何低调的，这似乎并不意味着对历史学家的专业知识没有需求。专业的历史学家（如矶田道史、吴座勇一，以及吉田裕）所书写的书籍以数十万册的数量被广泛阅读。这在日本的阅读市场上来说是巨大的。正如上次论坛所指出的，与担负着地方史研究的“准专家”的交流，虽也直面着老龄化的挑战，但仍旧得以维持。

然而，我想关注的是一个在迄今为止的历史学与人之间的关联的延长线上并不存在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现状是历史学与人们的活动是相背离的，而研究与广义上的、与传统的关注点不同的历史关注没有连结。我想把这种新的关注出现的场所称为“历史学的‘现场’”。

在思考大众化的时候，考虑到在各种内容产业中出现的历史的商品化以及它的消费的侧面是很重要的。然而，我想在这里讨论的是基于市民在生存中所感受到的迫切的必要性、对于广义上的“历史”的关注，以及表达这种关注的作品。

我首先想举的例子是“对抗病魔记录文库”。近年来，在全国各地的图书馆都设立了一个收集对抗病魔记录的区域。所谓对抗病魔记录，指的是记录如何与疾病斗争、回顾斗争经历的作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当事人的历史。为什么我们

7 Thompson, Paul, Joanna Bornat(2017) "The Voice of the Past: Oral History" 4th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8 Hayes, Patrick ed.(2022) "The Oxford History of Life-Writing: Volume 7: Postwar to Contemporary, 1945-202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9 长谷川贵彦《自我记录的历史学》，岩波书店，2020年。

需要这样的作品？当谈到关于疾病的标准知识时，最为重要的是由学会以及专家监修的“科学性的”知识。然而，仅仅如此是不足以让人们信服的。在接受某种治疗的时候，会发生什么虽然可以通过概率给予说明，但这对病人本身的“意义”是无法标准化的。具有不同的情况的个人在对事件解释时，需要接触和学习其他的个体经验的情况并不少见。

其次，一些自治体在积极支持回忆活动，因为他们认为追忆过往具有健康层面上的预防老年痴呆症的效果。在日本中部地区的爱知县的北名古屋市，“昭和日常生活博物馆”通过收集与20世纪普通百姓的生活密切关联的物品，并将其提供给当地聚会，来支持回忆计划。老年人们以所收集的过去的物品为线索，进行谈论和倾听。据说这样的活动可以激发人们参加社区活动的意愿。

最后，鉴于孤独和孤立已然成为社会问题，在关西的京都市，作为对抗老年人的孤独和孤立的对策，为老年人们提供机会在当地聚会上谈论他们的历史的公民活动受到了行政部门的高度评价。

参与以上这些企划的人并不尽是专业学习过历史的人。他们只是从支撑人们的专业角度，关注和利用人们接触其他个体的历史，并从而表达自己的历史的“功效”。这种新兴的、个人化的历史意识的实际需求与历史学之间的距离，处于一种不折不扣的断裂状态。

历史学如何能与这种新的需求相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考虑战争与殖民主义的问题？对此，我想参考1985年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人类教育会议（ユネスコ国際性人教育会議）上通过的《学习权利宣言》。

在宣言的开始部分，对学习权做了如下规定。

学习权指的是阅读与书写的权利，是持续提问与深入思考的权利，是想象与创造的权利，是阅读自身的世界与谱写历史的权利，是获得所有教育手段的权利，是发展个人与集体能力的权利。（由国家教育研究所翻译）

它被认为是每个人作为学习者的权利，可以阅读自身的世界，谱写历史。居住在关东地区的神奈川县川崎市的一位在日韩国女性在当地学习认字班习得文字后写下的醒目话语，成为一本关于他们如何拼写、谱写的书名。——“我也是这个时代的一部分”（Watashi mo jidai no ichibu desu）<sup>10</sup>。

在这个日本民族中的少数群体集中居住的地区，仇恨言论的恶果层出不穷，因而催生了全国首个规则条例的制定。这样一份写于连生存都会受到威胁的地区的声明，难道不是在叩问我们人们的权利与历史意识之间的联系吗？

### 3. 色川大吉与本人史

谈及谱写历史的权利，如何考虑其书写者是个重要问题。直到目前为止并非没有人指出这个问题。历史学家色川大吉（1925-2021）在1970年代创造了“本人史”这个术语。此后，“本人史”一词被众人所接受。为什么它激发了许多人的参与

10 康润伊、铃木宏子、丹野清人：《我也是这个时代的一部分》，日本评论社，2019年。

意愿？色川的论点在今天依旧具有值得探讨的重要的意义。首先，我想追溯色川的历史学的脚步，思考他的历史研究的发展，并进一步考虑历史的书写者。

色川大吉的以《明治精神史》为首的作为历史学家的工作，现今依旧是日本研究的经典作品，具有重要地位。被称为大众史的历史观，在与社会的对话中不断成型。尤其是1960年的安保条约斗争是一个重要的催化剂。当时在韩国已经发生了学生革命，而日本则因为美日安保条约的修订发生了最大规模的群众抗议活动。在中国，以群众动员的方式抗议美日安保条约的修订，也塑造了这一事件的历史意义。作为一名历史学家，色川参与了这一系列的运动，并完善、推敲了他自己对过去的看法。他表示，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能够重新思考由先锋派的领导和群众（以及他们的行动）的框架，而这在此前是不言自明的存在<sup>11</sup>。

基于这一信念，他继续在东京八王子地区进行田野调查，发现了民众自身构思了宪法的事实，1968年在同一地区发现的五日市宪法草案是居住在日本的地方社会的民众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如何构思民主主义，以及如何展望下一个社会的代表性事例。

色川是在与学生和市民共同进行田野调查时遇到了这些罕见的资料。当然，历史学家在田野调查中所遇到的的不仅限于材料。在他所遇见的众人中，包含了与桥本义夫（1902-1985）的相遇。

桥本出生于战前，尤其热爱书籍与历史，在经营书店的同时，也有志于地方文化活动。虽然受到大正民主主义的影响，但他对于战争时期挥舞战时合作旗帜一事，在战后通过《战争责任自述》的完成，列数了自己的罪状，是一位能与内心深处的自我进行对话的人物<sup>12</sup>。

桥本义夫开展了在当地竖立与历史有关的纪念碑等活动，并自1950年代以来，推动当地的人们写下他们的经历或日常感受。随着参与者的增加，在1960年代后半叶，终于完成了一本册子。色川目睹了桥本的实践，写下了《现代的常人：桥本义夫论》<sup>13</sup>。

此后，在1970年，他尝试以所处的时代中的个人视角进行捕捉，以本人史这个用语命名了《一份昭和史：关于〈本人史〉的尝试》。为了响应桥本的号召，作为历史学家自身也书写关于自己生活在历史中的经验，也呼吁邀请其他人进行尝试。这本著作荣获了当年的每日出版文化奖，获得了广泛的读者群体。在今天，本人史一词已经普遍化，而其是由一位个性鲜明的历史学家色川大吉发明的。他并不是作为“代表”或“指导”人们的专家，而是作为一位市民进行与时代的对话实践，在这一点上是与他的安保经验相重合的。

色川的出发点是提出如下主张，即作为经历过昭和时代的战前时期的一代人，应重新考虑自身与实施战争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此后，本人史的聚集遍布了包括冲绳和北海道的全国各地，以本人史为对象的自费出版也受到当地出版社的支持而得以普及推广。色川自身也积极参与各地方的活动，讨论本人史问题。

此后，自1980年代后，甚至出现了能被称为本人史的产业，其范围广阔，组

11 可见色川大吉：《本人史：其理念与尝试》，讲谈社，1992年所收《六月下了绵延的雨》。

12 桥本钢二编、桥本义夫：《在暴风雨中》，私家版，1996年。

13 色川大吉：《一份昭和史》，中央公论社，1975年所收。

织展开了形形色色的研讨会。而到了2010年代后，重要报社开始出售用于制作本人史的时间顺序表，记者们也通过采访开始开展本人史书写等项目<sup>14</sup>。在求职和学校教育中，本人史这一词汇的使用也在增加。

## 4. 本人史与地区史

我意识到，“本人史”的书写这一点实践，归根到底说来是一种探索，去解明与地区、与他人的联系，并且因为这一种个人与地区与国家的历史的关联，它也显示出与历史学有交叉的一面。

作为例子，我想关注与我自身有深刻关联的长野县南部的下伊那地区的历史。尤其是，我将从民俗学家后藤综一郎（1933-2003）的实践出发，即他从1970年代起有意识地将本人史的问题与寻找地方史连结起来，由此联系到明确了满洲移民史的市民活动。

后藤综一郎在明治大学时参与了学生运动，在安保条约斗争后，走上了研究者的道路。他推动了柳田国男（1875-1962）的研究，并试图将民俗学作为一门与地区对话的学科重新思考。

后藤在自己的故乡长野县南部的远山地区与住民们合作，编纂地方史。后藤发挥了其家乡特有的人际脉络，与当地住民们共同编纂了地方史。它可以被看作是村子的本人史。

后藤与当地住民的合作并没有随着历史书的出版而结束，为了使被记录下的村子的历史能成为住民自身的历史，为了能继续学习村子历史，他成立了远山常民（toyamajomin）大学<sup>15</sup>。后藤所提倡的常民大学运动引起了广泛的共鸣，此后，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多种联系，后藤与全国各地的人们积极进行接触交流。常民大学的实践活动传播扩大到邻近的地方城市，促成了一个名为饭田历史大学的学习组织的形成。后藤在那里进行演讲，他反复强调将地方历史与自身的历史相连结的重要性。

在这里，目标所指向的作为自我理解的地方史与解明自身历史的动向相关联，这其中包括了负面的历史。在饭田历史大学的讲座中，一位在战前曾作为开拓团到过中国的听讲生作了证词，其他与会者都认真倾听。由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得到探讨的从本地区输送出的众多的满洲移民的历史得以阐明。自1980年代至90年代，当地住民开始挖掘自己地区的满洲移民的历史，并以此为基础，2000年代以后关于战争历史的采访活动开始走上正轨。

这种动向与饭田市历史研究所这一自治体单位的历史研究专门机构的创建相联动<sup>16</sup>。饭田市有10万人口，为了编纂地方史，聘请了在研究生院深造过的研究人员作为有聘期的研究者，推进地方史研究。这个历史研究机构与市民的采访活动共同迈进，记录了许多人的证词言论。

在市民组成的叙说满蒙开拓的研究会中，有一些是在大规模自杀中幸存下来并

14 可见小林多寿子：《被叙述的〈人生〉》，学阳书房，1997年；释七月子《叙说〈本人史〉》，晃洋书房，2020年。

15 地域文化研究会：《扎根地区的民众文化的创造》，藤原书店，2016年。

16 关于饭田市历史研究所，参见饭田市历史研究所网页。<https://www.city.iida.lg.jp/soshiki/39/>

返回家园的人。对参与其中的人来说，谈论悲痛的历史绝非易事。随着时间的逐渐推移，信任感逐渐培养起来，该地区成为一个可以讲述历史的地方。

战后的中日友好运动在该地区也很活跃。从各个方面的相关者处积累到的大量信息材料得以统合起来，其中包括了作为留守中国的日本人的父亲，和作为支持者在全国范围内宣传这一问题的僧侣，他们推动了2010年代的满蒙开拓和平纪念馆的建立<sup>17</sup>。纪念馆中有中日再不开战的纪念碑，是一个蕴含和传承了当地住民的各种记忆和经验的设施场馆。

下伊那地区的实际例子表明了，在书写一个地区的历史时，如何使其成为参与者自己的事，当地的住民自身的学习、调查和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 结语

我于2013年至2015年在饭田市历史研究所担任研究员。在那里，我负责运行一个当地住民参加的研讨会，并由此得以设立一个书写本人史的场所，这也是我长期以来的关注点所在<sup>18</sup>。

我想举一位有中国血统的女性所写的本人史为例<sup>19</sup>。为书写本人史而参与研讨会的相泽莉依女士的母亲是留守中国的妇女。相泽女士出生于战后的中国，在当地长大，并得到了大学职员的工作，但至1990年代，她决定追寻她母亲的根而来到日本。她随后搬来了日本，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日语。

她所写的本人史《幸——被幸运与幸福所包围的平凡人生》（2016年）追溯了她的半生，记录了一位女人如何跨越日本与中国的生活的经历。无论这个地区的历史研究如何兴盛，如果没有她自己的写作，这本一半是中国历史、一半是日本历史的书籍就不会诞生。即使进行了采访，若非听众同时熟悉这两方的历史也无法理解其经验的完整情况。能够全面追踪这一独特途径的首当其冲的是当事人相泽女士本人。这本书在2021年获得了“女性文化奖”，这具有象征意义，说明了地方的历史文化能通过由不同经历根源的当事人的描绘而得以丰富的可能性<sup>20</sup>。

共同参与研讨会的人们也遇到了相泽女士，一位中国归国人员，再次成为一个可见的存在。相泽女士的例子表明，如果我们作为承载历史的主体，相互交谈的空间如果能以公开的方式构建，我们实际上可以构建的是一个适合当今跨越诸多边界的全球化市民的历史意识。在某个地区共同生活的“我们”之中，流淌着并汇合着众多的历史支流。通过“我”的历史的书写，经由分享，得以产生“我们”。

全球史的问题提起对我们做出了以下要求，即要求我们对民族国家框架的固定化、并对其中被同质化的想象力进行批判性的重新审视<sup>21</sup>。具体的线索在何处？我们所探求的并不仅仅是与对历史学迄今为止所积累的过去本身，还可以参与创造一

17 参见满蒙开拓和平纪念馆（阿智村）网页。<https://www.manmoukinenkan.com/>

18 作为研讨会记录，参见安冈健一：《从〈个体〉的历史看地区：从〈本人史〉重新审视》，《饭田市历史研究所年报》，16号，2019年。

19 安冈健一：《从本人史看满洲记忆与地区史研究的可能性》，佐藤量、菅野智博、汤川真树江：《战后日本的满洲记忆》，东方书店（售卖）2020年4月。

20 《女性文化奖获得者 在饭田的第二代遗留中国日本人相泽女士 关于和平的所思 由日语的书写》，《信浓每日新闻》，2021年10月19日。

21 Sebastian Conrad（小田原琳翻译）：《全球史：为了批判性的历史叙述》，岩波书店，2021年。

“历史‘领域’”，它伴随着一种将战争与殖民统治的历史与每个人的人生相联结从而了解自己的愿望。

我认为，除了目前为止的历史学已有的作用，即充当指摘问题的检察官和作出判决的法官的作用之外，其还应该发挥新作用，如律师般能支持实现人们的权利的作用。我认为，这种角色如果成为可能，那我们能够与其他专业人员、抑或许多非专业人员合作，培养下一代的、更为广泛的历史研究的承担者。

我们可以设想多种可能的“现场”的形式，诸如来自不同国家的年轻人们与历史学家一起工作，书写包括家族史的本人史的研讨会等。如此，如果对于谱写每个人的历史的权利得以实现，从历史学的分期来说，尤其是对与现今相连接的现代史所承担的功能得以添加的话，这不将会促进跨越国界的对话，进一步提高目前已有的历史学对市民的贡献吗？若我们都能直面所处社会的“此时此地”的历史意识的性质，那无疑会有助于丰富我们未来的对话可能性。

第4场  
研究

报告 8 (韩国)



# 在“发展”之外， 书写新的历史的可能性： 韩国殖民地时期经济史研究的方向

梁知惠

东北亚历史财团

[原文为韩语。翻译：金丹实（翻译工作者）]

## 1. 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一日

大家好。我叫梁知惠。承蒙邀请参会，十分感念。我觉得这里不是来宣读新论“文”的地方，大家共聚一堂是为了生产新的“历史叙事话语”，所以我这篇报告使用了口语进行写作，而非书面语。

“20 世纪的战争·殖民统治与和解的历史叙述”，面对这个沉甸甸的主题，我首先想提出 2011.3.11 这七个数字。这是东日本大地震发生的日子。我想对于在座的各位来说，这个日子可能是铭刻在记忆里的特殊的一天。对我来说也是如此。所以，如果说可以给学者赋予某种代际特征的话，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一日以后的一代学者。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十几年来，我和韩国的同代学者在这场悲剧面前分享了怎样一些思考。

## 2. “三·一一”与人类世，以及韩国近代经济史研究

在东亚各国，2021 年曾是怎样一个年份呢，我有些好奇。这一年时值“三·一一”十周年，但是事件本身在韩国的知识场域几乎完全被淡忘。据韩国最大的科研搜索引擎 Riss.kr 统计，该年在韩国问世的有关东日本大地震的学术论文竟不到五篇。与此相反，对生态环境 (ecological environment) 的关切，以“人类世 (Anthropocene)”这个新词为中心，开始迅速扩散。2020 年新冠疫情在全球大流行，成了这个概念浮出的契机，它在韩国社会已然是媒体、出版、学术等所有知识场域中最具影响力的关键词之一。而这些年韩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面对“经济”与“发展”这对公分母，还算做到了与这忘却与热炒的浪潮起伏保持了一定距离。我试着围绕几个基点，粗略划分一下其演进脉络。

首先是一九九零年代以前，“殖民地掠夺论”和“殖民地近代化论”分庭抗礼<sup>1</sup>。解放后提出的“掠夺论”，强调要摆脱殖民史学<sup>2</sup>，早期研究将重点放在了日本帝国主义动用强权掠夺土地和粮食。这一派论者认为日帝是“强取豪夺”，而这种“原始掠夺论”到了后来随着研究逐渐深入，转而变成“结构性掠夺论”。这种主张认为：日本的确是通过资本主义化推动了开发，但开发的目的在于掠夺朝鲜半岛的土地、大米、地下资源、劳动力等。与此同时，自从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主要以经济学家为中心，学界出现了强调殖民统治下实现经济增长这一正面效应的视角。这就是被冠以“殖民地近代化论”的观点。持此论者认为：日本通过铁道、港口等社会间接设施建设促进了经济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朝鲜人资本家和工人也都实现了各自的发展；而到后来，这些设施和人力资源 (man power) 成为殖民地遗产，对解放后的韩国实现高速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

“掠夺论”和“近代化论”的这种二元对立结构，随着二〇〇〇年以后“殖民地近代性理论”的登场迎来了新局面。近代性论将锋芒主要指向此前的讨论将“近代”视为“善”的问题。此后，涌现出跳脱“近代主义”的单向度发展至上主义和民族中心宏观叙事的种种多样化研究成果<sup>3</sup>。在这个过程中，尤其在经济史研究中，出现一些超越“抵抗”和“合作”间非此即彼式对立的角度来考察上水道、电力等社会间接资本开发领域中跨民族合作的个案研究，引起注目<sup>4</sup>。

### 3. 越过发展逻辑：生态-经济史路径

试图记住东日本大地震这一分岔口后某种“觉醒”的行动，在此基础上用新的视角审视“发展”与“增长”的多种尝试，也在这一脉络的隙缝初露端倪。这些学者的研究，被一方斥为“掠夺论”改头换面登场，同时被另一方指为后现代主义以来的“碎片化”流弊；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对这类研究的具体样貌进行系统梳理。而且中国和日本的学界（包括西方的亚洲研究 Asian studies）在公害史或环境史研究领域已经达到了相当水准，相比之下韩国的情况是环境史视角和路径依然没能获得充分的学术发言权。因此，我准备向各位介绍近年在韩国面世的论文中对发展与增长持批判立场的、将生态与经济挂钩的历史研究 (ecology-economy history) 呈现的特征及相关案例，从最基础的部分入手开启讨论（幻灯片 1）。

众所周知，关于经济发展的研究起源于帝国主义时代的“殖民地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近代化理论”的出台成为契机，使其演变成全球范围的围绕经济增长的讨论。但是历经 1960 ~ 70 年代的过程中，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冲突成为重要

1 解放后韩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历史学总结参考如下：郑泰宪，《韩国的殖民地现代反思》，先仁，2007年；李承一等，《日本的殖民地统治与殖民地现代性》，东北亚历史财团，2009年；朴灿升，《21世纪韩国历史学的进程》，汉阳大学出版社，2019年；特别是对于在殖民地统治下展开的以重工业化为中心的经济发展规划，即“朝鲜工业化”的最新研究总结参考如下：柳相允，《韩国近现代经济史研究所呈现的历史图景》，《经济史学》，2013年55期；裴镇禹，《日帝强占时期工业史研究的争点与课题》，《历史与世界》，2015年48期；裴成俊，《韩国近代工业史1876-1945》，蔚蓝历史，2022年。

2 译注①：为将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的侵略及殖民统治正当化，而强调朝鲜历史的非自主性与落后性的历史观被称作“殖民史观”，基于此史观的研究成果即被称为“殖民史学”。

3 关于殖民地近代性理论的意义和局限性，请参考《(对谈)殖民地近代性理论的历史与现在》，《历史批判》136期，2021年。

4 参考了收录于尹海东编著《殖民地的公共性：实体与隐喻之间的距离》的研究成果。与书同行，2013年出版。

| 区分     | 传统的经济史             | 生态-经济史                |
|--------|--------------------|-----------------------|
| 对开发的定义 | 源于竞争欲望的、自然生成的概念    | 出于统治需要制造的历史性概念        |
| 分析的对象  | 以专家(官僚·企业·知识阶层)为中心 | 包括利害相关方(社区居民·劳动者等) 在内 |
| 人的概念   | 孤立的个人              | 多重规模的关系网中的个人          |
| 研究的方向  | 自上而下               | 自下而上                  |
| 研究方法   | 货币化指标·数量分析         | 物理的·生物学的指标，去指标·定性分析   |
|        | 以经济学为中心            | 跨学科                   |
| 追求     | 效率与增长·分配·福利的最优化    | 可持续性·与满足需要            |
| 评价     | 分析投入产出比            | 多维度的评估价值              |
| 理念     | 注重增长，功利主义，功能主义     | 注重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          |
| 论点     | 经济增长路径             | 经济增长的多面性              |

※ 出处：Arturo Escobar, *Encountering Developm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Robert Potter et al., *Geographies of Development*, Prentice Hall, 1999.; 吉尔伯尔·李斯特, 申海京译, 《以为发展能永恒持续的幻想》, 春日之书, 2013.; 金炳权, 《考虑气候的经济学》, 良善书店, 2023.

幻灯片 1 传统的经济史与生态经济史的比较

讨论议题；到了 1990 年代以后，全球规模的能源·气候·环境·金融危机使得脱离经济增长一边倒的单向路径，对此进行反思的生态 - 经济学的方法论逐渐扩大影响。我在这篇发言中介绍的几个历史研究案例，从学问上讲可以说受到这一潮流的影响。也就是说，这些研究摆脱了传统经济史默认“开发”为人人趋之若鹜的本质诉求这一套路，将“开发”还原为具历史意味的构成因素。人类的本性中除了追求发展的欲望，还有包括协同、互动性等在内的诸多要素；重视经济增长的“开发”概念滥觞于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和冷战时期的体制竞争，是为统治的需要炮制出来的。这就是这些学者的主张。

从这一观点出发，逐渐将分析对象从传统的精英阶层扩大到社区民众、工人这样的“开发”利益相关方。关于人的概念也同样，如果说传统的经济史将人定义为计算利害关系的孤立的个人，那么在批判性研究脉络中，人被定义为处于世界、国家、区域、社区、家庭等多重规模的细密关系网之中而被关系规定的存在。

分析方法也是同样。传统经济史设定了 GDP·GNP 这类货币指标，重视以此推算的数量分析，而上述批判性视角则在排列优先顺序时把无法换算成货币指标的物理的和生物学意义上的指标、指标中心的路径以外的质量因素放在最上位。通过这一点，不同于着力发现高效经济增长模式的传统研究，另辟蹊径的这类研究寻求的是各开发现场固有的政治、历史、文化、社会、空间、生态特点的总和，将重点放在了分析其独特性。换言之，关注经济增长成果的同时，也要揭示在增长过程中转嫁给特定空间·阶层·环境的不平等和损害，通过它反思经济增长中心的发展思路，并创造能取代它的新模式，是这些人的认识。

## 4. 殖民地朝鲜的“生态-经济史”：几个案例

下面，我想跟大家分享立足这样的观点，从生态 - 经济史路径分析日本殖民统治下朝鲜开发的若干个案。

## (1) 开发与“无知”导致的悲剧

下面的照片（幻灯片 2）收录在 2023 年发表的姜正元的论文中<sup>5</sup>，我们可以看到民众误以为王子造纸厂的废水和温泉一样是“包治百病的水”而涌到废水排出的下水道口的情形。废水中含有为了溶解原木投放的硫磺、氢氧化钠及其他有毒物质。然而当蒸过木材的废水像沸腾的“温泉”那样排放出来后，不知其有毒有害的民众还是把它误认作治病神水。据这篇论文，王子造纸厂早在从 1911 年起便在日本本土多次遭渔民抗议，向居民支付慰问金或者被送上法庭。但是在朝鲜，只“因为这是朝鲜”而认为他们不用“费大劲儿”不顾“麻烦”对废液进行处理。殖民地民众对公害<sup>6</sup>的无知，在无知状态下将污染水从头到脚浇自己身上的这一悲剧场面，让我们再次深思当年的“开发”对殖民地民众究竟意味着什么。此外，企业明知废水的危险性和有害性，却以殖民地“没有管制规定”为由，通过肆意排放污染水谋取经济利益，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殖民地经济结构十分极端的断面。



幻灯片 2

## (2) 开发与灾难

另一方面，由对开发的浪漫构想所导致的悲剧的案例也获得了研究关注。我本人关于日本统治时期朝鲜大型水坝开发和在北部山林地带营建开拓村的个案研究便属此列。

首先，我们来看看电力开发项目案例<sup>7</sup>。正如幻灯片 3 中的漫评所描写<sup>8</sup>，在殖民统治时期，日本企业在朝鲜北部即现在的北朝鲜<sup>9</sup>地区，使用了叫做“流域变更式

5 姜正元，《日本统治时期纸浆造纸产业的扩张与“开发的灾难”——以王子造纸为中心》，《海港城市文化交涉学》28期，2023年。

6 译注②：具有现在的意思的“公害”一词被广泛使用是在战后，本报告论文中此处根据原文表述，将「공해」译作“公害”（下同）。

7 梁知惠，《日本统治下大型水坝建设和“开发带来的灾难”：以日本窒素（氮肥公司）赴战江水力发电站建设案例为中心》，《韩国文化》89期，2020年。

8 译注③：“⑤原文（摘录）”的中文为译者根据原图中的日文翻译而来。

9 译注④：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 幻灯片 3

技术”的最新工法，接二连三建造大型水库。被称为“朝鲜工业化”的重工业化的动力就在此基础上形成。此前的同类研究关注的是电力和重工业化发展这一“生产力增长指标”。但是本研究注意到，自从大坝建成以后，当地环境发生了剧烈变动；在这个过程中，马马虎虎建造的堤坝坍塌掉、春季频繁发生饥荒、夏季不断发生洪灾。当时，日本本土的情形是，在企业开发水力电力之际，政府强行征收水利权使用费，同时推进河川整建项目；但是在朝鲜，却免征企业的这些费用。与前面提到的王子造纸厂案例一样，这也是“殖民地监管空白”的问题。这个个案分析反证了“发展”本身对当地社区来说无异乎一场巨大灾难。

接下来，我们看看朝鲜总督府和多家企业在朝鲜北部森林地带推行的开拓村项目<sup>10</sup>。总督府和参与这一项目的企业的构想是：将日本帝国内的过剩人口尤其是将朝鲜半岛内刀耕火种的火田民<sup>11</sup>、贫农、灾民、开发难民等移居到朝鲜北部山林地区，解决人口问题的同时，开辟出又一片肥沃的土地。这些策划者们宣传：他们引进北海道等日本帝国内最新的高海拔农学技术和种子，与此同时扩充商品流通网，因而定能在开拓村实现科学·效益·发展。于是，许多火田民、贫农、灾民等流入包括咸镜南道和咸镜北道在内的多个地区的森林。然而贫瘠的高海拔地区的土壤和极端气候不断地带来损失，这个项目终告全面失败。其结果是这些地区因饥荒源源不断饿死人，总督府不得不转换政策，不再把“开拓村”这个定居型农村视为目标，而是通过引导人们进入各种建设工地的劳动移民政策来吸收贫民人口。这个事件是殖民者在不了解具体开发现场的情况下推行开发政策，终究酿成另一种灾难的典型案例。

10 梁知惠，《桌上的乌托邦：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朝鲜北部开拓村的建设和失败》，《士林》81期，2022年。

11 译注⑤：主要指朝鲜北部山区进行刀耕火种的农民。

### (3) 战争时期的暴动

接下来，看一下中日战争后战时下的情形。2014年发表的加藤圭木的研究论文<sup>12</sup>介绍了1938年黄海道凤山郡民众反抗浅野水泥厂的居民运动事例。据此文介绍，民众深为浅野水泥厂排放的煤烟和石粉所苦，多次要求厂方采取“安装防尘设备”等公害对策。他们主张“像浅野水泥厂这样在全国各地有无数工厂的企业(…)，不可能不知道如果不安装防尘设备会给周边居民生活带来严重危害这起码的常识”。事实上，浅野水泥厂很早就在日本本土引发公害问题，曾被起诉和进行相应赔偿。可见殖民地朝鲜的民众也是一针见血直击这一点。但尽管如此，始终不见地方当局的管制措施和水泥厂方面的对策出台。这篇文章重点关注愤怒的当地民众200~300人袭击工厂破坏设备的事件。如果说此前研究都是注重中日战争之后朝鲜半岛的重工业化本身，聚焦“殖民地工业投资”的一面，这篇文章则说明了急剧的军工产业化和它带来的副作用表现为民众的“暴力”和企业与民众之间的“冲突”。归根结底，这个事件因“暴力”而不是“公害”本身引起了关注，公害终究没能找到很好的解决方法，事件不了了之。

“如果想在这样的大企业附近生活，你难道不是应该先做好吸煤烟的心理准备吗？”当时水泥厂方面负责人留下的这句话让我们不禁陷入沉思：我们该如何评价战争时期殖民地朝鲜的工业化？

### (4) 公害，殖民地遗产？

这种叩问也可以指向如何看待解放后殖民地留下的遗产的问题。在此前的研究中，殖民地遗产主要指的是铁路、港口等物质遗产或殖民地培植的技术和工人等人力资源的遗产<sup>13</sup>。但是最近的研究更多地聚焦于1965年韩日邦交正常化以后日本向外输出公害的问题<sup>14</sup>。这些研究共同指出了以下引人瞩目的问题：1970年代重化学工业化以后，骄人的经济增长使得韩国为实现其速度战方式的经济发展制造公害（农药等各种）、向韩半岛东南沿海（与日本隔海相望的这一海岸地带是1970年基于矢次构想建设的）工业地带转嫁或者说转移产业公害污染，还有一点就是以“援助”或“投资”之名始于日本帝国历史的物资、知识、技术的亚洲内部网络（intra-Asia network）在20世纪70年代复活<sup>15</sup>。真正的殖民地遗产是什么

12 加藤圭木，《朝鲜殖民地支配与公害--战时期黄海道凤山郡为中心》，《史海》61期，2014年。

13 关于相关论争，请参考许秀烈的《工业化遗产 第11章》，《殖民地遗产，国家形成，韩国民主主义》2，书世界，2012年；李大根的《归属财产研究》，此林，2015年。

14 申在俊，《1970年前后的公害日常化与环境圈认识的种子》，《历史问题研究》45,2021；高泰宇，「1970年代韩国公害状况与灾难认识」《概念和沟通》28,2021；Lee Seulgi，《以农药为中心看绿色革命：1970年代增产和公害背后的农药中毒》，《韩国科学史学会会志》，43-1，2021；KANG Yeonsil，“Transnational Hazard: A History of Asbestos in South Korea, 1938-1993”，The Korean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43-2，2021；梁智慧，1970年代韩日之间“发展”和“环境”交织相扣的政治：以重化学工业化转型和日本公害产业的输入为中心。（forthcoming）。

15 关于解放后日本以东亚为对象实施的ODA项目和日本殖民统治·占领时期对东亚“经济/环境”支配的连续性，请参考 Aaron Moore, Constructing East Asia: Technology, Ideology, and Empire in Japan's Wartime Era, 1931-1945, Stanford Univ Press, 2013; Mizuno, Hiromi, et al., eds. Engineering Asia: Technology, Colonial Development, and the Cold War Order.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20; David Fedman, Seeds of Control: Japan's Empire of Forestry in Colonial Kore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20.

呢？这些论文的主张是：殖民地时期盲目开采后没再规范管理而废弃至今的很多矿山<sup>16</sup>，饱受公害之苦罹患疾病的人们，才是从殖民地传下来的“迟缓的暴力”和“未经清算的殖民地遗产”<sup>17</sup>。

## 5. 超越发展的历史学，其局限与潜力

韩国依旧是“经济增长优先”思想具有压倒性影响力的社会。另一方面，由于2015年朴槿惠政权时期的国定教科书（国家统编教材）风波<sup>18</sup>、2019年《反日种族主义》一书出版后历史否定论<sup>19</sup>的全线反弹，现实政治和学问处于对峙状态的情况迄今仍在持续。韩国近现代史在这此过程是由来已久的历史冲突对象，所处的政治社会结构注定了它极容易被还原到“（左右）阵营逻辑”的框架内。

尽管如此，穿越2011年这一分水岭之后，新的历史图景正逐渐呈现，希望大家能更多地瞩目这一点。这是全新的历史观：认识到世界不再是人们生存的“手段”，而是人们比邻而居生活的“场所”；不再有货币能测量万物的自信，而且清晰地认知万物有膨胀也有极限。这些学者的尝试蕴藏着许多可能性，同时也有其局限性。我想借这个机会诚恳地请求大家分享各位的智慧，帮助我们这些人进一步扩展研究，以取得有意义的成果。

16 梁知惠，《近现代韩国的矿业开发与叫做“公害”的慢暴力》，《历史批评》134期，2021年。

17 梁知惠，《在“开发”极限的界线上：影子人言说中的“开发”和“对开发的超越”，《开创明天的历史》79期，2020年。

18 始于以极右学者为中心指摘现有韩国近现代史教科书有左倾化倾向；2015年当时朴槿惠政府指示“要编制均衡而正确的教科书”，决定历史教科书将采用单一的全国统编教材（国定教科书）后正式引发讨论和抵制。随着2016年12月9日朴槿惠总统被勒令停止职务，丧失其动力。这是政治对历史教育施压的象征性事件，各界倍感忧虑。

19 这是全面否定日军“慰安妇”和战时朝鲜人强征劳工存在的历史观，与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研究所、韩国的落星台经济研究所、美国的马克拉姆齐尔（John Mark Ramseyer）等跨越国界一唱一和。

第4场  
研究

报告 9 (中国)



# 民国时期中国人对“日本军阀”的认知

## 陈红民

浙江大学

在近代中日关系中，日本军人扮演了侵华急先锋的角色。中国人深受其害，有切肤之痛，“日本军阀”被广泛运用，成为中国人认识日本的一个重要概念。目前，中国史学界对“日本军阀”的研究论著并不多，留下很大的研究空间。<sup>1</sup> 本文拟借鉴概念史的方法，对中华民国时期（1912年-1949年）中国人对“日本军阀”的认知与批判进行初步的展示与分析，希冀能对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略尽绵薄之力。

## 一、从“军阀”到“日本军阀”

中国古代典籍有“军阀”一词，多用于指代军人作战立功的资历，是表彰军功的正面词汇。<sup>2</sup> 近代意义的“军阀”概念源自19世纪80年代（大政初年）的日本，明显具有贬义。日本学者松下芳男定义，“军阀”是指军队中利用军制特权非法干预国政、谋取私利的派阀集团，干政弄权是其基本特征。<sup>3</sup> 1916年袁世凯死后中国逐渐陷入军人派系的纷争中，部分知识分子借用日本的“军阀”概念抨击国内乱象。据学者徐勇的研究，军阀一词在进入五四之后明显增加，1920年代普及为热门用语。<sup>4</sup> 中国与日本国情不同，“军阀”概念在中国流传的过程中，又逐渐增加了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纪律败坏残害民众等新的属性，使其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贬义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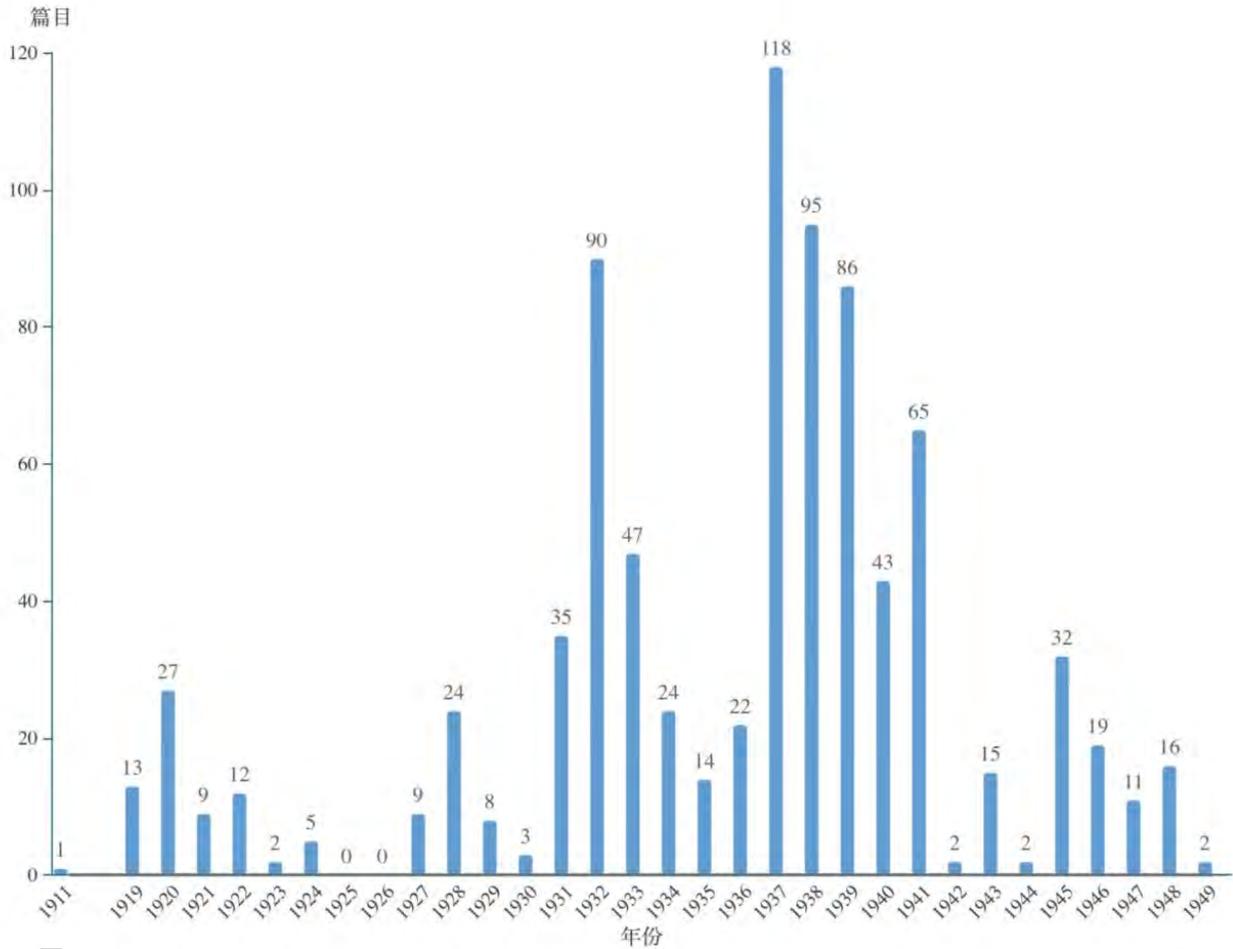
1 根据“中国知网”（cnki.net）检索，中国学者在相关研究中，更多地是使用“日本军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日本侵略者”等，运用“日本军阀”的文章并不多，具体成果包括：徐勇《近代中日两国军阀政治现象及其政治文化比较》（《思想理论战线》2022年第3期）、徐勇《日本的军部政治化与法西斯主义的确立》（《历史研究》1988年第4期）、陶海洋《近代日本军阀破坏国内政党政治——基于〈东方杂志〉的述评》（《江苏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赵庆云《“日本人民”与“军阀政府”的辨析——济南惨案后中国报刊舆论对日认识的一个侧面》（《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等。

2 谢蔚：《试析“军阀”古义的形成》，《历史教学（高校版）》2009年第1期。

3 徐勇：《近现代军阀现象的政治文化分析——兼考军阀概念输入中国之成因》，《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第66页。

4 徐勇：《近现代军阀现象的政治文化分析——兼考军阀概念输入中国之成因》，《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第62页。

民国时期中国报刊文章标题中含“日本军阀”数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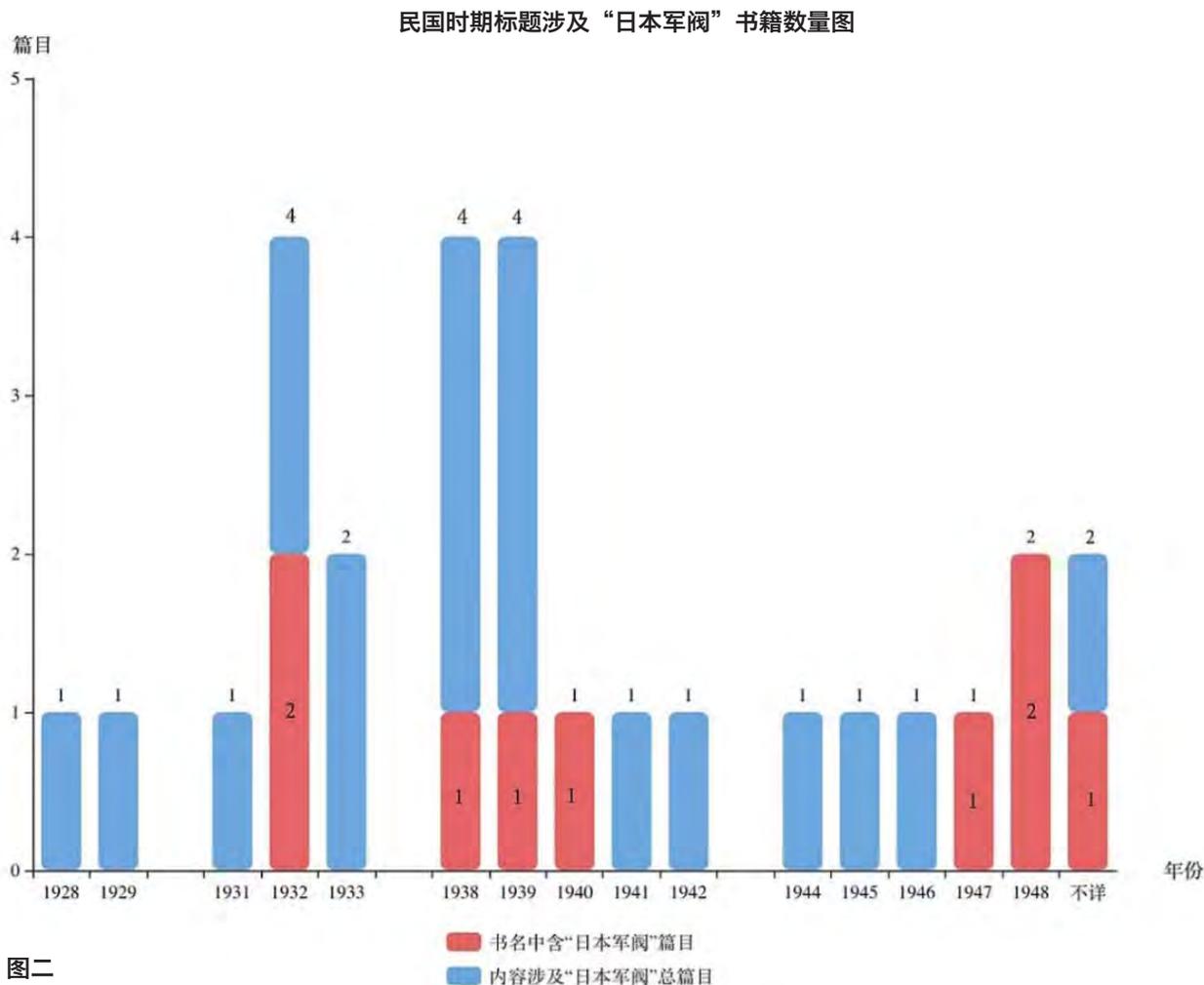


图一

数据来源：“全国报刊索引网”

几乎与“军阀”一词进入中国同步，“日本军阀”也出现在中国的报刊上。根据对“全国报刊网索引网”的检索，1919-1949年间中国报刊的文章标题上有“日本军阀”的文章有851篇，最早两篇文章分别是：1919年2月11日《民国日报》发表楚伦的《问日本军阀派》，1919年3月21日《时报》刊登的《日本实行废除军阀》。1919年-1949年30年间，中国报刊上标题中有“日本军阀”的文章发表时间分布如下：

以上柱状图显示，民国报刊文章标题中出现“日本军阀”有5个频率相对较高的时间段，正与日本对中国的军事侵略进程有关：第一个是1919-1920年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日两国为山东问题争端白热化；第二个是1928年，日本阻碍北伐军，制造“济南惨案”，第三个是1931-1933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并将战火蔓延到华北；第四个是1937年-1941年，日本全面侵华，中国独立抗击日本侵略；第五个是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要对日本的战争责任进行清算。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是，1937-1941年这5年间，平均每年超过80篇，但1942年从前一年的65篇跌至罕见的2篇，1943年是15篇，1944年只有2篇，3年间平均每年不至7篇，同样是在全面抗战时期，对“日本军阀”的使用为何差别这么大？可以想到的原因是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战场与盟军联成一



片，打败日本的前景基本确定，中国人无须再用情感色彩十分强烈的“日本军阀”来宣泄对日本军队仇恨与恐惧。

民国书籍方面，以“日本军阀”为书名，或者在书的章节级标题中出现“日本军阀”，要明显晚于报刊，这很容易理解，报刊追求时效性的“新”，而出版著作有滞后性。根据对复旦大学图书馆龙向洋研究员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民国时期图书目录资料库”（收录中国主要图书馆及部分海外图书馆中文目录）检索，<sup>5</sup>民国时期出版涉及“日本军阀”的著作共28本（书名中有“日本军阀”的9本）。最早的一本是1932年5月由北平萃斌阁出版曹重三著《对华硬化之军阀干政与法西斯运动（日本最近政情之演变）》。同年8月，上海时事编译社出版了日本人佐滕清胜著《东北问题与日本军阀的大陆政策》的中译本。1932年最先出现两本在书名中有“日本军阀”的著作，应该与前一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有关。1932-1933年，1938-1939年，各有8本与6本与“日本军阀”有关的著作，明显高出其他年份。这与报刊文章的频率基本相同，都发生在日本扩大对华侵略后。

<sup>5</sup> 目前，技术上尚无法对所有民国书籍进行全文检索，只能对部分书籍检索从书名扩大到章节目录。

## 二、中国人对“日本军阀”的认知与运用

民国时期，中国人使用的“日本军阀”一词所指较主宽泛，一般是指日本军部、侵华日军，也可以特指具体的日本军人，尤其是高官阶军人。如1927年6月12日上海《时事新报》曾以《日本军阀到青岛》为题，报道日本山梨半造大将在中国的行程。使用这个贬义十足的词，主要是用于斥责日本侵略中国之不义与侵华必败、揭露侵华日军暴行等，也有少数是出于对日本社会结构的学理探讨。当然，这些目的经常是交叉混合的。下列简要列举：

### （一）研究日本军阀的形成历史与现状、派系与人物等，使中国人知己知彼。

1922年刘馥在陈述其写作《日本军阀论》的动机时说，“日本军阀之所以支配全国者，其方术如何，其内部之系派如何，其首领人物如何。此吾人所亟欲研究，而亦我国人所不能不研究者也”。<sup>6</sup>《日本军阀论》包括导论与四章正文，内容包括日本军阀之由来（从文化、宪法、官制、国防等方面的观察）、日本军阀之现势（与陆海军、政治、外交、元老、官僚、财阀、政党等的关系）、日本军阀之内容（陆军阀、海军阀、陆海军阀的内外政略等）、日本军阀之前途等。

7年后的1929年，缪凤林完成了同以《日本军阀论》为题的文章在南京《史学杂志》上刊出。缪文共有导言、结论及八节正文，他自述第二至第六节多综合日本资料，第七至第九节则在日本资料基础上“以己意统合”。<sup>7</sup>其实，当时中国媒体所发表分析日本军阀历史与特性的文章，多数参考了日本人的研究成果。

1935年《汗血周刊》发表《日本军阀与日本政治》一文，指出日本军阀能在日本政治中形成特殊势力的5个原因：“是由于宪法上有所谓‘军部’者，与内阁形成对立的地位”、“是由于军部大臣的武官制”、是由于“日本内阁之负责是对天皇，而不是对国会”、是由于日本制度上的习惯多次担任阁员者方能任首相，造成军人组阁的机会更多、是由于日本军阀在基层“树立极深的根基”。自1901年起日本出现的20次内阁，由军人出面组阁的就多达10次。自世界经济危机发生，“日本统治阶级、有产阶级和地主，相信战争是打破日本帝国主义经济恐慌的唯一出路，因此他们不再信任政党而信任军阀，因为军阀是能负担这个任务的人。”因此，“日本军阀在日本政治上取得了绝对支配的地位”。文章最后的落脚点，还是中国人对日本军阀的态度：

日本军阀的政治势力日益高涨，倒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前途，将日趋暗淡。我们如果要复兴我们的民族，解除我们的国难，那我们便只有集中在强有力的政治统治之下，努力巩固国防去抵抗日本军阀的暴力啊！<sup>8</sup>

6 刘馥：《日本军阀论》，《国民外交杂志》第1卷第2期，第6页。

7 缪凤林：《日本军阀论》，《史学杂志》（南京），1929年第1卷第2期，第2页。

8 白鸥：《日本军阀与日本政治》，《汗血周刊》1935年第4卷第11期，第168-第170页。

这类有些学术研究且较平实的文章一般都是长篇大论，需要在报刊上连载完成，多数发表于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全面侵华之前或者初期，中日关系紧张但有一定程度维持的可能，媒体尚能理性发声。

## （二）揭示日本军阀与其他派阀、民众的矛盾，间接给中国抗日军民打气。

九一八事变刚发生，就有中国人分析日本军阀与政府之间存在矛盾，指出日本军阀面临四面楚歌，情势日亟危机，遂发动对外战争，侵略中国东北。此举使得由来已久的军阀与现政府的冲突“益陷于深刻化”，在侵略中国东北的方针上意见相左。<sup>9</sup>

全面抗战刚爆发的1937年8月，中国报纸披露日本军阀与政府在对华方针上的尖锐矛盾：“自九一八以来，日本对华政策，素为军阀所挟持。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少壮军人益形嚣张”，东京政府只能承认既成事实，不能事前有所主张。“此次糜烂华北，增兵沪上，均系此辈军人所为，藉谋个人升官发财机会，但无辜良民，被征兵役，怨声载道，军费支出，数目庞大，势将破产，实已引起日本空前未有之危机。闻日本政府内部，现已发生重大裂痕，元老重臣大都主张适可而止，侧重经济发展。”<sup>10</sup>

在披露日本军阀与政府矛盾的同时，“日本军阀 - 民众”的两分法在中国媒体中屡见不鲜。余协中在《向日本军阀和国民说几句话》中，一面表明中国抵抗到底的决心，一面对日本国民揭露侵华日军的烧杀抢奸的残暴行径，希望其不要被军阀欺骗，“尤望日本人民能以最大的努力制止军阀继续的侵略”，与中国人民携手“从速打倒日本军阀”。<sup>11</sup>

## （三）警告日本军阀，促其悬崖勒马。

中国媒体也希望通过说理让日本军阀集团能够翻然悔悟，中止对华侵略。

王芸生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不久发表了《诫日本军阀》，从三个方面诚恳地规劝日本军阀改邪归正：一是回顾日本盛衰的历史，指出到明治时代，军人才恢复了“忠君爱国”的美德，将大政奉还王室，“奠定明治维新的始基”。而现在日本军阀走的路线，完全是重复过去一千年旧军阀的罪恶与祸害，“个人的罪恶及国家的祸害，皆将超过于旧时代的幕府”；<sup>12</sup>二是就日本国家利益而言，日本全面侵华“不仅逼得中国硬着头皮走苦斗求强的路”，也打破华盛顿体系，使各国“以日本做假想敌”来充实军备，日本军阀“必然外启轻侮之端，内如崩溃之祸”；<sup>13</sup>三从世界大局而言，近来世界的危机大部分是日本军阀“闯出来的”，如果其一意孤行，“世界人类均将蒙受日本军阀的祸殃，而最先毁灭的必定是日本”。文章最后给日本军阀一个选择：

9 岩白：《倭军阀侵略东北之动机》，《日本评论》1931年第1期，第8页。

10 《日本军阀专横，日本政府内部发生重大裂痕》，《锡报》1937年8月14日，第3版。

11 余协中：《向日本军阀和国民说几句话》，《经世》，1938年战时特刊13，第9期。

12 王芸生：《诫日本军阀》，《救亡文辑》第38页，1937年。

13 王芸生：《诫日本军阀》，《救亡文辑》第40页，1937年。

日本军阀！假如你们甘愿做国家的乱臣贼子，甘愿做世界的公敌罪人，就请你们继续倒行逆施下去，你们的国家及人类的世界都会给你们以公道的惩罚。假如你们还有一点理智，还有一点真感，就请你们为了先辈军人的历史，为了国家人民的利益，为了世界人类的幸福，一齐跪倒在明治神宫的香案前，痛切忏悔你们的罪孽吧！<sup>14</sup>

中国媒体还借用外国名人的言论来揭露日本军阀侵华不得人心。1938年《文摘》曾以《泰戈尔痛斥日本军阀》为题，介绍获得诺贝尔奖的印度诗人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对日本侵华的看法。泰戈尔说，他曾很颂扬日本人，但日本彻底改变了，“对于东方无抵抗的平民的严重迫害，并且较之它的经济拓展，领土野心尤为恶劣的，是天天在那儿进行的屠杀和对于这种残暴的无耻地掩饰。”<sup>15</sup>值得注意的是，泰戈尔这段话的语境是要婉拒别人要他出面反对抵制日货运动，对日本的侵华行径的极度不满是婉拒的理由。中文媒体却用“痛斥日本军阀”为标题，更突显日本之不义。中国报纸刊物也翻译过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Pearl S. Buck)在美国发表《日本军阀的心理》一文，斥责日本军人对不设防的中国城市与平民的轰炸，赛珍珠表示，她鄙视日本军阀的心理，反抗日本军阀的行为，“我严拒宽容日本今日在中国所做的行为。”<sup>16</sup>

#### (四) 揭露日本侵华暴行

揭露日军在华各种暴行，是中国人使用“日本军阀”的最主要目的。日军侵略中国的各种胡作非为多被归因为“日本军阀”所主导。1928年7月《申报》以《日本军阀又来捣乱》为题，报道日本政府为干涉中国统一，维护其在东北利益，坚持在华增加军力。<sup>17</sup>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发表对日本宣战文告，文告“日本军阀夙以征服亚洲，并独霸太平洋为其国策”开头，将“日本军阀”视为侵略战争的源头。<sup>18</sup>

《日本军阀在中国的罪恶记录》可谓揭露日本侵华的典型。文中写道：“宣扬法西斯的日本匪军，留在中国血腥的烙印，就是用他们自己的血也不能洗清。”该文以日军统治下中国的经济破产为例：“中国最进步的地方全被日本占领了，在这些地方发生了甚么事情呢？无论就人民生计全体说，还是单就农村经济说，都遭到了巨大的改变，从坏变到更坏，从次殖民地变到了十足的殖民地了。这种改变是由道地日本式的政策造成的：大规模的杀戮与劫掠，提倡迷信与吸食鸦片，没收土地，征用五谷与劳动力，繁重过分的税收与摧毁劳动兽力等政策造成的。”<sup>19</sup>在这样的侵略与掠夺面前，中国人唯有坚定抗击日本侵略者。

14 王芸生：《诫日本军阀》，《救亡文辑》第40页，1937年。

15 《泰戈尔痛斥日本军阀》，《文摘》1938年第12期，第299页。

16 赛珍珠著、蒋学楷译：《日本军阀的心理》，《新文摘旬刊》，1938年第1卷第4期，第112页。

17 《日本军阀又来捣乱》，《申报》，1928年7月13日，第二张。

18 《国民政府对日宣战原文》，《党员知识》，1941年第1卷，第2页。

19 陶泽译：《日本军阀在中国的罪恶记录》，《读者》1945年(无具体日期与期号)

### 三、蒋介石对“日本军阀”概念的运用<sup>20</sup>

蒋介石经常使用“军阀”概念，在他的军阀话语中，“日本军阀”是个特殊且关键的存在。笔者通过对国民党官方出版收集蒋介石言论较全的《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计40卷）与收藏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的《蒋介石日记》进行检索，发现他使用“军阀”的词频均是在全面抗战时期（1937-1945年）达到了高峰，而这里的“军阀”多是与“日本”连在一起的。就笔者所见资料，蒋首次提及“日本军阀”概念是在1928年5月“五三惨案”期间，比他运用“军阀”概念晚了9年。<sup>21</sup>此时，日军处心积虑地阻挠北伐，让蒋有极大挫折感，感叹“中日世仇不能再忘，其军阀之害国甚于中国之军阀也。”<sup>22</sup>

蒋介石曾年轻时克服重重困难到日本留学学习军事，对日本军人的地位与军事组织训练非常崇拜。然而，日本侵华损害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也危及蒋介石的统治，蒋结合日本军部对内干政对外侵略的现实与“军阀”一词的负面意涵，用“日本军阀”来蔑称日本军部势力与侵华日军。

如下图所示，蒋使用“日本军阀”最频繁的1938-1940年，正是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时间，中国独立抗击日本侵略，国民政府丧失了最富庶的东部地区而撤退到西南。蒋介石用“日本军阀”一词激发军民对敌寇的仇恨，提振抗日士气。另一方面，蒋在日记中私下诅咒谩骂侵华日军，宣泄压抑郁闷之气。这与中国媒体使用“日本军阀”的节奏完全一致。

蒋介石为凝聚抗战人心士气，对国内军民宣传中痛斥日本军阀。九一八事变后，蒋发表演讲称：“日本占领东三省，就是破坏东亚和平，日本军阀不明此理，无异自绝世界。”<sup>23</sup>中国军民必须与日本军阀抗争到底：“彼日寇军阀以东亚共荣圈为口号，而实行吞并亚洲，独霸太平洋的野心，正是我们所要澈底铲除的公敌。”<sup>24</sup>军阀在中国是具有负面性且必然失败的形象，蒋利用“日本军阀”的宣传，直接或间接地引导国人将对“军阀”诸多恶感加诸日本侵略者之上。

用“两分法”将“日本军阀-国民”作对立性区分，是蒋介石强调“日本军阀”概念的基本逻辑。在蒋看来，日本军阀与民众是“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主张侵略的军阀得不到民众支持，甚至日本民众会起而推翻军阀。蒋明确表示：“（日本）一般国民对军阀嫌恶之程度，尤可注意。”<sup>25</sup>蒋认为，多数侵华日军只是被军阀欺蒙的普通民众，他要求用教育去感化日军俘虏：“尤其是对于一般日本俘虏，我们要使他们彻底觉悟，心悦诚服，来反对他们本国的军阀。”<sup>26</sup>除了强调日本国民与军阀的对立外，蒋还认为日本政坛中存在着“文-武对立”，文官对军阀也有牵制作用：“更应注意日本内部文武两派之胜败谁属，当使文派抬头以制军阀，抑使军阀横行以促其孤立乎。”<sup>27</sup>蒋还认为，日本军阀内部也有分歧与斗争。米内光政组阁

20 笔者曾研究蒋介石对“军阀”概念的认知，成果发表于《军事历史研究》2022年第4期。

21 蒋最早运用“军阀”一词，是1919年2月在以《废督裁兵议》为题给孙中山的一份建议中。

22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8年5月12日。

23 蒋介石：《拥护公理抗御强权》（1931年10月12日），《思想言论总集》卷10，第47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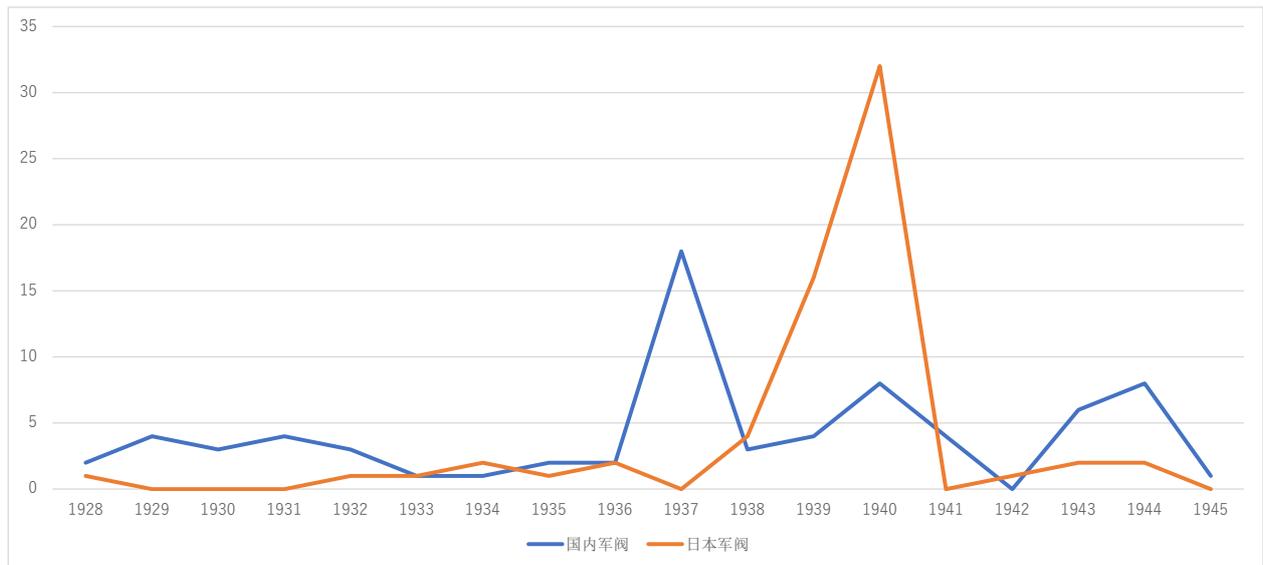
24 蒋介石：《对于国民参政员的期望》（1942年10月31日），《思想言论总集》卷19，第354页。

25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3年3月17日。

26 蒋介石：《今日教育与体育应注重之要点》（1940年10月13日），《思想言论总集》卷17，第483页。

27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4年11月27日。

《蒋介石日记》中“军阀”与“日本军阀”使用词频（1928-1945）



图三

注：“日本军阀”的词频统计包括与之含义相同的“日阀”、“敌阀”、“倭阀”等。

后，蒋判断“陆海二军必更暗斗，文武新旧，必冲突益甚，促成帝国内溃。”<sup>28</sup> 既然日本军阀为民众所反对，内外均遭遇抵制，那么中国坚持抗日，拖垮日本军阀就是必然的选择。<sup>29</sup>

“日本军阀”的概念更被蒋介石运用在对日本民众的宣传中，希冀唤醒日本民众奋起推翻军阀。蒋 1938 年在抗战周年发表的题为《中国只向日本军阀打击》的“告日本国民书”中首先说明中日两国为“兄弟之邦”，理应“相亲相睦，图存共荣”，但日本军阀发动侵华战争，在中国烧杀奸淫，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的灾难，同时也给日本国民带来损失：不仅负担庞大的军费开支，青壮年士兵在中国战死成鬼，闺中少妇成为未亡人。所有这些责任均在日本狂妄之军阀，中国之抗战，固属自救，“亦即所以救（日本）诸君”。蒋介石文告中最后说：

中国之抗战，不仅为自卫生存，实亦为实现中日两国国民未来永久之福祉，而贵国暴戾之军部，不仅为中国之敌人，实亦日本国民诸君之公敌。中国自抗战至今，只认日本之军阀为敌，不以日本国民诸君为敌。……深望诸君及早省察两国安危之至计，团结一致，反对强暴军部之一切施为，发挥贵国国民正义之意志与力量，促使变更侵略政策，恢复和平秩序，实现中日相互之亲睦，奠定东亚永久之和平。<sup>30</sup>

28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1月20日，“上星期反省录”。

29 蒋介石：《抗战建国三周年纪念告美国民众书》（1940年7月8日），《思想言论总集》卷31，第188页。

30 蒋介石：《中国只向日本军阀打击——抗战建国纪念告日本国民书》（1938年7月7日），《时事月报》1938年第19卷第1期，第11页。

一年后，蒋又发表了长达一万六千余字的《抗战建国二周年纪念告日本民众书》，详尽阐述了日本军阀的种种罪恶，希望日本民众“省察两国安危之至计，团结一致，反对强暴军部之一切施为，发挥贵国国民之正义的意志与力量。”<sup>31</sup>

在争取援助与面向世界各国的战时国际宣传中，蒋介石同样运用“日本军阀”概念来唤起各国对日本侵略行径的厌恶和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援，强调富有侵略野心的日本军阀是各国的共同敌人：“日本军阀夙以征服亚洲，并独霸太平洋为其国策。”<sup>32</sup>

中日两国民众普遍接受“军阀”概念的贬义，即军阀是祸国殃民的势力，蒋介石以“军阀”来定义主张侵华的日本军部，在对日宣传中祭出反“军阀”的大旗，希望也会收获同国内一样的效果。然而，日本军部的势力既未像蒋预期的那样快速崩溃，日本国民也远非蒋理解的那样站在军部的对立面，更没有响应蒋的宣传自动发起反“军阀”革命。但他用“日本军阀”概念来对内对外宣传，策略与方向是对的。

## 四、孙中山、毛泽东对“日本军阀”概念的运用

日本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中有着重要的影响，他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成立与活跃于日本，有着众多的日本友人，与宋庆龄成婚也在日本。孙中山在世时，中日关系虽紧张但未到决裂程度，日本军人对华野心时常显露，孙在强调中日友好的同时，也时常批评日本军人猖獗，一意侵华，他偶然用过“日本军阀”一词。佛云 1940 年 11 月孙中山诞辰纪念日曾发表《总理论日本军阀》短文，选出孙中山运用“日本军阀”的两处文字。孙在致白浪滔天的信中写道：“此后吾党之患，仍在日本之军阀政策”。在《实业计划》中写道：“日本于每一战争之结局，辄获最厚之报酬，无怪日本军阀，以战事为最有利之事业。今中国既已醒觉，日本欲被告其侵略政策，中国人亦必出而拒绝之。”作者写此文的目的，是要说明“打倒日本军阀，是总理的一向主张。”此际发扬革命精神，打倒日本军阀，是对孙中山诞辰最好的纪念。<sup>33</sup>

中共领袖毛泽东也少量运用过“日本军阀”的概念。据对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四卷本《毛泽东选集》的全文检索，毛泽东 1949 年 10 月前共在 5 篇文章正文中，9 次使用过“日本军阀”。最早的是在 1938 年 5 月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用过两次，同月发表的《论持久战》中有两次，1939 年 9 月的《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中有一次，1944 年 4 月的《学习和时局》中有 3 次，最后一次使用是抗日战争结束后 1946 年 8 月的《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有一次。此外，在 1949 年 1 月的《中共发言人关于命令国民党反动政府重新逮捕前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和逮捕国民党内战罪犯的谈话》中，毛泽东使用了“日本法西斯军阀”这一名词。毛泽东最早使用“日本军阀”的文字如下：

31 蒋介石：《抗战建国二周年纪念告日本民众书》（1939年7月7日），《思想言论总集》卷31，第77-101页。

32 蒋介石：《蒋委员长告世界友邦书》，《申报》1938年7月7日，第2版。

33 佛云：《总理论日本军阀》，《胜利》1940年第31期（第104号），1940年11月9日。文中的“白浪滔天”，似应为“宫崎滔天”。

日本帝国主义有两个基本的弱点，即是兵力不足和异国作战。并且因其对中国力量的估计不足和日本军阀的内部矛盾，产生了许多指挥的错误，例如逐渐增加兵力，缺乏战略的协同，某种时期没有主攻方向，某些作战失去时机和有包围无歼灭等等，可以说是他的第三个弱点。这样，兵力不足（包括小国、寡民，资源不足和他是封建的帝国主义等等），异国作战（包括战争的帝国主义性和野蛮性等等），指挥笨拙，使得日本军阀虽然处在进攻战和外线作战的有利地位，但其主动权却日益减弱下去。<sup>34</sup>

毛泽东在其文章中指称日本主张与实施侵略中国的机构、军队与军官时，除了“日本军阀”而外，使用较多的是：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者、日本法西斯、日本侵略军、日本侵略者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与“日本侵略者”这两个词。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时间，毛泽东的用词也不同，在1935年12月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用的全是“日本帝国主义”（23处），或“日本帝国主义者”（6处）。而10年后，他1945年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发表的《论联合政府》中，75处用了“日本侵略者”，而没有了“日本帝国主义”。

日本侵华对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之重，使得国人思之心痛，难以平复。故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日本被解除武装后，中国人还较多地使用“日本军阀”一词，前述图一统计，中国新闻媒体刊登文章篇名中有“日本军阀”的，在1946年有19篇，1947年有11篇，1948年16篇，1949年有2篇。这些文章主要是3方面内容：一是追究日本军阀侵华的责任，清算日本侵略罪行，如《日本军阀所造罪孽》（《新闻报》1945年12月19日）、《日本军阀奴役中国》（重庆《益世报》（重庆版）1946年8月21日）等；二是要求惩治日本军阀，如《日本军阀的末日 又一批新战犯入狱》（《江苏民报》1945年12月4日）、《清算日本黠武军阀起诉书昨正式提出》（《前线日报》1946年4月30日）。三是防止日本军阀复活，如《预防日本军阀复起》（重庆《中央日报》1945年9月3日）、《旧日本军阀图再起》（《中央日报》1947年10月23日）等。

34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10-4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讨论·提问答疑】第4场

## 报告人互评·回应与会者提问

主持人：宋志勇 南开大学

发言：陈红民 浙江大学

(按发言顺序排序) 唐小兵 华东师范大学

安冈健一 大阪大学

福间良明 立命馆大学

金滢 首尔大学

梁知惠 东北亚历史财团

论点整理：刘杰 早稻田大学

[以母语发言。翻译：于宁（日语）、洪龙日（韩语）]



宋志勇

下面我们进入讨论阶段。我想一些规则刚才李恩民教授已经都讲过了，我就不再重复了。还是依照相同的规则进行。我们现在开放提问。首先有请陈红民教授。

陈红民

这一组两位年轻学者的研究都非常好，我很认真地拜读了他们的论文。我现在主要对韩国学者梁知惠的论文发表一点看法。这篇论文非常有新意，因为殖民地史研究再跟环境史结合在一起，这两个都比较新，所以这个角度非常好。我们过去研究殖民地，强调殖民地的经济遗产、文化遗产，或者是教育遗产，她现在把它说到一个环境遗产的问题。殖民地统治者在殖民地发展经济，但是破坏了环境，而且在本国遭受抵制的产业拿到殖民地来发展，不惜破坏殖民地的环境。文章举了好几个例子，这些例子在她的论文里都非常恰当，逻辑上也自治，也更深刻地批判了殖民主义，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

但是，现在我希望梁教授能够更注意的是，环境问题是工业化高度发展之后才出现的问题，它不是很早的问题，是一个发展中的问题，你在论文里面也说了，它是工业化发展过程当中，有一个出现全球阶梯性的这种发展，或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之内它也有一个区域阶梯性的这种发展，有一个产业升级和转移的问

题，或者产业区域分工的问题。还有一个资本本来就逐利的问题。所以殖民地统治者以殖民的名义对殖民地环境的破坏，正好和刚才这两个都重合了。一个就是全球化，产业不断地转移，这种转移其实对原来相对不发展的国家，今天我们还在看到，比如日本的产业转移到中国，中国发展之后，又将这些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去了。所以这个在转移的过程之中，劳动力密集、环境污染很厉害的产业，在被移入的地方最初是欢迎的，等到发展起来之后它意识到这种情况。就是在殖民地国家，通常比被殖民地方的产业要高一个级别。所以它把这个产业转移到殖民的地方去，它基本上就跟转移劳动密集型是结合在一块儿的。殖民统治者占领殖民地本来就有一个产业分工的问题，比如日本占领台湾后，就有“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口号。殖民统治者实现产业分工，其实有内在的逻辑的。这是第一个你得考虑的。

其实，即使没有殖民地，我们全世界仍然有高污染的产业继续向其他国家转移的问题，而且不少国家并不反对，或者至少政府不反对。第二个问题，即使没有殖民主义和外国资本的强力介入，那本国的资本家，或者本国的那种官员，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也强力地发展污染环境的产业。这个不存在殖民主义的问题，本国的资本家他也这样做。

从这两点看起来，你在讨论是不是把殖民地经济发展过程中所有出现的环境问题一定归结于是殖民地或殖民统治者他殖民的结果，而不是全世界产业分工，或者资本本身逐利造成的，你在你的论文中很自治，但是建议你放在更广阔的领域里去考察。这是我的一个建议，不是问题，谢谢。

宋志勇

谢谢陈教授的点评。下面哪一位？

唐小兵

我想针对安冈教授的报告提一两个问题。因为我很感兴趣，关于这样一个本人史（在我们中国称之为回忆录或者是自传）历史书写形式在日本的推动，我觉得很有意思。他在这里面所谈到的是史学的大众化的问题和消费化的问题。所以我很好奇，在日本这样的历史大众化的内涵是什么，历史写作更关注一个以大众作为历史写作的主体，或者是被写作的对象也好，还是说历史学家写的作品，面向大众的推广过程，如果是后者的话，历史学的大众化跟历史学的商品化中间那个关系到底如何去处理，我是很好奇。因为在中国大陆，比如说，有些非常畅销的历史学著作，它可能并不是真正专业历史学者写的，它很有可能比如像在中国大陆很有名的面向大众进行历史写作的有一个年轻的小说家，叫马伯庸，马伯庸写了很多关于中国古代史的历史作品，比如像《长安十二时辰》等等，非常畅销，也改编成历史电视剧，但同时他会非常认真地吸收研究唐史和明清史的专家的著作，他会读很多专业的史学著作，然后转化成为公众能够理解的这样一种通俗的历史写作。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我不知道在日本有没有一个这样的写作者群体，他是把日本的比如说像在座的大学任教的历史学家的专业的作品转化成为公众能够理解的通俗的历史作品，他同时还是有一定的客观性和准确性的，同时又是大众能够理解的这样一种所谓公众史学的作品。这是我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安冈教授所谈到的，从“我的历史”出发，走向一个“我们的历史”，就是从这样一个个体的身份认同走向一种社群或集体的身份认同，这当然也是我非常渴望在中国大陆见到的。比如说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底层的普通人

的历史写作、呈现，不是仅仅只有政治家的历史、经济精英的历史，或知识分子的历史。但这中间可能会有个问题，从“我”到“我们”，这中间可能它不是个简单的理想主义的通道，那“我”和“他”的历史之间有时候就会有冲突，在同样一个家庭、家族内部，关于家庭过去的历史记忆有时候都会有冲突。那当产生这个冲突的时候，我们该如何来处理 and 协调，作为历史学家应该贡献怎样的智慧，来帮助这样一个“我的历史”走向“我们的历史”，能够找到彼此重叠的一个共识，找到一个最大的公约数，我觉得这是非常挑战所谓公众史学和大众史学的问题。这是我针对安冈教授的另一问题。

浙江大学陈红民老师的报告我也很感兴趣。因为他是研究蒋介石非常重要的专家和权威。他这个关于“日本军阀”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我比较感兴趣的问题，因为他最后谈到说这些对于日本的预测和推断，包括日本国内会有很多的把日本的军阀跟日本的民众做一个切割，民众可能并不认同军阀和少壮军官的这种做法，但最后很多的预测并没有真正应验。那我感兴趣的问题就是说，其实在整个民国的时代，其实是有一个知日派的。因为很多人从晚清甲午海战 1895 年以后，很多人源源不断到日本去留学，包括比如像戴季陶、蒋百里、王芸生、张季鸾、蒋介石本人，更加不用说汪精卫了，有很多人都到日本留学过，那么其实他们当年对日本社会和文化精神的了解，包括周作人这些人，其实可能还超过今天的中国这些处于权力者位置的人，他们对日本的了解，包括精神文化，历史沿革和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比较深入。那么，这些人相当一部分在当时国民政府也是政府的高级官员。为什么他们不能够反过来对于蒋介石的日本认知产生某些正面的影响？这是我的一个问题，谢谢。

宋志勇 谢谢唐教授。唐教授的问题比较多一些，那就先请安冈先生作一个回答吧。

安冈健一 好的，谢谢。我应该是收到了两个提问。我想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在讲述个人历史的过程中，如果出现了前后矛盾的历史记忆时该如何处理。当然，如果是历史专家或长期致力于进行结构性理解的历史学家来说，有些问题是可以调解，并通过介入促进理解的。

但我首先想在这里讲的是“首先记录下来是非常重要的”。即便那些观点难以接受，记录当事人是如何理解和感受，并将这些作为史料留给以后的历史学家，也是当代历史学家的职责。我认为历史学家必须基于史料进行思考的原则在将来也不会改变。因此，对于史料如何被保留下来，以及史料是如何被制作的等问题，我认为我们不应只是被动地去研究现存的史料，而是应该以公正的姿态积极介入史料的创建过程。

所以，当有些问题现在无法立刻解决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将其记录保存下来，这非常重要。试图代替当事人即刻去解决问题，这个做法有时反而会妨碍记录。这是我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

第二个提问是与文学作品的关系。在日本也有很多历史小说，比如在村上春树的作品中，中日战争的故事成为一个重要主题那样，历史有时会在未被直接描述的文学作品中。对于历史与文学，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论述，我在这里谈论的是，对于广义的历史，比如当前蕴含着怎样的过去，历史学家需要与各种领域的表达进行讨

论。

因为谈到了历史小说，福间老师最近也写了司马辽太郎相关的著述。虽然有些冒昧，但能否请福间老师谈一谈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宋志勇

有请福间老师。

福间良明

首先，在日本司马辽太郎描写日俄战争和幕末维新时期的作品被广泛阅读。从年龄来看，他属于战中一代，有过战争体验，且看过大量史料。不过，在手法上他与历史学的程序有所不同，因此也受到了很多历史学界的批评。我认为，司马本人并非完全忽视了加害责任的问题，但关于殖民地问题的描述确实不足，这一点也受到过批评。

但是，如果我们去思考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会去读司马的作品，我认为这个现象其实可以看作是一种稍微变质的教养主义。他的作品最被广泛阅读是在1970年代后半期书籍开始文库化以后。从那时起，他有了更多读者。有很多中年上班族会读他的作品。之所以说这是教养主义的变种，是因为这些人在年轻时接触过教养主义，到了中年以后又再次试图去接触历史性的东西。除了这一点以外，还有劳动意识的问题。当时大多数情况是，人们终生就职于同一家公司，其间从事各种不同的工作。当时已经形成了经过在销售、财务、工厂等不同的部门之间轮岗之后，最终升任为公司领导职务的升迁路线的范本。在这个过程中一边学习历史，一边磨砺人格。比起成为财务等特定领域的专家，他们更想追求的是通过熟练掌握各种工作来提升自己作为领导的人格，而这在我看来是与教养主义变种的趋势相契合的。

宋志勇

谢谢福间教授。安冈教授把一个问题让给了福间教授，那么不好意思，我利用特权再给安冈教授提一个问题，补充一下，把刚才那个问题再补上。安冈教授以色川大吉为代表人物做的报告，那么色川大吉在前年去世，不仅在日本，甚至在中国的日本史学界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大家都还是很吃惊的。因为他的研究在日本史学界还是非常有影响的。我提的问题是，色川先生在六、七十年代提倡大众史、个人史，在那个时代应该说主要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占主要地位的时代。那么，他的个人史和大众史跟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想大众史研究在六、七十年代形成一个高潮之后，在八、九十年代又沉寂了一段时间，那么最近大家又对大众史、个人史有新的认识，最近其实又开始火起来。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人们对大众史和个人史的认识有了什么样的变化？另外，还有大众史和个人史它们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有请安冈教授做一个回答，谢谢。

安冈健一

好的，谢谢。当然，1960年代以后的所谓民众史与民众思想史，不仅仅是色川，他以及其他学者提议的学术研究方式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学术研究的面貌。当然，这其中存在时代的变迁，正如刚才梁老师谈到的，战前的运动史研究在日本非常盛行。但如果我们去观察日本的社会运动史研究就会发现，研究的热度因时代而异。一些之前曾备受关注的研究动向，在某些时期也会不被关注。但在2000年以后，随着日本社会贫富差距的现实在各种形式上的讨论，以及在研究者代际更替的进程中，社会性议题再次受到更多关注，我认为这显示出一种学术历史的变化。

但我在这里关注的，并非以研究史这一形式展现出来的学术历史本身，而是学术之外的历史。在我看来，色川就是这两者的接点，衔接并游走在学术与大众之间。与个人相关的学术研究，以所谓的自传体文献（ego document）研究的形式，在学者中正变得越来越活跃。但对于如何看待非专业者，即普通民众书写的历史，目前的讨论还很少。关于这一点，色川本人也没有展开详细论述。但是在历史经由个人之手进行书写的状况逐渐成为现实的当下，比任何一个时代都有更多的个人正在书写自己的历史。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需要重新审视的重要问题，重新思考这一现象，这便是我提出的问题。

金 濤

虽然我还有一些内容需要整理，但我想先向安冈老师提一个问题。

上周我读了于2021年去世的美国历史学家朱利叶斯·斯科特（Julius Sherrod Scott III）的一本书。这本书名为《The Common Wind》，讲述了加勒比地区许多奴隶的故事。斯科特通过查阅大量报纸和古文书，不只是简单地称他们为“奴隶（slave）”，而是逐一恢复了他们的名字，赋予他们身份，使这些无历史的人有了自己的历史。在他去世后，他的博士论文被认为是出色历史学家的典范。

我想探讨的是，历史学家如何为无历史的人提供历史？无历史的人又如何书写自己的历史？正如黑格尔所说，没有国家就没有历史。由于民族国家的想象，许多人被排除在历史之外。然而今天，许多渴望书写自己历史的普通人的故事正在浮出水面。在我看来，这些故事以“本人史（自我史）”的形式出现。尽管许多人在书写各自的故事，但他们的叙述中可能包含了他们自己未曾意识到的民族国家的想象。

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像朱利叶斯·斯科特那样，通过长期训练为无历史的人们提供历史？还是应该鼓励更多普通人书写自己的历史？这也让我想到了印度历史学家拉纳吉特·古哈（Ranajit Guha）提出的问题，即“如何为无历史的人们、属下阶层（subaltern）提供历史？”在这一点上，我很想知道日本的老师们是如何看待和处理这些问题的？你们是如何在比较相同与不同之处的过程中，创造新的历史学趋势的？安冈老师作为一位雄心勃勃的年轻学者，似乎对这些问题有一些见解和研究。希望能听听您的计划和想法。

安冈健一

谢谢。没有历史的人（people without history），这类人对于历史学者来说，确实一直都是重要的存在。有讨论一直在思考要如何书写这些人，要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受此影响，我自己也展开了所谓的实证研究，试图解决如何从史料中揭示其存在的问题。

这次，以这样的形式关注研究的外部，也与我自身经历有关。最初我对战争历史感兴趣，当我去采访时，总会被他们说“如果你早来5年就好了”“要是早来10年就好了”。因为很多人都已经去世了，我们无法从已故的人那里听到他们的讲述。很多次，我都在想，要是他们还在世的时候留下哪怕一丁点儿的记录，那对我得是多大的帮助啊。

我会关注当事人自己书写历史这件事，很大程度是因为当今社会，我们这一代人拥有记录历史的能力。在那些没有这种能力的时代，口述历史尤为重要，这种重要性至今未变。对于提问，他们思考后进行回答。我认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第一次创造出关于自己的故事，或另类叙事。

但我在进行口述历史记录的过程中，却逐渐意识到提问方的局限性。提问方有想要问的事才去做访问，而正是受到要回答提问者的这一限制，所以讲述者会不会没有讲出他们真正想要讲的东西呢？提问者想问的问题与讲述者想表达的内容有时并非一致。于是，我认为尽可能地向他们提供支持，帮助他们把真正想写的，自己真正想要传达给别人的事写下来，这个过程非常必要。这其中包括各种不同种类的经历，比如刚才老师提到的“未被讲述的奴隶的历史”，这些历史的重要性可能在今后得以显现。我认为通过这种记录，后世人们可从其中汲取真正重要历史的原始记录，所以要尽可能多地确保这样的机会。在我看来，支持这些记录的产生，是人文学科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深入理解人类的重要途径。

过去半年，我在大学以几位新生为对象进行了一项新的尝试，让他们思考自己的历史。从国外来的留学生和日本学生在互相交流各自人生轨迹的过程中，我见证了他们讲述自己所背负的各种历史及其异同点。虽然他们不是专门从事历史学研究的人，但其中有几位学生领悟到了自己也是历史的一部分这个事实。我认为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更加广泛地传达历史的重要性，这也是历史教育的作用之一。

梁知惠

我想简单回应一下陈老师刚才提到的内容，不知道时间是否允许？可以让我先简单地回应一下陈老师的评论吗？谢谢。

听众 3

请允许我插个话，因为这样会更高效。很抱歉。今天的主题是“战争·殖民统治与和解的历史叙述”，如果看最后的第14个脚注，会提到“由于《反日种族主义》出版后，历史否定论的强化，现实政治和学术不断对立”等内容，并提到了日军慰安妇等问题。然而，今天在盐出老师的报告中，也提到2021年因为引起误解，日本决定使用“慰安妇”这一更合适的用语，而不是“强制劳动”，而是“征用”。那么，在2022年的“历史综合”，在某种意义上说，似乎是日本根据近邻条款在认识到上述问题后所作出的某种改变。

首先，我想了解在日本的学校里，如何处理慰安妇问题。其次，如果描述相同，想请问梁知惠老师，通过今天的报告和讨论，您如何看待日本的这些努力？另外，我也想知道，您认为外国与国内在历史研究上的主张是否存在差异？谢谢。

宋志勇

不好意思，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个环节快要结束了。所以，如果梁教授能简要回答的话，就请回答一下。如果要是比较费时间的话，我们就移到明天讨论的时候大家作进一步的讨论。下面有请梁教授简要地做一个回答。

梁知惠

两位老师提到的内容都非常重要。特别是陈老师提到的，在殖民地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不应完全归结为殖民性的问题，这一点非常关键。同时，也必须明确认识到的确有很多人是试图去利用经济开发的，这也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重要问题。韩国也有很多类似的案例。例如，1980年代在废矿区推行引入核废料处理场的运动。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实际上揭示了开发的多面性和复杂性，是非常本质和重要的问题。

尽管如此，我认为我们需要思考痛苦的独特性或唯一性，并希望我们能共同探讨这一点。关于殖民性和开发阶段性的问题，显然需要非常敏感地加以考虑。但从

经历痛苦的地区和诉说痛苦的人们角度来看，国家层面的经济开发进展程度，例如 GDP 或 GNP 等指标，并不能带来太大的安慰。

正如大家所知，日据时期某些地区，特别是朝鲜半岛北部和满洲地区，经历了高度集中的经济开发，成为全球瞩目的经济开发案例。在这个过程中，开发带来的痛苦以独特的方式传递到这些地区。因此，在讨论这些痛苦时，不应简单地用国家平均水平的经济指标来衡量，而应深入思考如何讲述这些独特的痛苦。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听众提出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可能并不完全适合由我来回答，明天的讨论中或许会有很多重要的观点被提出。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补充一点。

当我们谈论殖民统治时，讨论环境或生态问题是极其重要的课题。我在今天的发言中提到这个主题，是因为我认为需要进行更加本质和根本的思考。关于《反日种族主义》和历史否定论的批评已经有很多讨论和相关书籍，但在学界和各类媒体中，对“发展”这一核心概念的本质性反思却相对较少。现在是时候重新思考“发展”的本质性问题了。如果不重新审视这一核心概念，那么关于经济发展的历史否定论和修正主义讨论只会重复现有的水平。

我可能没有充分回答您的问题，明天或许会有更多老师为您提供有益的见解。

宋志勇

谢谢梁教授。因为时间的关系，虽然我想这个课题，一个是大家都非常感兴趣，我想留出更多的时间，明天讨论的时候，大家一块儿深入地讨论。所以梁教授也要做好准备，跟大家更加热烈地讨论下去。

非常感谢三位报告人以及各位的配合，我们基本上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了本单元的报告和讨论。我想“研究”单元应该是为刚才的“教育”单元和“媒体”单元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我想这肯定是不够的，还需要大家进一步再加深研究，进一步地努力，今后为“20 世纪的战争·殖民统治与和解的历史叙述”这一课题提供更多的智慧。

感谢所有的报告人和讨论者，谢谢大家。本单元到此结束。下面进入论点整理环节，下面有请刘杰教授。

## ■ 论点整理

刘杰

今天，几位报告人老师提出了许多非常宝贵的见解。尽管我的职责是总结讨论要点，但要完整地整理出所有论点是非常困难的。而且明天在讨论之前，三谷老师还会进一步指出更多论点。因此，作为今天讨论的一个总结，我想稍微谈一下个人感想。此次的主题是“20 世纪的战争·殖民统治与和解的历史叙述”，考虑到今天的讨论，我认为东亚这三个国家在战后研究和讨论 20 世纪战争的过程中，都经历了历史重构的过程，也就是这些历史是如何被叙述的过程。由于各国的政治、社会以及历史的脉络不同，在战后重塑 20 世纪历史图景时，各国有着不同的历史叙述方式。我想首先确认这一点。

关于韩国，首先是解放，然后经历冷战，并最终实现民主化的社会巨大变革。从去殖民化的课题开始，进而在冷战期间，在思考如何处理包括与中国（大陆）和

台湾的关系等在内的东亚国际关系的过程中，逐渐建构出新的历史图景。作为这一过程的一个达成，现在强力提出了东亚史的观点，这当然与民主化进程和经济增长等密切相关。可以理解为，如此重构近代史历史图景是存在着韩国的独特脉络的。

另一方面，关于中国如何重构战后的历史，我认为，特别是在80年代以后，在中国出现了知识阶级试图以挑战所谓的主流历史观的方式来构建新的历史图景的动向。例如，今天演讲的陈红民老师，我记得他提出了所谓的“民国史观”。在“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之外，陈老师主张与之不同的“民国史观”也是必要的。也就是说，在重构中华民国的历史的过程中，认为必须建构战后中国新的历史图景，并在其中扮演引领者角色的正是陈老师。此外，还谈到了个人日记的出版，它虽非对主流历史观的对抗，但与前者一样也是一种挑战主流历史观的举动，即探索国家历史和个人历史之间存在何种可能性。而这一修正以国家为中心被叙述的近代历史观的努力，正是通过出版个人史和个人日记来进行探究的过程。此外还出现了“对他者的理解”这一关键词。而在加害者和受害者非常明确的情况下，提出了对加害者的理解应该以何种方式存在的问题，这在以前是绝不可能的非常大胆的设问。当然，理解他者并不意味着赞同或承认他者，但仍然提出了理解的必要性，这是新的历史存在方式的提出。还有许多其他问题。如记忆与遗忘的竞争问题，这些我们会在后面讨论。

关于日本方面，盐出老师刚才通过教科书将这个历史图景非常清晰地展示了出来。一个主要趋势是“加害与受害的历史观逆转”，这是50年代以来日本历史教育、历史研究以及整个社会的历史观变化的一个趋势。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在80年代提出了邻国条款，这件事本身在历史观或加害受害的问题之外，对于在对邻国的关照中形成的历史观也是重要的。围绕历史认识问题，日本与邻国之间展开了多次论争，在这些论争中也形成了新的时代图景。此外，还通过刚才的本人史（自我史）或自传来探索与国家历史图景不同的历史观。

如此，三个国家在战后的70年间一直在探索各自的历史图景。这个探索过程显然还没有到达终点。由此必然产生的问题是，如何缩小国家间的历史认识和新建构的历史图景之间的距离，以及今后重构历史图景将会如何发展。例如，在中国，在挑战主流历史观的过程中，新建构的这个历史图景在将来是会扩大并持续下去，还是会逆转？这对历史学家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关于“历史图景重构”的问题是第一个要点。

第二个要点，我想用“新史学”这个词来表达。这是关于如何构建东亚的新历史的问题。例如，在韩国使用的“东亚史”，日本的“历史综合”，正如刚才几位老师所指出的，二者之间有相当多的共同点。产生这些共同点的一个原因是，许多人提到的民主化这一概念。由民主化所实现的事情，以及因民主化缺席而无法实现的事情，确实是存在的。

正如之前提到的中国的情况，上海部分地区曾编纂了名为“历史”的新教材，虽然在使用了两三年后便中止了，但这本身可以看作是“历史综合”或“东亚史”这一趋势的一部分。虽然中国在这方面中断了。但是，如何作为这个地区的共通之物来构建新的历史学、新史学，或是否存在这种可能性，在这方面，可能大部分是中国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此外，也有一些不限于中国，而是与其他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例如，其中一个“记住什么”与“遗忘什么”“由谁来决定”的问题。关

于由谁来决定这个议题，涉及到历史学家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

此外，“对他者的理解”这一问题，我认为对于他者的理解正是与促成东亚和解相关的问题。三谷老师在昨天的恳亲会上也谈到，如果没有道歉的人和接受这一道歉的人双方的存在，和解便无法成立。在非常明确的受害历史中如何去追求对于他者的理解，这可能是历史学家的责任。此外还有“政治与历史的关系”问题，这是中国历史学家面临的重大问题，但不仅限于中国，所有历史学家都需要思考这一问题。再者是道德与历史的问题。或者说，对于历史学和历史本身所持有的意义，中国、韩国和日本的观点是不同的。考虑到这些前提，我们应该如何进行历史对话？如果中国的历史与亚洲其他国家不同，那么是应继续这种历史对话来追求共识呢，还是必须对某些问题作出改变呢？这些都是历史学家需要思考的问题。

历史学家还有一个工作便是关于“史料问题”，这也被提出来了。历史学家要做的不仅是寻找和阅读史料来书写历史，现在的时代要求历史学家以某种方式创造史料，通过让人们讲述和书写，亲自创作史料，以此来探索在新的时代中历史该有的面貌。这些都可以视为新史学的一部分。梁启超曾提出新史学，随着时代变迁，新史学的内容已发生变化。如何在这三个国家的历史学家之间追求新史学，正是我们肩负的课题。我认为在共同追求新史学的过程中，大家要一起克服历史中的各种问题，从而创造新的历史与和解的可能性。

以上是根据我所关注的问题对今天的讨论进行的一些感想整理。非常期待明天的讨论会如何展开。非常感谢今天为我们做报告的老师以及翻译们。

我的发言到此结束。

## 第5场

## 指定讨论 / 全体讨论

主持人：  
郑淳一 高丽大学

讲在讨论开始之前：  
三谷博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指定讨论者：金宪柱 国立韩巴大学  
(按发言顺序排序) 袁庆丰 中国传媒大学  
吉井文美 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  
史博公 中国传媒大学

[以母语发言。翻译：洪龙日（韩语）、于宁（日语）]



郑淳一

大家好，我是第5场的主持人，来自高丽大学的郑淳一。在正式进入讨论之前，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三谷博老师将为我们做“讲在讨论开始之前”的发言。有请三谷老师。

## 讲在讨论开始之前

三谷博

大家早上好。因为会议安排由我开场，尽管可能有些多余，但请允许我谈一谈。昨天，各位在“教育”、“媒介”、“研究”这三个主题上进行了极富创意的发言。许多内容都在探讨“历史学家如何将当下的公共议题与过去的世界联系起来”的问题。我认为这是符合此次会议的宗旨，促进跨越国界的历史对话的非常好的一个提议。在此基础上，在大家开始讨论之前，我想先提出一个问题。

传递过去的一个线索便是史料。对于“现在”，正如昨天提到的，我们可以创造史料。然而，历史的大部分工作其实是通过寻找已经存在于过去的“物”，从中来提取信息。创造新的史料，从历史学的基本原则来看，是一种极其危险的行为。制作史料是让民众史可视化的一种有效方法。然而，通常的历史并非如此。我们从

过去已经存在的“物”中提取信息，但在这种情况下，所需要的史料可能无法获得，作为证据的“物”可能没有留下来。我想今天在座的各位老师应该都曾学习过学术史学，在那里，不基于史料的解读是不被允许的。而且还会被要求进行类似于自然科学那样的严格的“事实核查”。史料的展示及其可信度的审查判定，即“史料批判”，是历史学作为学术的根本。

昨天讨论了记忆的生成与管理。但是，对于记忆我们能信任到什么程度呢？我在中学时曾打过棒球比赛，在最后的决赛时我们输了。大约30年后，我和队友们写了回忆录，初稿中写到我们一开始是领先的，但在最后被反超，抱憾输掉了比赛。然而，当时的记分簿还保留着，记录显示其实我们从一开始就一直在输。这说明记忆是相当不可靠的。我们不可避免地把故事编得戏剧化。这种记忆能被信任吗？以上是我分享给大家的我本人的经历。

另外，我研究的是非常经典的领域，即历史中最古老的政治史。然而，如果严格遵守学术原则的话，是会碰到一些困境的。有些应有的史料却怎么也找不到。我研究明治维新，明治维新带来的最大变化是世袭身份制度的废除。曾控制江户时代的武士们全都消失了，这是一次大规模的阶级革命。但我们却找不到能够表明他们想废除世袭身份制度的相关史料。就是说，我们想找到记述有如下诉求的史料：“现在的社会，人们的身份生而不同，受到歧视。这是违背正义的。我们要联合起来废除这种身份制度。”但没有这样的史料。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但无论如何，按道理应该存在的东西在现实上确实是没有的。事实上，在这个巨大变革的背后，确实堆积了人们对于身份制度的强烈不满。明治维新后，福泽谕吉和涩泽荣一等人写了这样的回忆录，但在幕末的同期史料中确实是没有的。那么，因为没有史料就能说他们没有不满吗？绝不是这样。如此，如果教条地遵守学术原则的话，有时问题会无法解决。

此外，昨天也提到了民众史，而法院记录是其有力的史料。在民众史研究中，民事诉讼的记录常被使用。因为诉讼记录中，民众的形象非常生动，利害关系和立场的碰撞以及背后的社会都清晰可见。然而，日本政府销毁了近代民事诉讼记录。因为有详细的诉讼记录，所以我们对江户时代的民众了解得很清楚，但因缺少近代的记录所以对近代不了解。对于民众的生活样貌，出现了反而是更早的时代比近代更容易让人去了解的微妙状况。这种史料的缺失给研究带来了巨大的障碍。

总结一下。我们不能因为没有史料，就断言本该由其所传达的过去是不存在的。但是，脱离史料凭空捏造故事也是不健全的。有的文学家或评论家会随意书写历史，比如写关于日本的历史，在YouTube等平台上传播。我们历史学家的叙事与这些文学或评论有何不同？历史学不同于文学以及评论。学术史学是“事实核查”的良好训练场。我们有时可能不得不涉足文学领域，但作为学者，我们不能放弃史料批判这一根基。关于这个边界问题，希望大家结合各自的专业做出相应的思考。

另外再追加一点，昨天我也提到过，接下来开始的讨论会提出比昨天更多的多样论点。这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难得的学习机会。个人的思考是有限的，要从他人那里学习，从他人那里借取智慧。历史学家一生都要持续这么做。因此，请大家务必倾听其他人的发言，并思考从中能够获得什么。

## ■ 指定讨论/全体讨论

郑淳一 三谷老师，非常感谢您的发言。现在我们将进入第5场的指定讨论。进入讨论之前，我想先简单说两点。

我曾在早稻田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由于会议地点在早稻田大学，这让我想起了留学时期的一些回忆。首先，我想起了那时每天早晨都通过NHK的《早安日本》新闻节目开始新的一天。今天早上，我恰好与彭浩老师约好早些见面，意外地在7点左右醒来，正好看到NHK在播放《早安日本》。节目中提到，今天是1945年8月9日长崎原子弹投放78周年，这让我觉得在今天这样一个讨论殖民时期和战争主题的学术会议上，这个日期有着特别的意义。

另外，我还想起了留学期间的另一件事。我非常幸运，得到了早稻田大学和渥美财团的奖学金，使我的留学生活相对轻松。然而，我还是做了不少兼职工作，其中最让我喜欢和受益的兼职是口译工作。那时，我充满信心地认为自己能胜任韩日口译，但实际上经历了不少困难。尽管我做的是交替传译，仍然觉得非常辛苦。现在我们有同声传译的译员在工作，我深知同声传译是非常艰辛的工作。因此，在各位老师讨论时，请务必考虑到译员的工作。我们在本国可能都是权威和专家，但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我们的发言如何被翻译成外语至关重要。最终将我们的观点传递出去的是译员。因此，请各位老师遵循“清晰、缓慢”的原则发言，这样才能更好地传达各位的研究内容和思想。

最后再补充一点。正如昨天我向指定讨论者们提到的，每位发言者的评论时间大约为7分钟。评论不应该是另一场演讲，而是与昨天的发言相关的感想或问题。如果有问题，请明确指出希望哪位报告者回答，这样有助于进行有效的问答交流。目前，我们有七位指定讨论者，第5场中将先请四位指定讨论者发言。顺序如前所述，首先是国立韩巴大学的金宪柱老师，然后是史博公老师，接着是吉井文美老师，最后是袁庆丰老师。

首先，请金宪柱老师发表评论。

金宪柱 大家好。此次会议聚集了中日韩三国的历史研究者，各国的背景在发言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作为韩国历史研究者，我对中国史和日本史仅有一些初步的了解，通过此次各位的报告，我学到了很多。因此，我想以感想、问题以及未来展望的方式来继续我们的对话。

在正式讨论之前，我想先说几句话。我认为，虽然中日韩三国在20世纪的历史经历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受害者叙事”。这种“受害者身份叙事”在各国有着不同的背景。我认为，克服这种受害者叙事是解决东亚历史问题的重要线索。

首先，通过盐出浩之老师的报告，我了解到战后日本人认为日本因战争受害，并被国家权力强迫参战。这种情况下，日本人的受害者意识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在福间良明老师的文章中，也提到战后年轻一代批判战中一代的受害者意识。综合来看，战后日本人的受害者意识或受害者叙事显然广泛存在。

读这些文章时，我想起了2013年上映的宫崎骏导演的动画片《起风了》。这部电影略显浪漫地描绘了二战期间日本战斗机设计师的生活，但在韩国，因为忽略

了日本帝国的历史侵略背景，受到很多批评。然而，当时我并没有对电影本身作出评价，而是一直好奇日本人在战争记忆中的体验。通过阅读本次会议论文，我的疑问得到了部分解答。简言之，日本人对战争和殖民统治的委屈感，最终基于受害者叙事。

然而，受害者叙事在任何条件下都会出现。如果说日本的受害者叙事是其反思自身历史的过程中出现的反作用，那么韩国也有过度主张受害者身份的一面。例如，韩国在越南战争中参战并犯下战争罪行，这一点在最近的判决中得到了确认。尽管这与日本的历史情境不同，但韩国也有加害的经历。然而，这段加害的记忆尚未被官方叙事承认，参战的士兵中因橙剂受害的士兵们也将自己视为受害者。

我认为，这种方式与日本的受害者叙事非常相似。也就是说，日本更多记得的是受到美国的伤害，而不是自身在殖民统治中的加害。同样，韩国尽管明确记得殖民统治的受害，却未能充分认识到对越南的加害。在民族主义强烈存在的情况下，无论经历了什么样的历史，受害者叙事都会根深蒂固地存在。在这一点上，韩日两国具有相似之处。

然而，仅仅发现相似之处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正视责任的问题。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历史学家是特莎·莫里斯-铃木（Tessa Morris-Suzuki）。她是英国人，目前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研究日本历史。她解释说，在殖民统治的责任问题上，加害国的国民无论个人意愿如何，都与殖民统治的责任有联系。例如，现代日本的辉煌发展部分归因于 20 世纪初中期对东亚国家的殖民统治，而韩国作为世界十大经济强国的繁荣也与参与了越南战争的历史性加害有关。

我之所以强调韩日两国历史经历的差异，是因为两国的历史教育和媒体都倾向于强调受害者叙事。有历史学者用“受害者意识民族主义”来解释东亚各国的受害者叙事。西江大学的林志弦教授提出了这样的主张，在不断的受害者叙事中，责任和反思往往被推到后面。因此，克服受害者叙事是东亚历史对话中的一个要点。

基于这样的思考，我想向盐出浩之老师提问。您在发言中提到了“历史综合”的方法，并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然而，仅从发言的内容来看，我不确定这是否能成为解决历史问题的关键。实际上，2021 年通过审定的“历史综合”教材，研究者河合干雄批评说，这仅仅是把日本史部分嵌入世界史，并且存在美化日本现代化的问题。韩国学者徐贤珠的研究也显示，在“历史综合”教材中，不同出版社的描述有所不同，但在强制征用和慰安妇问题上的描述减少了，内容和数量上都没有进步。

尽管通过“历史综合”教材，您所介绍的内容比以前有所进步，并且包含了很多重要的尝试，但我仍然怀疑它是否能达到克服受害者叙事和理解加害责任的阶段。如果仅仅是这样，那么“历史综合”可能只是“缝合”而已，我可能对“历史综合”的理解不够详细，还请您详细说明我的疑问是否在“历史综合”中得到了反映。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加害的结构性问题。福间老师提出了在 1980 年代之前的日本媒体文化中，出现了加害结构性反思的问题，这非常有趣。同时，他提到在 1980 年代之后，加害与歌颂（彰显）的二元对立再度出现，加害结构的质疑消失了，这也非常引人入胜。然而，福间老师似乎在 1960-70 年代的媒体文化中找到了某种替代方案。

但是，实际上，1960-70 年代日本社会的氛围中，虽然出现了一些有意义的讨论，

但这些讨论是否具有普遍性，我认为值得进一步探讨。根据我的浅薄认识，那一时期日本战后的战争责任论和全共斗运动，与1980年代韩国的民主化运动氛围相似。我好奇在这些时代背景下的思考是否能在当前环境中得到再次应用，因此在发言中没有看到近期有值得注意的讨论。尽管我学识浅薄，但我认为日本社会具有多样性，应该有一些有意义的动态或媒体内容，如果有的话，还请福间老师补充说明。

最后，我读了江沛老师关于伪满中国合作者的报告论文，觉得非常有趣。我也非常赞同江老师提出的探讨民众生存权和日常合作实质的问题意识。作为研究韩国现代社会运动史的研究者，我发现了许多类似的案例，因此对此深有共鸣。然而，分析这些实质后，我们可以展望什么，这也是我在思考的问题。当然，报告中提到的合作案例在韩国历史中也有类似的表现，但由于时间关系，我将略过这些具体细节。

接下来，我想提出一些具体的问题和疑问。首先，合作的原因被简化为困境或日常生活。如果按照本文的论调来看，日本的统治和伪满的统治的压迫结构似乎成为了依附变量。然而在我看来，合作不是合作者可以自主决定的，而是依附于统治结构。无论是在王朝时代还是在殖民地时代，合作都是被统治结构所决定的。例如，以韩国殖民统治为例，考虑到1920年代以后有计划地培养日本合作者的政策，显然朝鲜总督府的合作问题本质上存在于统治结构中。在本文中，关于伪满统治方式与合作关系的分析似乎没有完全呈现，我想问问您对此有何看法。尽管并非完全没有提及，但我认为这一点不够突出。

在昨天的报告中，您提到了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书中的平庸之恶论。然而，最近德国历史学界的研究表明，艾希曼并不是在无知的情况下进行屠杀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实证性的反驳。换句话说，艾希曼不仅仅是听从命令行事，而是积极提出了屠杀方法的建议。这不仅在实证上推翻了这一论点，还显示了根据言辞判断事实的危险性。

此外，如果过于沉迷于日常和平凡性，正如汉娜·阿伦特沉迷于艾希曼的欺骗性陈述一样，历史学家们也存在可能陷入通过历史个体的史料所得出的陈述之中的风险。即使承认这一前提，我也对您提到的施明儒的案例是否属于民众的概念有所疑问。作为伪满军人，施明儒处于一个特殊的职位，他是一名通信大队的指挥官，这使得我对您如何定义民众的范畴感到好奇。

最后，读这篇文章时，我想起了2000年代初期韩国历史学界，汉阳大学的尹海东教授出版的《殖民地的灰色地带》一书。这本书批判了将韩国殖民地历史视为统治与抵抗二分法的观点，主张关注在统治与抵抗之间灰色地带中的冲突与合作主体。当时，这一观点相当突破。尽管如今已被广泛接受，但当时面临了许多批评。虽然我对中国学界的研究动向了解不多，但我很好奇您的这些讨论在中国学界处于什么位置，又是如何被接受的。感谢您的聆听，我的讨论到此结束。谢谢。

郑淳一

金宪柱老师，非常感谢您的发言。看到昨天的报告者们非常紧张地聆听，我感到很有趣。他们似乎在想着“我的名字会不会被提到呢？”听了金宪柱老师的评论，我注意到您具体提到了三位研究者的名字和他们的报告内容。福间良明老师、盐出浩之老师和江沛老师，请三位稍后准备好回应和评论。

接下来我本来想请史博公老师发言，但由于一些情况，我想调整一下顺序，请袁庆丰老师先发言，可以吗？谢谢。

袁庆丰 各位早上好，再次感谢主办方邀请我来参加本次会议，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尤其诸位都是特别有成就的历史研究者，我是带着问题来参加这个会议的，所以请诸位一定要帮助我。我研究中国电影史，这里面有一个问题，请日本学者和韩国学者一定帮助我。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后，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全面侵华。一个月后，1937年8月份，日本在东北占领区的长春建立了一个电影制片厂，叫做“满洲映画协会”，简称“满映”。当然，那个时候伪满洲国已经成立了。这个“满映”是当时亚洲最大的电影制片厂，它的存在是从1937年8月开始，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根据1944年的统计，就是战争结束前一年的统计，“满映”一共有编导、演和技术人员1857人，其中日本人有1075人，占57.9%，中国人有711人，占38.3%，朝鲜人有51人，占2.7%，台湾人有20人，占1.1%。我重复一下这个比例，1857人的“满映”，日本人占了57.9%，中国人占了38.3%，朝鲜人占了2.7%，台湾人占了1.1%。在这八年期间，“满映”一共出品了300部以上的影片，其中故事片有100多部，有的说108部，有的说130部，总而言之有100多部故事片。根据我查找的资料，“满映”出品的影片，它当然主要是在中国占领区放映，因为大半个中国都沦陷了。很少一部分可能送到了日本本土和朝鲜放映。

我下面要请教各位问题，各位都是资深的历史学家，都是很有训练的专家学者，请问，在这八年期间，“满映”生产的这些电影，是中国电影吗？还是日本电影？各位学者一定帮我这个忙，它是中国电影吗？

我顺便报告一下，中国电影史对这个问题研究不表态，没办法说。现在的问题是，我作为研究者，只能看到一部“满映”的电影。据说，苏联占领东北以后，就把“满映”所有的东西全抢了，拿回了苏联，据说，1990年代日本把这些资料买过来了，送给了中国大陆一套，但是中国学者，我自己问了，有关方面也就是中国电影资料馆不让你看，不给我们看。这次我到东京来，第一向各位请教这个问题，“满映”的影片是不是中国电影，能不能叫做中国电影。第二，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在日本看到这些电影，哪怕一个。

我的问题说清楚了吗？请诸位一定帮忙。感谢，祝大家身体健康。

郑淳一 袁庆丰老师，感谢您的评论和提问。虽然您没有具体提到报告者的名字，但您第一个和第二个问题都非常重要。稍后我们将一起讨论这两个问题。

接下来，我想请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的吉井文美老师发表评论。由于个人原因，吉井文美老师今天原本计划通过在线方式发表评论，（但因为线上也无法参加，）已提前将评论发给了主持人。我们请彭浩老师代为朗读。谢谢。

吉井 (彭浩代读) 非常感谢各位昨天精彩而富有意义的发言和讨论。非常抱歉，虽然被指定为讨论者，但由于家庭原因，今天临时无法出席。因此，我将评论内容以书面形式提交。我的评论有两点。

第一点是关于从个人视角看历史的问题。听了江沛老师关于在（伪）满洲国担任低级军官的中国人的报告，我想起了管理河北省唐山开滦煤矿的一位英国人。他的名字叫内森（Nathan）。在1930年代，开滦煤矿是中国大陆产量第二大的煤矿，仅次于抚顺煤矿，经营实权掌握在英国人手中。内森住在天津英国租界，负责煤矿的管理。

1935年华北事变后，唐山被日本设立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所控制。日本要求开滦煤矿向冀东政府纳税和登记。起初，管理开滦煤矿的英国人拒绝了这一要求，因为冀东政府只是一个“事实上的政府”，并不是控制中国的“合法政府”。然而，随着中日战争的开始和战争的长期化，内森等英国人改变了态度，停止向南京国民政府纳税，转而向冀东政府纳税。对此内森解释说，“因为日本的统治力量似乎不会从华北消失，所以我们只能这么做”。

此后，当日本宣布东亚新秩序，并在华北加强对贸易和经济的控制时，内森对统治当地的日本表现出抗拒，并对在日本占领下继续经营煤矿越来越感到不安。他请求英国政府向日本施压以保护煤矿，但由于当时英国外交部无力干预东亚，这一请求被拒绝。在无法获得本国支持的情况下，为了在华北继续经营，英国人认为必须向统治当地的日本势力妥协让步，于是他们将原本销往上海和香港的煤炭转卖给日本，加强了与日本的关系。日本侵略中国，进军东南亚，而内森大量向日本出售煤炭，支持日本的军需工业，这使得英国外交部越来越排斥他。

内森对日本侵略的态度也体现了“心态经历了从忧患、焦虑到接受、顺从”（江论文 p50），以及在日本“强权下的生存”（江论文 p56）的一种侧面。

内森的史料保存在牛津大学，我在研究1930年代开滦煤矿与日本的关系时阅读这份史料，发现有英国人为了公司的利益甚至请求英国外交部承认临时政府，这让我非常惊讶。内森的考量与英国政府对东亚的政策不同，但如果站在他作为经营者的立场上，在被日本统治的天津试图去维护带来巨大财富的煤矿，可以说他所作出的选择也有其合理性。

通过内森的个人视角看历史，涉及到刘杰老师在论点整理时谈到的“国家历史认识和新建构的历史图景之间的距离”的问题。关于在认识到这种距离之后接下来应该怎么做的问题，通过内森，我揭示了一个小小的事实，即中日战争期间日本在华北的统治离不开当地英国人的合作，以及日本通过瓦解内森等英国人来加强统治的具体过程。通过揭示这个小事实，我相信可以缩小“国家历史认识和新建构的历史图景之间的距离”，或者成为思考为什么存在这种距离的契机，有助于多元理解战争和殖民统治的问题。

哪怕不像施明儒和内森那样，未能通过留下日记或手记的方式实时地将接二连三的“复杂而艰难的选择”流传给后世，但通过研究者和当地人士的引导，他们能够以本人史（自我史）的形式进行自我表达，安冈健一老师介绍的书写了本人史（自我史）的拥有中日血统的相泽莉依女士就是一个例子。接触这些无法以国家关系涵盖的个人经历与个人记忆，并积累这些个别事例来重构历史的实践，随着历史史料的多样化，在今后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第二点，关于刘杰老师整理的“对他者的理解”问题，我曾介绍过我所在的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相关的一个案例。2019年10月至2020年2月，韩国国立民族博物馆与我馆共同举办了名为“海带与裙带菜”的特别展。

该展览在主要研究民俗学的学者经过数年的共同研究之后进行举办，旨在“从相似和不同的角度，聚焦日本和韩国围绕海洋的日常历史及其变迁，描绘出先人们相互影响并主动接受对方文化的动态面貌”。展览由三个部分构成，最后的“跨越海洋”部分展示了近代渔民移动迁徙的样态以及由其所带来的文化交融。其中大部分涉及殖民时期。

在展览开幕前，韩国最高法院对强征劳工案作出判决，日本政府将韩国从贸易白名单中除名，导致日韩关系被认为达到战后最糟糕的状态。就是在这个时期，仍然举办了与日韩文化交流相关的展览，作为专攻历史学的研究者，我对此非常感兴趣，想要探究个中原因，于是我便去首尔参观了这个展览。

展览中的近代部分介绍了日本渔民引入新的捕鱼方法，以及朝鲜半岛纳入东亚广域经济圈给韩国传统渔业带来急剧变革，同时也对韩国的饮食文化产生重大影响。也介绍了由移居日本的济州岛海女所带来的文化，这些文化至今在日本仍然存在。不知道各位是否了解，殖民时期由日本人带过去的煮干文化现已扎根韩国，而日本餐桌上的常客明太子，它最早在日本被制作其实是因为战后韩国人在九州、博多想要重现记忆里的韩国味道。我是通过这个展览第一次知道了这些。

在日本殖民统治下，不能忽视的是日本人与韩国人之间存在过不对等的权力关系这一事实，但在日常生活层面，日本人与韩国人相互影响，并存在主动接受对方的文化，将之带入自己的生活的实践，而这些文化交流的痕迹也已融入了我们当今的生活，展览描绘出了这个事实。这个展览活用了民俗学视角的生动有趣。

研究殖民统治的学者老师可能会认为我的看法过于乐观，但我认为该展览从统治与被统治、加害与受害这一殖民统治时期相关构图中迈出去一步，提供了一种重新认识过去的契机。或许正因如此，该展览在日韩关系恶化时期依然能够开幕，并在首尔吸引众多访客前去观展。

作为刘杰老师论点整理的“对他者的理解”，以及在与他者的关系性中深化自我理解的例子，我分享上述案例。我的评论到此结束。

郑淳一

谢谢彭浩老师。吉井老师的评论也提到了加害与受害这一对立的历史认知，以及对这种对立进行相对化的努力，展现出相当大的魅力。具体提到了江沛老师、安冈老师和刘杰老师的名字，稍后我们将听听他们的回应。

接下来，我想请第5场的最后一位指定讨论者史博公老师发言。史老师现在在线上，请您简单做个自我介绍，然后在7分钟内进行评论。谢谢。

郑淳一

（因为网络问题）非常抱歉，作为主持人，我想稍微调整一下顺序。在史老师进行系统检查的同时，我们先请在评论中被提到的几位老师回应。首先请福间良明老师发言，然后是盐出老师、安冈老师和江沛老师。请按这个顺序进行回应和补充说明。福间老师，请开始。

福间良明

非常感谢大家的评论。第一个是关于1960年代围绕加害与责任展开的讨论是否具有特殊性的问题。正如我昨天所提到的，1960年代围绕加害与受害所迸发的讨论确实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特点。但同时，无论是何种言论，似乎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当时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背景的制约。要区分什么是普遍性，什么是特殊性，其实并非易事。但考虑到1960年代的社会背景，那时战中世代具有社会发言权，而年轻一代则开始试图争取发言权，也就是说当时正处于发言权代际交替的时期。在年轻一代挑战上一代的过程中，作为批判上一代的逻辑，出现了受害者意识批判和加害责任的讨论。另一方面，上一代也并非完全忽视加害问题，但在这个讨论中他们也提出了一个论点，即是否应该将战争体验或相关记忆用于当时的政治之中。

在战后日本人中，确实广泛存在某种受害者意识。但值得思考的是如何去处理加害问题。这也与我昨天提到的内容有关，当讨论加害时，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的年轻一代确实更容易发言。这是因为他们未被置身于相同的条件中，不用担心自己会实施同样的加害行为，因而更容易追究加害责任。如果自己没有责任，确实更容易去追究责任，但如果自己处在相同的情境中，是否能保证自己不实施同样的暴力行为呢？我认为这一点不仅仅是日本的战中一代，对于其他各个世代及之外的人们也可以同样进行思考。这也与我昨天稍稍提及的内容有关，即这是一种让恶劣暴力显得不恶劣的情境和行动。不仅仅是暴力本身，还需要思考如何看待让暴力带有某种正义性的那些行为。我认为我昨天谈的这些是在1960年代的代际冲突中产生的讨论。然后我谈到，在此基础上，加害与验证的讨论在80年代、90年代乃至至今一直以这种二元对立的形式存在。要说今后有没有可能性，当然并非没有。在过去的10到15年间，日本国内与“战争社会学”相关的讨论逐渐升温。在这些讨论中，某种意义上与传统的正义和规范保持了一定距离，重新审视正义的本质。因此，不仅仅是历史认识的对错，更要讨论这些争论在何种社会背景下产生，以及其中被忽视的是什么。我认为这个讨论以相对年轻的中坚一代为中心正逐渐加深。

还有一个关于“满映”的问题，由于我自身对这个领域了解不多，因此很难回答。如果是在日本，可以考虑向日本的国立电影资料馆的研究员咨询，或者联系谷川建司老师或板仓史明老师等专家，他们对战前电影史非常有研究，这或许是一条捷径。

郑淳一

谢谢福间老师。感谢您对金宪柱老师的评论进行回应，并补充说明了袁庆丰老师提到的满洲映画协会的日本方面相关情况，对我们帮助很大。

很抱歉从盐出老师开始我不得不提醒，评论时间请控制在3分钟内，即使延长也请不要超过5分钟，这样可以让更多的老师有发言机会。拜托了。

盐出浩之

金宪柱老师，感谢您的提问。关于“历史综合”这个科目或者教科书存在着各种课题，您说的没错。首先，关于“只不过是把日本史纳入世界史而已”的批评，事实上，从教科书的篇幅来看，日本史大约占三分之一，其余的三分之二是世界史或者其他内容，因此可以明显看出世界史是核心。另外，确实存在“由谁在现场教这门科目”的问题。也就是说，过去的高中老师们都是按世界史老师和日本史老师来分的，那么现在要由谁来负责教这门课呢？因为世界史是核心，所以由世界史老师来教，还是分担教学，或者由日本史老师来教，亦或是由之前没有教授过历史的老师来教？听说在实际操作中存在许多问题。不过，就内容而言，并不仅仅是简单地把世界史和日本史合并，还有一些教科书在跨越两者的叙述上做了很多努力，不完全是简单的加法。我认为各家出版社都下了一番苦心，各有巧思。

关于对日本近代礼赞的批评，我也非常理解。这其中有几个原因，其中之一是，自民党政权方面的压力似乎反映在了学习指导纲要上。不过，也存在一些无法避免的问题。即日本的孩子们通过教科书学习以后，是否还能喜欢上自己的国家。这一点在昨天的报告中也提到，有学生评论说，包括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在内，他们希望通过学习能喜欢上自己的国家。我认为需要认真考虑这一点。也就是说，如果只学习负面的方面，孩子们能否接受？相反，认为日本在过去的所有方面都是正确的，这种观点显然是不健全的，所以归根结底还是要把握好平衡。在此基础上还有一个

问题，这与昨天梁知惠老师提到的问题有所重合，当前“历史综合”教科书在整体上近代化论调非常强烈，对经济增长持非常积极的态度，与其说这是对近代礼赞，是对日本近代的礼赞，不如说更像是对近代化的礼赞。因此，我认为如何看待这一点是今后一大课题。

有人批评说教科书跟以前相比减少了对于慰安妇和强制动员相关的内容，对此我也可以理解。这些问题不仅受到邻国的关注，也受到国内右翼的高度关注，双方都在制作检查清单，编写者和教科书公司都非常留心这方面的问题。不过，我要补充的是，我参与编写的教科书中，这些内容在正文中都有详细描述。

郑淳一

盐出老师，非常感谢您。最后，我想再次强调您编写的教科书中明确提到了慰安妇问题。现在我们将连线中国，试试看能否听到史博公老师的声音。史老师，您能听到吗？请您做个自我介绍并发表评论。

史博公

各位好，首先感谢会议主办方给我提供了这次宝贵的学习与交流机会。我的报告题目是《谈“二战题材”影视剧对促进民族和解的意义》。

我认为，国家之间的积怨应当本着尊重历史的原则，想方设法尽早达成“和解”，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而达成“和解”的重要前提之一，就是要对国民普及真实的而非虚妄的历史知识，同时对彼此的现实状况也要加强交流、增进了解。在践行上述使命的过程中，除政府引导和学校教育外，我认为媒体的效用也相当重要。其中，“二战”题材影视剧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尤为突出。

具体来看，自1930年代迄今，中日韩三国都已拍摄过不少相关影片。其中有些作品的历史观、价值观很好，对化解历史仇怨，加深彼此理解，促进相互合作，推进当下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例如，日本的《二十四只眼睛》、中国的《将军与孤女》等影片就很出色。当然，也有部分作品存在严重偏差，产生了不良影响。这种情形在中日韩三国都不乏其例，其中“抗日神剧”的糟糕表现尤为明显。

所谓“抗日神剧”，就是采用一些诸如“手撕鬼子”“石头打飞机”“子弹拐弯”“裤裆藏雷”等违反军事常识和生活逻辑的荒谬情节，去表现抗战历史的影视剧，典型如《追击阿多丸》《抗日奇侠》《一起打鬼子》《永不磨灭的番号》等。这类作品集出现在21世纪的最初十年前后，其衍生逻辑和创作理念在我的论文里已有较多阐释（详见：《“抗日神剧”的衍生逻辑、传播效应及创作反思》，载《抗日战争研究》2020年03期），现在我主要谈谈它的传播效应以及聆听本次会议的一些感受。

首先，“抗日神剧”带给中国观众的多为负面观感。它把残酷的战争和严肃的历史戏谑化，从叙事到表演都显得极为轻佻乖戾，充斥着许多反历史、反文明、反人性、反常识、反理性的现象。可以说，它们就是一堆扭曲历史真相、渲染民族仇恨、宣泄低级欲望的文化糟粕。亦因此，中国的文化界、学术界和主流媒体对“抗日神剧”均持严厉批评的态度。尽管这类作品目前已基本销声匿迹，但作为一种曾经存在了十多年的影视现象，我们仍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刻检讨和反思。

其次，“抗日神剧”还严重损害了中华民族的国际形象，尤其是在这类作品大量出现时，很容易让外国人误以为中国人的价值观很扭曲，艺术修养也很低劣。但事实上，“抗日神剧”只是中国影视发展史上的一股短暂逆流。仅就二战题材影视剧而言，中国在过去的八十多年里，也拍摄过不少反对战争、呼吁和平的佳作，诸

如《玉色蝴蝶》(1980)、《一盘没有下完的棋》(1982)、《将军与孤女》(1984)、《清凉寺钟声》(1991)等。这些影片讲述了中日两国民众相互扶助、共渡难关的深厚情谊,也展示了战争给双方造成的巨大灾难。它们既没有回避战争的罪恶,也没有纠结历史的仇怨,而是用跨越种族的“人间大爱”去弥合过往的创伤,去描画未来的愿景。这类作品为世界敲响了历史的警钟,也为观众播下了和平的种子,对促进中日两国的和解与发展显然有无可替代的积极意义。

综上所述,优秀的影视作品有利于增进民族间的和解与共情,而低劣的作品只能增加民族间的裂隙乃至敌视。当两类作品都存在时,加强跨国文化交流就显得格外重要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彼此获得更为真切全面的信息,才能避免因偏见而衍生没完没了的怨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渥美财团和早稻田大学的努力就有了特别重要的时代意义。

众所周知,目前的世界并不太平,有些地区的冲突还相当激烈,东亚的局势也正在变得日益严峻。造成这些状况的缘由当然很复杂,但彼此间因沟通不足,导致对某些现象误判,进而引发争端的情形也并不罕见。因此,加强从政府到民间的多层次沟通,是促进民族和解的有效路径。因此,我衷心希望类似渥美财团和早稻田大学这样的学术活动能常办常新、越办越多,更希望中日韩三国能够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早日卸下过往仇怨的沉重包袱,共同为亚洲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更有意义的贡献。

此外,我对会议的主办方还有个小建议——今后能否增加一个专门讨论“中日韩民间友好交往史研究”的单元,具体议题如:1)清末民初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情况研究。2)中日两国相互赈灾史研究。3)中日韩跨国婚姻研究等。

我的汇报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 郑淳一

不知道是否传到了身在中国的您那里,但会议厅这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非常感谢您,史博公老师。您提到了抗日相关的电视剧,还讨论了与历史教育相关的重要问题。我认为,您传达的信息不仅是“发动战争的人是坏人”和“我们受到了很多伤害”,更重要的是,反思战争并将其引向和平的讨论。

接下来,我们继续之前的讨论,请安冈健一老师就吉井文美老师评论中提到的本人史(自我史)做一些补充说明。

#### 安冈健一

感谢大家给我提出的几个问题。主持人提到了要我回答吉井老师的提问,但我想首先稍微谈一下袁庆丰老师的评论。

袁老师在评论中提到满洲的电影,谈到满映的作品究竟是中国电影还是日本电影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体现在现代各个层面中的问题。日本有大量移民前往巴西和美国,并在那里建立社区,进行各种文化活动。那么这些文化活动算是日本历史的一部分吗?再比如,因日本的殖民统治而在日本居住的在日韩国人,他们在日本建立的社区,进行的教育和文化活动,这些又是否应归类为日本历史的一部分?

在我看来,这取决于我们如何展望日本,或者如何展望中国,这与我们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以及历史叙述密切相关。在对社会进行想象时,我们是选择将一个时代或地区排他性地归属于某一方,还是尝试将双方视为一个流动和交叉的存在,并构想以这样的方式存在的国家是否可行。而这种思考方式会影响我们对过去的把握。

当我思考这个问题时,我想再次回顾吉井老师提到的从个人角度看历史的评论。这也与刚才讨论到的加害和受害问题密切相关。侵略和统治显然是加害行为,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对于本次谈到的那些处于灰色地带的行为,我们应该去理解在结构性不公正的环境中,人类如何生存的那些复杂因素。环境本身就是不公正的,这一点必须明确。而在这种环境中,人们是如何表现如何行动的,要弄清这一点,我认为从个人记录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此外,这个加害与受害的框架,我认为存在有时会把所谓的受害视为已知的事实的风险。虽然有关于受害者意识的民族主义的讨论,但我们对于该受害的方式本身应该还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

三谷老师在开场致辞中指出了与制作史料相关的危险性,我对此表示赞同。我认为这种危险性确实存在。然而,正因为如此,专业人员应认真对待这一问题,并通过专业的努力揭示更多真相。日本慰安妇的证言几乎没能被充分记录下来,考虑到实际的受害状况,关于日本被强征的工人们的经验的调查也是非常不足的。当我们讨论受害者意识或加害与受害时,会不会表现得好像已经完全了解了这一问题?如果仍有被遗忘的事实,我们该如何记录和思考?为了思考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需要努力去倾听每一个人的想法。

郑淳一

谢谢安冈老师。您的发言非常广泛,涵盖了许多主题,是一次很好的讨论。现在请江沛老师发言。

江沛

好的,我回应一下,我的问题比较多。我觉得一个是论文本身写得不好,第二个可能是我觉得我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占领下民众的生活心态,这大概是在无数的战争状态或者强权之下可能具有普遍意义的话题。

感谢金老师、袁老师、吉井文美老师的提问。金老师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说真的,怎么看在沦陷区生存的民众,涉及到我们的历史评价标准,我是一直在强调,希望在今天我们没办法跳出民族国家立场的同时,能有一个民众的立场,能够有一个对人性的尊重,把这两个结合起来,可能是我们走出今天困境的一个思路吧。那在昨天的演讲中我也讲了,民族主义意识,中国在当时是有精英和下层之分的,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的资料,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于知识分子或者政治精英他们的表述。在民众的层面上,他们在当时的民族主义意识还是比较弱的。所以当时中国的民众有一句话叫“谁当朝就给谁纳粮”。政治统治者是谁,好像对他们来讲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这就能够看到当年他们的民族国家立场和今天我们的理解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另外,当年日军进攻华北的时候,华北有一个民间组织叫“联庄会”,就是村庄联合的意思。他们提出的口号叫“不抗日,不降日,保家乡”,日本人你只要不打我,我也不打你,你要打我,我就打你,我的目的就是保护我的家乡。这实际上是没有民族主义意识的,而是家族主义、地域主义,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今天讨论战时,我觉得为什么要跳出民族国家立场,就是因为民族国家立场这样一个大的宏观视野之下,我们没有去关注在强权之下一亿多民众他们究竟是如何生存的,这可能是历史最根本的要义。那么日本及伪政府可能会让合作者受益,当然也会让合作者得到利益以后变得顺从。但是,合作者对统治者的认同,我个人认为是需要时间的。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当年满族入关,清军入关,打败明朝,那

个时候，要求中国人要蓄辫子，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不愿意做，因为这是民族的一个象征。所以当时清军的政策叫“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你要剃头你就可以活着，要不然就杀掉。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殖民政策，但是268年以后，当清朝灭亡的时候，我们现在需要剪辫子的时候，很多人哭哭啼啼不愿意剪，因为他已经认同了，他把它变成了自己的一种文化象征了，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所以当民众没有一个普遍的民族主义意识的时候，我们用我们想象的民族共同体的概念去要求他们，那么对很多问题就很难解释。华北有的县，日军的一个班大概十几个人，就可以统治一个县，没有人反抗，它带着伪政权就可以统治，就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

另外有老师刚才补充提问说，施明儒是伪军军官，他能不能算民众。因为他是一个非常低级的，一个通讯队的副队长，手下大概有一二十个人，他也没有读过什么高等的学校，他只是考了军校，他基本上生活在基层，那么我认为他和高级官员不是一回事，所以他应该是属于一个普通的民众。

另外金老师讲到阿伦特讲艾希曼的时候，她是认同他在法庭的陈述的。所以后来有另外一本书指责那本书写得并不是非常完整的。但是问题是，阿伦特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艾希曼现象”。他是用他的职位来为自己开脱，艾希曼知道这是屠杀犹太人，但是他用他的职位，自己是职务犯罪，是不得不去做这个事，来为自己开脱，所以阿伦特将其归结为“平庸之恶”。这对我极有启发。在谈及沦陷区日本的统治时，我们多只讲日军对中国人的加害，有没有我们自己同胞在里边对同胞的各种各样的加害呢？为了自己的生存，为了自己过得更好。那么这就是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所以我是有这样一个思考。

另外，关于学者应该对于口述资料、日记有一个客观的审视，这没有问题。但是我个人为什么特别倾向于对日记给予高度的关注，因为一个平民，他当年记日记只是一个习惯，他只是记录自己的日常，他并不像蒋介石那样知道日后自己的日记一定会有人看，所以《蒋介石日记》不能完全去相信的。但是一个普通民众他记录他的日常生活，其真实的价值可能更高。反而是我们后来，八、九十年代很多人的回忆录，在当时的条件下，会有意无意修改自己的记忆，那个材料有的时候真的就有问题了。

总而言之，我还是非常感谢包括吉井文美老师提的英国人内森那样的例子，非常感谢，以后我也跟吉井老师多交流。包括袁老师讲的伪满时期生产的电影到底归谁，其实我觉得它就是中国的，因为它只不过是日伪占领时期产生的东西，傅葆石那本书讲上海电影，里边其实谈了非常复杂的问题，这个我们可以下来交流。就像伪大学、伪报刊，历史都是需要继承的，这些东西可能我们觉得是民族的耻辱，但它也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包括伪大学生，你不能把人都杀了吧。我们鉴别以后，还是中国人，你还是要让他生存的嘛。我就讲到这里。

郑淳一

感谢您的评论。之前有几位观众请求发言，三谷博老师首先申请了发言。我将给您两分钟的时间，然后川崎老师也请您发言控制在两分钟左右。首先有请三谷博老师发言。

三谷博

金宪柱老师提问了关于“历史综合”的问题，盐出老师也做出了回答。但因为我曾参与制定其原案计划，所以我想解释一下背景情况。

文部科学省制定学习指导要领，然后根据该要领编写教科书，并在教室里进行教学。日本的历史教育大致分为这三个阶段。关于“历史综合”这门课程，其实在文部科学省制定学习指导要领之前，日本学术会议这一组织已经提议设立“历史基础”课程。当时的计划由四、五个人负责，我也是其中之一。这个“历史基础”课程提案的一个重要支柱是将世界史和日本史融合在一起。此外，重视全球化现象，以及重视与邻国的关系也是构成原则的重要支柱。文部科学省可能参考了这个提案，实际在制定“历史综合”课程与制定指导要领时，删掉了重视全球化与邻国关系这两个支柱。据我所知，在制定学习指导要领框架的阶段，没有历史学家参与其中。文部科学省内部也有历史专家，但他们也被排除在外。据说是由事务官和一些不明身份的人以及教育学者共同制定了这个要领。历史学家被排除在外，这是一件非常令人羞愧的事情。当时的内阁在日本战后史中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内阁。现在的内阁是否如此，我还不清楚。但正因为这些政治背景，才导致了制定出这样扭曲的要领框架。不过，当实际编写指导要领时，有非常优秀的历史学家和教育学者参与起草，因此最终还是制定出了可用的指导要领。在编写教科书阶段，也将其改成了可以使用的版本。最后在教学现场，老师们也在努力使课堂教学能够更好。虽然最初的框架非常糟糕，但实际的教育已经以这种形式开始了。七年后应该会制定新的指导要领，所以我们现在必须做好制定更好的内容的准备，我是这样认为的。

郑淳一

感谢三谷老师分享“历史综合”的诞生背景和幕后故事。接下来可能是第5场的最后一位发言者，请川崎老师发言。拜托了。

川崎刚

我在早稻田大学社会科的英语学位项目中负责教日本的媒体课程。我不是历史专家，几年前我还是《朝日新闻》的记者。我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始终尊重历史专家的博学者。

大约十年前，一位我从年轻时就有交往的国立大学的老师在退休时，就当时《朝日新闻》上的一些文章，他向我表达了带有批评意味的评论，说道：“年轻记者对历史的认识不够。”8月份关于战争记忆、原爆纪念日、8月15日等历史事件的报道，大多由年轻记者负责。报社和电视台的社会部以及地方各县的地方总局，通常会指派这些记者负责和平或者战争记录等专题，他们自己寻找素材，进行采访，然后撰写新闻报道或制作节目。由于战争相关的历史考证集中在夏季，有时会被批评为“8月的新闻业”或者“夏日的金鱼贩卖”。或许有些文章在基本知识上存在问题，也可能出现编辑未能进行适当修改的问题。但我想强调的是，不仅仅是《朝日新闻》，所有进入媒体的年轻人，至少在那个时期，都是最优秀的年轻人之一。他们几个月前还在大学里，应该还在与历史学教授进行交流。如果大学没有提供一个培养他们历史观的环境，单靠媒体又如何能持续发表符合历史的正确报道呢？我当时在写给那位老师的有些幼稚的反驳邮件中提到，希望老师在批评年轻记者之前，能稍微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战后几十年，每年夏天都会有回顾战争的报道。最近我注意到一件事情。我出生于20世纪后半叶，在我少年时期，社会上仍然残留着战争的记忆，还有讲述战争经历的原子弹爆炸幸存者和老兵。成为报社记者后，我曾发表过关于在韩原子弹爆炸幸存者的长篇证言。如今的年轻记者在没有这些记忆的情况下，需要负责战争

专题报道。他们可能会与长崎和广岛的原子弹爆炸幸存者团体、在大学教授现代史的老师会面，阅读史料和书籍，采访战争受害者及其家属，甚至可以接触到愿意讲述关于被侵略的记忆与传承的韩国人、中国人，或战后占领日本的美国相关人士。总之，他们在被揶揄是在进行“夏日的金鱼贩卖”时，仍然努力在自己负责的地区中寻找与战争有关的故事，其中一些优秀的故事可能会作为历史而被保留下来。通过负责夏季的战争报道，记者得以成长，他们会更加意识到普遍的历史存在，开始认真对待历史，并将其应用于后续的记者工作中。这是理想的状态。当然，这不仅限于报纸，电视台的年轻记者们也在挑战这个主题。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记者愿意挑战历史性主题。NHK 的夏季特别节目评价特别高，几年前，他们详细记录了日军在缅甸的英帕尔战役，揭露了日军高层的无谋、无计划和无能。仅仅听取证言和采访还不够，最重要的是将这些内容制作成文章或节目，以新闻报道或电视节目的形式传达给读者或电视观众。这一连串繁琐的工作对于媒体记者建立自己的历史认识是非常必要的。我认为主流媒体和自由撰稿人的非虚构作品，是在学术界之外，日本人持续检验历史的尝试。

今年距 1923 年 9 月 1 日发生关东大地震刚好 100 周年。接下来应该会制作大量的报道和电视节目。而现在日本社会的状况是，东京都知事拒绝向记录朝鲜人虐杀受害者的集会致辞。即使被称为“8 月的新闻业”，我相信报道媒体也不会停止检验近现代史这一挑战。媒体面临许多问题，但我希望能与历史学家的各位老师一起思考和解决这些问题。

郑淳一

谢谢。川崎老师从媒体从业者的角度进行了评论。虽然时间有些超时，但我和彭浩老师商量后调整了时间。或许在第 5 场提到的讨论中，还有人希望在此发表意见。虽然不能给太多机会，但可以给一位与会者发言的机会。请平山老师发言。

平山升

首先，关于昨天的第 4 场会议，我有一个重要的补充说明。唐小兵老师问及日本是否有将专业历史研究成果通俗化并向大众广泛传播的人，对此安冈健一老师和福间良明老师在解释中有一个重要方面没有提到，那就是历史电视剧的“时代考证”。在日本，电视台（尤其是 NHK）播放的历史电视剧虽然包含很多与史实不符的虚构和演绎内容，但通常会聘请专门研究该历史时期的历史学者进行“时代考证”，这已成为惯例。去年，一位负责时代考证的年轻研究者详细记录了他与电视剧制作人员的互动经历，并在学会杂志上发表了文章（木下龙马《时代考证的领域：与大河剧《镰仓殿的 13 人》的日子》，《历史评论》第 870 期，2022 年 10 月）。文章揭示了编剧和制作负责人如何仔细阅读史料和研究成果，以提升电视剧的真实性。尽管常有人说，由于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现在的年轻人正在远离电视，但由人气偶像出演的 NHK 历史剧仍吸引了大量年轻粉丝观看，显示出电视剧跨越世代的影响力依然存在。这种电视剧重视专业研究者见解的现象，我认为非常值得关注。我也很想知道，韩国和中国是否有类似的做法。以上就是我的补充评论。

郑淳一

平山老师，非常感谢您的重要补充说明。虽然有很多话题想讨论，但由于主持能力有限，无法进行更多讨论。

接下来将进入第 6 场，由彭浩老师主持，我对此充满期待。辛苦了，谢谢大家。

## 第6场

## 指定讨论/全体讨论

主持人：彭浩 大阪公立大学

指定讨论者：张晓刚 长春师范大学  
(按发言顺序排序) 金滢 首尔大学  
平山升 神奈川大学

[以母语发言。翻译：洪龙日（韩语）、于宁（日语）]



彭浩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6场综合讨论的部分。上半场我们已经感受到了热烈的气氛，同时又担心大家语速会越来越快，所以请大家保持语速。下半场还是请三位指定讨论者首先进行发言。我们来安排一下发言顺序，第一位请张晓刚老师发言，然后是金滢老师，最后是平山老师，可以吗？请三位老师按这个顺序进行发言。首先在网上请张晓刚老师给我们做点评，谢谢。

张晓刚 各位老师，学界同仁，大家上午好！我听完昨天各位老师的会议发言，受益匪浅。首先，我非常荣幸能够参加本次会议，也对刘杰教授和主持人老师，包括会务组其他老师、担任同声传译的老师和同学们的辛勤劳作和付出表示衷心的感谢。其次，我因为上个月初得了新冠肺炎，目前尚处于恢复阶段，没能到会场向诸位师友当面请教，深感遗憾并表示歉意。本次会议截止到目前，包括上午的上半场都非常成功。我本来想跟中日韩三国的学者都能交流一下，昨天跟韩国学者李基勋老师已经交流过了。南开大学的江沛教授上半场其实已经回答了相关问题，主要是关于日记、书信，还有口述史和回忆录等这些史料的真实性、可信度的问题。我感觉江老师的回答非常得体，尤其还举了《蒋介石日记》的例子，认为作者（蒋介石）考虑

到那个日记将来早晚要公开，在有些内容的记述是可能是有取舍的，有些东西不能完全采信，需要第三方材料的佐证。我认为江老师的分析有一定的道理。另外，还有一些其他问题，包括中日战争期间中国的汉奸比较多、抵抗力弱等问题，有机会再向他请教。

时间有限，我今天主要想对有关日本殖民主义、殖民侵略实践的问题请教一下日本学者，主要是盐出浩之老师和安冈健一老师，他们的文章都提到这个问题。我也发现，咱们这次会议主要从教育的角度，还有从传媒的角度对日本殖民历史进行探讨，实际上对殖民理论的探讨比较欠缺。尤其对日本的殖民主义，或者殖民学等概念，很少有涉及到。实际上我也谈不上专家，某种意义上还是门外汉，但是最近几年一直在关注日本的殖民主义理论问题，尤其是日本的北大学派。北大学派就是指北海道大学学派，早期是札幌农学校；这里面就提到了很多人，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比方说佐藤昌介，最早是在该学校教授殖民学，从教学乃至从理论上进行探讨。后来就是曾经写了《武士道》的日本著名的学者新渡户稻造等人，他们从欧美等国留学回来，在北海道大学任教期间带了一批学生。代表性的有东乡实，他后来既研究殖民学，又到殖民地任职，比方说到台湾等地，做一些指导殖民地管理和实践活动的工作。这些人就把在北海道学习的殖民地理论和实践知识应用到对殖民地的管理工作之中，具体而言，日本政府就把这些殖民官员派到台湾、朝鲜半岛这些地方进行指导和管理。当然还有到“关东州”来的人，“关东州”就是中国大连和旅顺地区，当时还不能把它和东北地区同等看待。大家都知道，因为甲午战争清朝战败把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后来“三国干涉还辽”俄国又把它占为租借地。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又把“关东州”占领了。日本在关东州的殖民统治有别于台湾、朝鲜半岛，包括后来的东北，即伪满洲国的殖民统治体系。在此我想提到一点，我收集了十几张日本明治时期到昭和时期（太平洋战争时期）的地图。当时，地图里是把“关东州”即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台湾，包括日本的本土，以及库页岛（日语所说的桦太）的南部标为深红颜色。这是什么概念呢？大概表明这些土地都是日本的领土，当时日本人或许是这样理解的。实际上应该指出，辽东半岛（“关东州”）不是日本的领土，它只是租借地，它跟台湾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当然了，伪满洲国又是另外一种情况，它是日本关东军扶持一个傀儡政权。

一直以来有很多日本学者在探讨中国的东北问题，亦即伪满洲国的有关问题。我参加一些学术会议时也经常与日本学者进行交流，探讨如何看待日本在东北的移民、开拓团问题，包括在东北的城市化、工业化等问题。我看了盐出浩之和安冈健一两位老师的发表，一个是从教科书的视角探讨中日战争期间日本的教育和殖民地统治问题；另一个是安冈先生提出了通过对个体的人的研究，考察殖民地统治和20世纪的战争问题。我感觉二位学者对殖民主义问题还是没有作更多深入的讨论，但是他们提出的一些思路、想法和建议是非常好的，值得我们中国学者借鉴，至少值得我来学习和参考。尤其是安冈先生还提出了拥有撰写历史权利的个人，以及从战争的殖民统治的历史中探寻和解的一些线索，通过学术研究探讨东亚人民和解问题这一点确实是值得肯定的。另外，安冈先生强调了个人在历史书写中的重要性，显然，中国学者在这一方面重视的还不够。客观而言，个人，尤其是学者或历史研究者个人的独立见解、个人的潜心研究，建立在扎实史料基础上的通过实证性的论从史出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江沛老师也提到了一个问题，比如日记，包括口述史的重要作用。安冈老师也提到了个人书写问题。我就想到了日本在江户幕末的开港时期，对官方的记录，比如说美国黑船叩关日本的时候，除了官方的外交文书的记载，还有民间日记、家书的记载，民间的一些人士，不管他的出身是农民、商人还是学者，他们的家书特别重要，书信和日记都是真实记录和反映历史史实的一面。就像江沛老师说的那样，记录者当时没有顾及到，没想到这个要外传的问题，也没有考虑到个人的一些的利益得失，它是相当有真实性的，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我现在想对二位日本学者提出问题。首先是想请问盐出老师，在进行日本教科书的研究中对殖民地、殖民统治等相关课题，有没有过统计报告或社会调查？比方说，受调查者对日本殖民统治历史持批判的、肯定的，还有居中的，大致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因为在日本学术界“殖民主义”早期是个中性词，并不是贬义的。二战结束以后因为被殖民的国家纷纷走向独立，学术界也开始对殖民主义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和批判。下面想对安冈先生提个问题，您提到 20 世纪的战争、殖民统治的研究，也提到了挖掘东北移民的历史。那么，您所说的中国东北地区的移民，是否仅限于日本派遣开拓团的问题？您觉得在东北移民问题上还应该关注哪些具体问题，有哪些需要格外加以注意，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我还有一些想请教的问题，时间原因期待以后有机会再和大家交流。我的提问到此为止，谢谢大家。

彭浩

谢谢张老师。张老师给我们补充了一些殖民地学方面的知识和研究动向，并且向几位老师提了一些问题和意见。因为时间关系在这里我就不多做总结，接下来，我们有请金濤老师发言，希望发言尽量不要超过 7 分钟，谢谢。

金濤

为了准备这篇讨论稿，昨晚我没能享用美味的啤酒和料理，因此希望能慢慢地把它读完。在讨论开始之前，三谷博老师提到了倾听他人声音的重要性。孔子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在座有三十多位老师，我有很多可以学习的地方。再次感谢渥美财团的各位组织了这样的讨论会。

实际上，此次讨论会最重要的主题是面向未来的历史学实践。最重要的问题是，未来的历史学应该是什么，应该为何而实践。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中提到，“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无论是否思考未来，都能深刻地感受到未来”，并指出，历史学家不仅要问“为什么”，还要问“向哪里去”。这句话非常经典。简而言之，历史学家不是引发对过去怀念的人，而是负有提出未来方案职责的人，因此历史学常常面临这样的压力和危机。

这一点非常重要。深入研究过去本身并非易事，但让历史学者更加困惑的是历史学如何为未来的实践做出贡献。这使历史学者感到强烈的责任感，因此这次会议也让我们历史学者感受到责任，我也因此曾犹豫是否参加。

但是，如果没有对历史学未来的讨论，无论是保存共同体的历史，还是维持个人的生活，或是促进世界的和平，那都是一种责任的放弃，甚至可以说是失职。当然，美国哲学家理查德·麦凯·罗蒂曾主张，“对过去的讨论是不必要的，仅凭对未来的共同希望，就可以建立新的联结”。我并不同意这个观点，虽然罗蒂的表述非常激烈，但我认为这是当前历史学者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梁知惠老师在文章结尾中提出了生态史作为超越发展的替代方案，强调世界不

仅是人类生存的手段，更是邻里共存的地方，清楚地认识到扩张和限制的存在，而不是盲目自信万物皆可以货币定价，这是一种新的历史观主张。尽管生态环境的强调引入了超越个人或国家共同体的新视角，但为何几十年来仍未能建立超越民族国家的和平历史观，这是我们需要继续追问的问题。

陈红民老师详细阐述了中华民国时期中国人对日本军阀的理解，我听得非常愉快。令人感兴趣的是，将军阀视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原因的观点，似乎把日本国家和市民社会与军部分开，把对亚洲的侵略归咎于军部的失控。然而，这种方式召唤历史记忆，围绕历史因果论进行讨论的同时，也必须追问在对历史责任的根本性讨论上引发了什么样的实际问题。这种将市民社会与军部分离的讨论，使我们不得不思考，如何在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中进行反思。个人对某个共同体的归属与共享的历史记忆，可能会阻碍我们正确认识个人的层面。在这个层面上，什么样的历史叙述成为可能？

如安冈健一老师的发言所示，“本人史（自我史）”的概念提供了有趣的论点。安冈老师以“给每个人书写本人史（自我史）的机会”为主旨，介绍了日本历史学界的本人史（自我史）研究趋势，主张历史学不再扮演法官的角色，而应发挥辩护人的作用。现在，每个人都获得了这一为自己辩护的工具。为了辩护，关于每个人说了什么、没说什么、不能说什么和应该说什么的复杂问题，我们需要提高关于正误的标准，即提高正义的水平。这意味着在享有允许辩护的自由和权利的同时，也必须感受到相应的义务和责任的沉重感。

与此相关，自然会想到需要思考历史教育的重要性。我再次引用爱德华·霍列特·卡尔的论述。卡尔在他的书中说，“历史学家可以像鱼贩子挑选摊上的鱼一样，从文件和碑文中挑选事实”，然后“将收集到的这些事实带回家，按照自己的方法进行烹饪”。

通过“历史学家与他的事实”这一章节，卡尔指出，历史学家的工作不是简单复制过去，而是根据所需材料和配方重新创造。超越“为什么”，进入“向哪里去”的问题意识和哲学，正是创造新料理的基础。市场上除了鱼，还有蘑菇等各种蔬菜和猪肉、牛肉等肉类。“今天午餐吃什么呢，哪怕会变胖，我也要吃肥腻的东西”这一选择“向哪里去”的意志，与选择以蔬菜为主的沙拉来准备饭菜的意志明显不同，基于该不同端上餐桌的菜品必然完全不一样。学校按照规定的餐单向学生供餐，与此不同，我们可以自由构思并制作自己的菜品，无论好坏，选择变得更多。

有人可能会批评这种情况将原本给什么就吃什么的便捷变得复杂，但对于那些因不愿意吃而将校园餐剩下的人来说，菜品任选的自助餐以及多样性甚至超越自助餐的自制料理意味着人们获得了更多选择的自由。新的历史教育就像这种从固定的学校供餐向自由料理的转换。

另外，盐出浩之老师在他的文章中提到了“历史综合”与日本历史教育的未来。特别是作为高中必修科目的“历史综合”，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实验，也是展示历史教育未来方向的积极案例。正如文中所述，“历史综合”的目标除了赋予年轻一代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才智的基本素养外，还旨在改善日本人对近代日本及其周边邻国问题的无知现状。

然而，我更关注的是“历史综合”另一个特点，即重视从资料中读取信息，并提出问题，通过资料进行讨论这一点。教育的目的正从以讲授和背诵为主的历史教

育，转变为通过学生自主努力回答“为什么”和“怎么会这样”的问题，从而引导出更深刻的理解。特别是，纠正教育中的权威主义结构这个意图非常重要。

不过，我认为有点遗憾的是，除了“为什么”和“怎么会这样”，对“向哪里去”的方向性关注稍显不足。历史叙述和“向哪里去”的方向性，意味着历史与未来的关系。历史不是“现在与过去的对话”，而是“未来与过去的对话”。这与唐小兵老师的发言直接相关。唐老师问到，战争记忆应达到什么样的历史和道德目标。这与卡尔提出的“向哪里去”的问题有着相似的意图。

唐老师引用王明珂的观点，明确表示“历史不只有一种声音。这是对过去的诠释权之争，也是认同之争，权力之争”。在这个过程中，有人批评同情掩盖了理性反思，而理性反思又埋没了在历史结构和行动中成为牺牲的个人。

对此，唐老师指出，我们在回顾和记录某些历史时，必须保持谨慎。谨慎是历史研究者的重要美德。但除了谨慎，还需要什么呢？唐小兵老师在文章开头引用了白永瑞老师的话：“‘失忆’的反义词不是‘记忆’，而是‘正义’。”我认为在谨慎的基础上，必须注入正义。杨念群老师提到的“炮灰史观”一词，一方面谈到了正义，另一方面却激发了侮辱感。

那么，不带侮辱的正义如何可能？为了正义，侮辱是不可避免的吗？我认为在正义这个词下，还需要再加上一块基石，那就是对人的尊重和热爱。历史学应该走向哪里？要建构一个尊重对方的社会，首先要从成为一个不侮辱对方的社会开始。我认为对人的尊重首先来自不互相侮辱的感知。关于这一点，在最后的时候我会再稍微谈一下。

避开正义和侮辱这些激发人剧烈情绪的词汇，我想稍微谈一谈教育问题。我相信，如果学生们通过批判性思维训练的历史教育，经历了反思性历史叙事的构思的话，他们批判性地看待教科书和各种媒体的能力将得到极大的锻炼。我通过自己的经验对此深信不疑。

我长期在培养教师的大学教授历史，并与教师们一起进行了多年的“小历史书写”项目。这种小历史并不是大写的 History，而是小写的 history。“小历史”也包含了写自己历史的历史学家的体验。为了让学生体验到成为历史学家的过程，我与教师们一起进行了写作项目课程，从建构主义视角开展教学。

然而，当材料受到限制时，教师们的想象力难以超越所提供的材料范围。如果配方太复杂，他们就无法完成烹饪。启发思考的历史课程比想象中要困难。历史教育需要高品质、新鲜、多样的材料，而配方不能过于简单或复杂。这样才能在烹饪过程中享受乐趣，并勇于挑战历史书写。配方不能太简单，这样才能认真对待历史书写，认识到其中的难度。

但最重要的是思考最终与谁一起享用这道菜。厨师要怀着对一起享用食物的人的尊重之心进行烹饪。商家为了顾客会付出真心和尊重，更何况是为家人或朋友准备的菜肴。思考为什么、应该怎么做才能促成彼此和睦的人际关系非常重要，只有这样才能在料理中加入真心和对他人的关怀。

将历史比作烹饪，是因为未来的历史学应包含对人的尊重。如何才能停止相互侮辱并怀有尊重之心？不能一边呼喊和平，一边发动战争。不能让国家这一制度羞辱其成员。不能因国家本身无意义而倡导无政府主义。也不能像竹林中的隐士那样，宣称任何制度都与自己无关。

此外，我们在批判国家暴力或军阀失控的同时，也要认真反思“平庸之恶”。共同体的记忆和历史应该以尊重人为基础，构想正义的记忆。我主要研究18世纪的韩国，在此我想引用作为我研究对象的茶山（译注：丁若镛的号）丁若镛的文章。18世纪后期，对于按罚金刑处置杀人罪的惯例，即“无钱有罪，有钱无罪”的惯例，有人认为补上断脚或斩首等肉刑才更符合正义，丁若镛在当时直面了这一主张。

对此，茶山批评了朝鲜肉刑的不仁，认为不能推翻400年来尊重生命的法治文化，回到野蛮时代。暴力本身的野蛮性，我将之称作“不仁”，是我不得不深入探讨的观点。只有在对人类生命尊重的基础上，正义才能站得住脚。相互尊重、不互相侮辱的方法，是与谨慎地遵守人类难以明知的界限相关联的。

现在我想总结一下我的讨论。由于中日韩学者齐聚一堂，我想使用我们共同使用的词语。仁和义是我们熟悉却不易定义的词语。我更关注的是不仁和不义，而不是仁和义。我认为，应该敏锐地培养对不仁和不义的感觉。有些不对劲、不义的感觉，感到好像被侮辱的感觉，即不仁的感觉，对这些不仁和不义的感觉的培养，我认为历史学可以发挥作用。

例如，在强烈呼吁正义和公正时，不应发生夺取生命或侮辱人的事情。因此，应以不仁的感觉来制止正义的失控。如何设定不能容忍之事的界限，需要谨慎讨论。其次，要意识到过度强调对家庭或国家等特殊共同体的爱，可能会导致不正当行为。通过不义的感觉，可以控制对共同体过度的爱。应谨慎考虑如何使用是非感。换句话说，用不仁的感觉适当地控制义，即避免不义。

同时也应用不义的感觉适当地控制仁，即避免不仁。在这种不仁和不义的感觉中，控制过度的义和狭隘的仁，从而希望可以在如此开创出来的仁义的向量空间中探索未来历史新的可能。谢谢大家。

#### 彭浩

谢谢金老师，金老师准备得非常充分，发言的内容也非常丰富。特别是跟史学史、史学理论方面有关系的见解比较多，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比方说面向未来的历史学实践，以及在尊重对方的基础上谈论历史问题等，这些都很值得进一步讨论。而且对昨天的报告也提了好多问题，可供接下来进行综合讨论。还有最后一位指定讨论者平山老师，请您发言，谢谢。

#### 平山升

在这次会议中，我对“国史”与地域多样性之间的关系以及历史形象在社会中的形成过程有了更多的思考。以下我将分成三个要点进行评论。

首先第一点，关于国家历史与地方历史的关系。我想请教在第2场为我们做报告的金泰雄老师，但遗憾的是他今天不在现场，希望在场的韩国学者能帮我解答。金老师提到，战后韩国的历史教育大幅削减了日本史的内容，那么在那时，是如何处理釜山的呢？对于历史上与日本有着频繁交流与冲突的釜山的人们来说，一个几乎没有与日本的关系史的“国史”是否显得很不自在呢？另一方面，自1990年代以来，韩国开始重视“东亚史”和“韩日关系史”的框架，那历史教科书中是否也相应增加了对于釜山的记述呢？

当“国史”被国家的中央操控时，必然会忽视本国历史的地域多样性。这与第3场李基勋老师在报告中关于电影使用标准语而非方言来体现统一的民族共同体的论述也有关联。类似的情况在任何国家的“国史”中都可能出现。如果日本的“国史”

忽视了与朝鲜的关系史，那么对马自然就会被忽视。吉井老师在评论中提到的博多明太子也是如此。我非常喜欢博多明太子，但如果忽视与朝鲜的关系史，它的起源也就无法看清了。类似的情况在中国或其他任何国家的“国史”中都可能发生。

结合我的个人经历再做一点补充。我在长崎县出生，我的祖先平山家是负责日本与朝鲜谈判的对马岛宗家的家臣。然而，当我在长崎县长崎市的小小学上学时，历史教育主要强调的是江户时代在出岛与荷兰还有中国的交流史，以及1945年的原子弹爆炸受害史，对对马的历史只字未提。这是因为长崎县的历史教育完全遵循全国统一的小学教科书，导致长崎县的历史被剔除，对马的历史被忽略，而植入小学生们认知当中的便是这种缺失的历史形象。

第二点，我想请教在座的中国、韩国学者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与第一点也有关联，就是在各地方是否有培养专业历史学者的研究和教育制度的基础？

如前所述，长崎县的历史教育遵循标准“国史”，这可能是因为在长崎县的大学在文学系内没有开设历史学科，导致地方历史脱离学术研究，在结构上易于被归入“观光”内容。

“观光”极度倾向于利用简化的历史故事，而从日本其他地方去长崎观光的游客进一步强化了“出岛与原子弹爆炸”的刻板印象。

比如，在韩国的釜山是怎么一个情况呢？釜山的大学是否有历史学科，是否在从事将中央建构的历史图景相对化的工作？中国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无论如何，在国家中央之外的各个地方培养专业历史学者，能够相对化“国史”与“观光”的政治力学。这种学术基础在地方的落实程度如何呢？对于这个问题，希望在座的中国、韩国学者能不吝赐教。

最后第三点，算不上是问题，更像是给各位的建议。关联着第二点，我想谈谈日本与韩国的修学旅行问题。

作为会对人们的历史意识产生影响的事物，这次会议中不仅关注了学校教育，还关注了媒体的作用。而关于学校教育，盐出老师还关注到了接受教育的孩子们家人们的反应，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方法。然而，关于日本和韩国，我们还应增加一个视角，那便是修学旅行。

在日本的小学、初中、高中都有修学旅行，就是跟自己学校同一学年的同学一起进行为期数日的团体旅行。韩国也是如此，但在全球范围内这其实是非常罕见的现象。

修学旅行是可以同时体验“教育+观光”的团体活动。在战前的日本，修学旅行目的地是供奉皇室祖先神的伊势神宫，战后则普遍前往长崎、广岛、冲绳进行和平教育。我向在大学上我课的学生们询问过他们修学旅行的体验，发现学生对教科书上的内容在考试结束后便会淡忘，但修学旅行作为“一生只有一次”的经历，很多人在多年后仍记忆犹新。至少他们绝对不会忘记去了哪里。

从而成为问题的是，在修学旅行中孩子们接触到的是什么样的历史图景。在第2场盐出老师指出了日本历史教育倾向于强调日本的受害，而这在修学旅行中也同样存在。很少有修学旅行会告诉孩子们，在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和冲绳地面战的受害者里面也有朝鲜人和中国人，以及日本殖民统治的加害面。此外，除了和平教育，还有前往京都和奈良等地的修学旅行，旨在通过参观古代的神社与佛寺，让学生对日本文化和历史感到自豪，这种形式从战前延续至今。韩国的修学旅行情况

如何呢？

因此，我们需要思考韩国和日本的修学旅行经验对人们的历史印象所产生的影响。此外，中国应该也有通过短途旅行前去现场学习历史的做法，我认为研究其影响也是很有助益的。

我想顺便提出一个建议。日本的修学旅行一般由学校老师跟本校学生一起行动，存在很少与当地交流的问题。日本高中生出国修学旅行也很常见，但目前我还没有听说过他们与当地高中生互动的事例。我想了解现在的情况，于是昨天问了参会的高中老师，他们也说好像还是没有。我听说韩国现在也有高中生出国修学旅行。就像三谷老师在第1场提到的那样，我们历史学者和大学生已经在积极开展跨国交流，但非历史专家的普通中学生和高中生跨国对话的机会依然不多。例如，在日本和韩国的修学旅行中，学生可以与访问地的高中生一起参观涉及战争和殖民统治的场所并进行对话。利用现有的海外修学旅行，促进跨国中学生和高中生的历史对话，这是否可行呢？以上就是我的评论。谢谢。

彭浩

谢谢平山老师，平山老师结合了自己的经验，谈了国家历史和地方历史之间的关系。本来希望各位报告人能对前面几位老师的点评以及提问分别做一回馈，但由于时间关系我想稍做调整，请大家把各自需要回答的问题记录下来，最后给大家时间做集中回答。在刚才平山老师的点评里面已经出现了与教育相关的问题，昨天我跟各位老师聊天的时候，听到了不少关于教育问题的意见，很多与会者对日本的历史综合教育非常有兴趣。而且在网上参加的市川老师也给我们提了一些意见，我想先请市川老师在1分钟之内把您的意见简单地讲给我们听，可以吗？有请市川老师。

市川智生

我是冲绳国际大学的市川。我从昨天开始聆听各位老师的报告，受益匪浅。关于昨天开会之初刘杰老师所讲的举办宗旨，我有一些感触，想要谈一谈。

老师谈到“在20世纪东亚历史的基本认识上并无重大不一致之处”，但坦率地说，我对此有违和之感。

我的疑问是，研究者的理解在多大程度上被大学生或普通人所共享。我大约在2010年前后在上海的一所大学教授日本近代史。在寻找教材的过程中，我也阅读了宋志勇老师的著作，但最终我还是选择自己将日本高中的教科书翻译成中文来讲授。我觉得效果不是很好。学生们听了我的课后，脸上浮现出“所以呢？”那样的表情。仅仅是将面向日本高中生的信息翻译成中文，那可能只是与中国学生的思维方式维度不同的信息。当然，这其中也可能有我的中文能力问题。我记得很清楚，中国的许多学生认为“日本由于明治维新而成功实现经济发展，而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失败了”（这是十年前的事情，现在或许有所改变）。我想，在日本，没有学生会持这种看法吧。我的疑问是，中国学生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见解呢？是历史研究者的信息传递出了问题，还是中国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所致，亦或是有其他完全不同的问题存在呢？

关于这个问题，我希望不仅能了解中国的情况，也能了解韩国的现状。

彭浩

谢谢市川老师。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教育问题进行讨论，因为昨天我听到早稻田大学的浅野老师非常希望就国民性、国民国家与教育之间的关系发表意见，有请

浅野老师发言。

浅野丰美

我在早稻田大学教授日本政治史。金濑老师谈到“必须在构想未来的同时讲述历史”，对此我完全同意。基于此，我想提出一些问题。

2000年代初出生的学生到90岁时，即2090年，距离日本开国的1858年将有大约230多年。而所谓的锁国时代从葡萄牙航行停止的1630年开始也持续了大约230年，所以这两个时间长度是相当的。在我们进行的“国史对话”中，我们讨论了蒙古的世界帝国和文禄·庆长之役。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在这里应该讨论的是如何以近代以前的传统社会为基础来思考近代。近代以前，有国王和身份等级制度，这在当时的时代是理所当然的存在。我认为在构想未来时，必须考虑这些过去。

在身份等级制度消失的过程中，经历了殖民统治和战争。在现在的学生逐渐变老的过程中，所谓的日本开国也将经历大约230年，而这些年轻人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正如平山老师所提出的，我们必须重视地方，同时也必须在未来的想象中充分意识到超越民族国家的东亚区域。我觉得我们拥有在新的语境下有效利用如“仁”与“义”这样的概念所象征的我们至今仍共享的某种遗产的可能性。

第2场的主题是“教育”，第3场的主题是“媒介”，第4场的主题是“研究”。教育的重点应着重于身份等级制度如何消失以及国民是如何形成的。在以“媒介”为主题的第3场中提到了合作者的问题，以及无法与国民历史相“匹配”的存在，比如移民和对日合作者，还提到一个县被区区十几名日本军人所统治，简而言之，就是日军的这个占领发生在尚未产生国民意识的时代。当我们构想未来时，与国民历史不匹配的东西反而可能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我们在这里就历史综合科目应该讨论的是，如何通过教育来培养出一种能够将遥远的过去和遥远的未来联系起来思考当前时代的视角。正是为了构想未来，遥远的过去才显得重要。特别是，只有意识到有身份等级制度和国王的时代与没有身份等级制度和国王的时代的存在，才能把建立在国民这一存在之上的现代视为一个时代，也只有这样才能展望未来世界中的东亚这一区域，以及釜山、博多（我来自福岛）等地方超越国民，在东亚这个大区域内相互连结的未来时代。我希望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能在不忘记蒙古和文禄·庆长之役的基础上展开讨论。

今天许多老师都提出了很多重要的问题，我从中受益匪浅，在此向各位表示感谢。谢谢大家。

彭浩

谢谢浅野老师的发言。我们谈到不少教育方面的问题，不知是否还有其他有关教育的提问？有一位老师举手，请您1分钟左右简短提问。

听众4

您好，我是上海师范大学的老师。我刚才想提的一个问题是关于加害和受害，我们说有时间和空间上的区别。加害是一个过去进行完成时的内容，但是受害我们说它可以通过创口、伤口或者是传说，各种家庭叙事把它传续下来。所以说我们今天再来看加害和受害之间的统一，是不是因为加害已经结束了，它是一个过去完成时。与此同时，除了时间上的问题，我们经常要考虑一些空间上的问题。我是长期在日本做战争田野调查，比如说我到了大阪的时候，大阪是空袭，东京讲空袭，广

岛和长崎讲原爆，到某些地方，比如说前两天我到舞鹤，舞鹤是当时的返还的港口，所以他们强调的是西伯利亚得记忆。所以在日本，不同的地区，它的受害者记忆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想从教育的角度请教一下各位老师，在这种传播当中，加害的时间和空间还有什么大家可以一起去做的事情，谢谢。

彭浩 谢谢这位老师。由于时间关系有关教育方面的讨论我们也即将告一段落。刚才市川老师向刘老师提了一个问题，不知刘老师可否现在回答一下？

刘杰 市川老师，感谢您的提问。或许当您通读我的这篇文章时，就能够理解我的本意。实际上，当我们开始这场关于日本、中国和韩国的历史对话时，我们是基于一个问题意识出发的，那就是在战争或殖民统治等非常大的框架上，是否存在某种认识上的差异。在过去20年的对话中，当我们谈论“受害与加害”、“殖民统治”或“侵略”等问题时，争论或意见对立的情况已经不那么常见了，而我在举办主旨中所说的便是这个变化。

不过，在我文章的下一段中，我也提到了在各自国家的政治、社会环境以及本国历史的语境中，存在各种差异、误解或不理解，对于这种封闭的历史环境，我也是谈到了的。因此，关于历史信息在知识上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如何缩小这种差距，以及由于这种差距产生的历史认识差异，是绝不能忽视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教育方面的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举办主旨在整体上是基于这样的思路来写的。感谢您的提问。

彭浩 谢谢刘老师的回应。因为刚才提到教育问题，昨天高中来的老师，川岛老师和田卷老师也做了发言，刚才又提到了一些新的内容，两位有没有一些新的补充？

川岛启一 我是同志社高中的川岛启一。大家提出了“‘历史综合’是否有助于东亚历史问题的和解？”这个大问题，尽管它存在诸多问题，但我认为是有可能性的。我想从历史教育的“目的论”、“内容论”和“方法论”三个视角简要回答这个问题。

第一点，关于“目的论”，“历史综合”使我们能够直接学习为什么要学习历史。这意味着仅仅由高中教师讲授历史事实是不够的。因此，这为克服历史教师的权威主义提供了可能性。高中生可以自主探究历史，带着“为什么我要在高中学习‘历史综合’”的问题意识，高中生可以进行探究，使历史学习更加贴近高中生。“历史综合”还使得高中生可以探究“为什么东亚的历史和解如此困难”这一问题。

第二点，从“内容论”的角度进行简要回答。首先，“历史综合”教授历史的学习方法，我们不仅要教授历史事实，还需要教高中生如何学习历史、如何进行历史批判，以及事实的立脚性、逻辑一致性、反证可能性是什么等相关内容。这虽然非常困难，但可以与高中生一起探究。第二点是更加重视问题和史料的学习。文部科学省在课程大纲中也写进了多方面、多角度等字样，即持有批判性、分析性的视角，不只从一个角度学习史料，例如，将加害和受害的多重性作为史料来学习。事实上保证了历史学习不偏向于单一视角，不偏向于国家历史。此外，“历史综合”也规定了高中生可以自己调查、做报告、讨论、对话和写作=叙述。因此，我们必须保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学习权宣言》中所述的“高中生自主书写历史的权利”，也

就是先前提到的“小历史”，我们必须保障高中生对其进行写作的权利。这为高中生的“历史综合”探究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第三点是设定了视角的框架：“自由与限制”、“平等与差距”、“对立与协调”、“统一与分化”、“开发与保全”五个视角。昨天也提到了“开发与保全”的问题。为了更好地运用各个视角而设定了这些框架。此外，“历史综合”还设定了处理现代各种课题的视角，可以在处理现在高中生所面临的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探索相关历史进行学习。尽管由国家规定的这类框架中存在着各种问题，但我认为这对高中生的探究是有帮助的。

第三点是“方法论”。“历史综合”事实上规定了教师不能仅仅一味地讲授历史事实，而要采用对话式的学习、学生相互讨论、与教师讨论等形式，因此，在对话方面打开了一个广阔空间。这一课程还规定了“深度学习”，有可能克服相对主义。（在讨论中就可以相互指出）“不是什么历史观念都可以接受的”，“你可以这么想也可以那么想是不行的”，对于修正主义言论、仇恨思想和做出歧视性解释的学生，（就会有人指出）“这是不对的”，追问“你这么说的根据在哪里”；“任何想法都是可以的这种相对主义是不可取的”，“我们需要面向未来分享一种能够相互靠拢的观点”等等，“历史综合”为这样的学习进一步提供了可能性。以上就是我对如何通过“历史综合”来实现东亚历史和解的一些思考。

彭浩 谢谢。刚才川岛老师已经讲得非常详细和全面了，如果田卷老师还有补充，请在1分钟以内做简短发言，可以吗？

田卷庆 我来自千叶县私立初高中一贯制学校芝浦工大柏。我想就“历史综合”在实际教学中的问题意识和现阶段教师们关注的问题，补充两点个人看法。

首先第一点，我非常关注史料批判的教材化。在训练学生思考各种历史解释、逻辑叙述及反证可能性方面，可以在让学生自行确定主题撰写报告或者在让学生提出问题的活动中得到确保。然而，在史料批判方面，让学生发挥能动性去主动体验却较为困难。因此，在这个方面，我们需要在讲授的过程中与学生一起体验学习。但另一方面，史料批判不能仅停留在方法解说的层面。关注点因史料而异。我们需要思考如何为不同类型的史料与不同的范式提供相应的应该从哪里着眼的视角。总体来说，我认为这类史料的教材化在今后会变得愈加重要。

第二点，历史课程开始重视思考现代各种课题的视角，因此越来越多地注重处理时事问题。此次也有关于媒体的讨论，所以我想谈一下，现在在课堂上使用报纸文章来处理时事问题的实践越来越多。然而，随着数字化的推进，很多家庭已经不再阅读报纸。因此，如何阅读报纸、养成正确阅读的习惯，并如何将其与历史联动，将成为第一线教师们今后需要攻克的一个课题。

彭浩 谢谢。我们时间比较紧张，刚才几位老师都提到了史料应该如何处理的问题，这不仅是教育的问题，同时也是研究方面的问题。刚才三谷老师也讲过口述史料方面的问题，大家昨天报告里出现了好多口述史、个人史、大众史的话题都用到口述史料，但利用口述史料也有很多需要我们特别留意的地方。比方说慰安妇问题有很多争论，日本曾有过河野谈话之类的受到中韩欢迎的表态，但是在国内却受到了很多批评。韩国提到的很多资料里面，可能是对慰安妇进行调查，有很多对我们历史

研究者来说，可能是口述史方面的一些资料，不少日本的政治家认为这种口述史料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不值得相信，这也是我们需要充分考虑的地方。我想接下来留出一点儿时间来进行有关口述史以及历史大众化的讨论，还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好，有请大久保老师。

#### 大久保健晴

我是庆应义塾大学的大久保健晴。在这两天的会议中，我听取了许多非常有趣的讨论，并学到了很多。我专攻东亚政治思想史，被划在法学院政治学系。因此，在研究历史的同时，我也教授政治学。我想从这个视角出发提出一些问题。

在昨天安冈老师的报告中，以及本次会议中多位老师都指出了口述史的重要性。各位提到，通过口述史研究，深入挖掘个人历史，描绘出个人所处时代的不正义，以及潜藏其中的帝国主义的结构暴力，从而可以跨越国家，重新构建连接各个不同地区的全球历史图景。这一点也与今天浅野老师的观点不谋而合，显示了克服历来国家中心框架，连接各地区的全球性未来导向的历史研究的可能性。

然而，另一方面，当我与政治学系研究现代韩国政治和中国政治的学者交流时，常常会谈道，现今发生的问题必须要由我们这一代人来解决。特别是近年来的慰安妇问题和原朝鲜半岛出身劳工问题（强制征用工问题），国家赔偿成为一个重要讨论点。在这些问题上，国家的作用和民族问题是不容忽视的。

当然，作为历史学者，通过研究“过去”的历史，追求跨越国家的全球性结盟和世界图景的“未来”导向的姿态是非常值得高度评价的。然而，同时，从各自研究的时代或历史角度出发，重新审视“现在”国家间存在的冲突和问题，也是历史学家无法回避的课题。这不仅是研究的课题，也是在学校教育的现场会遇到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呢？如何能够在面向未来的全球性的研究，与对当前国家间问题的回应之间，架起连接的桥梁呢？希望能够得到安冈老师以及其他老师们的指教。谢谢。

#### 彭浩

谢谢大久保老师。大久保老师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论点。可能我们时间不够，还有没有想提问的老师？跟教育或刚才提到的口述史研究方法有关的，或是跟媒体有关的也可以。如果没有的话，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报告人，现在能够留出的时间，一个人可能只有两三分钟。请大家尽量简短地进行回答。首先有请陈老师。

#### 陈红民

刚才金濤教授提到说，我的论文中有这样的观点，中国的媒体和政治领袖在用日本军阀和民众两分法这个对立起来的情况，当时其实没有事实的基础，后来好像也没有什么效果。那么，做这个研究还有什么意义？我其实是用概念史的方法来进行这个研究的，概念史的基本理念就是，当时既然出现了这个概念，它就有意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当时蒋介石和中国媒体用这个“日本军阀”，是非常有感情色彩的。当时中国人知道打不过日本，所以用“日本军阀”这个词或者两分法，他来动员民众，宣传、鼓舞大家抗日是有前途的，有信心的。我觉得它战争宣传和动员方面的意义非常清楚。总之，第一这是个值得研究的历史概念，第二个是当时有着战争动员的意义，从这两点上来说，它有研究的价值。

昨天唐小兵老师也提到，说蒋介石身边有一些知日派，为什么这些知日派了解到不可行，为什么不劝说蒋介石，或者给蒋介石提出更切实可能的建议来？对这个

问题，我的回复是如果说知日派的话，国民政府里面，最大的知日派就是蒋介石，其他的知日派都是隔靴搔痒。蒋介石他在日本学习军事，他对日本的情况其实相当了解。他为什么知道不可行还这样做，还是我回答金濤老师的那个问题，就是那个时候，他作为中国的政治领袖，他能宣传失败主义情绪吗？他能说日本非常强大，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战胜日本吗？他只有找到这种理论上可行、实际上不可行的办法，作为一种战争的宣传和动员，我觉得这是蒋介石的策略。

最后一个问题，刚才讨论到史料的问题。作为一种史料，日记的可信度的问题。江沛老师特别说到，他用的是个小人物的日记，这个人写日记没人看，所以它一定可信。然后大家众口一词，都是蒋介石的日记因为考虑到会被别人看到，所以蒋介石的日记可能不可信。我是用蒋介石日记做了较多研究的，可以负责任地说，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严肃的学者，指出来《蒋介石日记》中间有哪一个事实是虚构的。所以《蒋介石日记》里面所有事实都是清楚的，如果像蒋介石 50 多年写日记，每天考虑到日记被别人看，他要编造，他要做自己的“人设”，那真的太辛苦了。每天晚上写日记的时候就想，这个日记被别人看到之后，对我有什么印象，我怎么来下笔，这不大可能。而且蒋介石在最初写日记的时候，他也是个小人物。所以《蒋介石日记》的真实性，至少在历史进程的事实层面，是基本真实的，至于他的动机、想法上的真实性，我们可以考虑每个人写日记其实都有趋利避害的，都可能害怕被别人看到。学生可能怕家长看到，我们谈恋爱的人害怕被恋人看到，其实写日记都有趋利避害的东西。蒋介石也有，但是他没有虚构事实。所以作为史料的运用，或者跟多种史料相互起来运用，作为一种参考资料，它还是非常重要的。关于日记，我讲一个笑话。中国有一部电影《邪不压正》中有个细节，有人说到写日记的事情，然后另外一个人调侃说：“正经人谁写日记啊？”观众看到这里都会大笑。所以在不少人看来，写日记的人，无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都是不正经的人，正经的人都不写日记。

彭浩

谢谢陈老师。接下来我们把话筒交给梁老师。就按座次顺序来做最后的总结发言吧，谢谢。

梁知惠

金濤老师，感谢您提出有意义的评论。由于时间关系，我只能简单回答。您指出韩国的生态史研究局限于国家层面的历史书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未来的研究确实需要更超越国界、更重视全球化的视角。然而，关于当前研究的水平和目标，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在 2000 年代初，韩国提出生态史研究作为超越强烈民族主义历史叙事的一个解决方案。当时还处在非常初期的研究阶段，可以说当时要解决的主要目标是韩国的国家主义，所以当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前现代时期。然而，正如我在报告中提到的，自 2011 年福岛核泄漏事故之后，以及经历了这几年的疫情以来，韩国历史学界对生态史的思考和目标有所变化。

在韩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生态史研究的水平仍处于初级阶段。整体社会氛围仍然以发展为导向。然而，随着社会的变化，研究的目标也发生了变化。当前的思考不仅是超越国家或国界，而是反思消费、欲望与发展至上主义，这是全世界共同的方向。因此，我们需要在各国的讨论中寻找有意义的共同课题，而不是将基于各国

各自状况而展开的讨论本身视为具有“国家性”并以此为理由对其进行批评。

举例来说，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最近在韩国国家政策发生变化，要求所有教育课程都引入生态基础学习这一新的学科课程面向所有学生授课。遗憾的是，我见过许多从事现场教学的教师，经常听到他们抱怨说因为韩国历史相关的教学内容本身非常不足，令他们相当困扰。因此，我们需要基于当前的情况和条件，在跨越国界的讨论中逐步积累相关讨论。

彭浩 谢谢梁老师为我们节约时间。接下来有请安冈老师。

安冈健一 我收到了很多问题，想从“尊重人类”和“叙述的可信度”这两点进行回应。在提问和评论中，有人提到受害时间的长久性，牺牲（受害）是经过长时间形成的。我此次讨论的满洲移民记忆，也是如此。那些在战前前往中国的人们的痛苦和伤痛经历，在经过战后大约40年的时间后才开始被讲述。这是因为，在当时的当地社会中，有派遣移民的一方和被派遣的一方。派遣的一方在战后的当地社会中继续是有权势的人，所以那些受伤害的人很难在社会中谈论自己的经历。只有当这些有权势的人逐渐离世，并且出现愿意倾听、尊重这些叙述的人时，这段历史才得以被讲述。通过这些叙述，我们终于能够了解侵略和满洲统治的实际情况。评论中也有人提到“能挖掘什么”的问题，我认为深入挖掘讲述这一行为的背景，对于理解战后社会也非常重要，而且从根本上涉及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性。

接下来是关于可信度的问题。口述史研究中，可信度一直是一个重要问题。关于这点，我有两个观点。第一，即使存在记忆错误，我们也可以思考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错误。不是因为有错误就完全否定，而是这些记忆错误本身也可以成为重要的研究材料。第二，历史学家需要注意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事件的意义和解读会发生变化，需要更具创造性地看待这一点。不好意思，接下来我想谈一下我自己的经历，我在中学时经历了阪神淡路大地震。当时我并不了解发生了什么，只忙于日常事务，比如取水和排队领取物资，以及备考。但很多年以后，随着父亲去世和孩子长大，我逐渐明白了当时发生了什么，以及在学习了战争历史以后，在时间过去很久之后，才理解了身处废墟的意义。以这样的方式，解释会随着时间而变化。历史需要重视的是时间和日期的问题，准确记录何时由谁如何讲述，是确保可信度的重要方式。这是专家的责任，不把这个责任推给讲述者在我看来是非常重要的。通过这样的方式挖掘出重要内容，而这之后还有一个重要步骤。刚好刚才也有人提到了记者与学者之间关系的问题，以这样方式，与能够利用学术成果的记者交流，或者与能充分利用学术成果的政策制定者沟通。比起靠我们自身直接去解决，更应该思考如何在各种职业能力之间建立起相应的联系，像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这种跨越国家和代际的集会也很重要。在这些方面，我希望我的专业能够有所贡献。以上就是我对评论的回复。

彭浩 谢谢安冈老师。下面有请李基勋老师发言。

李基勋 首先谈谈地方和中央的问题。我想谈两点，首先是冷战民族主义使韩国成为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这导致包括方言在内的地方和地域被全面压制。这不仅是权力

和行政的问题，也是观念的问题。

我是釜山人，在首尔上的大学。大一时听到一件荒唐的事。暑假时，我要回釜山，首尔的朋友竟问我是不是要回乡下。釜山有三百万人口，却被他们说成乡下。连釜山都被如此看待，可以想见他们对真正的乡下感觉如何。

反过来说，韩国的民主化过程意味着从这种观念中解放出来，是发现和重构方言、地方与民众的过程。从某种角度看，1990年代和2000年代以后，地方大学的历史系的发展是地方史复兴的过程。平山老师提到了釜山大学，我虽然是釜山人，但在木浦大学工作了很长时间。木浦大学、群山大学等学校在地方史研究方面有传统，特别是海洋史、岛屿海洋史很强。

这是作为启蒙价值的地方被发现的过程，但现在韩国的大学面临的问题是，这种启蒙价值如何直面现实。地方正在崩溃。虽然日本也在经历这个过程，但韩国的地方崩溃更加严重，首先表现为地方大学的崩溃。许多地方大学培育的地方史研究传统正面临危机。虽然还在坚持，但实际上非常艰难。历史学在追求价值的过程中，当与现实的压力相遇时，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这其中存在的不是真实与价值的问题，而是价值与现实的脱节的面向，则是历史学实践面临的另一个问题。

关于“满洲电影”的问题，没有标准答案。朝鲜和韩国处理方式不同。在朝鲜，通常会从电影史中将被认为是亲日的电影作品删除，小说也一样。而在韩国，则设定一个亲日电影的类别，在这个范围内进行讨论。

彭浩

谢谢李老师。接下来请福间良明老师做总结。

福间良明

刚才有人提问关于加害与受害的时间及空间关系的问题，我想对此稍作说明。我本人主要研究日本，包括以冲绳、广岛和长崎为主题的相关问题。正如提问中谈到的，时间差异和空间差异确实非常重要。围绕战争的叙述方式，以及加害和受害的论点，往往是在当时社会状况随着时间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形成的。我本人对加害和受害问题的关注，更多在于它们如何在社会中构建，而不仅仅是对与错的问题。以冲绳为例，关于冲绳战役的经历曾被很多人讲述过，它在1960年代，由于冲绳的复归运动，即回归日本的运动，而被广泛谈论。但当时实际上，关于旧日本军的加害讨论存在被抑制的倾向，就是因为复归日本运动的影响。当冲绳回归日本变得可能时，美军基地将被大量保留的问题逐渐显露出来。在这样的背景下，旧日本军对冲绳的加害问题逐渐成为焦点。然而，与此同时，冲绳内部的加害问题也开始凸显。例如，冲绳的学校教师对冲绳学生进行皇民化教育，冲绳出身的人对朝鲜军属施加暴力等由冲绳施行的加害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另一方面，关于广岛和长崎的问题，我认为提问的老师可能比我更了解。总体来说，关于被爆体验的讨论，广岛似乎处在引领的地位上。然而，1970年代和80年代左右，长崎的证言记录运动相对更加活跃，也有很多讨论认为广岛在这一方面似乎落后于长崎。在这个层面上，在存在时间差异的同时，相关论点的形成也有所不同。例如，广岛、长崎和冲绳在这方面是存有差异的。然而，越南战争对这些地区的影响却存在共通之处。冲绳复归与越南战争是关联在一起的，而在广岛和冲绳的体验记录的生成过程中，企业号航空母舰停靠佐世保港口的事件也与越南战争相关。在讨论时间变迁的同时，还需要考虑空间差异。各地区有其特有的差异，

但同时也存在许多共同的社会背景，这些背景对多个地区产生了影响。通过详细解读不同地区在不同时间的不同讨论，其中存在过哪些可能性，而又忽视了哪些内容，我们可以重新审视当前的讨论方式。而这在我看来，便是对过去，现在，甚至未来的反思。

彭浩 谢谢福间老师。接下来有请江老师发言。

江沛 我一直在听其他老师的报告，听下来还是非常有感触，因为其实中国和韩国、日本这种历史教育确实有很大的差异。我记得刚才平山老师讲到，日本和韩国各地学生都有修学旅行，来从中获得对地域或历史知识的认识。中国其实也有这个机制，我所在的南开大学，我上大学的时候，二年级的时候就专门去外边考察，现在我们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有毕业实习，到一些跟历史相关的地方去考察。另外在暑期的时候有所谓的暑期实践，那个也是由学校给出一部分钱，然后学生拿一部分钱，他们可以去很多地方，这个其实和日韩的修学旅行可能有某种相似之处吧。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我对我的学生的了解，这种暑期实践什么的，他们也就是出去转转，可能有的人确实也许会有很深的感悟，效果不太一样。就介绍一点中国的情况。

刚才市川老师提了一个问题，日本的学者能不能帮我们回答一下，他刚才讲的中国学生就认为明治维新是日本崛起的一个关键，几乎是同时的中国洋务运动受到了很多因素的影响，然后失败了，这可能是甲午战争中日两国国力差异造成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原因。我们都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刚才他讲到日本学生不是这么认为的，日本史的老师能不能帮我们解释一下，日本为什么不这么认为，日本学界认为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真正的根源在哪儿，能不能帮我们解释一下，谢谢。

彭浩 谢谢江老师。刚才江老师最后提了个问题，我们可能没有时间交给其他老师来回答。如果盐出老师可以回答的话就请您简单回答一下，谢谢。

盐出浩之 既然如此，我就继续简洁地回答这个问题。事实上，日本的研究最近在观点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也就是说，虽然存在中国洋务运动失败了的理解，但在思考其为何失败时，当前的研究并不认为中国未能实现现代化。相反，清朝的体制、制度本身是非常完善的。换句话说，自宋代以来，中国拥有极为强韧的制度，这使得改变它变得非常困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使得中国能够应对西方的冲击。因此，可以理解为在当时改变这个制度的必要性并没有被广泛意识到。相比之下，日本在开国的冲击下，国家迅速分裂并发生了巨大变化。对此，实现了现代化的日本与未能实现现代化的中国这一论述视角，在当前的日本研究界基本已经看不到了。然而，在中学和高中的教学中，很多老师仍然采用这种“日本实现了现代化，而中国没有”的说法。在我参与编写“历史综合”教科书的过程中，因为与高中老师一起合作，从而发现还有人持有该观点。

接下来，我想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特别感谢金濤老师的提问。您提到历史教育中不仅要问“为什么”，还需要追问“向哪里去”。我觉得这一观点非常重要，但直接提出这个问题往往具有一定难度。因为在寻求意见时，可能会出现与历史无关的意见。那么，该如何处理呢？首先，我认为“为什么”这个问题实际上暗含了

“向哪里去”这个问题。换句话说，当我们思考“为什么”时，关于这个“为什么”来自哪里，其实在暗地里是存在某种价值判断的。因此，我们实际上已经在问这个问题，或者说应该以这种方式来问“为什么”。也就是说，设置什么样的“为什么”是非常重要的。另外，直接追问未来也是非常困难的，但在有些情况下是能够在历史中发现一些普遍性的问题。在有多个选择的情况下，为什么当时选择了这个选项？我觉得这个问题也许就可以作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来思考。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1920年代到1930年代的日本，为什么侵略中国并在国际上孤立自己，最终走向世界大战？这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说，为什么放弃国际合作？为什么必须侵略中国？我认为这个提问就是最重要的例题之一。再进一步讲，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与当前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有很多相似之处，包括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在让学生思考这些问题时，（为什么日本选择了孤立和战争）这个“为什么”就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问。

彭浩 谢谢盐出老师的简短回答。最后请唐老师做一下回应。

唐小兵 谢谢彭浩老师。好像也没有特别直接针对我的问题，但是有几个点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想做一些回应。一个就是平山升教授所谈到的关于历史学如何跟地方的一些人员发生关联的问题。因为我想介绍一点我们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一些经验。因为我们有一个地方文献与民间记忆的研究中心，所以我们每年会举办一个地方文史研修班，今年是第七届了，是跟各个县、市、地方文史工作人员，比方说地方志办公室呀，地方的一些博物馆呀，等等，跟他们合作，他们会成为学员，然后我们有专门的教授，比如说做地方史研究的，比如说华南学派，比如香港中文大学的科大卫啊，中山大学的刘志伟教授和厦门大学的郑振满教授等等，包括我们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冯筱才教授、李世众老师等等，会给他们做一些学术训练，比如怎么样做研究，怎么样做地方史研究，怎么样做口述史，等等。效果还不错，每年都坚持在办这样一个东西。

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会跟一些地方政府和机构进行合作，带学生，包括研究生、博士生和本科生去开展一些地方史研究，比如我们跟温州都有比较多的合作，到浙江的温州，包括编了温州的通史等等。这方面我们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主动跟地方社会连接，给地方培养一些比较具有历史学专业能力的人员，从而更好地从事挖掘地方史的这份工作。

还有一点就是刚才所谈到的，就是说我们的学生是不是有类似像日本和韩国这样的修学旅行。这几年因为疫情，所以很多的活动都停止。但今年暑假我们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安排学生到江南和西北等一些地方去进行历史行走和考察比如围绕着京杭大运河带学生去进行考察，都是些有历史研究背景的相关老师在进行指导，每个参与的同学要写考察报告，所以还是要求比较严格的，比如说都主要是拔尖班的学生，每个年级大概有十几个学生，他们也会到西安，沿着陕西的一些文化古迹进行考察和研究。所以也有类似这种工作，也蛮重要的。这是对于平山教授的回应，讲这些关于修学旅行在中国的故事，在我们的学校，也有类似这样的史学实践。

另外就是刚才金湍老师所谈到的，我觉得也是特别受触动，就是关于历史学，历史写作的意义，历史教学的意义，它怎么样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构成一个当下的连

接，这样一个史学家公共责任的问题。我觉得这个确实相当重要，包括您所谈到的这样一个历史写作不要构成某种侮辱、伤害，要培养一种尊重人的尊严的文化，这也是我特别认同的。真正好的历史学应该是一种人文主义的历史学，对文化，对人的尊严有一种价值的关切和内在的认同，它才会在历史写作中间注意到，无论是精英也好，知识分子阶层也好，还是普通人的尊严，它把这些东西连接起来。所以这样一种历史写作，它最后导向的就是我很喜欢的法国一个思想家托克维尔所倡导的理念，他在《旧制度与大革命》讲过一句话，他说：“当过去不再照耀未来的时候，人的心灵就会在茫然中游荡。”当过去的维度被遮蔽，被有意地压抑的时候，其实我们对于未来的理解，包括心灵的安顿，就会产生某种困扰。这是我对金滢老师的一个简单的回应。

还有就是韩国的金宪柱老师讲的关于被害者的叙事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两天有很多的老师，包括江老师也谈到阿伦特。阿伦特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政治思想家，她基于纳粹军官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审判的表现而提出的“平庸的恶”的观念当然影响很大。但我这里特别想补充的一点就是说，其实“平庸的恶”更多的是讲包括刚才金老师所谈到的所谓支配者和被支配者之间的灰色地带，这些都是我们要考察的。但另外一方面，阿伦特也特别强调，她有一本文集，讲责任与判断，论个人的责任和集体的责任，她也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讲服从与支持的区别的问题。其实我们更多的人，比如说艾希曼也好，比如说一个普通的伪满军官也好，我们都强调我们因为这样一个职业身份，我们是在消极或被动地服从。这种服从的说辞是更多地带有一种自我辩护性和消极性的概念，因为我这是不得已，我是没有办法，我以及我的家人在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时代首先要生存下去。阿伦特提出一个服从和支持的区分问题，如果把服从这个词理解成支持 (support)，那它就变成一个更多具有能动性的概念，那其实你个体的责任感就更强，其实你是有终极责任的。你这个服从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是支持某种政治暴力和极权统治。这样一个概念转化凸显了个体思考、判断和选择的重要，所以她与此相关提出另外一个看法也很重要，她在反思纳粹德国的责任时说，战后德国的一代人都认为“我们都是有罪的”，“我们都是有责任的”。那么在阿伦特看来，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全体来道歉或认罪的话，其实是把每一个人的责任都轻轻地放下来了。她的意思是要区分责任、罪过和罪错、罪行之间的区分，自我本身要面临审判的，个体必须要承担终极的责任的。那么过错和道德感是另外一个概念。所以她也同时强调两者之间的区分，所以我记得以前我读过一些书籍谈到德国战后的这一代人，其实很多普通的德国人，有一本书叫《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讲述他们的日常生活，普通的德国人在战后其实并不愿意面对这部分历史，他们其实可能更多地也是一个服从者，可能就是支持者，阿斯曼的《记忆中的历史：从个人经历到公共演示》也涉及到这个记忆和反思的核心。但是后来到了1960年代以后，整个德国年轻一代成长起来以后，他们就因为整个视野打开，以及欧洲左翼抗争的这样一个运动，他们重新回到家里去问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当年在纳粹德国之下你们做了什么？所以它有一个反向的来自代际的反作用的推动，他们重新来审视他们的责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义的。

最后一点，我想回应一下三谷老师讲到的关于史料的几点，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当然史料本身它的考辨和分析是史学的一个根本，立身之本，我觉得这是特别

重要的。三谷老师讲到有很多事情其实是没有史料记载的，所以我想提出问题，对历史学来说，史学就是史科学。对于历史学来说，史学需要想象力吗？我们是不是需要从可见的去抵达不可见的事物？这是基于常识、人情和某些逻辑推断来发现历史，这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史学能力。这样的训练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就讲到了记忆的可信度问题，我觉得这也是蛮重要的。因为我记得之前读了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格拉斯的回忆录《剥洋葱》。因为格拉斯在晚年的回忆录里面，他也谈到其实早年，在1944年前后他参加了纳粹党卫军的外围组织，但等到他年老的时候，他没办法将这一页翻过去或者当做没有发生，所以他真实坦率地呈现了这一部分私密的个人记忆。他讲到回忆和记忆的区别，这种真诚和忏悔在华人的私人记忆比较罕见。所以就我读到的中国大陆的很多的关于20世纪中国的回忆录和口述史，要么自我崇高化，比如有一些军队的将领，要么就是控诉史学，倾诉承受了很多苦难。比较客观地、真实地面对过去这一页历史的，可能相对比较少，我昨天在论文里提及的王鼎钧先生的回忆录是一个例外。所以我觉得这一方面，其实打开了很多思考的空间，也是特别有意义的。我就做这样一些感想式评论和简单的回应，谢谢大家。

彭浩

谢谢唐老师。不好意思，作为主持人，给大家留下的时间太少了。我们接下来还有赵老师的谈话总结。最后有请赵老师。



## 赵珺

高丽大学名誉教授

[原文为韩语。翻译：洪 龙日（东京大学）]

本届“日本·中国·韩国国史对话的可能性”会议是自2020年1月菲律宾会议以来，久违的一次面对面交流。

本次对话的主题是“20世纪的战争·殖民统治与和解的历史叙述”。我们从教育、媒介和研究这三个领域探讨了这一主题。即使在全世界被迫停止的疫情期间，“国史对话”也没有中断。因为我们以积极反映时代争议的各种主题为基础持续进行对话，才得以在今天共同直面20世纪战争、殖民统治与和解这一重大主题。

东亚，尤其是日本、中国、韩国三国，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当然，我们对这一历史的认知存在不少差异。对于近现代、特别是20世纪的战争和殖民历史中存在尖锐的争论和难解的问题这一事实，我们大多持相同意见，但在与事件相关的解释方面存在分歧。正是在此背景下，本次的第八届对话决定直接讨论这一主题。

但我们并未停留在只是重复传统的论点。本次会议关注了历史学者如何研究历史，以及在最能明确反映历史认识的教育和媒体领域中与历史认识相关的研究是如何被提及的。因此，在本次会议上表现出了对“元历史”（meta-history）这一提供历史解释基本框架的理论的极大关注。在“元历史”这一理论性层面以外，于20世纪后期在历史学界确立的日常史（l'histoire quotidienne）、口述史（oral history）等历史学方法也在历史教育中被广泛应用这一状况也得到了确认。本次会议很好地展示了三国学者的想法、问题意识与研究状况。

日本的各位研究者详细审视了日本在教育、媒体和个人层面如何对待历史的问题。日本学者在作为历史学者基本素养的自我客观化与作为传达者的历史学者或历史教育者之间的困境、以及在现代历史学中应该回顾的个人史的价值平衡方面，进行了精彩的发言。

韩国研究者讨论了殖民统治和朝鲜战争的热战经历及其历史痛苦。他们解释了解放后历史研究者如何从殖民地背景中解救韩国历史，讨论了韩国学界对殖民时期经济的争论点，并通过生动的历史影像资料介绍了与历史研究不同的媒体是如何记忆这一历史的。

与韩国差不多同一时期,中国也直面了剧烈的历史变动。对于伪满洲国合作者,如果换个角度去看,他有时候可能会变身为“爱国者”,中国研究者谈论了拥有这种两面性的人物的人生。还有研究者谈论了中华民国时期中国人对日本军阀认识的多样性,以及对于 1945 年至 1949 年间中国历史重大转折的不同解读。这给韩、日两国研究者带来了不少启示。通过中国学者的发言,我认为在中国大陆也开始萌发历史研究的巨大变化。

此次国史对话是验证新研究可能性的一种挑战,并确认了各国对补充作为官方历史的国史的巨大努力。通过本次对话,我们找到了新的变化与发展的可能性。我们各位研究者的这种努力,必定会对与邻国的历史和解以及东亚历史发展做出贡献。

我要感谢各国研究者们以各种有难度的领域为主题,向我们介绍了不同的视角。国史对话的精髓在于相互讨论,而非单向发言。通过讨论,我们能更准确地理解对方,实现共同理解。本次会议有充分的讨论时间,虽然包括主持人在内的很多与会者们普遍觉得时间不够,但按照国际学术会议的标准来看,我们已经确保了相对充分的讨论时间。讨论者在第二天进行了基于充分思考的深入讨论。

展望未来,两年后的 2025 年是二战结束 80 周年,这在世界历史学界是研究现代史的重要契机。各国学者已经在准备相关研究。韩、中、日三国分别用“解放”、“胜利”和“终战”来描述这一事件,并在纪念日期上有所不同。两年后,各国将重新评价这一历史事件。

考虑到这一前景,本次对话主题“20 世纪战争·殖民统治与和解的历史叙述”是一个非常出色的选择。本次会议深入探讨了既存的教育问题,即与学校教育现场相关的问题,以及作为社会教育重要核心的媒体与历史的问题,还有与这些题目相关的研究问题。在本次会议上报告的主题具有独立意义,同时也为深入理解二战对韩、中、日三国现代史的影响提供了基础。我们将反思这一战争的历史意义,并思考应向未来传承什么。

最后,我要再次感谢渥美国际交流财团今西淳子常务理事对 8 届国史对话的持续性支持。今西女士是一位杰出的策划者和熟练的组织者。感谢组织本次会议的三谷博老师、刘杰老师和所有工作人员,使会议顺利进行。

国史对话旨在提供一个平台,让三国在各自讲述自己的历史的同时,探讨应该共同讨论的内容,以及为共存的未来能够创造什么样的成果。我在此次对话中更加确认了这一可能性。再次感谢所有参与国史对话的各位,我的闭幕辞到此结束。感谢大家。

## 对8届国史对话的回顾与展望

## 今西淳子

渥美国际交流财团



[原文为日语。翻译：于宁（东京大学）]

各位，感谢大家一天半以来的精彩讨论。

国史对话项目始于2015年7月在早稻田大学举行的第49届SGRA论坛。我们讨论了在东亚建立“知识共享空间”或“知识平台”的意义，并从中为东亚提供通向和解的智慧。

在这个平台上，于2016年9月在北九州的亚洲未来会议上举办了首届“国史对话”。第2届对话于2017年8月在北九州举行，主题为“蒙古来袭和13世纪蒙古帝国的全球化”。第3届对话于2018年8月在首尔的亚洲未来会议上举行，主题为“17世纪东亚国际关系”。第4届对话于2020年1月在菲律宾的亚洲未来会议上举行，主题为“‘东亚’的诞生：19世纪国际秩序的转变”。第5届对话原计划在东京早稻田大学以20世纪为主题举办，但由于新冠疫情被迫延期。在疫情期间，我们举办了几次三小时左右的时间设置相对较短的线上对话，主题包括“传染病”、“人的流动”和“历史大众化”。本届论坛首次采取线上线下同步举办的形式，这种形式在今后可能会被继续采用。

渥美财团最初是向在日本的研究生院进行博士论文写作的外国研究者提供资助的奖学财团，后来通过利用毕业奖学生的人际网络开展国际化的、跨学科的学术交流工作。在与刘杰老师提出的“知识平台”相遇后，便诞生了国史对话项目。因此，该项目的重点是持续推动中日韩三国学者跨国界的积极对话。尽管一天半充实的讨论并未得出任何结论，但希望大家不要对此感到失望，而是利用本次对话的经验，带着困惑继续通过进一步的对话建立信任关系。

对于国史对话的成果，我们会使用三国语言编撰发行SGRA报告书，本次会议期间也展示了历届对话的报告书。PDF版本可以通过SGRA网站下载，网站可切换日、中、韩、英四种语言，欢迎大家下载使用。

此外，为了更有效地利用这些成果，这次我们启动了教材化项目，对象设定为大学一、二年级学生。我们设想制作视频教材，引导学生从背诵历史转向独立思考历史。遗憾的是这次未能赶上，但请期待下次国史对话。教材完成后，欢迎各位老

师在课堂上使用。

最后谈谈未来的计划。今后，国史对话将继续在渥美财团每两年举办一次的亚洲未来会议，这一规模为 500 人的国际研究交流平台上举办。下一届将于 2024 年 8 月在泰国曼谷举办。由于至今为止的以 13 世纪、17 世纪、19 世纪、20 世纪为主题的国史对话已告一段落，下次将结束历来设定三个副主题，每个主题各邀请中日韩三位学者，总共撰写九篇论文的这一方式。今后，我们将像之前以“传染病”、“历史大众化”为题进行线上对话时那样，围绕一个问题进行指定讨论，每种语言指定一到两位讨论者，并增加自由讨论的时间，以线上线下同步举办的形式进行。希望此次与会者也能来参与自由讨论。现场参加的人员不仅可以参与国史对话，也可以参加亚洲未来会议。欢迎各位老师带着学生一起来参与小组讨论。对以往参与过国史对话的人员，我们考虑提供免注册费等优惠。学生可以申请奖学金和优秀论文奖。

总之，国史对话还将继续下去。感谢在酷暑中来到早稻田的各位老师，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参与并合作。期待在下一次曼谷的会议上再次见到大家。

## 讲师简介

### ■ 金 泰雄 / KIM, Taewoong

1984年毕业于首尔大学师范大学历史教育专业。1990年毕业于首尔大学研究生院国史学科硕士课程，1997年毕业于首尔大学研究生院国史学科博士课程。文学博士。现任首尔大学师范大学历史教育系教授。专业领域是韩国近代史、韩国社会经济史。

主要著作：《根深蒂固的韩国史》，《深泉般的故事6（近代篇）》sol\_book（出版社），2003。《韩国近代地方财政研究》Acanet（出版社），2012。《大韩帝国与3.1运动》Humanist books（出版社），2022。

### ■ 唐 小兵 / TANG, Xiaobing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哈佛燕京访问学者。

研究领域集中在晚清民国报刊史、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与思想文化史、左翼文化与中国革命、回忆录、口述史与20世纪中国的历史记忆等领域。先后出版《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以〈大公报〉“星期论文”和〈申报〉“自由谈”为例》、《十字街头的知识人》、《与民国相遇》、《书架上的近代中国——一个人的阅读史》、《北美学踪：从温哥华到波士顿》等。主要作品发表在China Information、《新闻与传播研究》、《史林》、《中共党史研究》、《二十一世纪》（香港）、《思想》（台北）等海内外期刊。

曾获华东师范大学第一届青年教师育人贡献奖，2014年获《东方历史评论》杂志评选的中国杰出青年历史学人荣誉称号（全国共十五位）。

主要著作：《战争、苦难与新闻——试论抗战时期民间报刊的舆论动员》，《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8期。《民国时期中小知识青年的聚集与左翼化——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为中心》，《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11期。《后五四的家庭革命与社会改造思潮——以《中国青年》《生活周刊》《申报》为中心的讨论》，《天津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

### ■ 盐出浩之 / SHIODE, Hiroyuki

1997年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学士。1999年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专攻硕士。2004年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专攻博士课程毕业，获博士（学术）学位。曾供职于琉球大学法学院担任副教授、教授，后任职于京都大学研究生院文学研究科担任副教授，现任教授。专业为日本近现代史，日本政治史，东亚国际关系史。

主要著作：《冈仓天心与大川周明：思考“亚洲”的知识分子们》（山川出版社，2011年）。《越境者的政治史：亚洲太平洋中的日本人移民与殖民》（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5年）。《公论与交际的东亚近代》（东京大学出版会，2016年）。

### ■ 江 沛 / JIANG, Pei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南开大学中外文明交叉科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天津历史学会副理事长。2014-2020年间曾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主编《中国近代交通社会史丛书》等，曾先后任日本大阪大学、广岛大学、中国台湾政治大学客座教授。

主要从事民国史、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抗战研究专项重大项目的研究，任首席专家。

主要著作：《战国策派思潮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国民党结构史论》（下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城市化进程研究》（中华民国专题史丛书之九），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 ■ 福间良明 / FUKUMA, Yoshiaki

1969年生于熊本市。1992年同志社大学文学部社会学科新闻学专攻毕业。曾于出版社供职。2003年京都大学研究生院人类环境学研究科博士课程毕业。获博士（人类环境学）学位。曾任香川大学经济学部副教授，现任立命馆大学产业社会学部教授。

专业为历史社会学，媒介史。

主要著作：《“战争体验”的战后史——世代·教养·意识形态》（中公新书，2009年）。《战后日本、记忆的力学——“称作继承的断绝”与稳妥性的政治学》（作品社，2020年）。《司马辽太郎的时代——历史与大众教养主义》（中公新书，2022年）。

## ■ 李基勋 / LEE, Kihoon

1991年毕业于首尔大学国史系，1993年获得首尔大学国史系硕士学位，2005年获得首尔大学国史系博士学位。曾任木浦大学历史系教授，现任延世大学历史系教授，季刊《历史批评》编辑主编，历史问题研究所副所长。

专业领域是近代社会史及文化史。

主要著作：《姐姐的曲折——韩国近代家庭与女童劳动》，《历史批评》141，2022。《无限竞争的车轮：60-70年代的学校和学生》，书海文集，2018。《青年啊，青年啊，我们的青年：点名近代青年》，青年社，2014年

## ■ 安冈健一 / YASUOKA, Kenichi

2004年京都大学农学部生物资源经济学科毕业。2006年京都大学研究生院农学研究科硕士毕业。2009年京都大学研究生院农学研究科博士课程毕业。获京都大学博士（农学）学位。

现任大阪大学研究生院人文学研究科副教授。

专业为日本近现代史，口述史。

主要著作：《“他者”们的农业史》（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14年）。《以共生的“伙伴”为目标》（高谷幸编《多文化共生的实验室：从大阪思考》青弓社，2022年）。《听取/口述史》（岩城卓二等编《论点·日本史学》Minerva书房，2022年8月）。

## ■ 梁知惠 / YANG, Jihye

2021年，汉阳大学研究生院史学系博士毕业。东北亚历史财团研究委员。

韩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生态环境史专业。

主要著作：殖民地时期日本窒素在朝鲜推进的水力发电站建设和“开发难民”问题，日韩相互认识9，2019。A Locked City: The Japanese Company Nitchitsu's Building of Hŭngnam, Seoul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8, 2022年、Competing Memories of Mega-Dam Development in Colonial Korea: From Science to Disaster, Acta Koreana, 25-2, 2022年。

## ■ 陈红民 / CHEN, Hongmin

山东泰安人。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浙江省历史学会副会长。1985年-2006年，在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曾担任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副主任。2006年-迄今，在浙江大学历史系（历史学院）任教，曾担任历史系主任、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所长。

主要从事中华民国史、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出版《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蒋廷黻资料》等学术著作3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研究成果多次获省部级奖励。曾赴美国、英国、意大利、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国与香港、澳门、台湾地区进行学术交流。

主要著作：《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2003年。《蒋介石的后半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蒋廷黻资料》（哈佛燕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第九种）（2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6月。《九一八事变后的胡汉民》，《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周辺の存在の国民党内派閥闘争に対する影響——胡漢民の政治主張を中心とする研究（1931-1936）》，载《周辺から見た20世紀中国》，（日本）中国书店，2002年。《相异何其大——台湾时代蒋介石与胡适对彼此间交往的记录》，《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2期。《抗战后期蒋介石对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接触的怵惧和破坏：以《蒋介石日记》为中心的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23年第1期。

## 金 因泰

全南大学

[原文为韩语。翻译：洪 龙日（东京大学）]

8月8日，第8届日本·中国·韩国国史对话的可能性“20世纪的战争·殖民统治与和解的历史叙述——教育·媒介·研究”在略微阴沉的天气中线上线下同步拉开帷幕。

早稻田大学内的会场里，开放给一般听众的座位也座无虚席。第一天的会议共分为四场，第1场会议在村和明老师（东京大学）的主持下进行。在正式报告开始之前，刘杰老师（早稻田大学）作了开幕致辞，三谷博老师（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宣读了主旨说明，报告人、讨论者以及各位参加者进行了自我介绍。刘杰老师表示，他期待我们能够在历届“国史对话”的基础上，冷静而沉着地探讨各国目前是如何讨论20世纪的战争、殖民统治与和解的问题的，并强调希望本次会议成为彼此倾听对方国家的历史认识的机会。

三谷博老师首先提出了“为了未来”这一关键词。他表示，在国史对话项目策划之初，就想要尝试讨论这次的主题，现在终于得偿所愿，对此感到非常高兴。随后，他冷静地讲解了筹办国史对话这一大型学术性聚会的契机。日本以及其他国家持续开展历史对话之时，却因各国政府采取了对立政策而造成了倒退的后果。但即便如此，历史对话还是得以重新开启，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

第2场至第4场会议分别以教育、媒介和研究为主题，进行了论文报告和讨论。以“教育”为主题的第2场由南基正老师（首尔大学）主持。首位报告人是金泰雄老师（首尔大学），他报告的题目为《解放后韩国知识界的去殖民话语及历史叙事架构的变化》。该报告介绍了韩国解放（1945年8月15日独立）后历史教科书中历史叙述的变化过程，对韩国的国内外政治与历史教科书内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追溯。唐小兵老师（华东师范大学）在他报告的《历史记忆的战争与历史书写的伦理——有关20世纪中期中国的“历史之战”》中，介绍了对长春包围战的相反记忆及评价，提出了历史与启蒙之间的紧张关系问题。

在题为《日本的历史教育如何讲述战争与殖民统治——基于教科书与教育现场的思考》的报告中，盐出浩之老师（京都大学）阐述了日本在战后教科书编撰方面

发生的变化及变化的诱因。尤其是教科书在教育现场中的认知和使用方式，以及当前所面临的课题（作为加害者和受害者的两面性等）都是之前很少会涉及的内容，我认为这些对韩国和中国的研究者来说非常具有参考价值。

在随后的讨论中，我们首先听到了来自日本教育现场的教师们的苦恼。他们提出了如何教授新的历史综合科目的问题，以及尽管史料在历史教育中很重要，但在教育现场很难集中处理的局限性（如因入学考试等原因）等问题。韩国和中国的学者也分享了类似的经历和苦恼。此外，还讨论了记忆如何被用于启蒙和共情（其方向可能与严格的历史事实不同）的事例，以及个人各种记录（也可能与历史事实不同）等材料受到关注的问题。不少意见认为不能对此持否定态度，这是本次“对话”的主要论点之一。

第3场会议的主题是“媒介”，由李恩民老师（樱美林大学）主持。江沛老师（南开大学）在他报告的《自保、爱国与屈从：一个伪满“合作者”的心态探微》中，探讨了中国人对中日战争的看法。尽管中国将其明确记载为一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但当时生活在中国的人们是否也持相同看法，江沛老师通过一位人物的日记进行了分析。当时对人们来说生存很重要，而且还存在着不同面孔（叛国和爱国）的人。他指出历史学家应该将关注点转向弱势民众，并尊重每个人的尊严。

福间良明老师（立命馆大学）在他报告的《战后日本的媒介文化与“战争叙事”的变迁》中，以电影为中心，介绍了媒体在谈论战争方面的变化趋势以及当时的时代背景。他详细阐述了长期以来人们对那些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的情况所感到的纠结与矛盾，在这些纠结与矛盾已经变得模糊不清的当下，福间良明老师抛出了历史研究者在市民社会中应该扮演何种角色的课题，这些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研究。

李基勋老师（延世大学）以《现代韩国媒体的殖民地、战争经验形象化及其影响——以电影、电视剧为中心》为主题分析了韩国的战争电影。在韩国，殖民地经历和战争经历是不同的。然而在形成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它们常常被放在一起讨论。通过电影的方式，展示了典型的善与恶的二元对立形象，以及随着21世纪的临近而发生变化的面貌。

第4场会议的主题是“研究”，当天的最后一场会议由宋志勇老师（南开大学）主持。安冈健一老师（大阪大学）在他报告的《“我”的历史，“我们”的历史——以色川大吉的“本人史”论为线索》中，将“游离”于传统历史观之外的普通民众对历史的认知，以及历史学对此的认知作为主题。通过书写自己的历史，可以留下一个不被刻板历史所淹没的故事。安冈健一老师建议我们应该思考如何利用这一点，而这正是历史学可以为市民社会做出贡献的地方。

梁知惠老师（东北亚历史财团）在她报告的《在“发展”之外，书写新的历史的可能性：韩国殖民地时期经济史研究的方向》中，首先对韩国殖民地经济史研究的几个方向（殖民地掠夺论、殖民地近代化论以及殖民地近代性论）进行了说明。然而，随着进入21世纪，现有研究动向的速度逐渐减缓，同时出现了与学术讨论无关的激烈政治攻击，使该领域面临危机。尽管如此，一些批判性对策，如环境和生态问题等持续涌现，为这一研究注入了新的希望。

陈红民老师（浙江大学）在他报告的《民国时期中国人对“日本军阀”的认知》中，以附着在用语上的历史性为问题意识，关注了“日本军阀”一词。他强调，我们所熟知的历史用语在当时的语境下可能具有不同的含义。根据时代、发言主体以

及阵营的不同，有时甚至以不同的语境来使用。在当前学术界积极推动数据库的建设和应用以及利用大数据的背景下，我们期待具有这种问题意识的研究能够得到积极的尝试。

在最后一场的讨论时间里，三国研究者主要围绕（非历史学家）个人撰写历史的问题（历史和个人史的冲突可能性），历史学家介入个人历史写作的方式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与交流。尽管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但对个人史和自我史写作的积极叙述仍然非常有趣。

最后，刘杰老师总结了第一天的主要论点。简而言之，他指出，三国在近代所经历的不同历史背景导致了各国战后历史的不同侧重点。基于这些不同背景（积极的方面）进行了各种探索，但如何弥合这些不同历史观之间的差距仍然是个问题。刘杰老师还指出，在创造所谓的东亚新历史方面，在历史教育上存在一些共同的特征（日本的历史综合、韩国的东亚史以及中国上海的尝试）。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家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本次报告中，政治与历史、历史与道德、史料问题成为焦点。如果以这种问题意识为基础的努力持续下去，历史和解有望得到实现。

8月9日是“全体讨论”日。在开始之前，三谷博老师发表了评论。他根据个人的研究经验，细致地讲述了如何将公众与历史联系在一起这一课题。也就是说，在有些研究主题可能没有任何史料，或史料方面有局限性的情况下，我们是否可以创作故事，他希望我们可以谨慎处理这个两难境地。

讨论共分为两个部分进行。第5场会议由郑淳一老师（高丽大学）主持。在这一环节，指定讨论者们提出了一些问题。分别是金宪柱老师（国立韩巴大学）的“三个国家在不同语境下的受害者叙事”，“日本上世纪50至70年代的媒体文化能否成为当今时代的替代方案”，“对伪满‘合作者’的平面向解读”；袁庆丰老师（中国传媒大学）的“在伪满洲国制作的电影应该看作是哪个国家的电影”；吉井文美老师（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的“个人眼中的历史的相关事例（英国矿山经营者内森）与战争和殖民统治的多元理解的可能性”，“韩国和日本在政治对立时期举行的韩日共同展览中表现出的可能性”；史博公老师（中国传媒大学）的“抗日神剧的衍生逻辑和传播方式及其对普通大众的影响”。

大家就新教科书的问题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虽然这一课题仍然面临许多挑战，比如历史综合应由谁来教授以及对内容的批评等问题。但为了激发学生们对日本历史的兴趣，大家正在努力改进之前存在的问题。三谷博老师补充说明了在融合世界史和日本史，以及重视全球化和与邻国的关系等两个要素方面存在局限性，因此今后应该努力制定正确的指导方针。

现场听众也发表了一些有意义的观点。川崎刚先生（前朝日新闻记者）介绍了一个案例，他指出媒体上的历史文章存在问题，因为这些文章是由年轻记者撰写的，他强调这是一个事实，因为主要媒体的记者都接受了大学教育，所以并不能说教育制度方面没有责任。年轻记者无法亲历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因此不可避免地会有局限性。最后，他呼吁学术界与年轻记者合作，因为今后会有很多涉及关东大地震100周年纪念的文章。这一评论与本次对话的主题相符。历史研究者需要保持专业性，同时也需要承担新时代所要求的新职责，他们需要具备与不同“群体”沟通的能力。

第6场会议由彭浩老师（大阪公立大学）主持。除了张晓刚老师（长春师范大学）

的“论施明儒日记的真实性”；金滢老师（首尔大学）的“生态史能否超越民族国家史”、“对共同体中平庸之恶和遗留任务的思考”、“历史教育应超越‘为什么’和‘怎么做’，还要给出‘向哪里去’的方向”、“建议讨论历史学的未来，要包含对人的尊重”；平山升老师（神奈川大学）的“国家史与地方（区域）史的关系”、“地方培养专业历史学家的基础问题”、“以修学旅行为例的地方史（教育）与观光的两难问题”等指定讨论以外，现场教师们就“中国学生对于近代化的认识问题的原因”（市川智生老师（冲绳国际大学））以及将史料批判教材化的必要性提出了建议。

最后，赵珖老师（高丽大学名誉教授）致闭幕词，并由渥美国际交流财团常务理事今西淳子进行了会议回顾。赵珖老师表示，这是近来最令人满意的一次会议，因为是时隔许久召开的面对面会议，大家有相对充裕的时间进行讨论。在2025年即将到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80周年之际，三国将以光复、胜战、终战等不同的用语和概念，理解这一事件并对其进行历史评价，赵珖老师期待国史对话能够在其中发挥作用。今西淳子常务理事回顾了迄今为止的“国史对话”的历程，并约定明年在泰国再次相见。

在第8届国史对话中，三国研究者讲述了各自国家所处的现实情境以及在此背景之下产生的难题。在20世纪充满动荡的国际形势下，尽管三国都位于东亚地区，却面临着不同的挑战。各国的历史研究者都在思考如何评价和记录历史，而这也成为历史研究的一部分。通过本次对话可以看出，有关本国历史的评价和解释的讨论仍在继续，还有很多尚未“解决”的部分。然而，希望仍然存在。这些纠结与难题有一些是共通的，还有一些是在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发生的。通过分享各国历史上的讨论和困扰，可以找到推动三国之间历史对话朝着更合理、积极的方向发展的线索。

笔者任职于培养初高中历史教师的历史教育系。本次对话就我个人来说是一次很好的学习经历，我将活用此次经验，同学生和教师们共同努力。在这次对话中，我有幸得到与日本教育领域的教师交流的机会。与研究者的交流一样，这些教师也有与韩国教师类似的困扰。我认为，不仅是研究者，中国、韩国、日本的教师和研究者也应该努力创造更多沟通的机会。

在此次对话中，最广泛讨论的焦点是个人历史和历史教育现场的相关问题。这反映了在急剧变革的时代和即将到来的未来，历史学应该扮演何种角色这一问题。在反知性主义蔓延、人工智能发展、出生率下降等快速变化的时代，一些历史研究者感叹历史的作用似乎已经终结。因此，历史学应该具备什么样的作用以及是否能够发挥作用，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历史学需要保留其传统研究方法，同时也需要适应新时代的需求。

就我个人而言，金滢老师所提到的“今后的历史学研究不要再互相侮辱，要加入‘尊重人’的内容”和“要警惕仁义的排他性，培养不仁和不义的感官意识，摒弃过度的义和狭隘的仁”的建议比较印象深刻。我想起了最近看过的电影和书籍。《瞬息全宇宙（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作为近年来最有名的电影之一，之所以能引起我的共鸣，就是因为它所传达的互相安慰、与人为善的信息。在《鱼不存在（Why Fish Don't Exist）》一书中，露露·米勒（Lulu Miller）写出“生命都是有价值的，我们的生命都很重要”的口号。也许这正是时代的要求，也可以成为历史学的新角色之一。

历史学作为长期形成的学问，若能够遵守基本原则，若能向不同的可能性和方法论敞开大门，若能放下必须通过对决来战胜某些人（无论是历史上的对象还是现在的邻居）的义务感，若能传播这门学科的善意的话，那么我认为历史学将会获得新的生命。而正是本次对话让我的这个期待变得更加丰满了。

（金 囿泰《第8届国史对话“20世纪的战争·殖民统治与和解的历史叙述—教育·媒介·研究”报告书转载）

### ■ 金 囿泰 / KIM, Kyongtae

出生于韩国浦项市，韩国史专业。在高丽大学韩国史学系攻读博士期间，于2010年至2011年间，以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日本文化研究专业（日本史学）外国研究生的身份留学。2014年在高丽大学韩国史学系获得博士学位。曾任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研究员、高丽大学人文力量强化事业团研究教授，目前担任全南大学历史教育系副教授。研究关注战争的破坏性本性与必定从战争所引发的荒原中生长出的和平的历史。

主要著作：《壬辰战争期讲和交涉研究》（博士论文）、《虚势与妥协——围绕壬辰倭乱的三国协商》（东北亚历史财团，2019年）等。



第八届 国史对话的可能性 “20 世纪的战争·殖民统治与和解的历史叙述 参加者名单

|                  | 姓名 (罗马字)           | 姓名 (日语)            | 姓名 (韩语)        | 姓名 (中文)            | 所属单位 (日语)     |
|------------------|--------------------|--------------------|----------------|--------------------|---------------|
| <b>报告人</b>       |                    |                    |                |                    |               |
| 1                | KIM Taewoong       | 金泰雄                | 김태웅            | 金泰雄                | ソウル大学         |
| 2                | TANG Xiaobing      | 唐小兵                | 탕샤오빙           | 唐小兵                | 華東師範大学        |
| 3                | JIANG Pei          | 江沛                 | 장페이            | 江沛                 | 南開大学          |
| 4                | FUKUMA Yoshiaki    | 福間良明               | 후쿠마 요시아키       | 福间良明               | 立命館大学         |
| 5                | LEE Kihoon         | 李基勳                | 이기훈            | 李基勋                | 延世大学          |
| 6                | YASUOKA Kenichi    | 安岡健一               | 야스오카 겐이치       | 安冈健一               | 大阪大学          |
| 7                | YANG Jihye         | 梁知惠                | 양지혜            | 梁知惠                | 東北亜歴史財団       |
| 8                | CHEN Hongmin       | 陳紅民                | 천홍민            | 陈红民                | 浙江大学          |
| <b>报告人/组委会成员</b> |                    |                    |                |                    |               |
| 9                | SHIODE Hiroyuki    | 塩出浩之               | 시오데 히로유키       | 盐出浩之               | 京都大学          |
| <b>指定讨论者</b>     |                    |                    |                |                    |               |
| 10               | HIRAYAMA Noboru    | 平山昇                | 히라야마 노보루       | 平山升                | 神奈川大学         |
| 11               | KIM Ho             | 金滸                 | 김호             | 金滸                 | ソウル大学         |
| 12               | KIM Hunjoo         | 金憲柱                | 김헌주            | 金宪柱                | 国立한바탕大学       |
| 13               | SHI Bogong         | 史博公                | 시보공            | 史博公                | 中国传媒大学        |
| 14               | YOSHII Fumi        | 吉井文美               | 요시이 후미         | 吉井文美               | 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     |
| 15               | YUAN Qingfeng      | 袁慶豊                | 위안칭펑           | 袁庆丰                | 中国传媒大学        |
| 16               | ZHANG Xiaogang     | 張曉剛                | 장샤오강           | 张晓刚                | 長春師範大学        |
| <b>自由讨论小组成员</b>  |                    |                    |                |                    |               |
| 17               | ASANO Toyomi       | 浅野豊美               | 아사노 도요미        | 浅野丰美               | 早稲田大学         |
| 18               | DUAN Ruicong       | 段瑞聡                | 완루이충           | 段瑞聪                | 慶応義塾大学        |
| 19               | ICHIKAWA Tomoo     | 市川智生               | 이치카와 토모오       | 市川智生               | 沖繩國際大学        |
| 20               | Justin Kyle Aukema | ジャスティン<br>カエル アウケマ | 저스틴 카일<br>아우케마 | Justin Kyle Aukema | 大阪公立大学        |
| 21               | KAWASAKI Takeshi   | 川崎剛                | 가와사키 다케시       | 川崎刚                | 早稲田大学         |
| 22               | KAWASHIMA Keiichi  | 川島啓一               | 가와시마 케이이치      | 川岛启一               | 同志社中学校・高等学校   |
| 23               | KIM Hyunsun        | 金賢善                | 김현선            | 金贤善                | 明和大学          |
| 24               | MURAI Ryota        | 村井良太               | 무라이 료타         | 村井良太               | 駒沢大学          |
| 25               | OKUBO Takeharu     | 大久保健晴              | 오쿠보 다케하루       | 大久保健晴              | 慶応義塾大学        |
| 26               | TAMAKI Kei         | 田巻慶                | 다마키 케이         | 田卷庆                | 芝浦工業大学柏中学高等学校 |
| <b>组委会成员</b>     |                    |                    |                |                    |               |
| 27               | Chen Lu            | 陳璐                 | 첸루             | 陈璐                 | 早稲田大学         |
| 28               | Cho Kwang          | 趙琯                 | 조광             | 赵琯                 | 高麗大学名誉教授      |
| 29               | Chong Soonil       | 鄭淳一                | 정순일            | 郑淳一                | 高麗大学          |
| 30               | Kim Kyongtae       | 金キョンテ              | 김경태            | 金喆泰                | 全南大学          |
| 31               | Li Enmin           | 李恩民                | 리엔민            | 李恩民                | 桜美林大学         |
| 32               | Liu Jie            | 劉傑                 | 류지에            | 刘杰                 | 早稲田大学         |
| 33               | Mitani Hiroshi     | 三谷博                | 미타니 히로시        | 三谷博                | 東京大学名誉教授      |
| 34               | MURA Kazuaki       | 村和明                | 무라 가즈아키        | 村和明                | 東京大学          |
| 35               | Nam Kijeong        | 南基正                | 남기정            | 南基正                | ソウル大学         |
| 36               | Peng Hao           | 彭浩                 | 펑하오            | 彭浩                 | 大阪公立大学        |
| 37               | Song Zhiyong       | 宋志勇                | 송지용            | 宋志勇                | 南開大学          |
| <b>同声传译</b>      |                    |                    |                |                    |               |
| 38               | Ding Li            | 丁莉                 | 딩리             | 丁莉                 | 北京大学          |
| 39               | Song Gang          | 宋剛                 | 송강             | 宋刚                 | 北京外國語大学       |
| 40               | Lee Hyeri          | 李ヘリ                | 이혜리            | 李惠利                | 韓國外國語大学       |
| 41               | Ahn Younghee       | 安ヨンヒ               | 안영희            | 安映姬                | 韓國外國語大学       |
| 42               | Jin Danshi         | 金丹实                | 김단실            | 金丹实                | 通訳翻訳者         |
| 43               | Piao Xian          | 朴賢                 | 박현             | 朴贤                 | 京都大学          |
| <b>翻译</b>        |                    |                    |                |                    |               |
| 44               | Hong Yongil        | 洪龍日                | 홍용일            | 洪龙日                | 東京大学          |
| 45               | Yu Ning            | 于寧                 | 유닝             | 于宁                 | 東京大学          |
| 46               | Yun Jae-un         | 尹在彦                | 윤재언            | 尹在彦                | 立教大学          |
| <b>事務局</b>       |                    |                    |                |                    |               |
| 47               | Imanishi Junko     | 今西淳子               | 이마니시 준코        | 今西淳子               | 渥美財団          |
| 48               | Tsunoda Eiichi     | 角田英一               | 쓰노다 에이이치       | 角田英一               | 渥美財団          |
| 49               | Nagai Ayumi        | 長井亜弓               | 나가이 아유미        | 长井亚弓               | 渥美財団          |
| 50               | Miyake Aya         | 三宅綾                | 미야케 아야         | 三宅绫                | 渥美財団          |

# SGRA 報告 已发行期号介绍

---

- SGRA レポート01 設立記念講演録 「21世紀の日本とアジア」 船橋洋一 2001. 1.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02 CISV国際シンポジウム講演録 「グローバル化への挑戦：多様性の中に調和を求めて」  
今西淳子、高 偉俊、F. マキト、金 雄熙、李 來賛 2001. 1. 1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03 渥美奨学生の集い講演録 「技術の創造」 畑村洋太郎 2001. 3. 1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04 第1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地球市民の皆さんへ」 関 啓子、L. ビッヒラー、高 熙卓 2001. 5.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05 第2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グローバル化のなかの新しい東アジア：経済協力をどう考えるべきか」  
平川 均、F. マキト、李 鋼哲 2001. 5.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06 投稿 「今日の留学」「はじめの一步」 工藤正司 今西淳子 2001. 8.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07 第3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共生時代のエネルギーを考える：ライフスタイルからの工夫」  
木村建一、D. バート、高 偉俊 2001. 10.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08 第4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IT 教育革命：ITは教育をどう変えるか」  
白井建彦、西野篤夫、V. コストブ、F. マキト、J. スリスマンティオ、蔣 恵玲、楊 接期、  
李 來賛、斎藤信男 2002. 1.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09 第5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グローバル化と民族主義：対話と共生をキーワードに」  
ペマ・ギャルポ、林 泉忠 2002. 2. 28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10 第6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日本とイスラーム：文明間の対話のために」  
S. ギュレチ、板垣雄三 2002. 6. 1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11 投稿 「中国はなぜWTOに加盟したのか」 金香海 2002. 7. 8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12 第7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地球環境診断：地球の砂漠化を考える」  
建石隆太郎、B. プレンサイン 2002. 10. 2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13 投稿 「経済特区：フィリピンの視点から」 F. マキト 2002. 12. 12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14 第8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グローバル化の中の新しい東アジア」+宮澤喜一元総理大臣をお迎えして  
フリーディスカッション  
平川 均、李 鎮奎、ガト・アルヤ・プートゥラ、孟 健軍、B. ヴィリエガス 日本語版2003. 1. 31 発行、  
韓国語版2003. 3. 31 発行、中国語版2003. 5. 30 発行、英語版2003. 3. 6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15 投稿 「中国における行政訴訟—請求と処理状況に対する考察—」 呉東鎬 2003. 1. 31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16 第9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情報化と教育」 苑 復傑、遊間和子 2003. 5.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17 第10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21世紀の世界安全保障と東アジア」  
白石 隆、南 基正、李 恩民、村田晃嗣 日本語版2003. 3. 30 発行、英語版2003. 6. 6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18 第11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地球市民研究：国境を越える取り組み」 高橋 甫、貫戸朋子 2003. 8.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19 投稿 「海軍の誕生と近代日本—幕末期海軍建設の再検討と『海軍革命』の仮説」 朴 榮濬  
2003. 12. 4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20 第12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環境問題と国際協力：C O P 3 の目標は実現可能か」  
外岡豊、李海峰、鄭成春、高偉俊 2004. 3.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21 日韓アジア未来フォーラム 「アジア共同体構築に向けての日本及び韓国の役割について」2004. 6.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22 渥美奨学生の集い講演録 「民族紛争—どうして起こるのか どう解決するか」 明石康 2004. 4.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23 第13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日本は外国人をどう受け入れるべきか」  
宮島喬、イコ・プラムティオノ 2004. 2. 2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24 投稿 「1945年のモンゴル人民共和国の中国に対する援助：その評価の歴史」 フスレ 2004. 10. 2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25 第14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国境を越えるE-Learning」  
斎藤信男、福田収一、渡辺吉鎔、F. マキト、金 雄熙 2005. 3. 31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26 第15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この夏、東京の電気は大丈夫？」 中上英俊、高 偉俊 2005. 1. 24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27 第16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東アジア軍事同盟の過去・現在・未来」  
竹田いさみ、R. エルドリッチ、朴 榮濬、渡辺 剛、伊藤裕子 2005. 7.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28 第17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日本は外国人をどう受け入れるべきか- 地球市民の義務教育 -」  
宮島 喬、ヤマガチ・アナ・エリーザ、朴 校熙、小林宏美 2005. 7.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29 第18回フォーラム・第4回日韓アジア未来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韓流・日流：東アジア地域協力における  
ソフトパワー」 李 鎮奎、林 夏生、金 智龍、道上尚史、木宮正史、李 元徳、金 雄熙 2005. 5.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30 第19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東アジア文化再考－自由と市民社会をキーワードに－」  
宮崎法子、東島 誠 2005. 12.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31 第20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東アジアの経済統合：雁はまだ飛んでいるか」  
平川 均、渡辺利夫、トラン・ヴァン・トウ、範 建亭、白 寅秀、エンクバヤル・シャグダル、F. マキト  
2006. 2.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32 第21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日本人は外国人をどう受け入れるべきか－留学生－」  
横田雅弘、白石勝己、鄭仁豪、カンピラバープ・スネート、王雪萍、黒田一雄、大塚晶、徐向東、  
角田英一 2006. 4.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33 第22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戦後和解プロセスの研究」 小菅信子、李 恩民 2006. 7.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34 第23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日本人と宗教：宗教って何なの？」  
島蘭 進、ノルマン・ヘイヴンズ、ランジャンナ・ムコパディヤーヤ、ミラ・ゾンターク、  
セリム・ユジェル・ギュレチ 2006. 11.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35 第24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ごみ処理と国境を越える資源循環～私が分別したごみはどこへ行くの？～」  
鈴木進一、間宮 尚、李 海峰、中西 徹、外岡 豊 2007. 3.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36 第25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ITは教育を強化できるか」  
高橋富士信、藤谷哲、楊接期、江蘇蘇 2007. 4.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37 第1回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 in 北京講演録「パネルディスカッション『若者の未来と日本語』」  
池崎美代子、武田春仁、張 潤北、徐 向東、孫 建軍、朴 貞姫 2007. 6.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38 第6回日韓フォーラム in 葉山講演録「親日・反日・克日：多様化する韓国の対日観」  
金 範洙、趙 寛子、玄 大松、小針 進、南 基正 2007. 8. 31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39 第26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東アジアにおける日本思想史～私たちの出会いと将来～」  
黒住 真、韓 東育、趙 寛子、林 少陽、孫 軍悦 2007. 11.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40 第27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アジアにおける外来種問題～ひとの生活との関わりを考える～」  
多紀保彦、加納光樹、プラチャー・ムシカシントーン、今西淳子 2008. 5.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41 第28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いのちの尊厳と宗教の役割」  
島蘭進、秋葉悦子、井上ウイマラ、大谷いづみ、ランジャンナ・ムコパディヤーヤ 2008. 3. 1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42 第2回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 in 北京&新疆講演録「黄土高原緑化協力の15年－無理解と失敗から  
相互理解と信頼へ－」 高見邦雄 日本語版、中国語版 2008. 1.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43 渥美奨学生の集い講演録「鹿島守之助とパン・アジア主義」 平川均 2008. 3. 1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44 第29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広告と社会の複雑な関係」 関沢 英彦、徐 向東、オリガ・ホメンコ  
2008. 6. 2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45 第30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教育における『負け組』をどう考えるか～  
日本、中国、シンガポール～」 佐藤香、山口真美、シム・チュン・キャット 2008. 9.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46 第31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水田から油田へ：日本のエネルギー供給、食糧安全と地域の活性化」  
東城清秀、田村啓二、外岡 豊 2009. 1.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47 第32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オリンピックと東アジアの平和繁栄」  
清水 諭、池田慎太郎、朴 榮濬、劉傑、南 基正 2008. 8. 8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48 第3回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 in 延辺&北京講演録「一燈やがて万燈となる如く－  
アジアの留学生と生活を共にした協会の50年」 工藤正司 日本語版、中国語版 2009. 4. 1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49 第33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東アジアの経済統合が格差を縮めるか」  
東 茂樹、平川 均、ド・マン・ホーン、フェルディナンド・C・マキト 2009. 6.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50 第8回日韓アジア未来フォーラム講演録「日韓の東アジア地域構想と中国観」  
平川 均、孫 洌、川島 真、金 湘培、李 鋼哲 日本語版、韓国語 Web 版 2009. 9. 2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51 第35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テレビゲームが子どもの成長に与える影響を考える」  
大多和直樹、佐々木 敏、渋谷明子、ユ・ティ・ルイン、江 蘇蘇 2009. 11. 1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52 第36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東アジアの市民社会と21世紀の課題」  
宮島 喬、都築 勉、高 熙卓、中西 徹、林 泉忠、プ・ティ・ミン・チイ、  
劉 傑、孫 軍悦 2010. 3. 2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53 第4回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 in 北京&上海講演録「世界的課題に向けていま若者ができること〜  
TABLE FOR TWO〜」近藤正晃ジェームス 2010. 4.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54 第37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エリート教育は国に『希望』をもたらすか：  
東アジアのエリート高校教育の現状と課題」玄田有史 シム・チュンキャット  
金 範洙 張 健 2010. 5.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55 第38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Better City, Better Life 〜東アジアにおける都市・  
建築のエネルギー事情とライフスタイル〜」木村建一、高 偉俊、  
Mochamad Donny Koerniawan、Max Maquito、Pham Van Quan、  
葉 文昌、Supreedee Rittironk、郭 榮珠、王 劍宏、福田展淳 2010. 12. 1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56 第5回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 in 北京&フフホト講演録「中国の環境問題と日中民間協力」  
第一部（北京）：「北京の水問題を中心に」高見邦雄、汪 敏、張 昌玉  
第二部（フフホト）：「地下資源開発を中心に」高見邦雄、オンドロナ、ブレンサイン  
2011. 5.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57 第39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ポスト社会主義時代における宗教の復興」井上まどか、  
ティムール・ダダバエフ、ゾンターク・ミラ、エリック・シッケタンツ、島 蘭 進、陳 継東  
2011. 12.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58 投稿 「鹿島守之助とパン・アジア論への一試論」平川 均 2011. 2. 1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59 第10回日韓アジア未来フォーラム講演録「1300年前の東アジア地域交流」  
朴 亨國、金 尚泰、胡 潔、李 成制、陸 載和、清水重敦、林 慶澤 2012. 1.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60 第40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東アジアの少子高齢化問題と福祉」  
田多英範、李 蓮花、羅 仁淑、平川 均、シム・チュンキャット、F・マキト 2011. 11.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61 第41回SGRAフォーラム講演録「東アジア共同体の現状と展望」恒川恵市、黒柳米司、朴 榮濬、  
劉 傑、林 泉忠、ブレンサイン、李 成日、南 基正、平川 均 2012. 6. 18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62 第6回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 in 北京&フフホト講演録  
「Sound Economy 〜私がミナマタから学んだこと〜」柳田耕一  
「内モンゴル草原の生態系：鉱山採掘がもたらしている生態系破壊と環境汚染問題」郭 偉  
2012. 6. 1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64 第43回SGRAフォーラム in 蓼科 講演録「東アジア軍事同盟の課題と展望」  
朴 榮濬、渡辺 剛、伊藤裕子、南 基正、林 泉忠、竹田いさみ 2012. 11.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65 第44回SGRAフォーラム in 蓼科 講演録「21世紀型学力を育むフューチャースクールの戦略と課題」  
赤堀侃司、影戸誠、曹圭福、シム・チュンキャット、石澤紀雄 2013. 2. 1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66 渥美奨学生の集い講演録「日英戦後和解（1994-1998年）」（日本語・英語・中国語）沼田貞昭  
2013. 10.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67 第12回日韓アジア未来フォーラム講演録「アジア太平洋時代における東アジア新秩序の模索」  
平川 均、加茂具樹、金 雄熙、木宮正史、李 元徳、金 敬黙 2014. 2. 2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68 第7回SGRA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 in 北京講演録「ボランティア・志願者論」  
（日本語・中国語・英語）宮崎幸雄 2014. 5. 1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69 第45回SGRAフォーラム講演録「紛争の海から平和の海へー東アジア海洋秩序の現状と展望ー」  
村瀬信也、南 基正、李 成日、林 泉忠、福原裕二、朴 榮濬 2014. 10.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70 第46回 SGRA フォーラム講演録「インクルーシブ教育：子どもの多様なニーズにどう応えるか」  
荒川 智、上原芳枝、ヴィラーク ヴィクトル、中村ノーマン、崔 佳英 2015. 4.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71 第47回 SGRA フォーラム講演録「科学技術とリスク社会－福島第一原発事故から考える科学技術  
と倫理－」崔 勝媛、島藺 進、平川秀幸 2015. 5. 2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72 第8回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講演録「近代日本美術史と近代中国」  
佐藤道信、木田拓也 2015. 10.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73 第14回日韓アジア未来フォーラム、第48回SGRA フォーラム講演録「アジア経済のダイナミズム－  
物流を中心に」李 鎮奎、金 雄熙、榎原英資、安 秉民、ドマン ホーン、李 鋼哲 2015. 11.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74 第49回SGRA フォーラム講演録：円卓会議「日本研究の新しいパラダイムを求めて」  
劉 傑、平野健一郎、南 基正 他15名 2016. 6.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75 第50回SGRA フォーラム in 北九州講演録「青空、水、くらし－環境と女性と未来に向けて」  
神崎智子、斉藤淳子、李 允淑、小林直子、田村慶子 2016. 6. 27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76 第9回SGRA 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 in フフホト&北京講演録「日中200年－文化史からの再検討」  
劉 建輝 2020. 6. 18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77 第15回日韓アジア未来フォーラム講演録「これからの日韓の国際開発協力－共進化アーキテクチャ  
の模索」孫赫相、深川由紀子、平川均、フェルディナンド・C・マキト 2016. 11.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78 第51回SGRA フォーラム講演録「今、再び平和について－平和のための東アジア知識人連帯を考え  
る－」南基正、木宮正史、朴栄濬、宋均營、林泉忠、都築勉 2017. 3. 27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79 第52回SGRA フォーラム講演録「日本・中国・韓国における国史たちの対話の可能性(1)」  
劉傑、趙珧、葛兆光、三谷博、八百啓介、橋本雄、松田麻美子、徐静波、鄭淳一、金キョンテ  
2017. 6. 9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80 第16回日韓アジア未来フォーラム講演録「日中韓の国際開発協力－新たなアジア型モデルの模索－」  
金雄熙、李恩民、孫赫相、李鋼哲 2017. 5. 16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81 第56回SGRA フォーラム講演録「人を幸せにするロボット－人とロボットの共生社会をめざして第  
2回－」稲葉雅幸、李周浩、文景楠、瀬戸文美 2017. 11.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82 第57回SGRA フォーラム講演録「第2回 日本・中国・韓国における国史たちの対話の可能性－蒙  
古襲来と13世紀モンゴル帝国のグローバル化」葛兆光、四日市康博、チョグト、橋本雄、エルデニ  
バートル、向正樹、孫衛国、金甫枕、李命美、ツェレンドルジ、趙阮、張佳 2018. 5.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83 第58回SGRA フォーラム講演録「アジアを結ぶ？『一帯一路』の地政学」朱建榮、李彦銘、朴栄  
濬、古賀慶、朴准儀 2018. 11. 16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84 第11回SGRA 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講演録「東アジアからみた中国美術史学」塚本磨充、呉孟晋  
2019. 5. 17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85 第17回日韓アジア未来フォーラム講演録「北朝鮮開発協力：各アクターから現状と今後を聞く」  
孫赫相、朱建榮、文旻鍊 2019. 11. 22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86 第59回SGRA フォーラム講演録「第3回 日本・中国・韓国における国史たちの対話の可能性：17世  
紀東アジアの国際関係－戦乱から安定へ－」三谷博、劉傑、趙珧、崔永昌、鄭潔西、荒木和憲、許  
泰玖、鈴木開、祁美琴、牧原成征、崔姪姫、趙軼峰 2019. 9.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87 第61回SGRA フォーラム講演録「日本の高等教育のグローバル化!？」  
沈雨香、吉田文、シン・ジョンチョル、関沢和泉、ムラット・チャクル、金範洙 2019. 3. 26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88 第12回SGRA 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講演録「日中映画交流の可能性」  
刈間文俊、王衆一 2020. 9. 2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89 第62回SGRA フォーラム講演録「再生可能エネルギーが世界を変える時…？——不都合な真実を超えて」  
ルウェリン・ヒューズ、ハンス＝ヨゼフ・フェル、朴准儀、高偉俊、葉文昌、佐藤健太、近藤恵  
2019. 11. 1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90 第63回SGRAフォーラム講演録「第4回 日本・中国・韓国における国史たちの対話の可能性：『東アジア』の誕生—19世紀における国際秩序の転換—」三谷博、大久保健晴、韓承勳、孫青、大川真、南基玄、郭衛東、塩出浩之、韓成敏、秦方 2020. 11.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91 第13回SGRA-Vカフェ講演録「ポスト・コロナ時代の東アジア」林 泉忠 2020. 11.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92 第13回SGRA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講演録「国際日本学としてのアニメ研究」大塚英志、秦 剛、古市雅子、陳 龔 2021. 6. 18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93 第14回SGRA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講演録「東西思想の接触圏としての日本近代美術史再考」稲賀繁美、劉 曉峰、塚本磨充、王 中忱、林 少陽 2021. 6. 18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94 第65回SGRA-Vフォーラム講演録「第5回日本・中国・韓国における国史たちの対話の可能性：19世紀東アジアにおける感染症の流行と社会的対応」朴 漢珉、市川智生、余 新忠 2021. 10. 0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95 第19回日韓アジア未来フォーラム講演録「岐路に立つ日韓関係：これからどうすればいいか」小此木 政夫、李 元徳、沈 揆先、伊集院 敦、金 志英、小針 進、朴 榮濬、西野 純也 2021. 11. 17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96 第66回SGRAフォーラム講演録「第6回日本・中国・韓国における国史たちの対話の可能性 人の移動と境界・権力・民族」塩出浩之、趙 阮、張 佳、榎本 渉、韓 成敏、秦 方、大久保健晴 2022. 6. 9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97 第67回SGRAフォーラム講演録「『誰一人取り残さない』如何にパンデミックを乗り越えSDGs実現に向かうか—世界各地からの現状報告—」佐渡友 哲、フェルディナンド・C・マキト、杜 世鑫、ダルウィッシュ ホサム、李 鋼哲、モハメド・オマル・アブディン 2022. 2.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98 第15回SGRA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講演録「アジアはいかに作られ、モダンはいかなる変化を生んだのか？—空間アジアの形成と生活世界の近代・現代—」山室信一 2022. 6. 9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99 第68回SGRAフォーラム講演録「夢・希望・嘘—メディアとジェンダー・セクシュアリティの関係性を探る—」ハンブルトン・アレクサンドラ、バラニャク平田ズザンナ、于寧、洪ユン伸 2022. 11. 1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100 第20回日韓アジア未来フォーラム講演録「進撃のKカルチャー——新韓流現象とその影響力」小針 進、韓 準、チュ・スワン・ザオ 2022. 11. 16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101 第69回SGRAフォーラム講演録「第7回日本・中国・韓国における国史たちの対話の可能性：『歴史大衆化』と東アジアの歴史学」韓 成敏 2023. 3. 22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102 第16回SGRA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講演録「モダンの衝撃とアジアの百年—異中同あり、通底・反転するグローバリゼーション—」山室信一 2023. 6. 14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103 第70回SGRAフォーラム講演録「木造建築文化財の修復・保存について考える」竹口泰生、姜 璿慧、永 旻群、アレハンドロ・マルティネス、塩原フローニ・フリデリケ 2023. 11.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104 第21回日韓アジア未来フォーラム講演録「新たな脅威（エマージングリスク）・新たな安全保障（エマージングセキュリティ）—これからの政策への挑戦—」金 湘培、鈴木一人 2023. 11. 1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105 第71回SGRAフォーラム講演録「20世紀前半、北東アジアに現れた『緑のウクライナ』という特別な空間」オリガ・ホメンコ、塚瀬 進、ナヒヤ、グロリア・ヤン ユー、マグダレナ・コウオジェイ 2023. 10. 30 発行

■ レポートご希望の方は、SGRA 事務局（Tel：03-3943-7612 Email：sgra@aisf.or.jp）へご連絡ください。

SGRA 报告 No. 0106 (中文版)

---

第72届 SGRA论坛

第八届 日本·中国·韩国国史对话的可能性  
20世纪的战争·殖民统治与和解的历史叙述  
—教育·媒介·研究

编辑·发行 公益财团法人 渥美国际交流财团关口全球研究会 (SGRA)  
邮编 112-0014 东京都文京区关口 3-5-8  
电话：03-3943-7612 传真：03-3943-1512  
SGRA 网页：http://www.aisf.or.jp/sgra/  
电子邮件：sgra@aisf.or.jp

发行日 2024年7月30日  
发行人 今西淳子  
中文版监修 于宁  
印刷 (株) 平河工业社

© 关口全球研究会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关于本刊的文章内容，如有疑问或欲引用请与我们联系。  
©Sekiguchi Global Research Association Copying is Prohibited. For inquiries or quotes, please contact us.

SGRA REPORT

SGRA报告 中文版

NO. 106

第72届SGRA论坛

第八届

日本·中国·韩国

国史对话的可能性

— 20世纪的战争·殖民统治与和解的历史叙述  
— 教育·媒介·研究

